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缅怀毛泽东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緬懷毛澤東

## 回忆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新风

薄一波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 100 周年诞辰。

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曾在 1981 年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写过两篇回忆文章，分别发表在《红旗》第 13 期和 12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

近年来，我在研究、思考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历史事件时，接触到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调查研究的宝贵文献，感受很深。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希望我写一写，作为“纪念文集”中的一篇。

毛主席历来重视调查研究。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亲自做过大量调查研究，写下了许多名篇，为全党同志认清我国的国情，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了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用两个月的时间听取 34 个部委的汇报，写下了《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

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 1958 年以来农村工作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中的工作失误，毛主席带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农村六十条”，对我国农村克服严重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60 年夏，因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共产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业大幅度减产。中央和地方一些负责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11 月 15 日，毛主席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同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 1 月 14 日至 18 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表扬了湖北省委对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共产风”的调查，表扬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河北省宝坻县（今属天津市）江石窝生产队的调查，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 1961 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主席率先身体力行，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为期 10 天至 15 天，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然后到广州会合。

三个调查组 1961 年 1 月 21 日离京，赶赴农村。1 月 26 日，毛主席也带着急于了解农村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 2 月 24 日到达广州。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做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动员工作。

这一时期，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在做调查研究工作。

3 月 10 日，毛主席主持的“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11日，毛主席把他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加上批语，印发给“三南”会议各同志。

毛主席刚到广州时，就看到中央广东调查组2月19日报送的《调查纪要》。“纪要”讲到：“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关于队与队的平均主义，“纪要”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在山上，副业门路多，收入高，一个劳动日1.2元；另一个在平地，副业门路少，收入低，一个劳动日0.7元。现在，都降低了，而且降成一样，都是0.4元，两个大队的社员都有意见，收入降低多的社员意见更大。关于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纪要”认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的某些制度上。大沥公社平均每月共发工资500元，可是按人口平均供应的粮食、菜、油、盐、柴等合计每月需2600元，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而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却占了总分配数的80%多。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据典型调查，农村里劳动力多、人口少的家庭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大体都占农户总数的40%左右。人民公社要分配合理，重点就是处理好这两类户之间的矛盾。“纪要”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他看后察觉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规定的12条，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平均主义问题。

3月13日上午8时，毛主席给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并“三北”会议各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毛主席的信还说：《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

信写完后，当天上午，毛主席在“三南”会议上讲话时，反复阐明要搞清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就要深入调查研究。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其他书记的调查研究工作由第一书记抓。毛主席说，医生看病叫诊病，先诊，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下决心，然后布置队伍、后勤等。历来打败仗都是情况不明。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

毛主席原决定派陶铸同志去北京，向“三北”会议通报“三南”会议的情况，并带去他写给少奇等同志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写完后，他改变了主意，请“三北”会议各同志移师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

广州工作会议于3月15日开幕。大家对毛主席的信和《关于调查工作》

一文反映强烈。党中央随即将毛主席的信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学习。根据党中央意见，由胡乔木同志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指示信，于3月23日在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通过后发出。指示信将《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为附件，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各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地讨论”。指示信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在大会讨论这封指示信时，田家英同志边念信稿，毛主席穿插边作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毛主席的解释记录上万字。毛主席坦诚地说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过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他还说，听李雪峰同志（华北局第一书记）讲，河北省原152个县，现在并为63个县，没有一个县委书记作过典型调查。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正像鲁迅说创造社（当年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有一股让群众敬而远之的“创造气”一样，我们共产党人这几年有一股“共产气”。“共产气”要放在心上，不要挂在脸上，尤其不能天天挂着。勤于调查研究，就是很好的“共产气”。

3月广州工作会议结束后，各级党委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同志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炭子冲大队作了44天的调查。他轻车简从，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禾场、食堂、医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既不扰民，又深入群众。在天华大队，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住在养猪场。周恩来同志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调查。朱德同志在四川、河南等省农村作调查。陈云同志6月下旬、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邓小平、彭真同志利用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间隙，在北京市顺义县作调查。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返回原地调查。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同志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同志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同志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同志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同志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同志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同志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

5月6日到29日，毛主席先后批发了陈正人、周恩来、胡乔木、李井泉、邓小平和彭真、张平化、阎红彦、胡耀邦等同志的调查报告。5月6日，毛主席收到陈正人同志关于四川简阳平泉公社调查报告后写了回信。这封通过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转交的回信，除鼓励陈正人同志回简阳农村再作两个星期的调查外，还对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了一段话：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內，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5月14日，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的调查报告，写了一条批语：“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5月30日，毛主席批发了一份材料，要求所有从事调查研究的同志，不要采用“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

5月21日到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四大问题。毛主席在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介绍了少奇同志在湖南的调查研究，并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作调查。根据会议讨论结果，中央在6月15日发出的指示中指出：“中央重申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规定，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北京工作会议结束后，更多的领导同志深入城乡基层单位进行典型调查。

大批领导同志亲自出马，深入基层，蹲下来，进行典型调查，谱写了我们党调查研究史上的新篇章，使这次调查研究新风有了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成为我党六十年代前期转变工作作风、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思想先导，而且也直接结出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农村六十条”就是第一个硕果，它的酝酿、起草和修改的全过程，都是同调查研究新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调查研究的“十月怀胎”，就不会有制定“六十条”的“一朝分娩”。

“农村六十条”（草案）的前身，即邓子恢同志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1960年夏，邓子恢同志受刘少奇同志委托，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组到山西汾阳、江苏无锡等地作调查。在汾阳县的万年青公社，他选了两个调查点：一个是工作比较先进的贾家庄管理区，一个是工作比较落后的金井村管理区。调查回京途中，又在石家庄市郊区钢冶人民公社南钢冶大队作了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他当面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过汇报。在向总理汇报时，他提出需要搞一个条例。得到总理支持，他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所谓“内务条例”，是说条例的内容只涉及人民公社的内部关系，不包括公社与上级党和政府的关系，公社和公社的关系等。“内务条例”（修改稿）共14章，66条，1960年12月23日报送毛主席。1961年3月23日，在起草“农村六十条”的广州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邓子恢同志提出起草条例的倡议予以表扬。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庄、苏南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这几年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没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请他起草一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倡议的是总理（周总理插话：是他给我说的）。“啊！首先倡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邓子恢同志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正稿），后来成为起草“农村六十条”（草案）的重要参考材料。

3月13日，毛主席在“三南”会议讲话，谈到为什么要搞条例时，解释说：高级合作社的章程（即1956年6月30日首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经作废了。几年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条例。当然有些规定，比如：1958年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1959年3月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4月上海会议的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长、小队长的六条（即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等。这许多文件，在一类队灵；在二类队，一部分灵，一部分不灵；在三类队，基本不灵。“可能搞个条例也不灵，但总得搞一个”。由于一般文件不灵，于是想到搞一个条例，这是毛主席看了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某些地区发生严重情况的报告，又听了三个调查组汇报之后才形成的认识。因为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的报告已经说明，中央纠正“五风”的规定，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后来查明，有的还被当成“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中央三个调查组，按照原来的要求，都调查了一个落后队，调查材料也同样证明，中央有些政策，在这些落后队确实没有执行。因此，可以说，毛主席关于搞条例的决定，也是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

经过中央和地方党委初步调查，“三南”、“三北”和广州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认为，那时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或者社员与社员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公社和生产大队（当时的基本核算单位，有些地方称管理区）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公社对生产大队，大队对生产队（当时称小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党委包办各级行政事务的现象相当严重。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这些问题，就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政策目标。

广州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地方党委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不仅进一步摸清了情况，吸取了农民和基层干部克服困难、搞好农村生产和工作的经验，为“农村六十条”的修正提供了基本依据；更重要的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改变了高层领导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逐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使制定的条例真能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六十条”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但当年制定“六十条”时，全党同志在毛主席带动下所兴起的调查研究新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回味。它生动地说明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调查研究则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桥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就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陈丕显

今年 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丰功伟绩；学习他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激发我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毛泽东一生在上海有过许多重要活动。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方大都市，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曾九次到上海进行重要活动，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极为关心上海人民的革命斗争，关心宋庆龄、鲁迅等革命志士的斗争，千方百计取得联系，互相支持。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上海的工作，作出过许多重要批示、指示，亲自予以指导。同时，他有更多的机会到沪视察基层、访问民主人士、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他光辉的思想，伟大的风范，将铭记在上海人民的心田，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较多机会参加陪同、出席会议、执行他的指示，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的风采。岁月流逝，抚今忆昔，虽只是部分片断，但他留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却是那么经久而弥新。

—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是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天堑，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地把解放、接管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着想，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了“完整保全上海”和“防止蒋介石焦土政策”的战略思想，要求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能完好地回归人民。在实施解放、接管上海过程中，他亲自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近20份电函，运筹帷幄，成功地实现了人民解放军与上海地下党的里应外合，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战火硝烟刚刚熄灭，全市各界人民在新政权的领导下，立即投入到整顿和恢复经济的工作中去。

上海刚解放的头几年，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侵略，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掠夺，运走大量黄金白银和各种财富。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工商业凋敝，通货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勾结，对上海实行武装封锁、派飞机轰炸，企图窒息上海经济。上海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对全国有极大的影响。上海解放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就采取一系列重要决策帮助上海克服困难。首先委托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并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针对当时爆发的以“两白一黑”（指棉纱、大米、煤炭）为主的涨价风潮，以上海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经济斗争，很快取得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1949年底，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上海许多私营大中型工厂企业负债甚多，难以维持，要



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毛泽东接电后，指示陈云了解上海工商业家困难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妥善的对策。在毛泽东的重视、关怀下，中央拨款华东 500 万，大部用于收购沪产商品，还有部分用作贷款。1950 年 2 月 6 日，美制蒋机 17 架分 4 批袭沪轰炸（重点轰炸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死难同胞近 500 人，受伤者 600 余人，并造成全市大面积停电，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敌特乘机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但上海党政军和各阶层人民在市委领导下，以大无畏气概开展了反轰炸斗争。从 3 月 12 日至 5 月 10 日，在两个月中陈毅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连续发了六份电报，报告面临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对此，毛泽东作出了许多指示，使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贷款；救济失业工人，妥善安排就业等重要政策得以及时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精神，后来集中体现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根据中央的决定，上海有步骤地进行了头三年中规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胜利地实现了上海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经过二年的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海市的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即将完成“三大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毛泽东亲自来上海调查研究。1956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视察了公私合营申新九厂（现国棉二十二厂），毛泽东关切地向荣毅仁询问了工厂在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情况。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大家说，苏联取得政权后，一个命令就把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为国有，但中国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的情况，不硬性地把苏联一套搬过来。毛泽东还说，工厂公私合营后我们怎么办？他说就是要把工厂管理好，要对代理人做工作，让他们认识到做社会主义的经理是光荣的，过去是为资本家办事，现在是为工人阶级办事。在此前后，毛泽东还视察了上海港口和江南造船厂。1955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登上“港申轮”，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港厂 1 的新貌。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港的发展情况，随后意味深长地对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理好。他又对陪同的领导干部说，上海的干部要好好学会管理本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江南造船厂，他看到这个百年老厂已经能建造潜水艇，非常高兴。厂领导向他介绍，开始是苏联转让生产的，图纸材料都是向他们买的，先向他们学，以后我们要自己生产。陪同参观的市委负责人插话，“不但要学会，还要超过他们”。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说，“要有这种勇气”。

从 1955 年 12 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抽出大量时间，听取中央 34 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汇报关于发展轻工业和沿海工业时，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 70% 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还针对有些同志怕打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的思想，指出：“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上空也没有原子弹。”又说：“不用说有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业，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

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也完全合算。”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这是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对我国建设经验的总结。他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分析了十大矛盾，论述了十大关系，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历史证明《论十大关系》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文献。其中论述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对指导上海工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者底子”的思想，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5月3日陈云到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指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并在市委负责人和工商界上层人士中进行了传达。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在全面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上海各级党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措施，注意调动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次，全市各部门、各地区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围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一步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以及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在工业布局的调整中，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蕴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其间虽然遭到“大跃进”的错误影响，但由于贯彻这一方针没有间断，在经济调整中又基本上纠正了“大跃进”的失误，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依靠上海科技力量向“高、精、尖”发展，到1965年上海已经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先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基地。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在原有工业基础上发展了机电、仪表、汽车、化工新材料等工业，造出了我国自己的第一代手表和轿车。六十年代初，上海已经能研制、发射探空火箭，运用刚刚问世的激光技术，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和10万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制造出2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每秒运算20万次的电子计算机。到“文革”前，上海已有70多项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香港、台湾等地。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是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立足点。1957年7月8日，毛泽东视察上海机床厂。这是一个精密磨床的专业制造厂，新中国的第一台磨床在这里诞生，第一代掌握磨床制造技术的职工队伍在这里成长。毛泽东得知解放后的七年中，上海生产的磨床供应全国，支援了各地的建设，说：“国家建设需要这样的工厂”。当听到工厂由原来的仿制到已能自行设计磨床后，他非常兴奋，指出，“要走独立设计的道路”，并强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要“为我所用”。1958年9月，毛泽东在张治中、罗瑞卿的陪同下沿着长江巡视，在视察了武钢、马钢后，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上海，28日，参观刚刚建成的上钢一厂2号转炉，这座转炉是工人技术人员只花了47天建成的。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登上平台看转炉出钢水。王祖字厂长向毛泽东介绍，2号炉是侧吹转炉，特点是对进料铁没有特殊要求，具有较大的适应性。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这种炉不错，是吃粗粮的。”他握着工人的手鼓励说，“好好干，大有可为。”简单的几句话，充分体现着他对上海工人的信赖和希望。

万吨水压机的问世，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骄傲。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开始试制的。1958年5月，在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国制造万吨水压机的建议。当天毛泽东就批示

给邓小平总书记：“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此信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大家。在毛泽东的重视、关怀下，确定自力更生制造万吨水压机，并将此任务落实到协作条件较好的上海。当时万吨水压机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而那时，我们的国门还来打开，一切只能靠自己。在总设计师沈鸿、副总设计师林宗棠的带领下，上海的工人、技术人员发挥聪明才智，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先搞出缩小10倍的一千二百吨水压机，再把图纸放大制造。在六十年代初，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终于诞生了。在五十年代后期，上海工人阶级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涌现了一批技术革新能手。1960年3月19日，毛泽东为表达他对技术革命运动的支持和鼓励，专门在锦江饭店邀请部分上海革新能手吃饭。席间他勉励大家说：“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尤其你们在大搞技术革新的时候，要记住这条真理，不试验，不失败，不成功！凡事都要经过试验，在失败中取得经验，然后才会成功。”毛泽东的这些教诲，一直鼓舞着上海的工人阶级，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仍有启迪。

## 二

在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中，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身体力行，为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他谱写的许多生动的篇章。

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要贯彻“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建国后，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对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人民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政府里安排了职务。曾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沈钧儒等一批著名人士都参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有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的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有的当上了部长。对他们不仅安排位子，还赋予实际工作的权力。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毛泽东都十分重视。1950年春天，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致函毛泽东，反映：川沙、南汇、奉贤三县（当时还属苏南区），有灾民20万，征粮不但不减，还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毛泽东阅后马上电告华东局和我，并要我亲自赴三县作调查，以给黄先生一个切合实情的答复。我接电后，马上与松江地委书记深入三县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不久，在中央开会期间，毛泽东还专门把我介绍给黄炎培，要我当面向他汇报情况，提出妥善解决的办法。我向黄炎培副总理汇报说，他向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满意，并对我说了鼓励的话。

建国初期，毛泽东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真诚相待，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党与各阶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较好地处理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关系。1952年，我刚调到上海不久，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反映上海中小工商业者关于税收的意见。那时，刚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一段时间里私营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私营企业主对1952年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9月底应该缴三分之一，普遍感到有困难。黄炎培先生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关系上入手。毛泽东赞同黄炎培的建议，“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利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1952年9月，毛泽东与黄炎培还就“五反”后如何帮助中小工商业解决困难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提出了“联营”的办法，即大厂扶助小厂的“大带小”，以后改为“合作社”等措施，毛泽东带头与党外人士密切交往，使党和政府能经常听到不同的声

音，从而使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大事、要事，办得更谨慎、更好些。

毛泽东生前非常关心科学事业，积极支持科技人员的研究。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摩尔根遗传学受到批判，专门从事遗传学研究的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无法进行工作。当毛泽东得知遗传学不同学派有争议，他专门听取了谈教授关于学术争鸣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听后说。“应该取长补短”，并鼓励谈教授：“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继续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向谈家桢教授询问遗传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对谈教授说：“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提出的繁荣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使这一学科研究得以继续并发展。毛泽东在世时，还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曾参加制订全国科技十二年规划的工作，毛泽东接见过他。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苏教授，握着苏教授的手亲切他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毛泽东还注重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他曾勉励科学家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正确的思想去指导科学研究。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西路文艺会堂参观我国在上海发射的第一枚火箭模型，他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在《实践论》指导下进行火箭的试制经过，赞赏他们这种做法，并指出研制火箭要“循序渐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毛泽东喜欢结交朋友，曾同许多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交上朋友。毛泽东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关怀备至，使他们由衷地敬重人民的领袖，感受党的温暖。在这方面，有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毛泽东在上海时，曾亲自交我办过两件事。一是1960年6月，毛泽东要会见张维夫人，嘱咐我去接她，同时代他看望病中的张维及其家人。张维是毛泽东的湖南故友，早年曾共同创办《新湖南》。在斗争激烈的革命年代，张维母亲曾掩护过毛泽东。以后，张维走从医救国的道路，在抗战期间，为新四军筹运过药品。上海解放前夕，张维任上海卫生局长，毛泽东通过地下组织捎去口信：张维、赵祖康可以不必去香港、台湾，欢迎解放后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建国后，留在上海的张维自愿选择了卫生教育事业，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执教，被评定为一级教授。1957年张维不幸中风，毛泽东得知后鼓励他安心养病。此次，毛泽东就是想通过会见张夫人，进一步了解和关心张维的健康状况。会见时，张夫人转达了张维思念毛泽东之情。毛泽东听后很激动，表示下次来沪一定与他见面。翌年，毛泽东来沪期间，专门会见了这位故友，并一起照像，留下了促膝深谈的亲切场景。第二件事，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提出会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刘大杰，要我去把他们接到他的住地。这天是星期天，他们到公园去了。经过很大周折，好容易在公园里找到了这两位教授。这次会见犹如老朋友的聚会，谈话面很广，从《辞海》修改谈起，谈到教学改革、学术争鸣、宋代理学与乾嘉学派的是非、古典文学的臧否及京剧现代戏等，毛泽东与他们谈笑风生、谈古论今，并鼓励他们正确对待争鸣，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反映了毛泽东崇尚学术争鸣和他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对民主人士、专家学者很重情谊。虽然他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与上海不少人士常有书信往来，对有些生活困难者还给以资助。1956年毛泽东得知上海中国画院的张叔通、吴湖帆两位老画家生活不宽裕，他通过黄炎培给他们各送去500元钱。张维生病后，毛泽东从稿费中提出5000元，托专

大送去，使张维一家感动不已。听说后来这笔钱根据张维的意见存入银行，以此教育子孙后代，铭记领袖的关怀。

毛泽东是位时代的伟人，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他也和其他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难免会犯错误，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使党和国家遭受祸害，许多好同志受到迫害。但是，从整个革命历史看，毛泽东不愧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即使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审查时，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的信赖依然不变。我在“文革”期间也受到8年的迫害，当时我心存一个坚定的信念，毛泽东是了解我的，关怀我的，相信总有一天毛泽东会解放我的。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还是坚持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并向毛泽东写信申述自己的情况，果然毛泽东作了批示，“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不得不于1974年年底释放了我。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批评“四人帮”的结帮阴谋，及保留邓小平党籍，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条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正确政策得到恢复和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前我们要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坚信，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不断地继续下去，毛泽东思想将永远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永放光芒。

## 毛主席的教导常铭心间

朱学范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回想起他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刻，为我指明前进方向，给我的谆谆教导和亲切的关怀，历历在目，感激不尽。我把这些常铭心间的往事叙述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的毛泽东主席的深切怀念。

###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面临着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激烈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坚持法西斯独裁的一党专政，欲维持一个旧中国。我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在工人运动方面，坚持国共两党工会继续合作，坚持中国劳动协会和解放区工会联合，并共同开展团结国际工人阶级的活动。当时，举世瞩目的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定于1945年9月25日在巴黎举行，讨论成立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问题。我正在力争与解放区工会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前往参加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9月10日邀请我与易礼容到上清寺桂园会见。他身穿一身整洁的蓝布中山装，身材健硕魁伟，态度谦逊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度。当时他在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正在商谈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十分繁忙，为什么在百忙中还要接见我和易礼容？因为当时迫切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人阶级的巴黎会议的问题。我曾经向国民政府社会部提出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我再次要求，提出了三条理由：一、世界大战业已结束，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国际工会组织，没有苏联参加，现在苏联也参加了，这表示国际工人组织不分社会制度团结一致。国际工人的大团结，对防止法西斯再起有好处，中国对日抗战已胜利，全国人民要求团结，中国工人更要求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对建国有利。这次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就是表示中国工人大团结。二、政府已经同意共产党的代表与政府代表一起去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为什么中国劳动协会就不能和解放区工会一起去参加国际工会会议？三、现在国共两党在求合作，为什么工会就不能共同去参加世界工会大会？可是，社会部仍蛮横地不予同意，顽固地坚持实行封锁解放区的政策。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我具体地谈了出席巴黎会议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要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我同意他的意见。9月9日，周恩来给我送来了亲笔信，重申以董、邓、章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意见。当天，我去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否则，我自己也不去参加。因为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工会，已不分社会制度和党派联合在一起，劳协如果单独参加会不受欢迎。那时候，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有压力，英国工会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一再催问：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什么时候启程？顾维钧向外交部打电报，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终于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在毛泽东主席接见时，向他报告了这个情

况，他听了表示很高兴，频频点头，用郑重的语气，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他又说，这次打破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对解放区的封锁，具有重大意义。他还向我们阐明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政策，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的解决。他的一席话，使我明确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前进的方向，增强了我为全国工人争取和平民主，把工人运动与整个民主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决心和信心。

#### 第一次接到毛主席的电报

1946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破坏了政协决议，公然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6月在各地制造镇压民主和平运动的惨案，对劳协和我不断进行迫害。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8月6日，武装接收重庆工人福利机构，拘捕劳协工作人员。11月18日，我发表反对排斥解放区工会出劳协和反对伪国民大会的声明，将劳协总部迁到香港后，11月25日，国民党特务在香港制造车祸，将我撞伤。国民党当局下令外交部吊销我的护照，企图阻止我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正当我的处境十分困难之际，1947年12月，刘宁一通知我，中共中央欢迎我从欧洲到东北解放区。1948年2月28日，我到达哈尔滨，29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激情打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3月4日接到他们的复电，电报中说：“欣喜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的信徒的同样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这份电报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谋求利用合法可能进行工人运动，组织工人，保护工人切身利益，到处奔走呼吁。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连这样一些并不触动国民党统治基础的活动和要求，也是不允许的。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工人阶级不可能以合法斗争来取得解放，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解放全国工人、农民和人民。我到了解放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同解放区军民一道为推翻旧中国，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是我走上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我刚到解放区，就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给我指明了奋斗目标，而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为解放全国工人和人民，建立新中国而战斗。

#### 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工运报告

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我在这个招待会上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人运动的讲话，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听得特别认真，记得很牢。他的讲话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这次会议在这个形势下开是很需要的、必要的。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的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我参加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在大会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方针的时候，我是举手赞成的。但是对这个方针的深刻意义不完全认识，听了毛主席的这样透澈的阐明，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认识。对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工会，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的阶级关系，如何贯彻毛泽东

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我心中有了一个底盘，就是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40 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高兴地看到我国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快改革开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切，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战胜利后，把旧中国逐步改变成新中国的战略方针，使中国人民深受痛苦、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改变成为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一切，使我从长期以来在谋求改善我国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曲折、崎岖的途中，得到它的指引，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走上了解放我国工人阶级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



## 谆谆教诲铭记心间

帕巴拉·格列朗杰

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者。毛泽东主席在西藏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各族人民对毛泽东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民族理论，追思他老人家的教诲和接见我们时的情景，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毛主席历来十分关心西藏人民。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西藏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提出了西藏革命的任务和实现这个任务的步骤、方法，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把西藏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刚升起的时候，毛主席代表党和国家号召西藏人民，“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汉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他明确地指出：“西藏人民是热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中央的号召，当时虽曾遭到过西藏上层亲帝分子的竭力阻挠，但由于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成功地运用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原则，争取团结了爱国进步力量，最后圆满地达成了西藏和平解放的 17 条协议，使西藏得以和平解放。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成为我们各民族平等友爱合作大家庭的一员，这是西藏民族从衰败走向兴旺、由落后走向进步、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分裂走向团结的重要转折，对于改善和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前夕，毛主席又指出，西藏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针对当时西藏的特殊性，毛主席同时提出还要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分作两步来完成。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国主义分子，然后再逐步地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制定的这一策略是十分正确的，使西藏的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毛主席还十分重视西藏的民族和宗教工作，关心爱国上层人士的学习和生活。他谆谆告诫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毛主席分析了西藏地处边疆，过去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又不断进行挑拨离间的实际情况，看到要解决好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和宗教问题，所以他要求在解决其他任何问题时，首先要想到这两件事，一切工作都不能急躁冒进，必须慎重，稳步前进。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自和平解放西藏 17 条协议签订以来，毛主席曾多次接见西藏各种类型的参观团，反复阐明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56 年国庆节前夕，我参加西藏少数民族参观团来到北京，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那天，风和日丽，灿烂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首都北京城。

我们全团 200 多人，个个早已身着华丽的藏装等候在住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我们乘车去到中南海后，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首先接见了参观团秘书长以上的负责同志。作为参观团的名誉团长，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的旁边。毛主席精神矍铄，满面笑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询问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毛主席说：“你是昌都的大活佛。昌都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很大贡献。”当时我年仅 16 岁，心情既激动又显得有些紧张。参观团中，昌都的成员比较多。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回去以后，要在西藏工委的领导下，以团结为重，大局为重，继续为西藏的团结、进步、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然后，正式接见参观团全体成员。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来，参观团按照藏族的礼节，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敬献了哈达，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还同参观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离开中南海回到住地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立即把当天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接见时的情景记录下来，留作永久纪念。

在这以后的年月。我曾多次有幸见到毛主席，尤其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是 1972 年 1 月 10 日，全国人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的日子。当时我正在北京，接到通知前去八宝山烈士公墓礼堂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那天，毛主席身着灰色大衣，站在追悼行列的前面，心情显得异常沉重。毛主席忽然发现了我，一面向我招手，一面低沉而亲切地叫道：“帕巴拉！帕巴拉！”我立即奔了过去，紧紧地握着毛主席老人家的手，万分敬重地向他问好。毛主席默默地端详着我，然后说：“你已经长成大人了！”毛主席这句话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此时此刻，一句重千钧！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是啊！我长成大人了。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我的成长和进步，无不倾注着党和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1950 年 10 月昌都解放后，党和人民解放军就一直很尊重我，关心我的学习和进步。1951 年，当时我刚 11 岁就担任了昌都解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1956 年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又让我在自治区筹委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又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切都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从毛主席当时的神情中看出老人家是在勉励我要更多地为西藏人民做工作：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到毛主席却成了最后的一次诀别。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溘然辞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慈祥的面容，谆谆教诲，却牢牢地铭记在我的心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西藏全体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心中！

毛主席辞世已经 17 年了，17 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藏的变化更是举世瞩目的。我决不辜负党的关怀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更加勤奋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毕生精力。

## 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

杨得志

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几十年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创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是这支军队中的一名老兵，是人民战争的参加者，曾在这种战略战术的指引下冲锋拚杀，也曾运用这种战略战术指挥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每当回忆起走过的烽火历程，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到毛泽东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上，参加湘南起义后；经过汝城、酃县战斗，跟随朱德、陈毅同志到达耒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说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带领的部队，听说过他亲率部队掩护我们上山，却没有见到过他。为会师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他和朱德、陈毅等同志坐在用青竹和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他高高的个头，穿一身灰布军装，脸膛瘦削，头发很长，但很有精神，明亮的目光扫视着面前欢腾却并不十分整齐的队伍和群众。大会开始后，陈毅同志首先宣布将所有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接着是朱德同志讲话，讲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两支部队加强团结，去夺取胜利。朱德同志讲完话，毛泽东同志才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会师之后，我在特务营当战士，特务营负责警卫军部，我站岗放哨时，常见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领导人。朱德亲切朴实，陈毅开朗活跃，毛泽东则文雅多思，他有时急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有时点头致意，有时也停下来和我们说几句话，声音尖细，文质彬彬，讲话风趣幽默，平易中隐含着深刻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同数倍的敌人巧妙周旋，多次打败敌人的“进剿”，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和赤卫队，特别是著名的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更是鼓舞人心。

不久，我们又跟随毛泽东、朱德出赣南、战闽西，反对敌人的“围剿”。这时期，我很少看到毛泽东同志，但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就在我们的队列里，指挥着我们的战斗。他“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气魄，坚定了人们的信心，他“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妙计，引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如果说，我刚报名参军时还是出于生活不下去而寻找生路，那么到了这时，已开始懂得了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那时，我们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在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在说毛泽东，也是在说胜利。

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很多硬仗、恶仗、苦仗，伤亡却极大。当时，我虽然在团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所知甚少，不过也从实际中感受到那种与强敌拚消耗，和毛泽东所提倡的打法不一样，再看到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伤员运送、治疗都十分困难，

仗也越打越艰苦，心里就憋闷得慌。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打了一个月左右，牺牲了许多同志，最后还不得不撤下来，走上了长征的道路。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位置，我们才四渡赤水，巧过金沙，翻越雪山，走过草地，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每想到这些，我就想到“用兵如神”的话，想到他从根本上打破了战争如神物的观念，正确地认识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指挥我们无往而不胜的历史。是啊，他的英明和正确，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长征途中，我们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没有机会看见毛泽东同志，到达甘肃省的通渭城时才见到他。那天，我们刚到驻地一会儿，他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了我们团住的地方。政委肖华同志问我：“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有什么东西呢？何况事先又不知道，我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让机关的同志赶快买了些。毛泽东同志一到，就拍拍身上的尘土，和我们握手，询问部队情况。我请他坐下吃梨子，他一边抽烟，一过看着铁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我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里又感到很奇怪：他要辣椒粉干什么？他可能看出了我心里的疑问，望着我说：“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我说没吃过！他就把辣椒粉撒在梨子块上说：“噯，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看。”说着满有兴致地吃了起来，我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

吃梨的时候，我请他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他说，“你们这个一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的确，他在我们离开通渭之前就走了。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还在想着他说的话。他的话不但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含义深长。这之后不久，就打了直罗镇战役。他又随我们一大队行动。山上的树不多。敌机飞来扫射，我们部队没有高射武器，我担心着他的安全，几次劝他隐蔽，但他始终在阵地看敌情，沉着指挥我们，不时轻松地说着幽默的话。等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听他讲演时，对他讲话的幽默以及幽默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感受就更深了。他穿一身灰布军装，连帽子也不戴，乌黑浓密的头发，长而且乱。他打着手势，讲政治，讲军事，风趣幽默，好懂好记。记得一次讲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他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拉；后面要人推，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他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乡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们抗大军事队在往三原搬迁的路上举行了学习的结业典礼后，就奔向抗日前线，到1944年1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才又见到毛泽东同志。他把我找到枣园他住的窑洞，对警卫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向他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他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对他说，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并说在抗大时听过他的几次讲演。他笑着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

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还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这使我感到毛泽东目光远大，对干部成长十分关心。

“七大”闭幕后，我便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接着便是三年解放战争，从华北打到西北，不论是邯郸、清风店、石家庄战役，还是解放太原、兰州和宁夏，都是按照他的战略和战术歼敌取胜的。特别是平津战役时，蒋介石想利用华北之敌阻止我军南下或增援华东战场，傅作义本身还有西窜企图。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一特点，采取“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的方针，先稳住敌人，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敌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然后再斩头去尾，分段歼灭，在重兵包围下，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当时，我指挥的部队打的是敌人主力的腰部新保安，所以对此体会根深。我们说，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能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充分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兵团又奉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我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那天，他的精神很好，也胖了一些，见到我就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握着连晃了几下，说：“欢迎你呀，得志同志！”还向刘少奇、朱老总和董老等领导同志说：“你们都认识吧，此人大名扬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啊！”当周总理说我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团长时，他又风趣地说：“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他又转过脸对我说：“这次请你们回来，就是要你们给我们讲讲朝鲜的事。不但给我们讲，还要给群众讲，群众可是欢迎你们的啊！”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和平时期，看到毛泽东的次数就多了，在中央和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听他讲话；在不少场合，受到过他的接见；有几次，单独向他汇报过工作；1964年大比武，还陪他看过济南部队的军事表演，等等，总是能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

最难忘的，还是送他远行，在人大会堂里，他安卧在松柏和花丛中，我和许多人一样，轮流守候在他的身边。那一刻，我看着他宁静的面孔，又想到了井冈山上看到他的情景，想到40多年间在他指挥下的战斗征程，他的伟大气魄，他的斗争艺术，他的风趣幽默，总是在眼前浮现。感到他虽然停止了呼吸，但留下了辉煌的贡献和伟大的思想，他的贡献是历史所记住了的，他的思想是时间所不能混灭的。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这里记述的，只不过是亲眼见到的一点点。即使这一点点，不是也放射出了他耀眼的光辉吗？

## 毛主席的召见

杨成武

当第二十兵团开赴朝鲜战场的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找我去谈话。于是迅速地从天津赶到北京。

也许是由于心情有些兴奋的缘故，或许是大自然的造化原本如此，我感觉到北京的气温显然要比天津高几度。空中的风和阳光，地面上的槐树、白杨和花草，乃至大街上人流的着装，似乎都更早地显出了初夏时节的特征。北京，给人愈来愈多的亲切、热情和庄严之感。

地理位置的变迁，往往体现着时代的转换与革命的进程。自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由西柏坡迁至北平之后，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这座历经世界风云的雄关通衢，便一改往时的风貌和声望，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和迎接全国解放的领导中心。仅在同年 3 月至 9 月间，北平就召开过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民主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全国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多篇评论，政协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宣言》，也都是于这一短时期内在北平发表和颁布的。自开国大典之后，北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我。同我一起进入中南海的还有第二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同志。

中南海是全国人民的领导中心，也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领导中枢。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来到中央领导同志办公处丰泽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内见到了毛主席。

在我向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致以军礼的时候，毛主席很随和地打了个手势，说：坐下吧，请坐。

落坐后，未等我汇报二十兵团准备出征的情况，主席就说起赞扬的话来，我听军委的同志说了，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的准备，这很好。

我向主席报告：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伯牺牲，要多打胜仗。接着，我简要地汇报了部队待征的概况。

主席说：是的，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它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主席谈到朝鲜战场的局势时说：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尤其是今年 4 月 22 日起，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粉碎了和正在粉碎着“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战争双方已转入了战略对峙阶段。这一形势的出现，正如斯大林答真理报记者间时所说的，并不在于美军指挥员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了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呀，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咯。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军队的同志，头脑要清

醒，不能有速胜的想法。五次战役都证明了即使一次包围了敌人一个整师或者一个整团，也是很难歼灭的。要看到，我们是有过用兵过猛，张口过大的教训的。现在就是要作长期准备，争取早日结束战争。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打促谈……

我向主席保证，坚决按主席和军委指示办。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我们对这场战争不能持摇摆的态度。美国要象当年德、意、日那样，称霸世界，世界人民不答应，我们也不答应。当然，如果它不派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来，我们是不会同美国作战的。要知道，建国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出兵朝鲜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美帝国主义要侵略，要打仗，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它几仗。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要“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准备以21个军分三期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代表第二十兵团指战员向主席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主席边抽烟边喝茶边谈。他时而拿一颗烟，并不马上抽，而是说着话，手上捏弄着烟，捏弄一阵子，把烟捏松。那烟是四川特制的雪茄，比一般的雪茄烟短，比普通香烟略粗。当几句话告一段落，才拿根火柴，使劲擦着，点上雪茄，接着抽下去。他有时喝一口茶。当一缸子茶喝完，只剩下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咽下去。他还保留着湖南人吃茶叶的习惯。所有这些动作使谈话产生一种特有的节奏。我们都无拘无束，随着主席的谈话，自由地插话，整个气氛融洽、热烈。

主席说：呵，是的，你们是京津卫戍部队。主席以浓重的湖南乡音，伴以自然、简单的手势，回到朝鲜战争的话题上来。论战局如聊平常事，千军万马犹从眼底过。当一位工作人员走进门来，在主席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席忽然挺身而出，对我们说：吃饭，我们一起吃饭去。

毛泽东主席要留我们吃午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有点为难，说：主席，你吃饭去吧，我们走了。

不，吃了饭再走，一顿便饭。主席边说边以手势招呼我们往门外走。

时间将近正午，颐年堂门外阳光灿烂。门前的空地上搭着一个简易席棚，席棚下的阴凉里有一张木质方桌，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饭菜。看情景，这顿预先没有料到的午餐，是推辞不了的你和你们的兵团就要入朝作战了，这顿饭算是为你们饯行吧。主席领着我和张南生走向席棚下的餐桌。

毛主席要为我们入朝“饯行”，使我顿生一种甜润之情。这是全国胜利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之前，主席对我的召见。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在重要时刻，我多次聆听主席的指示，每次见面，我都觉得主席总是这么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总是这么平易近人、宽怀大度的。

红军长征途中，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去他那里受领任务。在当时的党中央的临时驻地毛尔盖，在普通的藏民住房内，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决定的。如果我们掉头

南下，那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他对我们先锋团前去探路作了几点重要提示，并让我去见徐向前总指挥，听取具体的交待。见过徐总指挥，我遵嘱又回到主席住处。这时，邓发同志端来一盘六个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说，你一天没有吃饭了，这里离你们团部还有几十里，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我不知道这就是主席的晚餐，吃了两个青稞面馒头后，一听说这顿饭是主席让给我的，我怎么也不肯吃了。后来，主席来了，非要我吃不可，我又吃了一个。当晚，我赶回了部队。此后，经过几天几夜的艰难行程，我们团在充满死亡恐怖的水草地里，终于踏出了一条北上的路。

12年后，即1948年在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毛主席通知我，他有事要和我商量。见面后，主席先是高瞻远瞩地谈了一番战争形势，然后他让我选一个我熟悉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我们遵嘱迅速制定了护送方案，次日即向主席做了汇报。过了10几天，毛主席电告我们，同我谈的任务撤销。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主席身体不大好，斯大林邀请他去苏联疗养。主席原拟取道东北赴苏，后因故未能成行。

同年8月，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一起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我交代任务时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战略决战，突破口选在东北，争取首先全歼东北之敌，解放东三省。为了配合东北作战，军委的战略部署是“东北打，华北牵”。随后，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华北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傅作义必救。你们不但要占领绥远，还要经营绥远，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使之不出关、少出关，以保证东北野战军的胜利。并提醒说，这可不同于毛尔盖过草地，那时你带一个团，不过2,000人。现在是个兵团，有四个纵队，还有骑兵师、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10多万人都要吃饭……总之，你们必须把困难想够、想透，向指战员讲清楚，东北、华北是一盘棋，你们是间接地参加东北的作战。这是第一点，叫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第二点，就是要做好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就赶紧补充。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我护送他到山海关。他回国时我又到山海关去迎接他，与他同车赴京。火车开动后，他把我召到他的车箱，谈到了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对于北平解放建树了大功，他所发表的《通电》堪称赤诚之言，高远之见。主席说：人家对我们任用傅作义有意见，地方上的同志有，军队的同志也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呢，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新革命，还有什么革命不如反革命啦。主席问我：杨成武同志，有没有听到这种说法？

我如实回答：我听到过这种反映。

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咯。

是的，这种说法不好。我们建立了新国家，就象建了一座很好的大厦，非常好的大厦。主席接着说，有了非常好的大厦，里头总不能空空洞洞的嘛，必须有很多好的陈设：沙发、桌子等；也要有古董；还要挂上字画，摆上花，安排得当，才不是单单调调、简简单单的嘛。对不对呀，成武？可是，我们有的人哪，就只要他自己的陈设，不要别人的陈设。



主席说这一番话时，我认真地听，默默地记。他关于“大厦”的比喻既形象，又很深刻。我理解，他是劝戒我们要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各方面的力量，以利于建设新中国，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更加兴旺。

主席还说：革命当然比不革命好咯，革命总是革命的，不革命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老革命贡献是大嘛，新革命也有贡献。说革命不如不革命，这样的话不好嘛。是不是？

最后，主席又特地叮嘱：要讲清道理，我们的同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这个道理的。

主席安全地回到北京。

我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执行接送任务的情况时，转达了主席在途中一番谈话的内容。为宣传和贯彻主席的谈话精神，华北军区的《华北解放军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在我们入朝作战前夕，主席对我的谈话和款待，寄予了对兵团指战员的殷切希望。我和张南生一起随主席来到席棚下的餐桌边。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她招呼着我们吃饭。

桌上的菜是几碟家常菜。特别一点的就是摆了一瓶酒和几个酒杯。酒是红葡萄酒，杯子是高脚玻璃杯。

主席举起一杯酒，说：我祝你们一杯酒！

我立起身来说：主席，应该是由我们来敬你的酒。

不，我来祝你们的酒！祝你们到了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胜仗！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侵略的，是为了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

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主席连连用手示意，让我吃菜，又接着刚才的话头说，抗美援朝，也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志愿军要尊重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谦虚谨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他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这是胜利的基础。要和朝鲜人民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

我记住了主席的叮嘱。

主席第二次举起一杯酒：再来一杯！

我饮了第二杯酒。

主席说：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自从5月21日开始，所谓的“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中朝部队已于23日向北转移。24日在我主力北移之际，美第一、九、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间严峻起来。面对此情况，彭德怀同志准备组织三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7月底。他估计，敌人很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港口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亦将难守。为此，你们二十兵团必须在此之前赶赴朝鲜前线，以稳定战线，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换句话说，你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

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我说：主席，我们都记住了。我想代表第二十兵团全体指战员，向他敬上一杯酒，刚要举杯，主席却第三次举起了酒杯：来，干了这杯酒。

主席喝第三杯酒时说，要注意战场上的局势，注意军事的和政治的形势。你们给“志司”的电报，重要的要报军委……

三杯美酒，几番叮嘱。每番叮嘱都包含了重要的内容，每一杯酒都渗进了殷切的希望。主席的接见和饯行，增添了我们出征的豪情和完成作战任务的信心。“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人王翰的《凉州词》。王翰是晋阳即今太原市人，我们兵团参加过解放他家乡的战役。对于古人的这一诗作，尽管后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我初读它时就觉得不错，不失为一首真切动情的边塞诗。此刻，我觉得它格外豪爽、大度。也许，是由于注入了我的主观情思吧。

饮了酒，吃了饭，我向公务繁忙的主席告别，离开了颐年堂，离开了中南海。

当我坐在车上返回驻地时，心潮仍在起伏，我思索着毛主席的指示，思索着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

抗美援朝确实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壮举。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力量非常菲薄，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巨大的磨难，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需要休养生息、重整家园；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年征战，相当疲劳，需要休整，需要建设，需要改变单一步兵的现状，即组建海军、空军、炮兵以及装甲部队等等。而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空军，拥用威慑世界的原子弹，锋镝甚盛，且挟持十几个国家军队，威胁鸭绿江边，第7舰队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进行疯狂的挑战，企图先占领朝鲜半岛，作为尔后进攻我国的桥头堡。在这样严峻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支援我们的邻邦，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和伟大的气魄，作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曾几何时，经过几次战役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使全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刮目而视。

我这样想着，回首西望时，中南海醒目的红墙已经被楼群遮盖了。我不禁想：有如此英明的统帅，有如此伟大的军队，我们的正义的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败！

这天深夜，我回忆着主席的教诲和他对出征部队指战员的期望与关切，备感亲切和责任重大，思绪联翩，竟夜难眠，禁不住披衣伏案，写成小诗一首：

如火电令催东征，  
领袖召见紫禁城。  
一席妙语明方略，  
三杯美酒寄深情。  
热血滚滚翻激浪，  
豪气漫漫贯长虹。  
不负主席不负党，  
此去誓将敌虏平。

---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 难忘的回忆

陈再道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年诞辰之际，我作为一名跟随他老人家南征北战几十年，有幸曾多次当面聆听他老人家亲切教诲，对他老人家怀有深厚感情的老战士，心情格外深沉。我把自己与他老人家生前接触时的情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对我人身保护的情况记叙下来，以表达对这位举世伟人的深切缅怀和思念。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混乱到了非人力所能遏止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操纵策划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事件”。

是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参加“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一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在这次会期间进行当中，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讲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结束后，我和钟汉华政委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造反派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也引起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结果是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

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时间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目前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则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话，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作好了准备。

毛主席对武汉地区的形势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0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们，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我们得知，毛主席此行，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

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7月14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住进了东湖宾馆的乙所。

东湖宾馆的7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荫路上，就象走进了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接着，周总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汇报。周总理在汇报会结束时讲了话，这个讲话的提纲是经毛主席审阅过的。周总理强调，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好团结。周总理还建议我和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军区“支左”的有关事实。1967年初，鉴于

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武汉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武汉的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造反组织动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参与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央文革小组认定武汉军区在“支左”大方向上犯了错误。

7月18日晚上，周总理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梅岭一号。毛主席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毛主席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客套话，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切入议题，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以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至于做工作那更是天方夜谭。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主席沉静了片刻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主席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因情况不明发生意外。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春毛主席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不仅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乱了毛主席的正常部署。

毛主席还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各地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风，实行大联合。从1967

年冬到 1968 年春，社会动乱的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

大约到 10 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主席。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站在走廊里。毛主席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去，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当时尽管领会了毛主席谈话的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便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 月 20 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劝阻，这些群众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看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 1974 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

7 月 23 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是不准随便交谈的，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并使我联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1952 年 10 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当时，毛主席正在视察黄河。在交谈中，他问我的家庭，问我的出身，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工作，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听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他指示我们要在做好军区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6 年 6 月，我调武汉军区一年之后，又在武汉见到了毛主席。那次，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感受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

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坐在我们中间十分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从那次以后，每当吃苹果的时候，我就想起毛主席的话，很少再拿起水果刀子。

1961年9月，在武汉的毛主席陪同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我也陪同登上了汽艇。毛主席见我走过来就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蒙哥马利听了，摇晃着我的手，那注视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惊奇。

1965年夏天，我和另外几位同志相约去看望正在广州的毛主席。毛主席在室外的游泳池旁的一个篷子里接待了我们。谈话后，我耐不住酷热，没有同主席打招呼，就跳进了游泳池。毛主席看我游了一阵，也高兴地站起来，对在座的几位同志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便满面笑容的进入了游泳池。看得出，毛主席兴致很高。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到达北京，我被安排住在京西宾馆。从此，等待我的便是不公正的批斗。过了两天，传来了毛主席对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批示。原来中央复电在电文中提到我的名字时，没有称我为同志。是毛主席批阅时在我的名字后加了“同志”两个字。毛主席的这则批示，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严酷的时期，而幸免于死。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两个字，他们要整死我，那是易如反掌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〇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湖北，首先从武汉军区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已有十几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 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

伍修权

中国革命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活动几乎都与毛泽东紧密相连着。我们的成就和失误，许多都是执行他的指示的结果；同样，他的功勋和遗憾，其中不少也有着我们的份。他去世以后，国内外常有人贬低、攻击或否定他，我对此是不能赞同的。因为我们跟毛泽东干了半个多世纪，否定他不仅否定了我们自己，更否定了他和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思想、业绩仍然在我们生活中产生着重大作用和巨大影响，人们一直忘不了、舍不开他，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与别的老同志相比，我与毛泽东同志直接交往不算太多，但仅有的几次不仅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更是决定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几页。下面就是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几件事。

### 山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有过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意思是指国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太符合“正统”的马列主义，许多是山沟沟里的一些土知识分子和农民甚至“山大王”们搞的一套。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湖南山村韶山冲，正领着工农武装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毛泽东。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改变其领导成分，将在国外比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的青年革命者，陆续派回国内，他们中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和沈泽民、陈昌浩等，其首要人物却是深受共产国际信任并重用的陈绍禹（王明）。我也是那时从苏联回来的，上述那些人都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除王明以外，我们大都先后去了毛泽东所创建和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并接受了毛泽东所代表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只有并未进过“山沟沟”的王明，始终不理解也不承认并非来自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一直站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对立面，先后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于1931年夏进中央苏区不久，就去瑞金担任了红军学校学员连队指导员兼军事教员，就是在那里我初次见到并认识了毛泽东。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又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前敌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苏区以前我就不断听到他的大名，白区报纸上也时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和朱德同志共同领导的“朱毛红军”，早已为国内外人士所瞩目和关注。他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心腹大患。可是我见他以后，其第一印象既不像我在苏联见过的那些政治家和革命领袖，更不像人们概念中的军事家和军队统帅，而是一个对人亲切和蔼、言谈诙谐和不修边幅的中国书生，甚至像农村塾师。

他是应红军学校师生要求给大家讲课来的。虽然我早已听到过针对他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议论，但是第一次接触他并听他讲话以后，立即对他产生了信服甚至折服之情。那天他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这本来是个比较枯燥、深奥的政治经济问题，我在苏联学习时，每逢这类课程，都把主要精力花在强记政治名词、理论定义、专用术语和数据比例上。谁知毛泽东讲课时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全部用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现实事例，来分析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各个重要问题，阐述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例如他说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造成了我国手工业经济的破产，举了个农村随处可见的例子，中国过去一直用竹蔑箍木盆木桶，现在从外国进口了铁丝，很快夺取了竹蔑的市场，木盆木桶都改用铁



丝箍了，结果使我国大批竹箍手工业者失业，劈竹蔑用的竹子滞销，生产和销售外国铁丝的资本家们都发了财。毛泽东在讲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全是普通农民都能听明白的语言，加上许多俗语、谚语和生动手势，使所有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观点。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他已三十多岁，并且已是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高的威望影响，所以我一下子就被他“征服”了，并从此坚信和追随他，一生也没有动摇过。六十年代初我陪外宾见他时，他曾向外宾介绍说：伍修权是个老实人，在莫斯科回来的人中，他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

正由于毛泽东在广大群众中的很高声望，在1931年举行的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也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称他为毛主席，并且一叫几十年，后来“主席”二字竟成了他的专用称呼。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都不知道，正是当时，毛泽东日子并不好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不断对他进行排斥打击，他的思想主张都被当作所谓“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等等横加批评指责。在1932年10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受到排斥和打击，会后被撤消了所有军事领导职务，被迫离开军队。1933年初，受王明遥控的博古等人的临时中央迁入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王明的“左”倾错误全面深入地在苏区推行贯彻，毛泽东的处境就更糟了。当年秋天，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人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分来到苏区，我被中央指派去为他作翻译，直接领教了这位“洋钦差”的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李德和博古一唱一和地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否定了他的主张。当时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被完全剥夺了，仅剩了一个苏维埃主席的地方政府职务虚衔，所以博古曾嘲笑他成了“加里宁”，和苏联没有实权的苏维埃主席一样。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时，不是去养病，就是去作农村调查，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很少通知他参加，他的声音也很难听到了。

但是，正由于党和红军失去了他的领导，人们反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作用。他指挥苏区军民反击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每次都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粉碎了5到10倍敌人的进攻。第四次反“围剿”，由于仍沿用了他原来的战略战术，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和博古凭着洋本子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盲目宣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打“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搞什么“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等等，结果使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部队伤亡惨重，阵地连连失守，兵力越战越弱，苏区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了撤退转移一条路。严重失败使许多红军指战员都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接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

连高级领导人中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异议和批评，并且逐步转而听取和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我和许多同志一样，也由应该听从李德的指挥，转为更加信服毛泽东的领导。

严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认识到：山沟沟里不是出不了马列主义，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马列主义在苏区山沟里的实际应用。李德和博古所推行的王明那一套，完全脱离了苏区的实际情况，必然把革命引向失败。

正是党和红军的这种思想认识，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

####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中共党史上把 1935 年 1 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事情确是这样。正是从那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开始为全党全军所认识和接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受到了批判和纠正。这个胜利是毛泽东长期深入细致和艰苦工作的结果。鉴于对遵义会议本身的记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从另一方面作些补充，即毛泽东如何在组织上和方法上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好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声望，又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党内许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强地带他，但是只让他跟着军委二队的休养连，作为病号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正好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伤未愈，也在军委二队坐担架，二人的担架经常走在一起，毛泽东就抓紧时机将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一路和王稼祥边走边谈，把他的思想主张对王稼祥作了深入详尽的阐述解释。

王稼祥与博古、张闻天和王明同为“从莫斯科回来的”最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刚”之一。但是他为人正直坦诚，到苏区以后越来越为毛泽东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吸引，早在宁都会议时就曾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长征以后他和毛泽东的多次长谈，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并信服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毛泽东又通过他争取到张闻天的支持，长征途中他们三人索性一起行军和宿营。日夜反复交谈，对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面临的危险局势。解脱困境的办法，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直到进了遵义，他们三人都住在遵义新城同一座楼上。当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形影不离，人们就把他们叫成了“新三人团”，这意味着党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对此虽然很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和“小团体”，但因当时敌情紧迫，内外交困，早已自顾不暇，也只能对他们听之任之了。周恩来本来就敬重毛泽东，实际上支持着他们的活动。这样除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苏区的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转向了毛泽东，加上周恩来的实际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更是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意见这才开始被中央采纳。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的长征路线，转兵贵州，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使奔波苦战几个月、损兵折将一大半的中央红军，终于有了个难得的喘息机会。正是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适宜环境。

毛泽东通过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是反“围剿”的失败问题，讨论解决面临的严重局势。毛泽东考虑到政治局委员中有近半数人不在遵义，在遵义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张，又建议将会议扩大到红军军团指挥员一级，红军将领中许多是从井冈山到历次反“围剿”都和毛泽东一起战斗的，他们早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不满，他们的参加会议，使毛泽东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这就保证了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会议上得到多数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会议，我作为他的翻译，也有幸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中央和军委以往的会议，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说了算。这次会议却一反往常，不仅取消了李德的特权，会前的酝酿准备，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干与，开会时更把他摆到了实际是受审的位置上，别人都围桌而坐，他却被指定坐在门口一张独凳上。会议还是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由于明显地失去了多数人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失败，只是力图把失败原因推诿到客观上。周恩来作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贯彻执行者，主动承担责任，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马上对他表示了谅解。

许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讨论时的主要发言，是由毛泽东作的。其实讨论发言时的第一发重炮，是由张闻天发出的。正是他的发言，不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评和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更严厉指责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发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惊，也使不少参加会议者感到意外。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难，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

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几条结论性的话我却一直难忘。他说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即“左”倾教条主义。他在发言中又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他的论点。心里本来不太服气的博古，这时也只得低头接受批评，一向“老子说了算”的李德，除了干生气也无言以对。别的同志更觉得毛泽东说出了大家早已要说只是还没有说出的话。正是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言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还是由于毛泽东的推举，这一决议是由张闻天执笔写出的。

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发言中，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李德可说毫不留情，措词十分尖锐严厉，多处直接指责了他个人。对博古则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毛泽东会下还曾向参加会议的红军将领打了招呼，让他们将博古和李德区别对待，对博古这个才20多岁的中央负责人，尽量予以爱护和照顾。毛泽东这样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和委屈，认为许多事原来是中共中央推给他干的。现在出了问题却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气无处发。但是毛泽东的处理方法实际效果很好，会议团结和争取了博古，使他冷静地听取了批评意见，开始认识并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从这里我体会到了毛泽东努力缩小打击面，尽量团结大多数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怀。

遵义会议决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议，实际上实现了他的意图，但是在后来的党内分工时，他却又极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会议还决定朱德为“军事指挥者”和“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是党内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本人开始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由于战事需要，

才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这才开始成为党和红军实际上的负责人。这个不短的过程，都表明毛泽东为了党的事业，善于等待和因势利导地稳步前进。正如他当时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样，为了达到目标，不借迂回曲折。

在遵义会议以前，还曾经有人提出，当时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同样有着严重问题，也应该加以检查批判和纠正。毛泽东不仅马上劝阻别人这样做，而且在自己的发言和最后的决议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之类的话。他这一着也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和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绕开了政治路线问题，只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风时，共产国际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其政治主张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并日益巩固，这才对遵义会议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毛泽东为此等待了将近十年。在这一方面，他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典范。

遵义会议使长征红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也正是从那时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如果当年他只凭意气，急于求成，不讲究策略步骤，不仅难以取得遵义会议的成功，长征红军以至党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后来这样，中国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走上正轨和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这一关键时刻的历史作用和伟大功勋，确是永远不能抹煞的！

#### 分裂危机化险为夷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发生了张国焘阴谋分裂的严重事件。当时我已离开军委不再为李德作翻译，调到三军团担任叶剑英参谋长的副手，以后因为部队成员缩编，又主动要求下团工作，去了杨勇所在的10团。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全部中央红军只剩了一两万人，四方面军却有七八万人。张国焘自恃人多势壮，竟想由他来指挥全党全军，还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针，让中央红军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则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一场党内危机和分裂危险又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在此以前，毛泽东对张国焘作了大量耐心而艰苦细致的工作。两军会师时，他指示召开隆重而热烈的会师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肯定和赞扬，又让中央红军的文艺家们，为大会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对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由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清除和杀害了许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使四方面军文化人才奇缺，毛泽东又指示将中央红军的大批宣传文化干部，派到四方面军去帮助工作，著名的红军艺术家李伯钊和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等都去了四方面军。四方面军也派了一些干部到中央红军和红军大学来工作。毛泽东自己更不断地找张国焘交谈、商讨问题，对他表示十分尊重。因为张国焘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主席，毛泽东就招呼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人，一律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但是，当张国焘伸手要

军委主席职位，毛主席则考虑到这是个要害职位，便说军委主席已是党内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随便撤换，同时又作了某种妥协，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并且让人马上改称他为“张总政委”。部分地满足了张国焘的权力欲与虚荣心。

但是张国焘野心很大，欲壑难填，在过草地以后一意孤行地拒绝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红军不跟他走，他就要带原四方面军部队单独南下，甚至企图胁迫中央放弃北上方针，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在过草地前，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左路军，中央机关和原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等带队。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但李特不听，他又把李特拉到庙里去坐下来谈。李特按张国焘的腔调指责中央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李特仍然不听，执拗地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马上跟他回去。我的马夫（当时叫饲养员）也是四方面军来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长征后期只得由我自己牵马养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与李特等人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但是毛泽东依然大度地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实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将来总有重新会合的一天。他还对我们说，一、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张国焘同志走，不过以后还会回来的。我们有的人还是愤愤不平想不通，他又对我们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只要他们还是红军，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来的。

当时，正是由于毛泽东顾全大局地采取忍让克制态度，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严正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几乎发生的党和红军内部火并，挫败了张国焘的野心，要是那时真发生了冲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国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赖毛泽东的冷静和英明，加上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抵制，终于使党和红军平安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毛泽东更以其实际行动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的四方面军同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张国焘的面目和野心，最后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弯路以后，还是遵照中央的方针路线重新北上，在西北实现了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壮举。

对于违抗中央决议、图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本人，毛泽东对其一直采取争取挽救态度，当时有人主张立即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认为不行，说

张国焘还蒙蔽了好几万人的部队呢，一下子搞翻了脸，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中央根据他的意见，作了关于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决定，不仅继续称张为同志，并且将传达范围限制得很小，最初只让中央委员知道这件事，尽量维护张国焘的“面子”。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央红军改称为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他自任支队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避免与张国焘过分对立。后来又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电召张国焘到陕北。

张国焘回中央以后，毛泽东一面只在很小范围内批评其错误，一面又让他担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后，又由张国焘代理主席职务，仍然执掌不少的权力。在此期间，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了边区政府秘书长，并且与张国焘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为我本来是边区政府前身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秘书长，早就从事着相近的工作，谁知张国焘却认为我是毛泽东派去监视他的。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心怀鬼胎。

毛泽东从未向我单独交代过什么任务，我也从未直接向他报告过什么。相反，毛泽东不只要大家继续尊重张国焘，注意称呼他为“张主席”，自己也经常同他来往交谈，甚至照常和他开玩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来到延安，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国民党里有个“张杨”（指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也有个“张杨”（指张国焘及其妻子杨子烈）。这实际表明了他对张国焘还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离开延安调任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同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陵的机会，私逃到国民党统治区，毛泽东当即同意杨子烈带着儿子去了张国焘那儿，对他们一家做到了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背叛革命，拒绝党的挽救，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泽东的对待和处理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即使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他都能如此谦诚相待和宽宏大量，不愧为党内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方式的典范。

#### 亢而不卑的莫斯科之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正担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开国当年12月，我领受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专列路过东北境内的安全。一切布置停当后，我赶到山海关迎接已成为新中国头号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在来自北京的专列上，我见到了三年不见的毛主席。与延安时期相比，他已发福了，为了出国，穿了一身比较讲究的中山装，他带头穿的这种衣服，后来几乎成为我国的礼服，竟被西方人称之为“毛式服装”。这次访苏是毛主席第一次出国，而且是长途旅行，所以他的心情举止不象往常那么轻松随便，我在车上向他汇报了情况，高岗等东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上车看望他时，他也关切地问了一些问题。我随着他乘坐的专列，一直陪他到了满州里，下车目送他的专列驶入苏联国境，我此行的任务也宣告完成。

当时我已接到调令，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护送毛主席出境的任务完成后，我利用调动工作的机会，请假回武汉探亲。哪知我刚到家几天，就接到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令，要我马上去北京随他出国赴苏。毛主席这次去苏联是参加斯大林70诞辰的庆典，也准备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同苏联领导人商谈。后来中苏双方认为可以趁毛主席访苏签订一项友好条约，这才又让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赴苏进行签约谈判。由于我已是苏欧司长，周总理指定我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为他作外交工作助

手。我赶到北京几天后就随周总理出国，直奔阔别近 20 年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会合了先期到达的毛主席一行。

我们是 1950 年 1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的，随毛主席先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鉴于过去通过共产国际支持了王明，打击压制了毛泽东，对中国党作过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指示，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定损失，斯大林对此感到歉疚。由于他与毛泽东是初交，互相不摸脾气，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的活动，大都由他自己提出苏方才作安排，苏方避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当时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想了解对方怎样对待自己，结果双方产生了一些隔阂和误会。

例如斯大林曾问毛泽东，他此行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却以他惯常的幽默藏而不露地说，我这一趟当然不能白来，总要搞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听了怎么也闹不清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起研究，也解不开这个哑谜。后来由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从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那儿才摸到了底。原来毛泽东想让苏联与中国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既好看”，就是可以对外宣传；“又好吃”，就是我国能获实利。斯大林明白后马上表示同意，并且希望由他和毛泽东二人联名签署这一条约。可是毛泽东却表示，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签订条约是两国政府间的事，只能由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与相当于政府总理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来共同签署。这才马上电召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赶来，进行签约的实际会谈与准备工作。直到会谈结束准备签字时，斯大林还希望能与毛泽东联名签署这一条约，但是毛泽东仍然客气地拒绝了，所以后来只由周恩来与维辛斯基都以外交部长的身分，签署了世界瞩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件事表明了毛泽东不愿受别人尤其是外国轻易摆布的自立性格。就当我们来到前后还发生过几件事，苏方曾请毛主席参观一些地方，如苏联卫国战争的战绩、遗址和汽车工厂等等，他看了却认为不过如此，对苏方人员的“吹牛”很不以为然。在列宁格勒参观冬宫时，有几个馆据说正修理内部，没有开放，他就悄悄对陪同的翻译师哲说，那里面肯定是过去沙皇抢的我们的东西，他们不敢让我们看。当时莫斯科正上演一部以中国革命力题材的芭蕾舞剧《红婴粟》，苏方请毛泽东和我们去看。他让自己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和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先去看了。他们看后回来说了剧情，原来此剧说苏联的商船停泊在上海港口时，一个苏联海员在码头上结识了一个中国妓女，接受了妓女献给他的爱情和红婴粟花，他则向那妓女灌输革命思想，通过妓女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后来引起了中国革命，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听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歪曲和污蔑中国革命，断然拒绝去看演出。由于陈伯达去看了并在演出谢幕时鼓过掌，毛泽东就批评责备他道，就是你看得津津有味，还给人家鼓掌捧场呢！毛泽东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也成为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的依据。

中苏会谈和签约中的大事，毛主席一直抓得很紧，周总理每天向他详细汇报一切情况，条约的文稿也都经过他逐字逐句的审改推敲，在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上，他允许向对方作一点妥协让步，一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等大问题，他总是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例如在我国东北境内先由沙皇俄国建造，后由苏联管理经营的中长铁路，我国新疆的矿产开采及经营权益，中苏、中蒙接壤地区的国防和双边关系，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从我国东北掳获运

走的日本财产物资和工业机器设备等等，苏联继承沙皇俄国在我国大连、旅顺的特权及资产，以及北京的原沙俄兵营等等，毛泽东认为这应全部无偿地交还中国，指示我们在签订总的中苏条约的同时，另行一一签订明确具体的单项协定，只能在维护我国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到对方。我们遵照他的指示与要求，与苏方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协商。在毛主席、周总理于当年 2 月 17 日先期回国后，我奉命和李富春等同志一起留在莫斯科，与苏方就若干具体问题继续谈判并签订有关协定。历史证明，当年的这些条约及协定，对于维护我国独立主权，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树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形象，起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应该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具体指示的结果。

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举行后的当晚，由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面主持盛大酒会，招待苏联党政军及各界领导人，隔一天后苏方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饯行。斯大林自恃是苏联以至国际共运最高领袖，通常是不参加这些外交宴会的，这次却由于毛泽东的来到，每一次他不仅破例地亲自出席，并且对毛泽东特别尊重客气，席间还和毛泽东相互说笑，显得十分融洽友好。其实当时他们心中各自都有一本帐。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抵制过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方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意图，建立新中国时又不照搬苏联的模式，政府中又有不少亲西方的人士。毛泽东对斯大林从未俯首听命和低下三下四过。因此斯大林心有疑虑，担心毛泽东是个闹独立性的铁托式人物。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使斯大林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新中国的诞生又使苏联有了个东方大国作为盟友，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于苏联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斯大林一直不愿怠慢更不敢得罪在声望和地位上都不亚于自己的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不仅始终保持尊严，有时还使使性子甚至发发脾气。

就在毛主席访苏时，有段时间苏方没有给他安排什么活动，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中闲住了几天后，忽然向苏联的接待联络人员发起火来，说是我现在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真不知你们把我从那么远请来干什么？翻译师哲对他说，你发火的对象都是苏联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们什么都听上面的，你对他们发火也没有用。毛泽东却说，我就是要去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在发脾气了！他的这种基于自尊心的独立不羁性格，确曾赢得了苏方以至斯大林的敬畏。

不过这又只是毛泽东性格的一个方面，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当然深知中苏团结的重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方针，建国后他第一个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又是苏联，并且是去参加斯大林的 70 寿辰庆典，这就以行动驳斥了说他是“东方铁托”的议论。所以建国初期中苏友好调子之高和气氛之热，我这个苏联东欧司长活动之多，业务之忙，都是按他的决策指示进行的，而这都是适应当时形势和符合我国利益的。

这种状况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台前幕后

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



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

我不知道这话对毛泽东有过什么影响，但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世界革命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谁听谁的问题，即谁是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的问题。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继承了斯大林在党的关系上的“老子党”做法，在对外政策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作风。毛泽东对此坚决反对和极力抵制，自视为“正宗”马列主义的苏共头头处处咄咄逼人，从来不买外国人帐的中共领袖常常寸步不让，这就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导致了中国党对苏共方针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全面抵制和公开的批评，最后造成了国际共运以至世界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60年代初，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及其组织，全都一分为二，重新划线站队，绝大多数党或国家本着传统做法支持苏共，也有少数国家的党或小派别，赞成或同情中共，各国各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共产党之间的空前激烈的“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当然地成为“交战”一方的最高决策人和战略总指挥。

在此之前，我已从外交部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由从事政府外交转为党的国际联络工作，因此也直接参与了这场针对苏共的名为“国际反修斗争”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事情是从斯大林辞世几年后开始的，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动摇混乱，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党虽然力求维持表面上的中苏团结，实际上是反对苏共的许多做法的，赫鲁晓夫对此也心照不宣，对中国党的不紧跟他们十分不满。50年代后期，他们的不满日益公开化，苏共一面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国内政策表示批评和反对，又在当时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公开偏袒印度一方，赫鲁晓夫甚至在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时，不指名地攻击我国是“好斗的公鸡”，又在种种场合用各种方式批评指责我国的内外政策是“实际上反动的”、“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等等。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欧几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国派出了“观察员”身分的代表团，我是代表之一，康生领队。当时赫鲁晓夫正鼓吹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苏联在这次会议上，宣布单方面裁军120万，华沙条约各国也跟着裁军共达380万人，又宣称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和裁军、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中国代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主题相反的发言，提出国际形势好转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帝国主义性质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所有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协议，对我国一概没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我国代表团的发言很恼火，在招待会祝酒时，就不指名他说中国党在拆苏共的台，暗骂中共领袖是“应该扔到墙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场合多次批评中共的主张和做法，我国代表团向国内报告后，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场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和国际混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当年4月是列宁90诞辰，经毛主席决策并审改，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章。文中按毛主席的观点及要求，对苏共的思想路线及其内外政策引据马恩列之经典，作了全面、系统和严厉的批判。其批判对象虽然只提了南共“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但谁都知道其矛头是直指苏共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苏共对此当然不能沉默，马上与各党通气，决定利用当年6月

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约集各国党领导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毛主席决定由彭真、康生和我加上驻罗大使许建国等，组成代表团赴会。出发前先集中在钓鱼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研究制定赴会后的方针对策。我们按时出国并与 50 多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一起参加了罗共的大会。赫鲁晓夫亲率苏共代表团先我们一天到达，他们不仅利用罗共大会讲坛在致词中不点名地指责了中共，更在当天向各国代表团散发并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其中公开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等等，接着又发动各党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围攻中共代表团，全面批驳我国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说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极左路线”，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义”等等，使我们一时十分孤立，只剩东欧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一家还倾向和同情我们。

我们将事态迅速报告了北京，中央马上给我们发来写好的声明，让代表团立即译成外文发出去。声明中揭露苏共对我党搞突然袭击，对各国党采取家长式的专横态度，而中国党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决不向任何错误的观点和作法屈服。这个措词强硬的声明更加激怒了赫鲁晓夫，他们在会上对我们几乎到了对骂的程度，我见代表团长彭真有时也情绪激动得难以自控，就悄悄给他递过去一张写有“哀兵必胜”的字条，一面表示支持，一面让他压压火。当时现场口头翻译的是阎明复，这次显示出了高超的翻译水平和很强的思辩才能，准确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与意志，反而使赫鲁晓夫等围攻者常常慌不择言甚至语无伦次。

苏共原想利用这次机会压服中共，结果只“打”成了平局，反而使分歧更明显、矛盾更尖锐了，他们岂肯就此罢休，经过组织发动和挑拨收买，使本来只是中苏两党之争，变成了中共与各国党之争，并且使本来主要是党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观点之争，很快转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一结束，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是，毛主席镇静又充满自信地指挥全党全国，顶住了突然而来的恶劣形势，迅速组织了反击。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尊严，使赫鲁晓夫等人未能完全得逞。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苏联的毁约以至反华，我国从政治、经济到军事上，都蒙受了不少的损失，加上几乎同时发生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其实也是这场国际论争和政治风云的反映和后果之一。

1960 年 9 月上旬，我出访古巴尚未回国，就奉中央电令转道莫斯科，参加当月 17 日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我立即赶去并参加了会谈。我党代表团长是邓小平总书记，他在会上严正指出，苏共以“老子党”“老子国”自居。把党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已造成了我国的损失，同时表示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决不妥协的决心。苏共当然不会轻易认错，于是这次本想解决两党两国关系恶化问题的会谈，仅仅是“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散了会，唯一达成协议的是于当年 10 月和 11 月的十月革命 43 周年，中共再来代表团继续会谈。不久，由邓小平和刘少奇于 10 月、11 月分别率领代表团连续赴苏，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见争吵一番而已，只在十月革命 43 周年时和 81 国的“兄弟党”

一起签署了一项纯属对外宣传的《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这些文件丝毫掩盖不了由中苏两党分歧引起的国际共运间的分裂状况，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1960年。从这年2月起，我党先后派出5个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或在布加勒斯特与苏共领导人接触。每次会谈接触都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决策进行的，每次会谈结束回国时，他都要亲自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他在杭州或北戴河，我们都要专程赶了去，他对代表团的的活动，一再表示了肯定、赞许和支持，我们也因为上头有他的指导和指挥，不论什么情况都觉得信心百倍。由于这年我党代表团曾去莫斯科5次，郭沫若曾为此写诗说：“五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虽然毛主席本人并不住在钓鱼台，但是我们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回国后的总结，大都在钓鱼台进行，中央的“反修”领导和写作班子，也常在钓鱼台办公。如果说我们是这场国际论争的前线指战员，稳坐指挥并“钓鱼”的当然是毛主席了。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将分裂形势推向了新高潮，赫鲁晓夫等公开攻击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惯例是党代大会得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却不让阿党参加22大。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公开回答苏共对我党的攻击后，提前回国不再参加会议。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决定我为代表团长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四国党代大会。各党大会无一例外地按苏共的调子对中共及阿党进行了攻击，我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一作了回答，苏共及东道国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在捷、德的党代大会上，我致词中提到苏共时，台下竟起哄、拍桌、吹哨和跺地板企图打断我的发言。我当时心里虽然不免尴尬，表面上却还镇静，我想自己正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党，执行着自己领袖的指示，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主人不能也不应该对我无礼，就像毛主席诗中所说：“我自岿然不动”地硬着头皮顶住了。有的记者形容我当时能“泰然自若”，因而称我为“伍泰然”。

与此同时，中联部另一副部长赵毅敏代表我党出席意大利党代大会时，也受到了与我相似的对待。对这股气势不小的政治风潮，我国蔑称之为“反华大合唱”，我们几乎到处都受到攻击反对。我和赵毅敏先后回国后，分别向毛主席作了如实汇报，他对我们进行了鼓励和慰问，甚至连续吟诗自励：“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还“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苏共指挥的“反华大合唱”，我国针锋相对的“独唱”以及阿尔巴尼亚等的“帮腔”，正喧闹得不可开交时，与我国友好的越南等国建议停止公开论争，举行中苏会谈以平息争端。几经斡旋磋商，定于1963年7月由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可是因为在此以前，苏共不仅公开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共的文章报道，还在中苏边境、我国新疆和我国驻苏大使馆连续制造事端，其反华调子正越唱越高。为不让苏共乘机封住我们的口，就在代表团访苏前的6月14日，发表了由毛主席亲自定题定稿的，更加全面深刻地批判驳斥苏共观点的长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实际上使中苏论争达到了又一高峰。苏共哪能认输，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认为“25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诽谤与攻击”，并再次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和留学生，还砸坏了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展览橱窗等等。就在这股极不平静极不友好的气氛中，我党代表团还是按原计划启程出国了。我又是代表团成

员之一。

中苏两党的高级会谈就在双方的激烈论争和互相抗议中开始了。会谈中自然也是各不相让地你攻过来我顶过去，对于这种“会谈”，西方记者称之为“聋子对话”，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代表团每天及时将会谈的情况和内容报告北京，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请示后，又立即给我们发来指示，所以会外反而比会内忙。就在会谈中，苏共于7月14日又发表了名为苏共中央给全党实际上是给全世界的公开信，对中共的“25条”进行了坚决回击和全面驳斥。这使勉强进行的“聋子对话”也对不下去了，最后仅达成一项协议，会谈暂停，以后再说。第二天我们就全体回国。

我们的专机飞临北京机场时，我发现机场上十分热闹，一下飞机忽见等候在机场，亲自来迎接我们的竟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全体中央领导人，机场上聚集五千多人的欢迎队伍，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喧天锣鼓声中不时传出震耳的“反修”口号，全场到处都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横幅，我们刚走下舷梯，毛主席就领头走过来，与我们一一热烈握手问好，又让少先队员为全体代表团成员献上了鲜花，还让我们与以他为首的欢迎者一起排在飞机前合影留念。我们绕场一周和离开机场时，全场一片雷鸣似的欢呼和掌声，中外记者纷纷把这一盛大场面和热烈气氛摄入镜头和写入报道，第二天各报和各种新闻工具都突出报道了我们代表团的归来特别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迎接。对这场破格破例的欢迎仪式，我们都明白这并不是冲着我们这几个人，而是借题发挥地对外国“帝修反”特别是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组织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示威。

欢迎仪式一结束，又破例地没让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全体代表团成员都奉命跟着毛主席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也一点没有休息，坐下来就让我们作详细汇报。邓小平、彭真作汇报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认真地静坐倾听着。从毛主席那专注和满意的神情中，我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无比关切，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断点头称是，有时还插几句问话甚至笑话。

这次无结果的会谈，特别是中共“25条”和苏共“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中苏论争和共运分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央的“反修”写作班子，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连续发表了一批深入批判“苏修”的大文章。原来计划连发10篇，哪知才发表了第9篇，赫鲁晓夫就被迫下台了。虽然这是苏共内部的一次“宫廷政变”，但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我们的“九评”也是促使“赫修”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九评”把他轰下台的。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这天夜里，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以中联部负责人身分，出面接待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听取他的重要情况通报。因为中联部机关都已下班，我只得用自己家的客厅接待了苏联大使。他来就是通报赫鲁晓夫由于“健康原因”下台的事，于是我有幸成为我国第一个知道此事的人。苏联大使一离开，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杨尚昆，他马上报告了毛主席。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莫斯科时，突然从我国又发出一个更具轰动效应的名符其实的“爆炸性”消息——中国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原来我国的原子弹试验早就一切就绪，但是毛主席非要等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赫鲁晓夫一下台，毛主席当机立断，立即下令“起爆！”于是不仅把世界公众的视线牵到了中国，更把我国的这一胜利和赫鲁晓夫的垮台巧妙地联系到

了一起，形象他说明了“苏修”的失败和我们的成功。正如7月间在北京机场利用欢迎中共代表团回国进行的政治示威一样，这次又利用原子弹试验进行了一次实力示威。这不能不说又是毛主席的大手笔。

毛主席马上决定再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时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去苏联祝贺节日，我有幸又参加了这一代表团。我们出发前，中央已用各种方式向苏联发出了重修于好的意愿和信息，对新上台的勃烈日涅夫表示祝贺，在报纸上介绍其新的建设成就。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一一拜访了苏共各领导人，反复表示希望团结友好的愿望，所有的庆祝活动都积极参加，对苏方人员一律热诚相待。哪知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苏方仅仅撤换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其思想路线，新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相反企图使我们改变方针。

在一次宴会上，苏共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了台，你们也应该像我们这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元帅马上顶回了他的挑衅。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当即向苏方提出抗议，勃烈日涅夫打马虎眼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了，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不，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苏方向我们道歉认错。这次访苏也就这样未能如愿地结束了。我们来时颇有劲头，回国时不免有点失望甚至败兴。

我们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只觉面前呈现了几个月前的盛大场面，毛主席再次领着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所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和数千各界群众在一起，为我们举行了又一次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们下飞机和他见面握手后，他又领着我们绕场一周，接受各界群众对他和我们的欢迎欢呼，毛主席此举，再次向外显示了中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和他本人的拥戴，苏共的妄想图谋永远不会实现，同时也宣告了我们党与“苏修”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次中苏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矛盾更尖锐结怨更深了。也就从那年十月革命节起，我们与苏共完全停止了交往，我直到24年以后即1988年，才能再去苏联，中苏关系中断了几乎整整四分之一世纪。

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我还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国一个与苏联对着干，一个也已不一心。当时我们在东欧除了有的国家党内的少数反对派，也就剩了这一个半朋友。只是后来那个被毛主席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也同我们闹翻了，据说他们成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反而成了什么“修正主义”。这世界大舞台真比舞台小天地更加变幻莫测令人莫衷一是。

对于这场30多年前的国际“反修大战”，我党已在种种场合用不同方式作了新的评价和结论，认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应发生的，任何国家的党，都不应该干涉别党别国的内部事务及其方针政策，应当尊重各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是曾不断干涉过我们的内部事务，多次批评指责我们的方针政策。不过，我们也对人家的一套进行过毫不客气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我个人认为我们当时从若干论点某些做法上，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误的，它是我们党内当时那股“左”的思想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毛主席作为这场国际“反修大战”的最高指挥，一方面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智与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了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我作为当年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与过来人，仅将以上事实回忆出来，供后人对此进行分

析评说。

### 劫难岁月的希望寄托

史无前例的“文革”初期，我还在执行外事任务，曾参加以康生为首的代表团重访了阿尔巴尼亚。开始我以为“文革”大体是文化界的事，可是后来不行了，不仅是我所在的中联部，连我和我的全家都被卷入了。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等会议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看了他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许多文件材料，一面感到自己有点思想跟不上，一面又认为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坚决响应和积极参加。在自己尚未完全投入运动时，常通过家里人和孩子们了解些情况。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我谈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会议简报上摘发了我的发言，毛主席看到了，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现象，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他认为这是接近和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不过，当运动搞到自己头上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党内大阴谋家；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一开始就插手和操纵了中联部的“文革”运动。最初他想拉我跟他走。但是我见他平时不务正业，运动一来就特别活跃，从中捞名争权获利，并且一直老谋深算，早就称为“康老”，我就将《愚公移山》中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加到他头上，背地里称他为“智叟”。这次运动，他更不择手段了，1966年初，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和康生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当时文化革命（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经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批准后，由彭真去向正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汇报前彭真和五人小组成员一起整理出一个汇报提纲，后来就被称为“二月提纲”，康生不仅参加了讨论，同意提纲的各项内容，还在形成文件时画圈认可，并且和彭真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哪知他一察觉毛主席并不赞成这个提纲，立即翻脸不认账，说汇报提纲是背着搞出的，他根本不同意提纲的内容，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彭真头上。当有人拿出他画圈表示同意的文件稿时，他又耍赖说那个圈不是他自己画的。他的这些行为令人十分反感，我早就对他避而远之，存有戒心，当然不肯上他的钩。他一见我不跟他走，立即反过手狠整我，抓住我在东北局时曾支持过彭真，在中联部时支持过王稼祥，在外交部时又为南斯拉夫说过好话，他就伙同林彪、叶群等定我为“彭真黑帮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指使造反派揪斗批判我。

我对此当然不服气，认为党和毛主席一直是了解和信任我的，毛主席曾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是个老实人。我家里就有直通中央领导同志的红机子电话，如果我把自己的问题向他反映一下，他只要为我说一句话，就谁也怎么不了我了。但是我几次拿起红机子又放下了，我想到现在运动这么紧张，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过问，我不应该将个人的事去干扰他，使他再分心。为了表示自己内心对他的敬爱和体谅，终于没有给他打电话，只向周总理的秘书电话报告了一下我的处境。造反派发现我用红机子打过电话，不仅马上把红机子给拆了，还干脆把我“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别说再打电话，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在本单位被关了一阵，又被绑架似的押送到通县乡下的卫戍区部队中被“监护”起来。只是这里是监而不护，根本不被当人看，冬天挨冻，夏天挨蚊子叮，吃的是棒子面加白菜帮或咸菜。成年整月不见天日，还不断忍受专案组的审讯逼供和看守的辱骂训斥，与家

里更是音信不通，相互生死不知。那时每天“陪”着我苦度岁月的，只有一部“毛选”，我翻来复去地通读了许多遍，为了保持自己说话和发声能力，常常出声地一篇接一篇的朗读其中文章，读着读着，不由分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盼望他能拯救我脱离苦海。那时虽然外头什么事都不知道，每天的日子更是难捱，但是只要想到毛主席还健在，我们个人总有重见天日之时，我们的党和国家总会转入正常生活，所以也真诚地随着外头的广播声，默唱着“……他是我们的大救星，”甚至默祝他老人家真能“万寿无疆”。不过尽管我日夜盼望和真诚祝愿，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心脏病、糖尿病和浮肿病一齐出现了。

就在我情绪十分消极时，忽然情况好转，伙食逐步改善，允许有病吃药，还被安排见了一次家属子女，这是1972年的事。后来知道，这果然是毛主席发了话，当然不是为我一个人说的。原来是铁道部的刘建章同志，忍受不了对自己的迫害，设法上书中央，使毛主席了解到许多干部受摧残折磨的情况，他毕竟还是关怀我们这批跟他几十年的老同志的，立即下令制止这种“法西斯审查方式”，不准继续虐待我们。这才使我们忽然获救，开始重享人的待遇。专案人员对我审查了几年，并未查出我有什么严重问题，从“黑帮”“反革命”依次降为“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犯错误的好人”和“可以悔改的干部”。当时我们已获准看到报纸，又几次看到家属子女，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有关方面正在按他的指示，一步一步对我们落实政策，这使我信心倍增，认为自己不久也会和许多受审查同志一起，重见天日并重获工作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4年国庆前夕，我突然被解除监护放回家里。当时我的家早已七零八落了，我一被“监护”全家就从原来宿舍“扫地出门”，后来寄居在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全家人大都天各一方，我90多岁的老母，被赶回武昌老家，子女们多数分散在外地插队劳动或学习，好几个都被当作“黑帮子女”和“小反革命”关押批斗过。我到家时，老伴将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煎了，算是为我举行了接风盛宴。其情其景十分凄凉。好在当天就得通知，让我参加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我马上理了发刮了胡子，老伴找出我当年从事外事活动的衣服皮鞋等等，整容换装之后，几年来的“囚犯”形象一下改观了。当我按时进入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时，不由感慨万千，转瞬间从监护着的“阶下囚”变成赴国宴的“座上客”，这个角色转换得也太快了。正当我思潮汹涌时，只听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和熟人，他们许多也是刚从监护点、下放地和“牛棚”、监狱中出来的，有的同志竟与我关在同一座楼内几年，却从未相见毫不知情。我们都为自己的终于获得解放，重新回到人间而庆幸不已，并且都认为，是毛主席使我们获得了“新生”。

招待会开始后，几年来只能梦寐相见的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家祝酒并致词。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形象，专心致志地听着他的声音，只见他消瘦和衰老多了，连声音都显得沙哑和似乎底气不足，但是他的话却使我们止不住热泪盈眶。不只是为我们个人的忽然翻身，更是为了党和国家终于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和优良传统而无比兴奋和激动。当时林彪一伙虽已垮台，“四人帮”却还在台上，宴会厅的中心席位上就坐着那帮人，甚至我的邻座就有他们的帮凶爪牙。但是我想，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健在，他们毕竟翻不了天，我们能出席今天的国宴，说明毛主席、周总理

忘不了我们这批老战士。按照惯例，毛主席本人没有出席今天的国宴，不过我感到，他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尽管我们从战争年代到“文革”运动，都经受了严峻以至残酷的考验，但我们对他的忠诚热爱，一直没有动摇，他永远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第二天正是国庆之日，套红的报纸上发表了国宴参加者的全部名单，在“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之后，也出现了我的名字，虽然只是3个小号铅字，却是八年来第一次不是作为“黑帮”“反革命”和“打倒对象”出现，标志着我新生活的开始。由于这次名字见报的共有好几千人，光是名单就登了《人民日报》一个多版。这个异乎寻常的做法又是毛主席、周总理的决定，由于党和国家的逐步恢复正常生活，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出来工作，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速度太慢，周总理便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反对，向毛主席建议整批整批地让正受审查和关押的干部迅速重新工作，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决定利用国庆节时一齐露面亮相，再在报上公布名单，算是宣布对我们集体解放了。对此，我们永远难忘毛主席、周总理的恩惠。

国庆以后，我先后拜望了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在看望叶剑英元帅时，他关切地间我对今后的工作怎么考虑的。我说我正为这事作难，我在的中联部，早已被康生及其一伙人把持，我将难以和他们一道工作。当时叶帅正主持军委工作，就说：“这样吧，你回军队来，总参谋部正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你回去给毛主席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愿望，对自己的问题也作一点自我批评，写好交给我，我去送给毛主席，同时向他推荐你，要你来总参工作。”我听了简直喜出望外，马上回去以最真诚的心愿和恳切的语言，写了给毛主席的信，送给叶帅的几天后，他就给了我答复，说毛主席看了我的信，表示满意，接受叶帅的建议，同意我回军队到总参工作。不久，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式批准，任命我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二部部长。叶帅亲自领我去总参报了到，他向总参党委介绍我时，一再强调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并任命我回总参工作的，我心里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了我重新工作并重回军队的大好机会，我又可以跟他“继续革命”了。

好事一件接一件，我又被通知参加了于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这次会议的全部议程及其文件，都是在毛主席的指示授意下进行和制订的，周总理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经他反复审改定稿的。正是在周总理的报告中，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党中央通过周总理发出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多次为周总理的报告兴奋得大鼓其掌。后来分组讨论时，周总理又亲自参加了我所在的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他亲切地一一问候我们之后，但然而又沉重地说，他已经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大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他正在同疾病作斗争，还要继续和大家一同奋斗。他说这话时，我的心里酸痛无比，才几年功夫，他因操劳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出现了很深的皱纹和寿斑，动作和声音都显得苍老了，但是他还是鼓励我们特别是年轻同志，努力工作，要求大家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我国早日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令人痛心的是这次会后仅过一年，周总理就猝然辞世，当年7月，朱德老师也因年高逝去：唐山大地震后，我国又发生了更强烈的政治地震，我们追随几十年的毛泽东主席，也忽然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内，我们连续失去了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时真有“天柱折，地维绝”之感。当我获准



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向其告别时，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与此同时，更使我们焦心的是，“四人帮”正打着他的旗号妄图抢班夺权，他们已经把全党全国搞得乱了套，一旦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这些人，必将真的“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永远不得翻身”了。

但是，毛主席培养教育出来的革命者，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将党和国家的权力重新牢牢地掌握在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新老战士手中。这时我们又由衷地欢欣鼓舞，1976年10月，我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欢庆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并且很有信心地认为，毛主席本人虽然不在了，他的思想言论和精神品德，将永远引导、帮助和鼓励我们前进，他的形象永远矗立在我们心里，他的声音永远响彻在我们耳际，他永远和我们战斗在一起！

我国古往今来，一个人对整个国家历史直至亿万人个人命运，能造成如此巨大影响和深刻烙印的，毛泽东如果不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也将是屈指可数和别无几人的。我作为毛泽东的老兵之一，将永远为此骄傲自豪，当他百岁诞辰将临时，我仅将自己的回忆和感想，奉献给广大读者，同时算是给他老人家的一份微薄寿礼。

（卢云整理）

## 沧桑深情——忆毛泽东同志

陈士渠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长眠于世的时候，我这个从青年时期就受教于毛泽东的老战士，默默地守在他的灵堂，悲痛欲绝，泪流不止。十多年来，虽生死隔世，而思念之情却无时或已。

### 走井冈山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数万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顷刻间倒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下。紧接着，国民党右派从城市到农村对革命势力展开了全面的大屠杀。那时候，我正在家乡湖北省荆门市同几个青年搞农会运动，杀了个恶霸地主，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武汉市的叔叔陈雨苍家。陈雨苍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在武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讨蒋叛变的群众活动。同年7月7日，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卢德铭警卫团。9月9日，又随该团参加了秋收起义。

一个团的武装力量同当时遍布城乡的国民党军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不是敌人的对手。不要说作战了，就是连生存立脚都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就是我们这个团，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经历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失败，竟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其中的端尾并非人们都了解的，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惨状，至今仍记忆犹新。起义的四个团中，第四团叛变，一、二、三团损失严重，部队被打散了。秋风瑟瑟，长夜漫漫，我们这些首战失利的青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命令，师部和我所在的第3团余部在浏阳县文家市会合。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我在村头值星时，接待了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泽东委员。

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伤痛，当晚就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会议，讨论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极力主张攻打长沙。毛泽东则不同意。他说：当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现在进攻城市已经不可能。要改变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指着一张地图形象地说道：这里有一块象眉毛似的地方，叫罗霄山脉，地处湘、赣、鄂、粤、闽五省交界的地方，特别是中段井冈山，适合我们建立革命政权，作落脚点。毛泽东从地理环境、政治影响、群众基础和经济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峭壁丛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军事割据站得住；它离城市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较好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统治还未来得及摧毁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是个聚集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势力的好地方。

毛泽东讲的句句在理，使前敌委员会的同志倍受启发，得到以卢德铭为代表的多数委员的赞成和支持，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第二天，9月21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一千五百多名起义军官兵和三百多当地干部、群众翘首以待，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毛委员的讲话。此时，毛泽东也显得非常兴奋，他仍然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的长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但他的讲话却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双手说道：我给中国

革命“算个八字”（即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中国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势力发展起来，困难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胜利！操场上群情激昂，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指着我们诙谐他说：你们还年青，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青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他还讲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土匪，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了的，从来没有消灭过。我们也上山当“大王”。反动分子骂我们是“匪”，我们不是那种打富济贫的土匪，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敌人更消灭不了我们，我们却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消灭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讲话，尽管不是都能理解，但是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却是我们昼思夜盼的理想目标，只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力量极其弱小的白色恐怖中，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思想上还是渺茫的。毛泽东高屋建瓴，第一次把这一理想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道路，说得这样明白，使我十分兴奋。我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就受到这样的思想启迪，遇到这样的导师和领路人，深感幸运和自豪。

####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以著名的三湾改编而载入史册。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文家市会合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到达三湾村。由于疲劳、饥饿加上疾病的袭扰，当时已不足千人。但部队仍然是起义时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一人要背两支枪，还要由牲口驮一部分。部队编制已经不适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锻炼和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有少数人，在战斗失利，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悲观动摇，有的离队逃跑。如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则难以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成竹在胸，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便立即组织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第二天，部队在有千年历史的一棵大枫树下集合。由于战斗失利，人员减少，人们的精神是沉默的。只有当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向我们走来时，大家的情绪才开始活跃起来。他的和蔼态度使人感到亲切，他的乐观精神令人鼓舞。他始终微笑着。给我们讲述了整编的意义，并宣布了三条：

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军队就是党军，但不这样称谓，还是叫工农革命军。

二、连队建立党支部，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加强政治工作，部队除执行战斗任务外，还要做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工作。我们是武装宣传队。

针对一些同志的悲观情绪，毛泽东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我们这两条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

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有两个营，又有这么多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有这几百人的部队，我们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大家喜上眉梢，情绪激昂。队伍解散后，我们许多人还在议论：毛委员都不怕，我们怕个啥！每当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身影，听到他的讲话，就感到精神振奋，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在三湾，部队进行了整编，把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七个连，还有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一、二、三连为第一营，七、八、九连为第三营，第四连为特务连。我被编在一连当战士，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祺。

当时还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同时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发给路费，希望他们回本地继续革命。

三湾改编，不仅是组织上的整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提出，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重大问题均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此，部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这一措施，既是对第一次大革命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军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当时党的活动还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都知，会做工作，遵守纪律，革命坚定，作战勇敢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党员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样板。党组织的正式建立，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思想保证。部队不仅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有巨大的向心力，许多人变得更加坚定起来。

1927年10月，在酃县水口，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带领党员宣誓，并讲了党课。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是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三湾改编，还确定了在军内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搞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泽东对我们说：有事大家来做，连队有什么问题，士兵可以向上反映。士兵委员会明确规定：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尽管初期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有过曲折，但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个新生事物的工作引导。他立足于建设新型军队的全局。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军阀残余作风。经济民主虽然是简单的，但由于士兵会派人管理伙食，清理帐目，还给大家分伙食尾子，在南瓜汤里盐都没有的艰苦条件下，我们却精神饱满，作战勇敢，十分热爱红军生活，并经常唱着一首歌谣：“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我把分到的伙食尾子积成两块光钢洋，还高兴地做了一身便衣穿。清新的民主政治空气，使我们这支于艰难奋斗中的红军队伍成为一个人热的大熔炉。从白军过来的人感受最深，他们说，红军和白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没想到红军这么好。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民主”这个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诸实践，竟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它成为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

美丽的三湾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年在大树下参加改编的老战士，如今只有我和张宗逊、韩伟三个人了，这使我更加怀念毛泽东和牺牲的战友们。

我在水口入党后，约在1927年11月中旬，参加了打茶陵。当时因为毛泽东的脚伤还没好，是由党代表宛希先、团长陈浩带领攻打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我们一营就住在汇文中学。接着便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委任谭梓生为县长。由于没有经验，开始仍按旧章程办事，毛泽东知道后即写信指出：不能组织那种旧衙门式的政府，要组建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宛希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信，撤消了县人民委员会，并于11月28日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即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选出的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我们三人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为部队筹粮筹款，并组建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等武装组织，县政府还出了石印的布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我们三个常委的名字，毛泽东看到布告后，曾和我开玩笑说：陈士渠同志，你作了县太爷啦！

我军先后三次打茶陵，前两次都比较顺利，第三次遇上敌人的正规军吴尚的独立团，由于我们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等人企图拉出部队投敌叛变，导致战斗失利。毛泽东闻讯赶到湖口，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砦市，我也随茶陵县政府和游击队撤回砦市。在这里召开了大会，毛泽东总结了在茶陵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此后，毛泽东继续以极大的精力进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1928年元旦，他率领红军在遂川大坑大败萧家壁反动武装后，即分兵三路在大坑、于田、草林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子、建立革命政权。1月8日，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中共遂川县委在该县城天主教堂宣告成立了。不久，万安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中共莲花县特别支部等相继成立。落实三大任务的工作如火如荼。根据地建设迅速发展。

1928年6月，毛委员在永新县委所在地西乡塘边村住了一个多月，他几乎手把手的教导我们如何展开游击战，建立革命政权。他说：在有敌人进攻的时候，要集中起来进行战斗，这是战斗队；在敌被打垮以后或两个战斗的间隙中，要分散做群众工作，这又是宣传工作队。因此，我们部队除了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就必须搞好社会调查，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当时不公开），给穷人分田地。那时我们一个班在永新县做了一个乡的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和工农兵政府。以后部队形成了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把做工作、搞调查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几乎人人都学会了这套本领。例如，社会调查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调查内容有：人口、土地、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等，尤其要弄清一个地方的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地主兼商人有多少。一般都要在三、五天内完成。在做好社会调查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就可以成功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的任务。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搞得热火朝天，我们的力量便一天天壮大起来。三大任务在以后召开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作为红军党的法

规固定下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路经大汾镇时遭到敌人伏击，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继续南下向桂东方向走去，我们一营和团直属队重新集合起来，准备上井冈山。当时就在荆竹山下山沟里一个小村子宿营。

第二天清晨，部队在村边大路旁集合。毛委员来到了队列前，站在路边的石坎上开始讲话，部队顿时肃静下来。毛泽东首先介绍了一个头戴礼帽身穿便衣长衫的人，说他就是山上的一支队伍派来欢迎我们上山的。毛委员简要地讲了井冈山的情况，便说道：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为什么要规定这三条纪律，毛泽东又作了些解释。因为当时部队中还存在旧军队的思想影响，违犯纪律，随便拿群众的东西等。上山后还有个对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的影晌问题。就人民群众来说，最讨厌旧军队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要搞好。这给我印象很深刻。就在前几天，我们班在行军休息的时候，还有人到老百姓地里捡过一块红薯，当时大家还不以为然，经毛委员一讲，我们才认识到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

为了转变大家的思想，树立军队严格的纪律政策观念，毛泽东同志经常深入进行教育，并及时提出和规定具体的政策纪律。没过几天，在遂川城里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了两条：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这样，我们很快就把群众意见最大的两个问题纠正了，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自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同志又将“八项注意”增加为“十项注意”，即宽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又将“十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丰富概括和具有针对性。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

从“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开始，经过丰富和发展，形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和智慧。它集中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终于圆满地塑造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美好形象。

#### 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

确立游击战战术原则，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当时红军中的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他们学习的是旧军队的一套指挥和管理办法。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么打仗，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这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讲话或同我们聊天时，经常谈到这个问题。1927年12月，第三次打茶陵失败后，他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时，专门谈到怎么打仗的问题。他说：

打仗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要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他讲了中国古代兵书以弱胜强的战例，还特别提到井冈山上的一件事，说过去井冈山有个老土匪，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毛委员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了敌人，又缴获了武器，最后他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不久，毛泽东指挥我们打宁冈，果然取得大胜利。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术思想水平，毛泽东又系统地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从而创造了以弱小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正确作战原则和一套崭新的作战方法。著名的“龙源口大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 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游击战战术原则，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并且在政治上成功地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农民队伍，升编为红军的建制。这件事不仅对于我们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重要作用和意义，而且在此后的复杂斗争中，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改造旧军队和中间势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方针，是前委在古城会议上确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已经讲了这个思想。当时他说，井冈山已有两支农民武装，我们要在井冈山立脚，创立根据地，必须和山上的两支武装力量的首领袁文才、王佐以及他们的部队，搞好团结，搞好联合。他说，我们要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还要搞统一战线，去争取一切中间势力。“统一战线”这个崭新的字眼，在三湾改编时首先提出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专门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对待袁、王两支地方武装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不和这两支农民自卫军搞好关系，我们在井冈山就站不住脚。要与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不使他们反对我们。他还说，遂川有个萧家壁、永新有个尹道一，宁冈有个张开阳等，一些地方的反动武装，这就要求我们和袁、王搞好团结。毛泽东极力主张联合袁、王农民自卫军、首先与他们建立军事统一战线。

由于袁、王部队都是由绿林武装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的，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绿林习气很重，没有政策观念，主要靠江湖义气和封建帮会关系巩固内部。根据这一状况，前委确定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并帮助其发展的正确方针。

团结、改造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联系，做好袁文才、王佐的思想工作。为此，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派入送信给袁文才，袁文才也派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情以及袁的秘书陈慕平等人作为代表来到了三湾。毛泽东向他们

讲了要团结合作的问题，并送给袁文才一百余支枪，袁答应做山上王佐的工作，双方建立了初步联系。

为了实现对袁、王部队的团结改造，毛泽东一面派人联系袁文才，同时还对王佐进行了耐心的争取和教育工作。由于送给王佐一些枪支，起了不小的作用，使他开始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毛泽东知道王佐在山上还有一千多亩水田，便对他讲：保持土地菩萨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萨，土地是农民开发出来的，不让农民得到耕地，农民会不拥护我们的。我们也会站不住的，要看远一点。王佐听了毛泽东的话，终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通过对袁、王的耐心教育和真诚帮助，解除了他们的疑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合作，使我们的部队顺利地茅坪“安家”，在井冈山立脚，并为改造袁、王部队创造了条件。

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参加了夺取宁冈县政权的武装暴动。他的部队政治素质比王佐的部队要好一些。针对袁、王两部的不同情况，确定了改造工作的不同重点。对袁文才部，主要是帮助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其军事素质，派出了徐颜刚、游雪程、陈伯钧等帮助袁部练兵。对王佐部队的改造，则侧重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的整顿。这一工作主要由何长工负责。毛泽东对改造王佐部队的意义和策略问题，当面向何长工工作过多次指示。他强调：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工作，袁、王及其部队发生了重大变化。袁、王二人心服口服，称赞“毛泽东是中央人才，毛泽东派的人有办法”。1928年2月上旬，经前委批准，在宁冈大陇举行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宣布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编为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第二团成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终于将这两支地方武装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 迎接朱德上井冈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后，一直关心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由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均告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难思良将”，上山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联系，以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寻找朱德，并相机联络附近地区的革命力量。

何长工当初和我同是卢德铭警卫团的战士，也是同班战友，他当我的班长。参加秋收起义后又一起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何长工两次下山，三见朱德和陈毅，历经艰险。

1928年4月24日，何长工率二团到达耒市，两天后，朱德、陈毅率部进山也赶到耒市，我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两天后也赶回耒市。此时，耒市充满了空前的喜庆气氛，象盛大节日似的热闹起来。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支革命队伍历经艰难波折，终于胜利会师了！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28年5月4日上午，在耒市东边广场即红四军



教导队操场，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及党政军各界代表都分别讲了话。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会上宣布全体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条大会没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泽东兼第十一师师长，朱德兼第十师师长。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他显得异常兴奋，诙谐地说道：“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可见，会师给军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喜悦。但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最早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通晓兵法、运筹帷幄的军事大家毛泽东，却不喜欢带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也许这就是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 毛泽东的情怀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他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爱和憎，正因为他是个伟人，因而在他的爱惜之中，不仅具有更加炽热的情感和超越常人的胸襟，而且有着巨大的震颤力和向心力。

#### 愤怒斩陈浩

1927年12月下旬，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攻打茶陵。敌众我寡，又没有充分准备。仅有一营和从桂东赶来的三营匆忙迎敌。当时本应及早撤出战斗。但因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和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故意拖延时间而导致战斗失利。直到部队退出战斗，他们仍迟迟不返回井冈山，反而向酃县方向走去，企图利用这次失利，拉出部队投向湘敌方鼎英（陈浩在黄埔军校时的教育长）的十三军。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冒着危险赶到酃县湖口，当即逮捕了陈浩等人，将部队带回宁冈。

12月底，毛泽东在宁冈砦市召开军民大会，愤怒斥责陈浩等人要毁掉井冈山革命队伍的罪恶企图，根据前敌委员会命令，枪毙了陈浩、徐恕、韩昌剑。团长由三营营长张子清接任，参谋长由朱云卿接任。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等挽救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次严重危机。

事后有人多次问及此事，并将陈浩等人企图投敌与朱德投靠其同学范石生并论。我认为这两件事无法相比。首先是陈浩等人违抗军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明确宣布，愿走的给路费，但不能带枪支，不能拉走部队，陈浩等作为团的领导，明知故犯，并企图拉部队投敌，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时我们一团只有一、三两个营的作战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一支最可靠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和前委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军纪军令的严肃性，也挽救了这支革命骨干力量。另外，朱德是在危机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部队才找到范石生的，除了暂时借用部队番号外，原部队编制和指挥权始终保持下来。因此，这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 力保陈伯钧

1927年12月，红军教导队在宁冈砦市创办。队长吕赤，四川人，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支部书记是蔡锺。我和陈伯钧、张令彬，还有一个姓王的，都是区队长。除了张令彬外，我们几个既是区队长，又是教官。1928年3月，教导队随毛泽东率领的一团胜利攻克了酃县县城，缴获不少。其中陈伯钧还搞到一支手枪。他向队长吕赤炫耀：你看，我搞到一支手枪！吕赤看后半开玩笑地说道：什么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不服气，便面对吕赤勾动扳机。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手枪里还压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响，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吕赤头部，吕赤应声倒地，顿时热血喷涌。陈

伯钧目瞪口呆，六神无主，等他跪地呼唤吕赤时，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被打死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气愤不止，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就去见毛泽东。“打死人偿命”，再三要求毛委员批准，枪毙陈伯钧。面对这些激动异常的士兵委员，毛泽东虽然心情沉痛，但却格外的冷静起来。他反复问明情况，思虑良久。终于说道：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按理说“杀人者偿命”，可是你们看看，已经打死了一个，是否还要打死一个？毛泽东这么一说，激动的人群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说道：我是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赤开玩笑，玩枪走火，误杀了人命。他们两个都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还很不够哩。毛泽东停了片刻说：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还不好追悼。来！你们看怎么样？士兵委员会的同志见毛委员这么尊重他们，而且讲的确有道理，也不好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

在当时“左”倾盲动思想影响极甚的情况下，毛泽东智排众议，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同志终于成长为一个著名的高级将领，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 一堂铭心的政治课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决定在中村住下来，给部队讲政治课。毛泽东坐在板田里一条长凳上，全团的部队分作两部分听课。排成扇形坐在禾兜上，围在他的前面。一堂课讲了三天，半天听课，半天讨论。

讲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讲课中，毛泽东泰然自若，他对于解放中国和建设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赤子深情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心。他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使我们激情昂扬，产生了一种无敌的力量。事后，我和罗荣桓、谭政、谭希林、陈伯钧、韩伟、张令彬等，每谈到这次政治课，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和自豪感，觉得对中国革命有底了。

会唱《国际歌》的俘虏兵（一颗红色的苗子）

1928年2月，由一团一营、三营和教导队参加的永新城战斗，打得很漂亮。

战斗结束后，毛委员在茅坪宣布了医治白军伤兵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当时俘虏归我们教导队分管，因为打算留一批充实部队，便对他们开展了工作。有一天，我正当班值星，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唱《国际歌》，满有感情。立即跑上楼去，问他们歌是谁唱的？顿时有个清瘦的青年站起来答道：是我唱的我叫谭甫红。我问他在哪里学会的唱《国际歌》？他说他参加彭湃领导的东江第二次起义，学会了这支歌，起义失败后，逃到江西朱培德部当了兵。听他讲到东江起义，便想到我们一团参谋长朱云卿也是来自东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就问他认识朱云卿吗？这时，他兴奋地连声答道：认得，认得，他是我们东江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我便派传令兵把他领到朱云卿那里。结果，朱云卿不但认识谭甫红，而且还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事情报知毛泽东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田了。这样谭甫红就成为红军教导队的学员。

#### 胜利中的苦与乐

朱德、毛泽东率领我们挺进至赣南大柏地、隘前地区，由于指挥正确和迅速集中了兵力，一举歼灭尾追我后的敌15旅两个团，扭转了进军中的被动

局面。面对着大批战利品，大家高兴得忘记寒冷和饥渴。缴获中有一种精制的合装香烟，由于我们多数人识洋货，误认为是带有机件的炸药包，便往河水里扔，当有人大胆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是香烟时，大家又后悔莫及，甚至又涉水到河里去捞回一些。有人建议沾了水的我们抽，没有沾水的给毛委员抽，大家当然同意。打完仗过春节，正愁没有饭菜，又发现几个被吓跑的地主家过年的饭菜还没有来得及吃。这下解决了个大问题，大家吃了一顿美味丰盛的年夜饭，高兴得乐不可支。

1929年3月11日，部队进至闽西长汀城南四都，经过两天的连续战斗，歼灭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两个团，击毙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长汀城。部队在长汀休息和整编，部队还换了装，全新的衣帽，每人还发了双新球鞋，穿起来特别有劲。看着上下一新的装束，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大家无不高兴地说：跟着毛委员，就能打胜仗！

1930年3月，赣南、闽西根据地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两块根据地进而发展成为中央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同年8月，在湖南浏阳北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师后，合编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此，红军力量迅速壮大，部队从三万人发展到十四万人，接连取得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期间，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先后担任侦察科长、作战科长、通讯主任、教育科长等职务。从始至终参加了反“围剿”的斗争，切身感受到毛泽东诱敌深入、积极防御方针的正确和他精干指挥的军事指导艺术。

不幸的是，在我们党内，一旦革命形势好起来的时候，总有些人头脑发热膨胀起来，这似乎成为规律。由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和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大力推行，使得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不但有违抗“中央决定”之过，而且又增加了对抗“国际路线”之错，从而使毛泽东同志受到无辜的冤枉和连续的折磨。

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竟作出了“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的错误决定，又成为“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开始。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左”倾盲动主义者以所谓“中央长信指示”作为尚方宝剑，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毫无根据地批评“积极防御路线”，无理地拒绝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正确意见，迫使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会议的结果使我无法接受。因为就在这一年的二月，苏区中央局执行“进攻路线”，部署我们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时，开始毛泽东就不赞成，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这种危机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第五兵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毛泽东再一次明确表示不该打赣州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们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把进攻受挫、损失严重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遂未坚决布置”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1933年6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即第二次宁都会议），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申述，使他仍然在受审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极为沉重，再一次“病倒”。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但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进而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断然拒

绝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主张，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损失惨重，以致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1934年10月，决定丢弃中央根据地而转入长征。他们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继而走向“逃跑主义”，于长征初期，又使仅余的八万红军主力过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折损过半。经过毛泽东同志多年发展起来的几十万红军和广大根据地，几乎要糟踏光了！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 无敌的精神和力量

遵义会议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使党和红军幸得挽救，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毛委员回前方指挥来了”，红军将士欢呼雀跃，精神振奋，好象获得新的生命，一扫往日的疑虑和愤懑情绪，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西却又向东，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调动敌军。我军一动，敌人又重摆阵势，我们便乘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人部署就绪，我们又远走高飞了。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被动挨打。娄山关、遵义城巧打激战，老鸦山、乌江边穷追敌兵，连续歼敌三个多师，捷报频频传来。几万人的红军突然变成了无处不在又无处不见的神兵天将，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心惊胆颤，无可奈何。这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惨状，形成鲜明的对比。

#### 三渡赤水“请滇军”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我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柴树蕃任党代表。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为调动敌人，决定三渡赤水，进至川南。朱德提出：由陈士榘指挥教导营、军委工兵营两营架桥。毛泽东表示赞成，他点头说道：请总司令决断。受命后我同工兵营营长谭希林立即勘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一连架起两座浮桥，并设了一个徒涉场，架桥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中央和军委首长们通过浮桥，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他一边通过，一边审视着浮桥，见到我们便打趣他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我们都过了茅台瘾。然后他自信他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次我们说不定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当时我并不完全明白毛泽东“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只知道我们这次行动仍然按黎平会议的决定，要向敌力量薄弱的贵阳前进。

我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敌人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便调集兵力向我逼近。但我军又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然南进，渡过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他十万火急地命云南军阀、省主席龙云率部前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布防。这时，我们才真象大白，原来调出滇军果真还是蒋介石帮了忙。我激动不已，不禁扼腕叫绝，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仅在调动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而且连蒋介石也调动起来了！

当下，由我们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龙里，迷惑敌人，而我军其余大部主力则穿越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的滇军背道而行。毛泽东示形动敌，声东击西，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 巧夺定番借敌旗

我红一军团包围龙里，为掩护主力进军云南，便虚张声势，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数县县城。其中定番地处贵阳以南，是贵阳通往云南的交通要冲。首攻定番，既可迷惑敌人，又便于监视贵阳敌人之动向。1935年4月9日，教导营通过龙里至贵阳公路的封锁线后，第二天天未亮，部队即在肃静中出发。由于蒋介石急令调兵，各路敌军纷纷赶援贵阳。在我们行军的路上，忽而天空有敌机轰炸，忽而地面与敌军遭遇，我第一师部队同敌人打得尤为激烈。飞机轰鸣，枪声大作，俨然是一派红军即将攻打贵阳的局面。实际上是虚晃一枪，我军都是通过性质，边打边走，不停地运动。

教导营连续翻过两座大山，准备宿营时，早已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屁股后边。

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接到总司令部命令：“一军团教导营，应马上出发，经赤城镇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宿营。定番至贵阳百余里，注意向该方向警戒。”部队早饭吃上了猪肉，他们一面说土豪的猪肉真香，一面感谢辛苦了一夜的炊事员，当时我想，要是毛泽东在这里，至少他要吃上一碗大肥肉！

有了战斗任务，又吃上了猪肉，大家情绪高涨，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路，到达赤城镇附近。突然间，敌人的飞机斜刺飞来，在我们头顶上狂叫着盘旋了几圈，后来大概是因为发现了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帜，便向西飞去。这倒给了我启发，毛泽东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我何不示假隐真欺骗敌人？即令尖兵打起那面“青天白日”旗子，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在距定番城不远的地方，便望见城墙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我们遥望。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头头及其喽罗们，果真把我们当成他们的“中央军”欢迎来了。但当走到城下桥边的时候，终于被敌人识破了，靖卫团的哨兵立即向我们开火，警察们急忙关闭城门，登城抵抗，大批“欢迎”的人群夺命而逃，但为时已晚，说时迟那时快，我第一连的一个班已经迅速地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几个守城的团匪，部队紧跟着扑了上去，敌人见我来势迅猛，在一片呼救叫喊声中狼奔豕突般地滚坍了下去。我军占领定番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大造“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舆论。毛泽东等接到我们的作战报告后，笑着说道：陈士集用兵法口来，他也跟敌人搞名堂哩！

给毛泽东当“设营司令”

中央红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乘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之际，向云南急进，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五天后，继续北上到达彝族同胞聚居区。

为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对部队进行了纪律整顿。军团部派陈奇涵下来调查，发现教导营少了几十人，我作为营长，当负重要责任。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罗荣桓找我谈话，林彪说：部队减员大多，要执行纪律。我问怎么执行法？林彪说：禁闭一个月。我急忙说道：关我在这里，怎么走啊？林彪几乎笑起来，说道：你还是要走，但不能骑马，马交给警卫员，还是跟着你。“走路关禁闭”，这处分很新鲜。我紧跟部队行军，不指挥，不查哨，自带干粮袋，警卫员到时候给热饭，这处分也太舒服了。于是我找到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过雪山每到山垭口时，有些同志因身体虚弱，过度疲劳。总要你靠我，我靠你的停下来休息，由于山上空气稀薄，有的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起来。我在武汉宋庆龄、何香凝办的卫生训练班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主动

向大家作宣传，并搀扶困难有病的同志，每当过山垭口的时候，大家都格外警觉起来，越走越好。我们这队人马顺利地翻越了雪山，没有出现减员问题。

快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兵团部，见我精神很好，便笑着说道：陈士榘下马受罚，表现不错嘛。然后他说：你搞的民情调查报告写得满好哩，就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打前站，搞清民情、政情、路线、画图标路，号房子。从此，每次行军我就带着副官和炊事员等人先行一步，一边调查，一边插路线标示牌，在宿营地提前埋锅造饭，划定宿营区域，标定住地房号。在工作中，我发现部队过草地身体消耗很大，十分疲劳，减员情况仍较严重。根据有关政情特别是敌情的调查，为了保存部队的体力，我提出缩短行军距离，每天走四十里路就宿营休息的建议。毛泽东非常赞同，他说：这样好，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半天工作，部队精神了。这是战胜自然敌人的好办法。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由于部队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筹集些给养，改善生活，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减员情况大为减少。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布署在木桥和山口隘处，并在桥头和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敌人凭险而守，很难通过。为了减少部队伤亡，毛泽东想找一条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让我去了解情况。我立即调查了当地的一些群众，并审讯了三个俘虏，结果都证实这里别无他路，还是要通过腊子口。情况报告后，毛泽东要我去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我带上罗荣桓政委的望远镜，选定了一个既安全又便于观察的小山头，放眼俯视，正赶上我军突击队突破腊子口，枪声大作，战斗激烈，我匆匆返回，不料忙中失手，将望远镜的盖子丢下山崖。在向毛泽东报告后，他眼睛一亮，立即说道：赶快走！因为毛泽东的座马还在兵团机关没有跟上来，要走就得步行我便犹豫起来。只听他不断地说道：立即行动，我们一走，机关就走快了。毛泽东迅步急行，一路领先来到腊子口，部队刚刚通过。此时，他站在腊子口上，却格外的平静起来。环视着腊子口的险山秀水，目送着即将远去的部队，仔细地搜寻着前方。接着便大步流星地走起来，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道路要通过一座座小土山，很不好走。但我见他走得很起劲，好象很喜欢爬山，本来有一个适合于宿营的地方，他仍然不停地说：不宿营，继续走。反而加快了速度，一直走到太阳落山，爬上山坡，进入一片草地中间的村子口，才停下脚步，向我挥手道：设营司令，快找房子，我要困觉了。我知道毛泽东太累了，即速找好房子，便请他休息了。我躺下后仍然不能入睡，毛泽东同志长我十五、六岁，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真担心把他累坏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想让他多睡些时间。不料，这时毛泽东已经出现在我的背后，轻手轻脚地走到我面前，亲切地说道：士榘同志，起得好早啊，你的觉怕没困够吧？顿时，一阵热流涌上心头，我正为自己没有照顾好他而感到内疚，他却来关照我来了。我恭敬地站起来，好象嗓子被什么塞住了，用了很大的劲才说出一句话：主席，你太累了！毛泽东诙谐而又象安慰我似地说：昨天那程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至于困觉吗，他略停了一下说：是有觉就困，没觉也不困。然后他陡转话题，关切地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首长和机关的同志，我立即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这时，天色将亮，毛泽东象一块巨大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周身感

到热烘烘的。我好象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他似地，不禁仔细地打量起来，只见毛泽东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红军战士穿的灰色军装，习惯地敞着怀，头发似乎更长了些，他那双智慧而明亮的眼睛，始终是那么慈祥，那么动人。错误路线给他带来的历次磨难，长征中艰苦生活的长期砥砺，使这位巨人变得更加刚毅和自信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被许多人看作是灾难和痛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和几万红军的奋斗，竟然创造了中外历史上的奇迹，并且变成成为动人心魄的精神财富和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

#### 难忘的教诲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我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翌年3月，渡河东征，返回陕北后，进红军大学一科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革命等方面，比较系统地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红大的教学课程和讲授导师是这样安排的：军事课，系战略学，由毛泽东讲授；战役学，由林彪讲授；战术课，由李德讲授（李是共产国际派员）；政治课分为：政治经济学，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王稼祥、博古讲授；中国革命，洛甫（张闻天）讲授；

文化课（即新文化），革命老人徐特立讲授。

毛泽东以“军事辩证法”为题所作的战略学演讲，共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五个部分，还讲了其他有关军事哲学若干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前四个部分的内容后来大都收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在演讲中，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指挥员要树立全局观点，掌握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提出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原则。

在此以前，我只是从感觉上认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了解其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讲演，使人大开了眼界，是我在军事理论上的一次升华，并且受益终身，在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直接指挥和参加指挥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都是认真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果。

#### 最后一次谈话

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初期，我主要是在南京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兼训练部长等职务，1952年又来北京任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直至1975年。这期间，我因工作关系，曾多次接触毛泽东。

195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中央办公厅直接打电话来，说主席要我马上过去。我顾不得盛夏酷暑，乘车直奔中南海毛泽东处，但他却不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了警卫人员，才知道毛泽东在游泳池。我赶到游泳池，老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围座在游泳池边的一个棚子里。我便快步走进，向毛泽东报到。他身披白色的游泳衣，轻捷地启动那高大的身躯，对我说道：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周恩来总理说：听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桥了。我回答：那是去年在济南洛口黄河上架过一次，是在非汛期架成的。我心理明白工程兵吃几

碗干饭，根据当时的装备训练情况，非汛期能架成浮桥，在汛期就不一定有把握。我只好向中央领导说明真情。

听了我的回答，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周恩来总理讲，这是铁道部吕正操部长向中央提出来的，说工程兵在黄河上架过浮桥，于是他才跟主席、彭总等进行了商量。既然中央已定，我便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表示：为了检验工程兵的桥梁装备情况，就作为一次练兵，力争把浮桥架起来。由于当时还没有自己研制的桥梁器材，第一次架桥没有成功。后来，工程兵党委确立了把训练装备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改造、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装备训练发展规划，并于当年成立了工程兵装备器材研究所，对外国（包括购买和缴获）装备，从五十年代以使用为主，走向六、七十年代的改造创新时期，开始有了我们自己的装备。六十年代中期，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高兴他说道：看来，那（指郑州黄河架浮桥）是一次失败的成功，只有从实际出发，才符合主席思想，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经过科研人员和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在七十年代走向系列发展。这时，由我们自己研制的渡河器材，已能克服季节性障碍，在短时间内，架通长江、黄河、珠江、辽河四大水系的浮桥。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生前愿望。

现在，工程兵主要装备器材已达到八十年代的国际先进水平。

“听你司令员的”

1965年，军委工程兵一支部队奉命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构筑防空工事。中南海管理局毛局长多次动员毛泽东搬家，他始终不愿意搬出来，毛局长很着急。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直接来到毛泽东住处（也是他的书房），给他做工作，毛泽东微笑着说：陈司令来作战斗动员了！我急忙说道：主席当然用不着我来动员，可主席不搬家，部队不便进入，毛局长他们也不好安排，毛泽东听后笑了，他说：是不是毛局长向你打了我的报告，你才来找我的？我也笑了，我说：这当然是毛局长他们的工作，不过，我们工程兵要给你修工事，我也应该向您汇报啊，只要主席搬家，我们有些事就能够安排了，毛泽东看了看我诙谐他说道：你们不要冤枉我啰，我听你陈司令的，这可以了吧！

毛泽东搬了家，毛局长很高兴，他神秘又俏皮地对我说：看来，主席还真听你陈司令员的。

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是顾全大局的，只要你给他讲清楚，办起事来很痛快。毛泽东很喜欢部队，尤其是这次是来给他修地下工事的，又是当年被他誉为“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他很高兴。因为“无名英雄”这个称号，还是他在1933年夏红军工兵第一次在中央苏区瑞金为中央领导修工事时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意当工兵的思想，给战士们讲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白龙马的故事。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白龙马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一直成为鼓舞工程兵指战员奋勇前进的巨大动力，并且是工程兵思想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32年后，被誉为白龙马似的无名英雄的工程兵，不仅将革命驮到了胜利，而且已经取到真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精神焕发地再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像当年那样十分关心工程兵指战员。他常对毛局长和有关工作人员说，工程兵是无名英雄，他们施工很辛苦，你们要关照他们。每逢



过五一、八一、十一等节假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便派人送些水果、肉食来慰问施工部队。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等，还多次看望接见工程兵部队。这是对工程兵的关怀和鼓舞，也是对我这个工程兵司令员的关怀和鼓舞。

#### 最后一次谈话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我接触毛泽东的机会更少了。直到1973年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和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我任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天，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毛主席要接见我们。

从三座门到中南海小礼堂客厅，我发现除了汪东兴在招呼以外，就我一个人等在等候，当然不知道接见要谈些什么，但一种期待和思念之情，仍然使我感到兴奋。汪东兴终于出来打招呼，告诉我可以进去了。走进会议厅，便看到毛泽东端座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王海容、唐闻生也在一边，是准备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毛泽东湖南韶山口音很重，有时候需要解释一下），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毛泽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道：陈士榘同志，要说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听到毛泽东讲这句话，我心里一阵激动……

毛泽东接着问我：当年上山的人现在还有多少？

我理解毛泽东是指秋收起义后跟随他第一次上井冈山的同志，但因当时我还没有仔细计算过，便说了个大概数字：还有二十几个人。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托了主席的福。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这就不对了，是托了党的福，我们都托了共产党的福。

同1969年相比，毛泽东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那年10月，为了进一步增进我们同阿尔及利亚的友谊，我奉命率中国政府和军事代表团，前往访问并参加阿尔及利亚国庆。行前，我问主席，能不能代表你向布迈丁主席问好？

他回答得非常爽快，说：当然可以。你这是外交活动，理应如此。那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现在他居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军队领导班子的问题。他双目凝视着我，说道：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毛泽东是指我在华东野战军的时候，参加和指挥打了一些大的胜仗，说那是我大出风头的时候。也许毛泽东在这里给我划了“句号”，但从他讲我们是一个山头的，到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更使人感到毛泽东历来反对拉山头，搞小圈子，主张五湖四海的一贯思想。足以说明了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作风。当我最后向他告别的时候，我庄重地向毛泽东敬了一个军礼，情不自禁地说道：祝愿主席健康长寿。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为毛泽东对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到这里，我对毛泽东的回忆似应结束了，但又觉得言犹未尽。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同毛泽东的接触仅仅是他革命实践中的一个有限部分，不是大部，更不是全部。但是一点可窥视一般。一个伟大的革命，必须有伟大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个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产生，并只能在实践中去检验、丰富和发展。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已经作出了开创性的历

史贡献，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集中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心血、智慧，乃至血的教训，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刘恩营整理）

##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李德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我是1969年7月由党中央决定调到北京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到北京后没几天，总理就带着我去见毛主席。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主席随手拿起总理放在桌上的眼镜戴了一下，问我戴不戴眼镜，就这样亲切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谈话中，主席向我讲了党的斗争历史，还问我看什么书，并且谈到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在总理向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后，我感到担子太重，提出职务太多，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后来，我一直是按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的。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到生产落后的安徽淮北去搞调查研究将近一个月。接到会议通知后，就从安徽直接上庐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那天，是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总理宣布了会议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列入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谈毛主席的天才，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导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等等。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一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70年已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已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很早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选阅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部署她手下几员大将在各组鼓动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为了尽快配合行动，将发言稿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于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上。

据后来揭发出的材料，林彪在听秘书读简报后，高兴得笑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言份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体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送到北京后，我仔细看了几遍。毛主席的这篇文章，点出了事情的性质，公开批判了陈伯达，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检查书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从1970年12月22日开至1971年1月24日。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毛主席在我的任命宣布前亲自和我谈了话。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一起去见了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经过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先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南昌、杭州，一路会见了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毛主席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着重讲了1970年庐山的这场斗争，指出：“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员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说，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还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

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点出了庐山会议事件的反党性质，对林彪一伙公开严厉地进行了谴责。

毛主席8月31日到南昌后，获悉林彪集团骨干分子周宇驰曾到江西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进一步引起了警觉，于9月3日，离开南昌到达杭州。

毛主席沿途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于第二天一回到北京，就将此信息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就在电话上告诉了叶群。9月5日深夜，林彪在广州的爪牙将毛主席讲话内容密报北京的于新野，于记了十五页，在9月6日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稿送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两路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使林彪一伙吓得失魂落魄。惊恐之余，狗急跳墙，他们决定下毒手谋害毛主席。

9月8日，林彪亲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信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后来审判罪犯时，他们供出林立果和同伙研究谋杀毛主席的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在毛主席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毛主席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9月10日，毛主席突然决定下午走，也不要人送行。离开杭州3个多小时后，到了上海。他没有下车，叫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第二天上午，许世友一下飞机，就由人领着他的汽车直驶毛主席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完话，叫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吃饭。汪东兴送走他们后，刚回来，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一直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方案，有提出在上海虹桥机场放火“乘乱干掉他”；有提出用火焰喷射器烧；有提出用飞机轰炸。还有一个方案是在苏州硕放铁路桥炸火车……此一方案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毛主席的专列已安全通过硕放桥，飞驰北上，一路不停。通过了蚌埠——济南一到了天津。毛主席叫停车，嘱咐随行的张耀词：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我们在1971年9月12日12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毛主席长途南巡归来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虑着同林彪一伙斗争的大事，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我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

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会议由总理主持，讨论他即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黄吴李邱也参加了会议。

10点多钟，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来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00，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11：22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知道山海关不但有256号三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一架伊尔—14。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

到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6”拦截，迫使直升机回头，迫降在怀柔境内。周宇驰打死了架机回返的陈修文同志后，与于新野自杀了，李伟信被活捉。林彪乘的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毛主席、周总理都商量好了应付一切由此而引起的事件。

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待一切安排妥当，总理已五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到了9月14日下午2点，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特急电报，只好把总理又叫醒。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已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后，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这时空军成立了由曹里怀同志等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我工作。在清查工作中，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

甚至具体地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



大历史贡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但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帮助，但林、陈反党集团的一伙人不思悔改，最终走上穷凶极恶，准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值此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接见党政军领导，不但在要害地区完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防范，而且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安全回京。林彪集团见到一切阴谋诡计均被粉碎，最终选择了仓惶叛逃的道路，落得个摔死异国的可耻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文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亲自着手纠正一些过“左”行为，如指示尽快尽多地解放干部。林彪搞“战备疏散”给弄到外地去的老师和老同志们，也都先后请回了北京。

朱德同志回北京后，总理和我陪同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朱总就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什么黑司令！你是红司令嘛！”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由叶帅主持。毛主席交待这项任务时，也是总理和我陪叶帅去的。毛主席见到叶帅后，当面向叶帅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说法。以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批示了大量解放老干部的信件和申诉给我，让总政办理。在周总理、叶帅领导下，我们做了艰巨的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的阻扰，使得军队大批高级将领得到解放。

“四人帮”粉碎后，到1980年1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黄、吴、李、邱及王、张、江、姚等一伙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判刑。

历史又一次证明，一切反人民的罪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 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候

郭化若

在全国上下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起我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情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在 1929 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几经周折，当年 8 月 2 日到达福建龙岩，加入红四军的行列。古田会议后，我被调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一直在毛主席身边负责司令部战斗文书拟制工作。还任过毛泽东同志的秘书；长征途中，有段时间毛泽东随干部团行动，我们吃住在一块。到达陕北后，直到抗战胜利，我一直在抗大和军委总部工作，耳提面命地接受毛泽东的指挥和教育。我深切地体会到，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党的事业就发展壮大，军队就无往而不胜，革命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关怀教育，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确实是写不完道不尽的，下面我挂一漏万地谈点感受。

在建军理论和实践上

有独到之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教训，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工人力量还很薄弱，在军队成分不能以工人为基本力量，而只能以农民为骨干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各地区的党和红军从起义之后就开始了摸索，逐步对军队进行改造和建设。

1929 年 1 月，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匝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

随着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征战中伤亡较大，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大多”、“十分缺乏”，同时，部队及党内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带来了思想状况复杂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突出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有人产生了动摇。

党内和军内一些同志的主张和意见分歧，由于下山以来长期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转战，未能尽快解决。5、6 月间，又因在要不要取消红四军军委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等人使争论公开化，影响了内部团结。

毛泽东同志对红军下山以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表现，早有所察觉。6 月 14 日，他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把红军党内错误思想和问题，概括为 14 条，强调最主要是党的领导问题，红军的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并将这封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 3 期上，想说服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1929 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国，8 月 2 日到福建龙岩找到红军，先在第二纵队任参谋，后任参谋长。当我到二纵不久就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长信。当时部队打骂士兵、虐待俘虏、军阀习气到处都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言之有据，分析深刻，我感到很有道理，很符合部队的实际，毛泽东同志观点完全正确。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在当时并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红军中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甚。三打龙岩后，暂时有了一个较安全的环境，6月22日便召开了红四军七次党代表会议，企图用会议形式解决争论问题。第四纵队长傅柏翠告诉我，开“七大”的头天晚总前委开了扩大会议，他晚到了十多分钟，会议已经是陈毅在主持。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油印散发给到会的人。信是拥护毛泽东的。朱、毛在会上没有怎么讲话，朱德在个别问题上作了点解释。会上有的批朱，有的批毛，最后推荐第二天大会主持人是陈毅。“七大”开了一天，陈毅把头天晚上大家的发言意思综合起来，作了报告，之后有几个发了言，没有怎么讨论就结束了。大会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为中央指定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未能当选。

“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到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领导只剩朱德1人，担子很重，应付不开，红四军政治工作大为削弱。基层干部战士非常惦念毛泽东同志。出击闽中失利后，部队出现了思想混乱。9月下旬，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当时前委什么都是民主，大家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然毫无结果。“八大”后转战东江，部队又遭受大的挫折，部队中包括朱德在内的一部分同志，认识到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肃清XX主义我不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回来的问题争论很激烈，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由我和彭桔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10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陈毅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七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工作。中共中央于9月28日写完《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陈毅致信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于11月26日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回到前委，按照中央9月来信精神，于11月28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我到会比较早，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正在谈笑风生。见我去了，朱德忙说：“这就是郭化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好啊，又来了一位秀才。”接着问我部队情况怎样，我说问题不少。他说你不能写个材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提出点解决办法来。我表示努力照办。毛泽东最后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为了开“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12月初，红四军主力部队开进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驻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反映。12月中旬，红四军机关进驻上杭古田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开了10多天，进一步为“九大”召开进行准备。

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镇开幕，出席大会代表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代表。我有幸出席了这次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建党建军理论问题的多次发言，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议只开了3天就顺利地结束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基本原则，红四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用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四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和红军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特定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但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决议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的独到之处。

#### 高超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领导艺术。中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1930年立三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机关，6月11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任务，提出了整套错误主张。在此之前，派了涂振农到福建汀州给红四军传达他的命令，其主要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四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对李立三整个方案，朱毛是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分析了形势，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但在敌军强大、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就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这是错误的。而这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30年6月22日毛泽东向红四军、红十二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内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给予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作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到江西广昌集中后，7月11日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

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占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蒋匪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署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早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十八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同志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界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没有对抗中央的命令。在关键的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决策，对错误的主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高明之处。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团结干部，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力量。1930年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袭击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打下文家市的当天，毛泽东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四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理论家”

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其实，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虽然侥幸攻进，但敌人一集中兵力反攻，就把我军包围在长沙城内。后虽突围出来，据当时参加第一次打长沙的同志回忆：被他们带去的地方武装约一万多人（没有准确的统计），都来不及撤退，有一批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挨家挨户搜查，致使长沙城内以至城郊我地下党也同时遭到破坏，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

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同志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先决定方面军“向长沙前进”（红一方面军司令部1930年8月24日于永和市发出的命令），应于8月28日进到长沙东南郊距城约20里左右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一带。29日到达上述地点，先头部队一部分展开成战斗队形，并分别派出少数兵力向长沙进行威力侦察。后来有人借口第二次打长沙时成立了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是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就说第二次打长沙的错误，是他执行了立三路线；也有人说第二次打长沙是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因而是正确的。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都是错误的。

在围长沙的过程中，我们于9月1日截到一个敌军的传令兵，缴到一件作战命令。从这份命令中清楚地知道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我们调整部署，以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

当晚，又开会（几乎每晚都开会，都争论）。少数领导干部又提出来，说敌人遗失作战命令，一定会改变行动，我军不能再等，吵着要去打长沙。争论的结果，采取妥协的办法，决定留下红三军作为方面军的总预备队（这种作战部署是总司令部有权决定，在总前委会上也无法反对的），仍控制在猴子石侧面，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展开向长沙进攻。

第三天下午3时许，敌陶广师之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沿猴子石出击了。至5时许，敌人出来约2个多团，后续部队尚未出城。我红三军因时近黄昏不便再等，即大举出击。红四军，红十二军各有一部参加战斗一直压歼敌军于湘江边上，敌军官兵被击落水死者约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出击的敌军基本上全部被歼。这一仗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我军部队得到补充和锻炼。战后查明，敌军虽遗失了作战文件却并未发现，只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反动军队传达命令迟缓，才推迟了一天，如果我们在战役指导上不受干扰，继续将主力部署在猴子石一侧，还会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消灭猴子石出击的敌人之后，有人又吵着要打长沙。我军发起两次强攻，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无法冲破敌人电网。结果一个突破口也没有打开。

怎么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呢？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先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近郊“散开”，诱敌出击，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之。这是第一步。这一建议，并没有放弃打长沙，所以要求打长沙的干部接受了。红一方面军从8月29日推进到长沙近郊新桥地区后，不断移动小打，同长沙的敌军周旋达半个月之久。当时从长江局传来张桂军已进到湘潭的消息。文章好做了，毛泽东同志当即提出先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而要消灭张桂军和何键出击部队，就得将红一方

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下令红一方面军“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州）等处待机”（见红一方面军总部9月12日命令）。这是第二步。分散到萍、醴、攸后，毛泽东又以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三县（均是白色区域）大力筹款20万（仅半个月军费），同时要在三县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为理由，提出部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两个军团从9月14日起，以12天时间在三县筹款。12天后，一军团沿株萍路进攻吉安，三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这是第三步。9月13日，方面军总部在株洲发出命令，命令前面说：“……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后面说：“……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攻取峡江、新赣”，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又一次争论，终于把整个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带到了江西。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打文家市时就想好了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这一战略计划是到湖南去，配合三军团狠打何键部队，然后引导三军团沿株萍路回师攻吉，准备在赣南闽西红色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作战。

事情总是复杂曲折的。总部9月29日下午在宜春发出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后，当晚得到了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同志的来信，大意说，长江局查明张桂军并未来到湘潭，一方面军仍应回打长沙。本来总部在发出向吉安前进的命令中就指定红三军派部队去迎接并护送周以粟到总部来。当晚周以粟就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一到宜春，毛泽东同志就热烈地欢迎他，并同他通宵交谈，把他说服了。这位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成为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领导，后来就是他在青塘会议上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在宜春开了一个会，就是有名的袁州会议。这次会议是毛泽东同志说服周以粟，并在周以粟的支持下召开的，主要是决定不回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我长期围困的吉安。这是在战略转变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尔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 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从而赢得战争的主动权，1930年10月，蒋介石兴兵10万向中央苏区进犯，声称3至6个月消灭红军。当时红军只有4万多人，武器装备极差，怎么打法，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时，大多数人又不能理解。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行动委员会在新余罗坊开了个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说明面对敌人首次“围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撒开双手诱敌深入”，充分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歼灭敌人的道理。他认为“将欲取

之必先与之”，不要怕丧失土地，一时的丧失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只有先退一步才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他要求干部不要忘记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必须实行战略退却。10月30日，总前委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谈到“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红军在11月5日全部渡过赣江，抓紧时间打土豪筹款，使进剿的敌人第一次扑空。11月中旬红军第二次大踏步后退，进入苏区中部待机，使尾追敌人第二次扑空。12月1日，红军再向苏区底部收缩，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敌人第三次扑空。12月底进攻的敌人已疲惫不堪，红军则进行战略反攻，一举歼灭了敌人主力十八师，活捉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乘胜追歼，5天打两仗，俘敌万余。依靠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指导，胜利结束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同志还善于在打第一仗之先，就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的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1931年2月，蒋介石派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随后，兴兵20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红军虽然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但是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贯彻到了苏区，带来了干扰。他们开头提出逃跑，后来又在打强敌和弱敌上展开争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进行了斗争，在敌人多路进攻情况下，提出先打数量虽多，但来自北方、表现恐惧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向东发展，扩大战果，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指挥红军隐蔽集结，迫敌而居，待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移动时，进行伏击，包围歼灭，接着横扫而东，15天打了5个大胜仗，敌20万兵上崩瓦解，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跑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大骂部属无能，毛泽东却写词《渔家傲》讽刺“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用兵还常“避实就虚，出奇制胜”。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剿匪”总司令，调动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方针，分7路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限令“3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10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镇定自若指挥红军先向苏区后部收集，然后从敌人缝隙中穿插过去，绕至敌后，向敌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而置于无用之地，打其薄弱处，初战将敌挺进第三纵队大部歼灭。然后及敌回头向北，狼奔豕突，已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实施战略反攻，敌军7路有4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 刻苦读书

毛泽东同志知识渊博，处事精明，领导、指挥艺术高超，我认为和他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

洛川会议前夕，毛主席住在延安城内一座石窑洞内。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研读联共党史。见我去了，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犀利的目光打量我一番，便说：“化若同志，你瘦多了。怎么搞的？”我说不知什么原因，老一个劲地往下掉肉。主席说：“累的，累的，你们的工作很辛苦。”我见主席办公桌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拿起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翻了翻，见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毛主席的墨笔小字旁批，内容多是谈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



的经验或教训。这些旁批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毛主席工作那么忙，在读书上这样下功夫，我不由得赞叹起来。主席说：“不读书不行呀，人家不是说我狭隘经验论吗？再说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我说来延安迟了，没赶上听他在抗大讲哲学课，主席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不大理解，主席解释说：“你看，我花3天4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说完两个人都笑了。我临走时，主席说：“你要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如果学习哲学有什么体会，也来给我谈谈。”

洛川会议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迅猛发展，继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斗争后，经国共两党谈判，湘、赣、闽、浙、鄂、豫、皖等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运筹中国的抗日事业，毛泽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每天一早机要科给他送来许多电报文件，主席通看一下摘要，对急需答复的，立即拟写批复，如果要答复的文件多，就一直工作下去，连早饭也不吃，那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访问的名流学者天天都有，毛主席都一一接待，亲切恳谈，时间多安排在夜间，一谈就是到深夜，有时通宵，客人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然而毛主席就是在这样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的情况下，仍坚持挤时间读书。初冬的一天早上，我爬山回来，太阳刚照到主席窑洞前，见他坐在太阳下看书，我走过去说：“主席，您起得真早。”

“我还没睡哩。”主席说。

听了主席回答，我半晌说不上话来，他读书真正是废寝忘食了。

“主席，给你搞个钟来好吗？”我问。

“不，不要钟好！”他非常干脆地回答，“有了钟就不自由了，没有钟，自由，什么时候工作做完，就什么时候睡觉。”

“如果有人约你谈话呢？”

“我叫秘书到时间喊我。”

有一天傍晚，我随同三四个老同志来看主席，正好主席工作告一段落站起来休息，便和大家闲谈。天黑了，主席叫搞饭吃，大家也没有推辞。延安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就是吃几两肉也有严格限制，不许多买，更不许给他炖鸡吃。因此有客人来，只好多炒两个鸡蛋，再加一点延安所仅有的红萝卜之类的蔬菜。大家在等着开饭，主席有趣地问：“人为什么每天吃三顿饭？吃一顿饭不行吗？我就常常一天只吃一餐。”我们大家不知如何回答好。一会儿，饭开出来了，四个菜，一个汤，一大锅米饭，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不大言语地吃着饭，有的吃两碗，有的吃一碗半。大家看看菜，都不好意思下筷。主席则侃侃而谈，古今中外，无所不至。当前情况和将来工作也都谈到。主席看看大家都吃完饭放下筷子，便问：“都吃饱了吗？”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吃饱了。”主席说：“还有许多菜哩！菜里有营养。”他这才大口地吃起饭来，把盘里很少的剩菜吃光。其实他每餐规定的菜，已被我们吃去了一半还多。主席和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从井冈山时期同吃红米南瓜起，就一直是这样的。但主席工作学习消耗的精力比一般战士不知要大多少倍。

毛主席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酷爱读书。他曾给我讲过，学生时期喜欢读介绍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战役的书，读研究农民战争的胜败得失的书，

他还读过记载历代战争中争夺战略要地的《读史方輿记要》，诸子百家中各种政治、哲学著作。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思考。他的领悟力、记忆力和批判吸收能力，都比一般人强。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他的政治活动能力，在党内是很杰出的。陈毅同志在“七大”前，同毛主席交谈过井冈山斗争问题。谈后找到我，告诉了谈话的大略内容。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等等，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使之更加完美。历史的实际正象陈毅同志所说的那样，当时毛主席已牢牢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则，如强调阶级分析，社会调查；重视贫雇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明确指出红军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特点等。他和朱德同志都一再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点点本钱，不能丝毫大意，不能打就走。毛主席又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多谋善断，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3千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3万余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经过艰难惊险，几经曲折的奋战，终于取得长征的胜利。毛主席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指挥，总是出敌意外，真可谓妙计神兵。

尽管如此，但毛主席并不自满，到了延安，更加刻苦钻研马、恩、列、斯著作。他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我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接着他又说：“李达还寄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后来延安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毛主席在百忙中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联系革命实际，认真地研究阅读。他自己说较多地读列宁的著作，这大概是要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关于帝国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对民主革命和由此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以便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对斯大林的著作也很尊重。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主席理论上多方面发展马列主义的成就，是和他学习中联系实际、刻苦钻研、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人们多说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过程，依我看同全世界各国革命的历程比较，中国革命还算是顺利的。当然这种“顺利”，与毛泽东同志精通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于革命实践是不无联系的。

尊重人民

1938年7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党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这是陈云写信告诉我的：

化若同志：

我代表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你，中央组织部于7月12日正式通过恢复你的党籍，认为1932年在江西红校时，托派分子供你为托派是没有根据的。供词（是）不可靠的。

此致

敬礼！

陈云

7月17日

7月23日军委总政治部又给我来信：

郭化若同志：

关于你请求恢复党籍的问题，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1938年7月12日恢复你的党籍，就是过去被开除时的那一段仍给你党籍。党认为你7年来是坚持了为党的路线奋斗，并且证明当时有人供你为托派中委的供词是不可靠的。请将这一恢复你党籍之决定转告总支委及本支部，并写入党员登记表上，以作根据。为盼。

此致

敬礼！

总政治部组织部

7月23日

之后，陈云同志在抗大干部会上两次宣布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至此我背了7年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卸下来了。许多熟人都向我祝贺，我自己也兴奋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做为一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交纳党费，总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旦被无辜开除党籍，不能参加了这种活动，才会觉得这些活动很珍贵，很神圣。我被关在党外7年，每当看到别的同志参加党的会议，交纳党费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象一个没爹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党的教育，党的监督，党组织中的温暖，是那样诱人，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回到了党的组织内，真象从零下几十度的严冬突然进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7年来，遭旁人的白眼倒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出答案，常常为此彻夜难眠。由于我出身很穷，当我了解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我就决心跟党闹一辈子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逐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在黄埔军校时，曾因成绩优异，蒋介石两次手令我当秘书，都拒绝了，我只愿听从党的指挥。北伐战争失败后，我向组织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当途中受阻未赶上起义时，我又从上海搭船往汕头追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安排我去莫斯科学习，那里环境比国内安全舒适，但我认为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战斗。我到中央根据地后，恭恭敬敬按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办事，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进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各方面也有了些进步升任为一方面军代参谋长，谁知突然一落千丈，竟被开除了党籍。我究竟违犯了党的那条党规党法呢？没人给我说得清，我自己也想不通。一年年，一月月，这些问题都缠绕着我，压抑着我，甚至使我常常从恶梦中醒来，大汗淋漓。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我站了一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绑的红军干部。我认出他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

“你是周昆！怎么搞的？”毛主席问。

“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主席又说。保卫队员马上松了绑。我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这种自述，正是王明“左”倾的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主席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呢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使我可以安慰的是毛主席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路线被抵制了，我想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

洛川会议之后，我去看望主席。主席先给我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主席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主席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我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主席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主席亲自过问我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日主席给我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我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我“松绑”时，我不禁想起毛主席给周昆松绑的情景，我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主席给我解开的吗？

毛主席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我到延安后深有体会，主席非常联系群众，当时延安城破旧不堪，不但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连一座整洁的好房屋也难得。然而从全国四方八面不远千里而来访问毛主席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和毛主席的谈话后，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有一次，有一位老教授会见主席后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去见主席，主席拿出纸烟来招待，可是不巧烟吸完了，只剩下一支，你想主席怎么办？他自己吸不请客当然不好，用来请客，自己不吸也不好，于是毛主席将这支纸烟分成两半，给我半支，他自己吸半支，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待人热情、诚恳而又亲切。”他最后说：“这使我很受感动。”

我和秘书处的同志常常议论一个问题，我们全军对毛主席的信赖和佩服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的发展过程中就确定的了，并早已深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主席也如此佩服呢？有一天夜晚，我去看望主席，汇报了最近来访者的反映之后，冒昧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毛主席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毛主席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樊昊 整理）

## 永不磨灭的怀念

莫文骅

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这个跟随他工作、战斗、生活了大半辈子，并有幸直接接受过他的工作领导，聆听过他的教导的人，更是心情激动，倍增怀念！

### 传闻·向往和敬仰

我最初听说毛泽东这个名字，约在1926年中。当时，我的家乡广西南宁正处在风雨如磐、民不聊生的反动时代。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在太平天国革命遗风的影响下，农民的革命要求十分强烈。1925年春，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彭湃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后，在桂西北东兰、凤山一带，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在传闻中，我们知道了这次农民运动已大大不同于太平天国，而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农民运动。而且知道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南宁市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1926年12月，我在省立第一中学念书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后，我和其他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在狱中我虽然未暴露政治身份，但经受这次斗争磨炼和教育，坚定了革命意志，体会到赤手空拳是对付不了反革命的。1928年2月我出狱回家，二姐夫邓绍棠（当时在旧军队中当营部书记）来看我。闲谈中他说：“朱、毛吹来吹去，现在吹起军队来了，在江西有了红军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红军，一方面感到高兴，同时结合狱中的体会，懂得了要组织革命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武装起义胜利实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起义的政治纲领中提出“迅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汇合”，作为具体行动口号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起义，在军部当中尉参谋。这也是我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逐步认识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的起点。

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当时党中央命令，准备“打柳州、桂林等城市，而后向广东小北江方向发展，阻止广东敌人向北，以配合全国红军夺取武汉”，即在立三路线错误指导下，离开左右江地区，挥师东进。沿途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浴血苦战，到达桂东北全州时，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原来七千五百人）。红七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决定放弃立三路线，取道湘、粤边，到江西去找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1931年1月在湖南道州听到了“朱、毛红军”在江西活动的确切消息，大家非常高兴，感到有希望摆脱困境了。

1931年4月，历尽艰险危难，后来被迫拆散分为两部分的红七军，终于先后到达湘赣苏区，与该区红军会师。一到湘赣，我们就感到耳目一新。感受最深的，一是看到新建的苏区政权，看到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的高昂革命热情，看到亲切温暖的军民关系，看到根据地那种情绪热烈融和，到处是欢声笑语的社会气氛。这对于一直在国民党区险境中孤军奋战的红七军来说，不啻是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二是到达后与湘赣独立师及红二十军一起作战，连战皆捷。连续几个胜仗都是大量歼敌，俘虏和缴获甚多，胜利完成任务，部队士气越打越旺。湘赣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盛赞红七军英勇善战。当时，部队已大大减员，我先后任红五十八团四连政治委员和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

（那时连改为指导员），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在与部队共享胜利的喜悦时，大家都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红七军的战斗作风不谓不勇敢顽强，由于没有革命根据地而在国民党白区作战，往往吃败仗，被动挨打，到了苏区就能打胜仗。苏区的军民关系这样好，打仗时群众热烈支援，有时出的民工担架比部队还多，保证每个伤员都能救护下来，使我从切身感到革命根据地万分重要。看到红军这样团结，官兵关系这样好。这样上下一心，协调一致。我们从实战中认识到，这就是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政策的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的。于是在作战间隙和休整时间，我们抓紧向苏区红军学习，先学群众工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游击战争战术等，接着又学习苏区形势，阶级分析，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军政纪律和作风等等。经过学习，认识提高了，眼界宽了，对毛泽东同志日益敬仰。这时，我们早已不停留于“到中央苏区汇合朱毛”的口号，而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建设部队。1932年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又经过第三、四次反“围剿”等实战锻炼，红七军发展成长起来，归属红三军团指挥，真正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但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见到毛泽东同志，我和周围的同志都多么想见到他啊！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军委调红七军去叶坪保卫中央，说是毛主席要来讲讲话，群情激奋，但后来未见到，部队又调走了，甚为失望！直到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军民大会，毛泽东同志向中央红军总直属队和群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红八军团撤销，任宣传部长的我，在总政治部待分配工作。听报告时，我挤到主席台前，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闻名不如见面，多么幸福啊！以后，我被分配到红军军委上级干部队（即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任政治委员和红军干部团任政治处主任，在长征中紧随总直属队行军，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才经常见到毛泽东同志。

#### 反对张国焘的一个插曲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政委由四方面军的同志担任。刘少奇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未到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任教育长，临时主持学校工作。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学校驻在党中央住地毛儿盖以西约十里地的卡英。当时，张国焘已经把他与党中央的路线分歧公开到部队，斗争开始激化。有一天，李特冲着我说：“你们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很散漫，着装不整齐，精神不振，表现出右倾。”我听了很吃惊，当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干部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长征中立过大功。李特听了我的解释发起火来。这时正好一位衣衫褴褛，一手提着个羊头，一手拿着个土罐子的一方面军干部从窗下走过。李特就指着他说：“你看他像什么样子！这不是向困难投降吗？向困难投降还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立即反驳说：“这是休养连的病号。他是师级干部，带病坚持跟部队走，说明他对革命是坚决的，怎能说他是向困难投降，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的逻辑不对头啊！”他见我这样说便没有再谈下去。次日，李特约我去谈谈。先请我吃苞米糊糊，这在当时，是难得的。又郑重地提出来：“我们昨天谈的事，你又想过没有？干部团是右倾机会主义啊！承认它，好转变。”我说：“没有这回事承认什么？”他又问我：“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一年半中学。”他忽然严肃起来说：“那么你是知识分子喽，难怪不坦白承认错误！”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张国焘歧视知识分子。在四方面军，戴上知识分

子的帽子是很危险的。又一想，李特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是军政大学的学生，论文化他比我高，就讥讽地说：“我哪能谈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那你教育长同志不就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了么？如果说不承认错误是小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造谣生事就是你这样大知识分子的特点喽！”他听了脸一沉，沉思了一会儿，没有生气，反而笑咪咪地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当过参谋、辎重队长、连长、连政委、游击队临时总指挥、军分区司令、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最近是干部团的政治处主任。”他说：“象你这样的干部在四方面军当军级干部也是可以的了。”我听他话里有话，便说：“在一方面军，像我这样的干部多得很，我算什么。”就这样谈了半个多钟头，话不投机，我起身要走。他又郑重地说：“这个问题你得慎重考虑啊！”我回答说：“你得收回你的不正确言论。”

我回来一想，李特这些话决不只是一般闲谈开开玩笑。这分明是借诬蔑干部团右倾来攻讦党中央，并且挑拨离间，搞小组织分裂活动。这一情况必须向上级反映。第二天我带着身边的两个同志去毛尔盖。先到上级干部队找肖劲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几位熟悉的同志，征询他们的看法。他们，尤其是冯雪峰同志，支持我向上级反映。于是我找了总政治部代主任博古同志和副主任李富春同志，把经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两位领导听了非常气愤说：“要和他继续斗争，要发动群众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还说要把这一情况立刻报告给党中央、毛主席，因天色已晚，让我住一夜再回去。次日早，富春同志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可以继续和李特斗争，但组织不宜出面，还不是时候。”因为当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还没有完全认清张国焘的错误，所以发动群众斗争李特是不合适的。我听了感到毛主席胸怀宽大，谋虑深远，准备回去照他的指示办。走到村边，陈赓同志等着向我询问此事，他支持和鼓励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斗争。

回去后，李特可能觉察到我已向党中央汇报此事，不再和我谈这个问题，只谈些具体工作。但却发现，当部队转移时，李特总是派出几个警卫员跟着监视我。不久，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何畏来任政治委员。我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建议他作必要的处理，但他不吭气。

过了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部队已普遍知道党内关于继续北上抗日还是回师向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争论，都非常关心，议论纷纷，气氛有些紧张。有一天早上约四时左右，李德突然来到我床边把我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李德虽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重要决策人，但仍是中央军事顾问，当时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我意识到，他来叫我，是军委示意的，就急忙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同志到骑兵科长苏进同志处，告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前进。行进中李特情绪很低，只是随着部队走。何畏一接到继续北上命令，就借口我军委谈谈，溜到张国焘那里去了。中午，部队来到一个山边村庄停下大休息，红军大学的队伍突然乱起来。原来红四方面军的300多名学员在李特的鼓动和压力下不愿北上，要回去。一个骑兵来传话说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大的四方面军学员立即回去。又传说四方面军的部队追上来了，可能会有战斗。我们一方面军的学员纷纷劝说四方面军学员跟中央北上，李特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



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懂得俄语的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毛主席从一家小屋里缓步走出来，指着村边的小河对李特说：“你不要闹了，彭德怀来了。”只见彭德怀同志正过河来，李特害怕彭德怀同志，也就不再吵了，也不敢和彭德怀见面，拐弯避开了。毛主席又说：“你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是可以的。”又对我说：“你们也不要劝说了，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这样，李特便命令四方面军的同志折返，其中部分想北上的同志也只好跟着走了。我便带着一方面军的学员同志随军委纵队北上。一年以后，正如毛泽东同志预见的那样，红四方面军南下碰了钉子，在广大指战员的逼迫下和中央的催促下，也决定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

#### 关怀培养干部 指导干部学习

我们党为了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从来都重视培养干部，以之作为开创党的事业，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基本措施之一，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更抓紧这一工作。毛泽东同志尤其如此。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党中央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编为中央军委的“上级干部队”，将几个红军学校编为干部团，均属中央纵队序列，随党中央前进，并保护中央。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后，如前所述组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方面军改为陕甘支队，成立随营学校。1935年10月，干部营（含上干队）与陕北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学校，随中央住瓦窑堡。1936年1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大学”。同年6月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不设政治部）。学员分一、二、三科。林、罗和我又都是一科学员。6月1日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毛主席讲了话，6月21日国民党偷袭瓦窑堡，红大一、二科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现志丹县），第三科改为步兵学校住甘肃庆阳。1937年1月，毛泽东同志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兼任该委员会主席。

在培养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政治思想上的培养教育，还在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办之初，毛泽东同志找校的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都认真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以适应当时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需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方针。他对抗大的教学工作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教学计划，一次郭化若同志对抗大的教育计划提了一些意见，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转给抗大，并复信郭化若说：“你的意见已告罗瑞卿、周昆、莫文骅、刘亚楼、杨兰史讨论了。”抗大课程安排军政并重。在政治课程中，既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课程。后者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授。我的感受，这一时期，从在西北红大时部分学员参加听毛泽东同志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红大一期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以及以后学习《论持久战》，加上张闻天同志讲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的党的建设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李维汉同志讲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等，我们所受的教育启发非常丰富深刻，不仅懂得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策略，而且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从而初步较系统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点，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较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在自己的政治军事进步上是一个飞跃。

在培养教育干部中，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他强调：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年冬季在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交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首先是学习文化，我照办了。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1936年4月26日毛泽东同志给红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制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据此，红大三科开展了文化教育。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三分之一。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学习文化的重视，体现了他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深切关怀。为了提倡红军战士学习文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教“红小鬼”在手中写字。至今还留有一张照片。

为了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便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人员更注意。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7、8点钟开始，到深夜11、12点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我（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被吸收参加了。《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研究会的合起来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一回事）。每次讨论都是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后来发现一个军事辩证法讲稿，没有署名，科研人员认为是他的。我当时不过30岁，过去没学过，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得到了很多启示和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写。他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书刊。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他要我们经常挑选一些送给他。一次我发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当向他谈到这件事时，他要我立即借给他，过了一天，我就送给他了。他见到书非常高兴，因为这书对他比我更重要。我知道他正在考虑外线作战问题，急于参阅这方面的书籍，但我的书未送到他手上，他就写信给郭化若同志，说发现这本书，告他向“莫主任”要。他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都是在红大和抗大初期推荐给大家看的。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学习气氛十分热烈。在保安红大时，书籍不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争着阅读，随时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休息。为此，党中央曾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强调劳逸结合，甚至规定星期天要把门关起来（其实没有门），强迫学员到户外活动休息。同志们虽然出去了，大多数人仍然拿着书本找个草垛坐着晒太阳看书。为什么学习热情这么高？动力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雄心壮志和政治责任感，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烈向往和追求。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精神，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

####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抗大”初期的政治教育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教育的重点之一，也是大家议论较多的问题。如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问题、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等等问题，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就这些问题多次来抗大讲课，作了大量地全面地深刻地论述。1936年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即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干部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了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的大道理。他还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逼蒋抗战”的方针，并且还阐明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抗战的关键。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1937年12月15日，我在抗大任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同志为抗大二期九队“救亡室”的题词中，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中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道理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述，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加深。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单纯依靠国民党军队和轻敌速胜的思想。王明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

“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么办！”当时我们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我们现在就是吃留守兵团的饭。意思是依靠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下，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1939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蒋介石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才收场。后来果然不久就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团结抗日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他曾提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抗日，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心一环。为此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文件。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口头指示。从这些指示中我们体会到，既不能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而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根本原则，又不能因为团结抗日而放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性，工作中要十分慎重仔细。在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的工作和反磨擦斗争往往是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即八路军留守兵团）出面，但实际上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指导下，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决策和参与下进行的。他指示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包括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1941年7月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了《介绍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与友军交朋友工作的经验》。对来到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要人，如卫立煌、邓宝珊等，虽由留守兵团负责接待，毛泽东同志都亲自接见交谈。就连那个在绥德地区猖狂进行反共活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也耐心地亲自与他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1939年初，驻洛川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2师师长马禄（属马家回军）率三千余人马进占我鄜县南部一些村镇，来电要借道延安去榆林，并派参谋来联络。毛泽东同志一见电报就火了，指示肖劲光同志立即复电，不准他们过延安，只准过延长，因为到了延安人马乱撞怎么办？如果他们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让曹里怀（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去鄜县组织部队准备战斗，监视马师行动，由我陪送他的联络参谋至鄜县洛川边界，又分别给国民党战区负责人及有关方面发电报，指责马师行动。在鄜县地区张贴布告，揭露和警告反共顽固分子。并派郭化若、袁光为代表先后去与马禄谈判。马禄见我方态度坚决。义正词严，表示他本人不愿和我们打。后又来信说是误会，并撤回到原防地。事后查明，国民党顽固派指使马禄师的这一活动，是阴谋探我虚实，制造事端，绝非“误会”。从这件事情，也看出毛泽东同志阶级警惕性非常高，眼光敏锐，反应很快。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必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和头脑清醒，斗争方式灵活，但又不脱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立场。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回忆毛泽东同志，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率领我们渡过的那漫长的艰难岁月。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来感染我们；

精辟阐述斗争的深远意义来鼓舞我们；用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来教育我们；强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立于不败之地来引导我们。1936年7月“红大”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真是一无所有。当地群众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一科以城外山崖上的石洞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因为长期没有人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败草兽粪，狼藉不堪。我们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土石作业，涮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又打来野草编成草帘子挂在洞口挡风，又用三天时间修路串通起来。就这样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开学后，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很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这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对我们交待了庄严而又重大的革命任务。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当地群众也特地给学校送来了一面锦旗，写着“劳动可以创造世界”，表示对学校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后来一科的确在西安事变后就结业下山了。

1937年4月“红大”二期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抗大”，虽然条件好一些，但老干部须重新训练，新青年如潮水般涌进来，校舍不足是急待解决的难题。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挖窑洞。罗瑞卿、刘亚楼、杨至诚和我等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拜当地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延安城外一带挖窑洞，计划用15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我们就以此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开工后，全校人员齐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经过半个月突击，就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而且内部都装修得很好，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气魄雄伟壮观。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山上，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为“窑洞大学”。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时，党中央把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制成横匾送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从讲话中得到启示，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逐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人民中国。挖窑洞结束后，我作了挖窑洞政治工作报告以总结经验。内容是讲新校舍的落成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和我们艰苦奋斗的成果。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之培育学员，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后来在为纪念抗大三周年所写的文章里，

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强调“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他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作为校训。我们就把这八个字用红布长幅挂起来，并指示大家学习。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就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直至现在成为全军学校的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陕甘宁边区从历史上就是经济落后，甚为贫困的地区。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扼杀政策，严厉封锁禁运，原来约定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很有限的一点军饱军需实物也停止供应了。又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加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造成留守兵团的严重经济困难。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保卫陕甘宁边区部队的子弟兵没有任何照顾，时值寒冬到来，怎么办呢？有一次，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主席。肖劲光、曹里怀、耿飏、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闰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交谈起来。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各自回家；一个是自己动手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大家得到启发赞成搞生产。当然不会赞成解散部队回家的。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打破敌顽的封锁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又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舞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留守兵团自1938年秋就开始搞生产。开始只是解决副食和生活用品问题，以后发展到开荒种粮，生产自给，到大规模屯田生产。整个边区展开了大生产运动。而且深为感人的是，上上下下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中央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一样生产劳动，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总司令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拂晓前带领警卫员去马路上拾马粪。周恩来副主席纺线传为美谈，也鼓舞了大家的生产热忱。大家都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丁加补丁，鞋子烤火烧了一个洞，都照样穿。有几次我们在他那里学习、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大米拿出来，熬稀粥请大家吃，这就算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党领导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的英明正确。

#### 民管军是好事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军事工作中，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关系。在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中，作了大量论述，是其军事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意义极其深远，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十分重视抓这方面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

步凝结了战斗友谊团结，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等等，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也发生纠葛。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年冬天，我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我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我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又有一次，是1941年夏天西北中央局的一位陈部长请我去，到时，他讲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开了枪，蛮不讲理。西北局决定严肃处理，将这两个连排长枪决，因为我是兼军法处长，要我执行。我当时大吃一惊说，此事我不知道，可调查再说。陈部长不允许，说是茵北局决定了，一定要执行。我仍不同意。他拍了桌子，说：“你还想当政治部主任么？”我当时也火了，说：“不当了！”说完就走，回来向肖劲光同志谈这事，他也不同意。这件事闹大了，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压服不行的，要讲点理。”后毛主席指示，双方去调查。于是我和陈同志去延长。到时，把当事人都找来了。都说是对方开的枪。我看墙上有一枪眼，于是拿县大队的“七九”枪，用一张小红纸贴在枪眼边，又问距离多远？他们答约十几米，我使用枪对准红纸，打了一枪，正中，枪眼和原来的一样大；我又拿三五九旅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而枪眼却小。这证明开枪是县大队的而非三五九旅的。我问陈同志，还杀人么？杀谁？他不吭气。于是我说，算了罢，不杀人了，各方回去自己检讨好了。他同意。这样，我们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我得了教训，题了“深知慎处”四字以作座右铭。还有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飏、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鍾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他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

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仍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来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地双方分别作出了决定，发出了指示，颁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边区政府颁布了有关当时军政军民关系具体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条例。部队则在教育基础上整顿群众纪律，进行遵纪守法大检查，揭露违纪事件，彻底清理军民关系旧案，退还借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强调爱护与节省民财民力，部队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进行助民活动，给群众排忧解难。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整个边区呈现了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不仅当时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次年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从思想政治上着手从严治军

凡是有成就的军事统帅，无不从从严治军。毛泽东同志也是如此，但他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他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从严治军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个别谈到军队建设问题时，他总是强调要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信给谭政同志（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和我，再次强调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信的全文如下：

谭政同志

莫文骅 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当时我们留守兵团的几个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同志的信后，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感到这封信的分量不轻，要求很高，是针对当时留守兵团情况所作的重要指示。



留守兵团建立以来，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指引下形成的红军优良传统进行部队建设的，这是主导的方面。然而留守兵团部队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廿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而成，由于王明、张国秦错误路线的影响；由于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由于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线，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内容。在当时严重困难形势的考验下，这一缺陷就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部队中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以脱离群众为特征的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和教条主义影响，造成军政军民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官兵之间的思想隔阂，工作作风不一致，在生产中，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有的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给解决这些矛盾指出了根本出路，同时也就为当年展开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基层单位的做法提出了具体措施。我们积极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各部队很快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以古田会议决议来统一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深入整风学习的热潮，并取得很大的收获。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划清人民军队和剥削阶级军队的界线，我军正确路线与军阀主义、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界线，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领导，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以后又结合进行拥政爱民运动和部队内部的尊于爱兵运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和部队内部团结。部队政治工作也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影响，在部队建设和对敌斗争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严治军首先要从干部做起，即干部本身对自己要求要严。毛泽东同志对待干部是既严格又宽厚的，严格是出于对部队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认为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少数的有越轨行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要把张国秦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要耐心地教育团结，消除疑虑和隔阂。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正确使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秦错误的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作了正确的而且很高的评价，强调“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种既严肃而又耐心的工作，使四方面军的同志深受教育和感动。即使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斗争。对于违犯纪律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是决不姑息迁就的。在延安抗大时，一位负责同志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爱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泽东同志知道后下了手令，给这位干部以降职处分。当时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是有贡献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写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为这位干部说情，还用了个不当的词说：“请收回成命。”毛泽东同志叫了我去，严肃批评说：“你作出的规定，你自己又带头违犯，这怎么能行啊！”他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革命纪律的严肃性，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另一件事是，抗大有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纠纷开枪打死一个女学生。抗大一位领导向毛主席建议免予死刑，又被狠批一顿。最后还是把这个红军长征时的团政委枪决了。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

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流泪，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高度的政治思想自觉基础上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首先提高部队、特别是干部的政治素质。建国以后，我军的政治训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级军事院校都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和政治时事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课。为了集中培养全军高中级政治工作干部，1954年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肖华同志兼任正、副院长。我任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学院工作很关心，每期毕业学员他都接见，向我询问教学工作情况，并关心学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情况。还给校刊题“思想战线”四个字。刘少奇同志批准从党费中拨50万元（人民币）作为学院的机动费。自1961年开始，政治学院组织学员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并结合各门课程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的一次干部会上提出：“外交干部要到罗荣桓院长和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院即办了一期外事干部班。1963年6月23日，罗荣桓同志逝世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设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后，并批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因而政治学院又开设了地方干部班，并编印了系统的政治工作教材。彭真、叶剑英同志对这一工作都表示关心和支持。因为学员大量增加，学院需要扩建。谷牧同志（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表示在人力物力上都全力支持。后因军队院校整风，接着“文革”开始而中止。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自己又是胜利实践这一思想的楷模。在平时，他是一位风度翩翩，文雅持重的学者，在危急情况下，他又是胆略过人，镇定自若，应付裕如的指挥者。这里我又不禁回忆起亲自经历的瓦窑堡战斗这件“小事”。1936年6月21日是个星期天。被榆林国民党军收编的陕北惯匪张延芝部一个营，长途偷袭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时，红军主力配置在陕甘宁边区南线对付敌人。瓦窑堡是后方，除一个连负责警卫外，就只有驻在祁家湾的我们“红大”三科800初级干部这点武装力量。当时我在红大任党的总支部书记，学校当晚准备开同乐晚会。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才知道这一敌情。三科遵照命令全部出动御敌。学校其他人员紧急转移。我来到北门城楼，见总政治部杨尚昆代主任、红大林彪校长、罗瑞卿教育长正观察敌情。城内已没有正规军，他们身边只带着警卫员和一个班的赤卫队，实际上是在唱“空城计”。这时西北枪声越来越近，但已与前线部队失去联系，敌情不清。我即带两个警卫员去找三科队伍，出城不到两里地，即发现少数敌人已到面前。我回去报告，罗瑞卿不信，我又转回去，正过小河，碰上了敌人，原来他们化装成红军，避开我前线部队钻进来了。敌向我们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卫员，我急忙撤回，上城楼报告敌情。林彪让我去指挥左侧一座山头上的一个班坚守顶住。我还未爬到山顶，发现敌人已由侧翼钻过来。我又回到城里，城里一片寂静，已是一片空城。我又赶出南门去找队伍，走了三百米忽然看见有几个人，跑近一看，啊，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后撤退的，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于是我跟在后边走，心想如果有了敌情，可以在后边掩护。走了一会儿，才通过我军的警戒线，似乎有一个连在散开防守。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亲自指挥。这场危险才算解除。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杨代主任、林彪校长等已经过去了，让

我到后边去找红大归队。

我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锻炼中逐步成长的军队干部，在与毛泽东同志这位革命伟人的接近中，一方面自觉水平很低而十分胆怯谨慎，但在具体接触中，他那简捷深邃而又时有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平易近人的态度，又使我感受到关怀、亲切和很深的思想启发。在延安时，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篇文章。专门叫我去。一进门，他就讽刺他说：“你真比斯大林还行。”我一下发愣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这我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他说：“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么？”我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的少。”他“唔”了一声，对我讲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要象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还有一次，一件工作问题，我想了两个方案下不了决心，跑去请示毛主席。请问他哪个办法好？他批评我说：“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你应该提出个倾向性意见。”我谈了倾向性想法后，他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又有一次，印象更深的是，毛泽东同志要我去。我到之后，还没坐下，他幽默他说：“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吃了一惊！答：“报告主席，没有意见”。他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在留守兵团传达？”我答，当初稿出来时，主席给我一份，并附一封信说，要我阅后提意见。我读之后，觉得很好，有些地方了解还不深刻，准备再读，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出版后，我成立一个学习班，调部队部分同志学习一个月，现在回去传达学习了。学习怎样，还未检查。他听了“唔”了一声。这时，我又问，这是谁报告的？他说是高岗。我听后，火了，说，他造谣。我便把高岗在地方工作中，对留守兵团以及个人缺德的事说了。但毛泽东同志没有回答，问我：“你在什么单位工作？”这就奇怪了，他还不知道我在那个单位工作？只好答：“在留守兵团嘛！”他又问：“在什么地区？”我答：“在边区。”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我又火了，说：“他要挟中央。”谈了一会，我告退。他送我出窑洞，用手搭在我肩膀上，边走边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三十了，他说：“过几年就好了。到底还年轻啊！”这样关怀亲切的态度使我内心深觉温暖和感动。有一次我患了较重的牙病，他知道后批示我立即去西安治疗。抗战胜利前夕，我离开延安后一直在前方工作。1951年夏天，我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路过北京。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接见我，留我吃饭。他生活仍很朴素，留人吃饭也就是他自己吃饭的两样菜，一碟辣椒，一碗汤，给客人增加一付碗筷而已，不过加了一瓶葡萄酒，他敬了我一杯，我也还敬他一杯。这次见面，先是谈论广西剿匪等工作问题。后谈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准备重修“镇南关”，以保存这一古迹，并想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他说：“仍叫镇南关，胡志明同志高兴不高兴？”我说“那就请主席考虑另外起个名。”（以后改为睦南关，又改为友谊关，这是后话。）我在政治学院时，他也关心着我的工作，特别是在教学方针等重大原则上给我以指示。“文革”中，1970年12月毛泽东同志看到当时中央军委给中央的报告，说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党籍、军籍、长期在农村“劳改”。他便批示：“莫文驿似乎不算坏生难忘。”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现在，世界风云变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更须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要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我生活在这个世纪，能参加复杂多变的非常艰苦危难的斗争，而又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胜利，是幸福的；在我有生之晚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是我的幸福。谨把一些经历和体会真实地写出来，作为幸福的回忆和由衷的怀念！

## 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

欧阳毅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虽已十几年了，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战略家，这位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贡献、建立了伟大历史功勋的伟人的光辉形象，却时时刻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怀着无限怀念和敬仰的心情，对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地方党配合下点燃了农民暴动的烈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燃遍了整个湘南。当时，我在宜章县梅田乡、区苏维埃政府担任秘书。我们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湘粤军阀开始向我们夹击，众多的民团也反扑过来。对红色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我们站立不住了，准备向东转移。

这时，黄沙区彭晒、肖克同志率领的琦石独立营也从琦石撤至梅田，我们汇合后，合并白沙农民武装组成宜章独立营，一同往江西方向转移。

我们翻过了五盖山，来到资兴龙溪洞。在这里，我们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我们是湘南暴动部队中最先与毛泽东部队会师的部队。当听到毛泽东同志在部队里，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早已听到过关于毛师长的许多传说，现在就要见到他，心情特别激动！

五月四日这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的集会庆祝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王尔琢同志都来到了会场。雄伟的井冈山满山青翠，遍野清香。只见到处都是红旗、红臂章、红缨枪，真是满眼一片红。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真觉得革命形势大好！

“现在，请毛党代表讲话！”陈毅同志声若洪钟，回荡山谷。

这时，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他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他在讲会师的意义时，还形象地讲了孙悟空与如来佛的故事。他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领，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他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强弱之分的。我们抓住弱的猛揍它一顿，等强的来了，我们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他生动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两军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这是第一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成立的军队。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陈毅同志任教导大队长。下编为三个团。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这个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素质比较好，是有基础的老部队，打过很多仗。朱德、陈毅同志带领的部队，编为二十八团。这个团打仗很英勇，敢打敢冲。我们湘南一带的干部和农军，编为二十九团，这个团因为有许多人是县、区、乡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士气很高，吃苦性强，打仗很勇敢。我在二十九团任团党委秘书。不久，部队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二十九团参与了新、老七溪岭等战斗，缴获不少。以后，还参

加了打永新、莲花等战斗，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自己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全军上下士气很高。

从此，我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就多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幽默风趣。常常来到青年人中间，给大家讲解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以后，大家对毛泽东同志就更加敬仰和佩服，称他为“孔明”，每次见到他时，都高兴地说：“孔明来了。”

在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带来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要红四军主力打回湘南。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召开了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为去湘南，继续留在井冈山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报告。杜修经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并无异议，会后他却利用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家乡观念浓厚的情绪，诱导他们并力主打回湘南。据说当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尔琢反对去湘南时，杜修经竟当面指责：“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由于杜修经以钦差大臣自居，迫使红四军主力成行。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我们驻地，但他曾写信给朱德、陈毅同志坚决反对这一行动。朱德、陈毅同志虽也做了工作，但未能阻止住。

这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个营。不久，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进攻。部队采用毛泽东同志的战术，英勇抗敌，打得敌人狼狈逃窜。

当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后，部队中有几个秀才仿照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空山计”，把毛泽东比喻成孔明，有几句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几句唱词，在部队流传甚广。

在我们下山后，毛泽东同志很不放心，当听说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吃了败仗后，立即亲率三十一团一个营到桂东接应我们。一天，我和文书李兆魁正在吃饭，看到窗外有部队走过。我们赶紧出来，一问原来是毛委员派来的，心里格外高兴。

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同志看到他时，批评了他。可他认错并不深刻。毛泽东同志给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说，请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不久，杜修经搞地方工作去了。同他一块来的少共湖南省委代表朱王湘留了下来，上了井冈山。

“八月失败”使我们丢掉了二十九团，剩下部队下到一百人。团长胡少海到二十八团当了营长，我到二十八团任党委秘书。一天，我正在路上走，迎面碰见毛泽东同志。他亲切地问我：“你也回来了！”我说：“那时我就不同意去湘南的。我是拥护你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也曾同他们争辩过。他们骂我怕死，连家乡都不要了。”毛泽东同志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分配没有，当我告他已分配了时，他很高兴，嘱我要好好工作。

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如：“进一步宣布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军事斗争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

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还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把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采取波浪式前进，不搞同时开花，以免群众受到损害。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又是普通一兵。他常常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背粮，还经常在黄洋界山上的一棵大树下休息，并且喜欢讲些笑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了疲劳。他以身作则遵守红军的规定，夜里写作时也只点燃三根灯蕊。他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有次开会时，毛泽东和毛泽覃有了意见分歧，毛泽覃走了出去。毛泽东有些火了，追上去说：“站住！”毛泽覃边走边说：“共产党不是家长制！”听到这话，毛泽东收住了脚步。事后，毛泽东同志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说：“我得罪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毛泽覃，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

毛泽东同志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既反对陈独秀的把人民武装拱手让给敌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李立三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同时也反对照抄苏联革命的模式。他认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些思想。我们党的三个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运用自如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从这里升起！

1929年1月初，前委、特委在井冈山茨坪召开会议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海党中央派遣秘密交通员把会议文件送到井冈山。当时，谭政同志和我把文件誊写、油印出来。会议对决议讨论得很热烈认真。尤其是陈毅、何挺颖、宛希先等同志发言最积极。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六大决议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对富农问题处理不够妥当。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研究了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对策，即确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打入敌后，以解井冈之围，解决经济困难；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为主的部队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下了山向赣南前进。

当时，二十八团团团长是林彪，三十一团团团长是伍中豪。我在军事委员会任秘书。下山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未能按予期目的进行，红军打了几次恶仗。

大庾（现大余）战斗时，开始红军进入大庾县城时无敌军设防，红军不费一弹占领了大庾城。当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开展群众工作。因大庾县城是个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当赣敌李文彬旅逼近大庾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另外，因二十八团侦察警戒的疏忽，所以当敌进攻时，

仓促地投入了战斗。后来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林彪未组织部队猛烈回击，却神色惊慌地跑回来，脚步还没停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朱德同志盯了他一眼，正要说话，毛泽东同志站了起来，看了林彪一眼，就大声在阵地上喊话：“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可惜，已经太晚了，这时，敌人的子弹已经“噗、噗、噗”地打到我们身边，地里冒起阵阵黄土。形势危急！朱德同志一面要林彪继续组织部队抵抗，一面赶快转移指挥位置。我们转到了一个城墙边，朱德、毛泽东同志严密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一会儿，部队完全垮了，象波浪一样往回涌来，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仓促之中，朱德和毛泽东跑散了。我和毛泽东同志一路跑。许多战士从我们身边跑过。我们后面黑压压一片人。毛泽东同志边跑边问“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我看到是敌我混杂，便含糊其辞他说：“没关系，我们赶快跑！”毛泽东同志个子高，腿长，我也好运动，所以不管是涉水和跳沟我们都跑得很快，终于脱离了虎口。我们按前委会原来的决定，如有情况，到乌迳集合。毛泽东、朱德同志两路人马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在乌迳汇合，大家很高兴，也很疲劳。

当部队刚刚休息下来，晚十二时许突然接到地方上一个党支部派人送来的情报，说敌人已经追上了我们，准备在拂晓消灭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部队决定连夜转移。当即由送信人带路，部队分多路纵队出发。为了不使敌人发觉，要求部队不能发出任何声响。这样，很快就脱离了险境。结果，次日敌人扑了个空。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支部、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后来，我们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时，又遭到了敌人偷袭，军部险遭覆灭。这次敌人来得隐蔽，非常凶狠。刚一接火，我们警戒部队就被打乱了，大部分人放弃了阵地，只有少数人在抵抗。一看形势不好，军部机关便开始转移，但就是不见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同志撤出。我心急如焚，边跑边喊，要部队顶住，但却不听指挥。这时，道路已被敌人火力封锁，我只好从稻田地里向山上跑。这里是水田，一脚踩下去，就被泥巴粘住。脚再拔出来时，鞋子已掉下来。幸好有鞋带系着，就拖着鞋子跑。跑着跑着，还被绊倒了，身上沾满了泥巴。也顾不得这些了，只想着赶快找人来救朱军长和毛党代表等。跑到山口时，正碰上同乡彭睽同志，他是连党代表。我上气不接下气他说：“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有撤出来！”他一听，抬手就是几枪警告，同时高喊：“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一下子部队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还击，才使朱德、毛泽东、陈毅同志得以脱险。但朱德同志的革命伴侣伍若兰同志却负伤被俘，后被残杀；朱德同志的四挺机枪，也被敌人搞掉了两挺。事后，我想，这次如若不是彭睽同志及其他同志指挥有方，使毛泽东、朱德同志脱险，其后果真不堪设想！同时，也想到，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就是这样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

这几次出师不利，败走麦城，使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寻敌“报仇的情绪很高。不久，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率领下，我们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刘士毅部两个团，缴获枪支很多，背不了的都丢到河里去了。毛泽东同志下令，从军长到伙夫，每人都要背一支枪。他虽然感冒头疼，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但以身作则也背了一支长枪。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们又路经



此地，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上次大柏地战斗，填了一首词《菩萨蛮·大柏地》。词的下阕写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的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大柏地战斗后，我军乘势攻下宁都，开到东固休整两周随后转辗向闽西进军。在长汀附近又歼敌一个旅，击毙了旅长郭凤鸣，红军名声为之大振。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迅速扩大到了一万多人，编为三个纵队。我在一纵队任党委秘书。随着部队的扩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蔓延起来，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加上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挤，一度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招致了红四军出击东江战斗的失利。

1929年12月中旬，为了克服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准备召开一个会议。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从白天到深夜，在他的住所一次又一次地召开由支队、大队领导干部和战士代表参加的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不断发问，亲自作记录，与会同志进行热烈讨论，共同分析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研究纠正的方法，并帮助大家分清哪些是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请进来”。不仅如此，他还同陈毅同志一块冒着山涧凛冽的寒风，深入到部队的各个驻地，从这个大队步行到那个大队，分别召开战士调查会，鼓励广大红军战士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同时，他还主动征询老乡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又把这种调查方法称之为“走出去”，当时，我和谭政同志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记录、笔记整理出来，连同会议文件一起油印、装订，准备下发与会代表。

1929年12月底，古田上空瑞雪纷飞，使山川大地披上了素装。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了。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政治决议案的报告，还多次讲了话。朱德、陈毅同志也分别作了报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的成功，对我军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党中央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政治领导核心已确立”，“可使中央放心”。

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观，对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流寇主义。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思考了几天，终于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我收到的。看后，知道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林彪，我没有直接交给他。而交给了纵队党代表彭枯（以后叛变）。当林彪看过此信后，脸色郁闷，没有吱声，顺手把信放在桌子上。当时，为了教育部队，便把信印发下去供大家学习。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将此信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式发表。在发表时，又作了修改，删掉了林彪的名字。

到了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调后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到汀州福音医院，一面养病，一面作社会调查，并攻读马列主义理论。这时，中央政治保卫处已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归党中央和国家主席双重领导，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秘书长。当时陈正人同志也在福音医院养病，我也住了一时期医院。福音医院院长是傅连璋。毛泽东同志曾约陈正人、傅连璋和我去吃饭。他显得非常豁达、乐观，在谈论时局外，还不时讲些笑话。我和贺子珍同志早在井

冈山上就认识了，所以常去看望毛泽东、贺子珍同志。在他们的住处，我曾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要文件上所作的批注和划的杠杠。房内摆着许多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毛泽东同志作短期休养后，即回到中央政府，以全力投向苏维埃政府的建设，使苏维埃各项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各项工作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央苏区一至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如第一次反“围剿”，把敌人从总指挥张辉瓒到伙夫、马夫全部一网打尽。张辉瓒是我们第十师俘获的。祝捷大会上，把他推到台前宣布其罪行，以后兄弟单位开祝捷大会后，不知谁把他的头砍下，装在木盒里，顺水漂到蒋管区去了。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经过毛泽东同志做工作，坚决进行反“围剿”斗争，结果在15天内，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取得伟大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则更大。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毛泽东同志被夺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但错误的军事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周恩来、朱德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的艺术，所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每粉碎敌人一次“围剿”，苏区版图就扩大一次。中央苏区根据地确实是一片兴旺景象。当时，群众曾流传“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这是苏区群众的自豪感和对毛泽东同志指挥英明的赞扬。可是，1933年7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博古他们不懂军事，就把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成太上皇，他们说：“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消极防御，死打硬拚”等口号。林彪也跟着他们一伙鼓吹“短促突击”等拼命主义方针，反对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是在他们错误的路线指导下，使红军东堵西挡，完全陷于被动地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极左政策。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震撼蒋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它主张抗日反蒋，主动和我们讲联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我们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其中拟定给予红军以枪支、弹药、物资等援助。为运输的方便，要求红军建立一个飞机场。当时，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军委任命我为飞机场建筑委员会主任，下设几个处，冯达飞同志任工程处长。有一次，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他指示说：这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你们一定要把这一有特殊意义的飞机场修好。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带领红军战士和民工日夜奋战。高质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务。周恩来同志到机场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准备了奖旗嘉奖我们。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与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联合作战。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军事上利用福建事变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后十九路军又派了一位代表前来谈判，有一次还列席了我们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有人当面指责说：“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第三势力比反革命蒋介石

还反革命”。他这样一骂，弄得那位代表非常难堪，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当时，毛泽东同志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已被夺了军权，仍然与“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并提出了不少英明的主张。他曾向中央建议：“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是，临时党中央根本听不进去。因此，当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时，他们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和见危不救的态度，使敌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又很快集中力量来对付红军。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虽经一年的艰苦奋战，也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终于被迫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所以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者造成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惊慌失措，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出发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转移时又不把握时机，主动歼敌，而是搞坛坛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对这种逃跑式的搬家，毛泽东同志形容为“叫化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了，根本不想把狗打死。那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正是这样，根本就不想消灭敌人，也没办法去消灭敌人。中央红军经过了三个月英勇奋战，付出了很大牺牲，才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就是突破湘江的一仗）。这时，八万多人的部队，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余人了。我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敌切断未能过江竟全军覆灭。“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二、六军团已向西进到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长征开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放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上。蒋介石为了阻挡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调来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堵截去路，妄图“围歼”中央红军。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尽管博古、李德仍坚持要去湘西，但这个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并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草打）等地。1935年1月，红军英勇作战，强渡了乌江，解放了黔北重镇遵义城，使中央红军脱离了险区。

在渡乌江时，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躲避飞机时失踪了。当时军委指示五军团设法寻找。钱同志是长期做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干部。早在上海时曾在党中央担任保卫工作，中央苏区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长。当然，他掌握着党和红军的很多重要机密。毛泽东同志很重视此事，他不但知道钱同志掌握着重要的机密，而且也了解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干部。所以他指示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当时五军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同钱同志在保卫局共过事，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接受任务后，迅即带一保卫部队，返回河对岸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未找到。这对革命是一很大损失。后来到延安，才知钱壮飞同志是被土匪绑去了，他在危难中曾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设法营救他，但其妻子也没有办法能营救得了，结果，钱壮飞同志就被上匪杀害了。

至今我还深深怀念这位为党作出过贡献的老战友。

中央红军在强渡乌江脱离险区之后，红军中广大党员和指战员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教育，深深懂得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大家热切盼望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继续领导全党，统帅红军！而王明博古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极大恶果，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撤换他们的领导职务。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稍后，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组成的三人小组直接指挥全军，结束了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这是经过多少流血牺牲，花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它“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线阵地”。遵义会议，是我党和我国革命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转到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就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调动敌人，迅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长征中四渡赤水，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长征中，我红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实行安全转移的战略任务，一路都是打的后卫阻击战。因此，对路线的正确与否，感受最深。遵义会议前，我们后卫，天天挨打，最艰苦，最疲劳，损失最大，补充最小。部队官兵意见很大。特别恼火的是对那位“独立房子先生”的插队。所谓“独立房子先生”，就是那个太上皇李德，他住的房子，是个四边不靠的一座独立房子，大家讽刺称他为“独立房子先生”。遵义会议前，他在行军中插队，大家敢怒不敢言。但遵义会议后，他再插队时，大家就嘘吼他，从此他就不敢插队了。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五军团仍然是后卫，但指战员情绪非常高涨，夜间行军，白天战斗，吃不上饭，睡不成觉，一夜走八、九十里。有的病员说：“要是在几个月前我早垮了，那时心里不明白呵！现在明白了。跟着党走没有错，这点病不算什么，一定能胜利走到新的根据地！”为了掩护主力渡金沙江，我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一带阻击敌人。利用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打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形势逼人。当时，五军团个别领导采取怀疑态度。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为此派李富春同志来到我们五军团，在高干会上，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只有皎平渡一个渡口，而且只有几只小船可以渡江。毛泽东同志正在亲自指挥数万红军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再坚持三天三夜，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即要宣告破产。最后李富春同志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毛泽东同志要我告诉同志们，中央相信五军团定能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指示传到部队，化成了无比坚强的战斗力量。战士们说：“人在阵地在，

坚决完成任务！”“告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五军团打光了，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过江，不要说三天三夜，就是十天十夜也守得住。”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当我们撤出阵地，一口气跑了五十里赶到江边，渡过金沙江，把几支小船烧了，以后敌人赶到岸边，只好“望洋兴叹”！过江后，我们在会理附近和一、三军团会合，进行了短期休整。当时五军团政治部文化科科长黄镇同志编了一个活报剧《一只破草鞋》，由军团“猛进”剧团演出，在全军会演中获得一等奖。这个剧生动地歌颂了毛泽东同志指挥的英明，使红军在十分艰难危急的情况下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也深刻地嘲讽了蒋介石这个笨蛋，指挥数十万人马，跋涉数千里，尾追我军到金沙江边，却毫无所得，只拾到我们战士穿的一只破草鞋。同时，也说明当时红军政治、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在那样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短短几天就自编自演了这样的节目，表现了紧张的战斗作风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从亲身经历四渡赤水的整个战斗中，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真是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之战，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我们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指导战争的光辉典范。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当时担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对变化着的战争实际视而不见，极力反对毛泽东关于寻求新的机动作战的方针。一渡赤水后，林彪抗拒军委关于向扎西集结的命令，提出“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并要军委和红军主力向他靠拢。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批评督促下，林彪整整拖了四天，最后才不得不带动部队向指定地区集中。二渡赤水后，林彪夸大困难，不敢打娄山关和向娄山关以南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当红军占领娄山关等地后，他又抗拒军委指示，不敢直追逃敌，直下遵义。在渡金沙江前后，林彪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甚至说毛泽东的指挥是“鞋底板擦油，会拖垮部队”，“现在领导不成了”，要彭德怀出来指挥。并写信要挟党中央撤换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林彪的这些错误作法，在会理会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毛孩子，懂得什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关于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问题，1972年，我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关押五年之后，第一次看到朱德同志时，朱德同志还亲自向我谈过这事。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中的伟大革命实践，这里我所记述的仅是片断回忆，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 毛主席和机要工作

戴镜元

战争年代，我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机要工作，那时我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大家都是超负荷工作。这期间，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常常亲自过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亲自给工作人员讲话，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教育和鞭策。这虽然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但他亲切感人、英明伟大的风范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 初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29年5月，当时我在共青团永定县委工作。5月25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红四军打下了永定县城，我们这些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别提多高兴了。5月25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中共永定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提出：1、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2、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3、发动群众，拆除永定县城城墙。与会同志一致拥护。27日，红四军在城关南门坝召开万人祝捷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都参加了。毛主席首先讲话，他的话当地群众听不懂，就由张鼎丞同志翻译。毛主席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共产党是为贫苦人民打天下的。国民党为地主阶级服务，专门欺压百姓，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能翻身得解放。他还说，不要小看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永定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土地革命暴动，从国民党地主民团手里夺枪武装自己，工农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建立工农自己的革命政权，只要大家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土地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土地革命暴动是由农村开始的。由几个村子逐步发展到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由乡区到县直至整个中国，从山区到平原，从农村到城市，最后夺取全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这时会上的气氛热烈极了，口号声连成一片。群众沸腾起来了，当场烧了田契、债据。会后又潮水一般地涌到城边，拆除了城墙。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两次聆听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深受教育，心情无比激动。毛主席当时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 长征途中非常关心伤病员

1933年春，我调到中央军委某局，从此就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身边工作。当时毛主席正受排挤，已离开军队，在地方做政府工作。福建事变时，我们对蒋介石调兵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哪个部队什么时候从哪里经过都知道。可是李德、博古就是不让打。刘伯承总参谋长看到这么好的时机不让打，还发了脾气。但那是无济于事的，后来，还被贬为五军团参谋长。从这个时候我就想，看来机要工作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英明的统帅来使用，恐怕很难发挥作用的。

毛主席虽然不管军事，但他知道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常常记挂着我们。长征途中，每到一地方，前面的部队打土豪，送给他的鸡和肉，他总是想着送一些给我们。强渡湘江后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在山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休息，突然看到毛主席的管理员手提三只母鸡，跑得满头是汗，边跑边喊：主席叫我给你们送鸡来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德元的病号正在拉痢疾，几天没有吃东西，听到喊声他一下子就从担架上弹了起来，望着管理员，两

眼泪汪汪的，十分感动。原来，毛主席知道我们在这里休息，特地叫管理员从后面追上来送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后，毛主席更加重视我们的工作，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常常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住在一个村子里，一起宿营。这期间有件事非常感人：1935年6月2日，中央军委从泸定出发，6日到了乾沟，当天要到四川天全。敌机六架发现了我们，轮番来轰炸，俯冲扫射。我们一位报务员腿部炸伤了，毛主席知道后，马上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我们知道这会严重影响毛主席晚上工作的。长征途中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很累，常常夜里工作。因为只有夜间工作才能和部队行动合拍。我军行军和作战情况，要到晚上驻下后，才能汇集上来。敌人一天的活动情况，也要到晚上才能得到，而且还要为部队次日行动作出部署。所以中央特地为他们准备了担架，以便白天行军时休息一下，毛主席当时的身体也不好。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能要毛主席的担架呢？但是毛主席不容分说，还是给报务员坐了。报务员一直坐了几个月，直到伤口基本痊愈，可以骑牲口行军时，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这位报务员叫雷永通，建国后在南京海军政治学院工作。

毛主席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完成中央和军委交给的任务。一般说来，我们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比较及时准确地提供了情况。四渡赤水、第二次占领遵义、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毛主席指挥得非常成功。据我多年的体会，指挥员既要有正确的决心，又要有及时准确的情况，没有及时准确的情况，就很难有正确的决心。但是只有准确及时的情况，没有英明的统帅，情况同样也发挥不了作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正确的战略指导，指战员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积极支持拥护，再加上情况明，才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所向无敌，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这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反复证明了的。

步步前进 就步步胜利

“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这是我们研究敌军重要情况，获得重大成果后，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嘉奖，毛主席给我的题词，并给予物质奖励。

为了奖励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还专门给我们发了嘉奖慰勉信。

听说你们最近以布尔塞维克的毅力，突击的精神，艰苦的工作，已开始获得了研究敌军的成绩，我们都非常高兴。兹特派滕参谋长代远同志前来慰勉，并代表中央和军委赠予工作出力同志的奖品，计每人布鞋、线袜、牙膏、大日记本各一件。

我记得还有一个重要情况，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中央和毛主席在获得这个情况后。又立刻发电通知联共中央，斯大林看了电报以后，当时不敢全相信，觉得不大可靠。因为1939年苏德签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结果在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真的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一下子推进200多公里，使苏联措手不及。这以后不久，斯大林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表示感谢！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第一、第三团，第三军分区第二团，和一二师特务团在黄土岭、上庄子地区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九百多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1941年聂总和贺总将缴获到的阿部规秀的军大衣由前方转送到延安，后来毛主席、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这件军大衣奖给我们，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

是对我们工作的奖励。

毛主席来到我们住地

1939年秋毛主席坐车从延安到真武洞去参加西北局的一个会议。去真武洞要经过我们驻地。我们驻地附近有条小河，平常没有水，但夏季过来水就有了。那天下着雨，河水上涨，毛主席的车子过河时陷在了河里。开始以为很容易启动，没有用人帮助，可司机越使劲发动，车轮子越往下陷。我们听说了，就叫来好多人给毛主席推车，搞了好久才把车子弄上了岸，这时天也快黑了。毛主席就临时住在我们那里，我把我住的窑洞让给毛主席住。原来没想到毛主席会在我们驻地住，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生活很艰苦，吃的都是小米、山药蛋，就是小米饭也不能天天吃，还经常吃黑豆，把黑豆当饭吃。所以毛主席来了，也就吃小米饭山药蛋，只是加了一个炒鸡蛋。毛主席还说菜饭都很好。

晚饭后，毛主席在窑洞里向我问长问短，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我简单地作了工作汇报。毛主席对我说：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路，就能步步胜利，他还说，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提出要看看大家，8点左右全局同志集合在一个大院子里，听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毛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工作得很有成绩，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致意！毛主席还说，革命工作是一个整体，分工合作缺一不可。为了说明这一点，毛主席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条大河，河岸两边的老百姓要修一座拱桥，经过大家的通力合作，用大理石修成了。但是在拱桥的弯部有一个缺口，大理石无法用得上，只需要一块小石头。于是大家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合适的，非常着急。如果不把这块小石头放上去拱桥就不坚固，不能竣工。后来在一个老公公的家里，找来一块捶打草鞋的小石头，这块小石头又坚又硬，把它放在拱桥的缺口处，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拱桥全部竣工落成。毛主席说，大理石固然重要，但是缺少老公公打草鞋用的那块小石头，拱桥就还是建不成。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都明白了毛主席是在教育我们，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其寓意之深刻，使我至今难忘。

记得毛主席在另一次讲话中批评教条主义，为了说明教条主义要不得，他说：一个私塾老先生到田里去看学生。经过一个田坎，下面有水走不过去。他没了办法，就问田里的农民怎样过田坎。农民告诉他跳过去。他就把双脚并拢，双脚一跳，结果跳到田里去了。他埋怨那位农民。农民做给他看。他说：这怎么叫跳呢？双脚并拢才叫跳，单脚叫跃呀！大家听了肚子都笑疼了。

毛主席请我们看戏

1941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突然接到毛主席的邀请，请全体同志到延安去看戏，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当时我们自己也没有开展文娱活动，生活很枯燥，所以大家听说去延安看戏，又是毛主席请的，都很高兴。当时延安搞得很活跃，有平戏团，话剧团。平戏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话剧有《雷雨》、《日出》等，都是名剧。

我们很快就把工作安排好，全体人员分作两批，住在延安的西北旅社。4个剧目，分4个晚上看，再加来回两天，大约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延安以



后，毛主席还请我们吃了饭。当时生活很艰苦，请吃饭也是小米饭山药蛋，饭后到杨家岭礼堂门口，大家围着毛主席非常亲切随和，气氛很随便，毛主席说，你们住在山沟，很少有文化娱乐活动，工作很紧张，生活也很艰苦，所以请你们来延安看看戏，调剂一下你们的生活，同时又可以和大家见见面，这样做不是很好嘛！毛主席还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战的情况，说现在又有一种危险，倒退投降的危险。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但都被我们打退了。现在还有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并在经济上对我们实行封锁，我们要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阴谋，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对倒退。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为革命战争胜利服务。

毛主席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同志们文娱活动，而且，十分关心我们的物质生活和报刊学习。毛主席曾把自己一年的办公费全部送给 qwu，作为生产基金。并且要解放日报社增发《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

我们从延安回到驻地以后，受了毛主席的启发，自己也搞起了业余文娱活动。没有乐器，同志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动手做。像胡琴、二胡都是用洋铁片做的。有的唱京戏，有的唱山西梆子，也有的唱陕西秦腔等地方戏，唱什么的都有，我们想也不能经常让主席请我们看戏呀！后来我们的文化生活搞得很活跃。

#### 以智取胜，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且采取了军事行动，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于1943年6、7月间频繁调动部队，将其驻守河防的一个集团军调到陕甘宁边区附近，驻扎在邢州、淳化、洛川一带，连同胡部原来驻守在边区周围的两个集团军，共四、五十万人，准备进攻边区，进攻延安。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兵力很少，只有两、三万人。蒋介石、胡宗南想用闪电式的方法，攻下延安。我们的兵力很少，要想在军事上打退蒋胡的进攻比较困难。延安告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毛主席和党中央首先由华北抽调一部分兵力，增加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但增援部队很难及时到达。与此同时，当时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提出一个以智取胜的办法，用我们掌握的情况通过《解放日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因为蒋胡进攻边区是一个阴谋，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一旦阴谋暴露，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国内外四面八方舆论的谴责，不打自败。毛主席当时反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掌握的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公开，究竟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叶参谋长请示毛主席后，先后两次让我到延安面谈这个问题。我向叶参谋长详细汇报情况后，叶参谋长立即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叶参谋长的意见，用《解放日报》公布胡宗南调动军队准备以闪电式的方法进攻边区和延安的情况，以揭穿蒋胡的阴谋。

1943年7月7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连日以来，西安军事当局突然尽撤河防之兵向边区周围开进，准备进攻边区。第一军之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由华阴、渭南开抵邠州、淳化；第二十八师、五十三师由韩城、郃阳开抵洛川；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抵中部；驻守河防之炮兵旅以及第十六军之重炮营已分别开抵耀县、淳化。第一师已撤离河防，其他部队亦正由河防阵地西开、北开中。”

我们的《解放日报》把这些情况一公布，蒋介石、胡宗南立刻慌了手脚，措手不及，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掌握的这么清楚，非常被动。与此同时，我们在延安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发表通电，揭露蒋、胡准备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朱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蒋介石，对胡宗南调动部队，准备进攻边区的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议。7月12日毛主席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延安掀起了一个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群众运动，敌后各个根据地人民群众都积极声援陕甘宁边区军民反对蒋、胡军事进攻的阴谋。

党外人士，以及重庆、国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舆论大哗，所有的舆论都同情我们，支持我们。蒋介石、胡宗南受到了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人民的坚决反对，国内外的舆论谴责，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胡宗南还要进攻边区、袭占延安就不行了。最后胡宗南给朱总司令打了一个电报，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军兵不血刃，就被彻底打退了，这是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是毛主席英明决策，以智取胜的伟大胜利。

主席复信嘉勉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于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对我整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

当时，敌军用于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总兵力为十个整编师、三十多万人，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

中原我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生存第一、胜利第一”，除以一部分武装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行动外，主力部队三万余人，于6月底分三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

7月3日，我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工作情况的报告，毛主席看后，于7月5日，亲自复信嘉勉我们：

你们的工作有成绩，特别是对中原方面帮助很大，甚以为慰。现我中原主力已安全突围，一部留在原地坚持，国民党虽以全力围堵，毫无所得。

中原我军于6月29日和7月1日，先后越过平汉路进入陕南，伏牛山以西、长江以北、大巴山以东，以及苏皖边等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箝制了大量敌人，并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和华东我军的作战。

中原我军胜利突围，解放战争首战告捷。

毛主席历来重视下级干部的意见，1945年冬，东北我军发起了本溪战役，我曾向主席反映了几点意见，即《本溪战役之管见》，没想到主席很快就看了。对整个报告内容都作了圈圈点点，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并且在报告的第一页上还批了四个字“很有见地”，使我深受教育、感动。

在陕北神泉堡和杨家沟

1947年9月，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召集我们到陕北佳县神泉堡汇报工作，研究通信机要工作等问题。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和我们一起每天下午三时到八时连续研究了三十多天，并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罗青长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敌我隐蔽斗争异常紧张激烈之际，周副主席召集王净、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和我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开会，专门研究了通信、机要和情报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周副主席与弼时同志一起亲自填密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严格的纪律与制度，从而使

我们在与国民党进行的秘密斗争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据解放后在南京接收的伪总统府对我党我军有关档案证实，敌人始终未能获得我核心机密，这样成功的范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王诤、罗青长、童小鹏、李质忠等同志在研究通信机要工作后，于同年十月底先后返回晋绥三交地区。

由于工作需要，我留下来继续汇报和研究工作。11月中旬，中央前委由佳县神泉堡转移到米脂杨家沟，我也随行。12月中旬，我准备从杨家沟返回晋绥三交驻地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特地到我驻地窑洞来看望。毛主席还亲切面示：你们这次来神泉堡杨家沟汇报工作，研究的问题，副主席和弼时同志随时对我讲了，完全同意副主席和弼时同志的指示，就照他们的指示办。接着，主席要我到隔壁窑洞请王维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文舟（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两同志到我住的窑洞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西北野战军的机要情报工作又作了具体指示。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从杨家沟最高一层窑洞到中间一层我住的窑洞，往返步行好几里，他们不带秘书、警卫员，事前也不通知，使我不仅深感突然，更感无比亲切。毛主席的谆谆教诲我永远不忘。

亲切关怀，体贴入微

我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几十年，他们对干部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使我终生难忘。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为了减少野战部队掩护中央机关的力量，一切非战斗人员都要撤往后方。当时我的爱人、孩子都在陕北，爱人刚刚生完小孩，身体还比较虚弱，我准备找头牲口驮着她走。3月21日中央由延安撤离瓦窑堡附近一个小村子时，任弼时同志要我到中央驻地汇报工作，在汇报结束后，弼时同志对我说，你的爱人和孩子与康大姐、陈琼英一起坐车走吧！我当时想，车子小，人数多，还是让孩子和爱人骑毛驴子走更合适。所以弼时同志说了几次，我都没有答应。后来，弼时同志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事情那么多，还记挂着我的爱人和孩子，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立刻安排爱人、孩子和康大姐和琼英同志一起坐车走了。

1951年我身体不大好，朱总司令要我和他一起到青岛休养。休养回来准备上班，写了一封信，报告主席，主席委托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让我好好休养，长期打算，不要急于工作。总理、朱总司令、聂帅也委托秘书打电话来，叫我先恢复身体，然后再工作。毛主席想得多么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被冲击到了“五七”于校。九·一三事件以后，先听说是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叶副主席问，戴镜元被冲到哪里去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什么问题都没有。后来又听说，是毛主席在问，他说，戴镜元被冲到哪里去了？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是个很好的同志。就这样我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不久调回了总参某部。1975年3月5日，毛主席签发命令，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总参某部部长。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革命干部的无微不至的深切关怀，爱护和信任。

在西柏坡、中南海与毛主席合影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面，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率党中央领导机关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解放区，5月初到达西柏坡。我们随中央后委也很快到了西柏坡，住在离毛主席驻地十里左右。1948年的春天是美好的，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最后挣扎，但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在我围歼中，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在那时，我几乎每

天都要去西柏坡，每次去我都要先问一问主席是睡着还是在工作，如果他在睡觉，说明我们又打了胜仗，他如释重负地睡了。如果他在工作，说明战斗正酣。最紧张的是淮海战役打黄百韬，打黄维兵团。黄百韬非常狡诈。我们给他设下圈套，就是不上钩，很叫人着急。后来还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黄才被迫钻入我们的口袋。黄百韬这块骨头也比较难啃，照我们的预计延长了几天才把他完全消灭。从 11 月 6 日到 22 日这 16 天，毛主席几乎是每天通宵达旦地工作，紧张极了。

1949 年 2 月，我们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的大势已去，我们胜利在望了。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齐集西柏坡准备开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这时我们也在开工作会议。2 月 28 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小平同志等都来了，他们来看望大家。毛主席走在前面，他神采奕奕，满面春风，和我 1929 年第一次看到他时大不一样了。他胖了许多，眼睛闪烁着智慧，透着英明，完全一幅伟人形象站在大家面前。同志们高兴极了。毛主席也高兴地和大家一个一个地握手，问寒问暖。当他和我握手时，我（当时是军委某局局长兼政治委员）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他答应了。正在这时，童小鹏同志走过来，拍了一张毛主席和我握手的照片，至今还珍藏着。毛主席对大家说，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你们的工作为战争的胜利配合得很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听了主席这个话，同志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之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小平同志等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周副主席还告诉我们，中午毛主席要宴请大家。因为一个突然的急事，毛主席未能和我们一起就餐，周副主席代表毛主席向我们敬酒。看着桌上的饭菜，我想了许多。桌上不全是南瓜汤，小米饭、山药蛋，而是有肉，还有酒，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就要胜利了。每个人都很激动，大家互相敬酒，一派节日气氛，仿佛每个人都醉了。

在工作会议之前，我们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作了综合报告。毛主席看后，作了批示：“已阅，很好。应予奖励。”1950 年春，我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前两天，毛主席要我到中南海参加一个晚会，利用休息的时间，我把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向毛主席作了简要的汇报，并说，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很想念毛主席。主席听了非常高兴，并亲切询问“是不是还要我去讲讲话？”我当时说，我们怎能过多的耽搁主席的时间，主席很忙，大家见见主席就可以了。主席历来对我们工作亲切关怀，对我们全体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

4 月 9 日，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接见前，李克农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和我（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先到主席办公室，并陪同主席来到接见大厅。主席与每个同志一一握手，李克农部长向主席简要汇报了大会情况，主席随即转向我详细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后，便开始向全体同志亲切讲话：“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就照你们的计划办！”接着，毛主席又作了重要的指示，同年 12 月 29 日，毛主席又亲自题词：“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毛主席的亲切批示、讲话和题词，是对我们工作最高褒奖，是伟大的号召与无穷的力量，主席还亲切地关照大家说：“是不是要照个像。”主席深知大家的心情，和主席在一起照像是全体同志的光荣。照完像后，大家恋恋不舍地告辞主席，由中南海回到了驻地。为了完成毛主席给予我们的重要指示，大家决心竭尽全力，团结奋进，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坚韧不拔，

夺取全胜。这是我们全体同志对党无限忠诚的誓言。

毛主席已离开我们多年，成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心间，他的光辉思想依然在哺育着我们，他为党为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张素华整理）

## 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

方 强

每当重读毛泽东同志 1934 年夏天写的《清平乐·会昌》诗句，就使我浮想联翩，想起毛主席当年来到南方战线的情景，想起会昌城外那战斗的日日夜夜……

1934 年春天，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方战线——赣南会昌。这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南方门户，是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粤赣军区的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距党中央、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只有 50 公里，距我们红二十二师正在激烈战斗的筠门岭前线只有 40 公里。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作战原则。在那危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的到来，给了粤赣地区党政军民以巨大鼓舞和胜利信心。

1934 年 4 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面的大门，并在蠢蠢欲动向我腹地进攻。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分二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我们这个师，在 1932 年 6 月是独三师九团；1933 年 6 月 7 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由粤赣军区二十三军改编为红二十二师；1934 年 3 月 23 日，又奉军委命令得到充实，由军委原第二教导团（缺一个营）及二十二师一营编为六十四团，第三教导团编为六十六团和二十二师原有的六十五团编为师的三个团。当时全师八千余人。第一任师长龚楚；第二任师长程子华；第三任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团长魏协安；我是以上几任的师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孙毅；第一任师政治部主任史友生；第二任是刘道生。师供给部长陈瑞兰。六十四团团团长帅荣，政委彭家庆；六十五团团团长魏协安，政委商辑五；六十六团团团长李国柱，政委幸元林（幸负伤后由贺清华接任）。筠门岭战斗以后师长周于昆，政委黄开湘。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红二十二师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

筠门岭西临湖南，东近福建，南下广东，北距会昌，和红色首都瑞金只有一百零一公里，是水陆通商要道，是粤赣边区的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

敌人进攻的企图和态势我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要攻占会昌，一定先夺筠门岭。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可能以南路军全部兵力分两路向筠门岭发起攻击：一路主力从寻乌、吉潭经澄江盘古隘正面向筠门岭攻击；另一路主力经安远向清溪迂回配合正面攻击，掩护敌东翼安全。

根据敌人企图，红二十二师分三线部署，筑堡防御。第一线在岔口，第二线在盘古隘，第三线在筠门岭。我师三个团配置在上述三线防御地区，正面放一个团进行防御，筠门岭西南高地放两个团对敌人进行侧击和反击进攻之敌。清溪方向由地方兵团担任防御钳制敌人。4 月初，敌南路军一、二纵队开始会攻筠门岭。二纵队第七师进攻罗塘，八师进攻澄江，独一师进攻桂坑，从正面进攻筠门岭。敌一纵队五师进占寻乌，一师进占重石，四十四师向清溪搜索前进，从西迂回威胁筠门岭。在两个方向向筠门岭进攻。4 月上

旬和中旬我师分别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顽强的作战。

岔口被敌突破后，筠门岭前沿阵地是盘古隘，这是一个山垭，小道崎岖，地高险要，山峰呈蘑菇状，我师六十四团二营六连在营长指挥下扼守盘古隘。敌人迫近我军阵地，修筑起钢筋水泥碉堡，排列起各式大炮，不时地向我阵地攻击。我部队就用土木构筑的碉堡工事，同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对垒。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在交通要道和阵地前沿撒满铁藻藜和竹针陷阱，设置鹿砦使敌人只有寸步难行之势，在树丛中隐蔽特等射手，专门狙击敌人的指挥官，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敌人被打得恼羞成怒，于4月中旬，又以第八师两个团倾巢出动，用整团整团的兵力，开始强攻盘古隘。这次战斗，我部队给了敌人很大杀伤。陈济堂称为有“武胆”的指挥官李杨敬惊叹他说：“红军的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当时，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39期对盘古隘作战的情况作了报道，予以高度赞扬：“西南方面的粤敌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积极向我苏区进攻，企图占领赤色筠门岭。我‘红’团六连奉命固守盘古隘，阻止敌人。当时敌人有一团以上兵力，特别是敌人具有优势的火力和空军。四方八面围困我第六连，猛烈攻击。我们的战士毫不动摇，激战一日到晚，坚决与敌抵抗……。”

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我们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法，转战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却被命令在南方战线分兵把口，固守在碉堡里，捆住了自己手脚，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以前作战，我们总是越打越“富”，每打一仗，队伍壮大一次，武器弹药得到补充，可是现在，越打越“穷”，消耗一粒子弹，就少一粒子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了那么多武器，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接收”了。特别使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反水”的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威胁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标、土枪，配合敌人，对我部队进行骚扰。记得罗田附近就有几千“反水”的人，在铲共团头子谢嘉犹欺骗、唆使下对我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土地政策，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革命情绪，造成我们极大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中，笼罩着一团团疑云，也发生了种种议论：为什么过去总是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现在处处被动，困守碉堡，天天挨打，打不破敌人的“围剿”？为什么不采取过去那种有效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动若游龙，在运动战中一口一口吃掉敌人？听到同志们这些谈论，我们师的领导当时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考虑了许多。

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时候，帽子被拉下来，把黑布缝的袋子罩在他们头上，只有两个窟窿让眼睛看着走路。凭着熟悉的身廓、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在和他们目光相对时，不难看出他们双眼流露出许多迷惑不解和忧虑。

部队撤到筠门岭以北的新开河高地，连夜构筑新的碉堡阵地。敌人因为也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暂时停止了进攻。

为了打一仗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5月初，我们在站塘中村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因为魏协安是代理师长，经师军政委员会（师党委）讨论，由我在会议上做筠门岭战斗的总结。我们的检讨只是停留在战术性质的范围内，并没有认识到造成战斗失利的总根子，因此，我们的总结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因为战役战斗的胜利首先取决于战略指导的正确。正因为我的总结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此不能解脱同志们的沉重心情，找不到今后的方向，会场上笼罩一片沉闷、压抑的气氛。大家一言不发，好象在思索着什么，我也有些茫然了。就在这个时候，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跑来，激动地悄悄对我说：“会昌转来电话，是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我猛一听吃了一惊，感到突然，心想：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没有在北方战线指挥主力部队作战，而到南方战线来了呢？但我又立刻想到：毛泽东同志一来，我们一定又要打胜仗了！真象久旱逢雨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心里漾起了一阵激动、欣慰。我跑步来到值班室电话机跟前，微微颤动的手刚刚拿起听筒，还没等我说话，听筒里先传来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你是哪一个？”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声音。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自己的名字，深怕毛主席听不清楚。然后又说：“总政治委员你好！”

毛泽东同志紧接着就从容地问道：“前边敌情怎么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

毛泽东同志的声音使我感到无比温暖，心中的紧张、焦躁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接着又问道：“筠门岭的战斗是怎么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现在是怎么部署的？”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经过，以及退出阵地后的新的防御部署情况和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汇报。

毛泽东同志听了，鼓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在我们部队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阵地，大家沉重的心情不能解脱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责怪我们，而是通过对主客观因素、敌我力量对比等情况的分析，充分肯定我部队的成绩，给予如此恳切的鼓励，这说明毛泽东同志是多么了解前线的情况，多么了解部队的心情啊！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明确、具体地指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聆听这些指示，当时我还理解不到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意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在启发我们，要我们认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路线。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们说：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在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



队作战，并取得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你们左边有江西省军区领导的大吉山游击队在信丰一带活动，南边也有游击队和赤卫队在全南、定南、龙南一带活动，他们可以牵制敌人，所以，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消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同时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指示，每一句话都沁入我心中，感到豁亮了，这不正是毛泽东同志过去指挥我们，在几次反“围剿”中打胜仗的办法嘛！

最后，毛泽东同志对于“反水”的问题作了指示，对“反水”的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同时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反复地回味和思考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我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希望。耳中回荡着毛泽东同志亲切而有力的声音，脑中涌现出一连串的回亿：

那是一九三一年秋，毛泽东、朱德同志在长沙城外，说服大家放弃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命令，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撤离围攻，率领部队从湖南向江西转移。在安源的一个军民大会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大家热烈鼓掌，欢迎他讲话。毛泽东同志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纲领，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用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武装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那时，我在安源工人纠察队担任党代表。几天之后，我们工人纠察队就跟着党和毛泽东同志，跟着红军，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在江西小布的红军誓师大会上，在福建建宁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当时形势和任务，讲粉碎敌人“围剿”的“七大把握”。每次都使人热血沸腾，浑身上下添力量。……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沉思中醒过来，觉得眼前分外明亮，充满着希望和胜利的信心。对！我应该赶快告诉大家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的消息，传达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指示。我跑步回到会场，同志们看到我那高兴的样子，立刻静了下来，等着听好消息。我抑制着激烈的心跳，激动他说：“同志们，毛主席到南方战线来了，毛主席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我们又要打胜仗了！”会场上立刻活跃起来。

我先向师的几个负责同志作了简要传达之后，随即向到会的全体干部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场上不时地响起掌声和口号声。许多同志兴奋得站起来，一个个眼睛发亮，脸上的愁云一扫尽光。全师有名的善于夜战的六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用纱布扎着的伤口的疼痛，举起拳头，带头请战。大家都纷纷要求战斗任务。会议在激昂的战斗气氛中结束。

当北斗星挂在天空闪闪发光时，我们召开了师军政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防御阵地，顶住敌人；以

小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主力部队集中整训，准备打仗。第二天，我们就带领干部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并向全师指战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部队情况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纷纷擦拭武器，打草鞋，抓紧战前练兵，政治情绪高涨起来。

筠门岭战斗后，国民党李杨敬的第二纵队的第七师进驻筠门岭；第八师驻盘古隘、澄江、吉潭；独立第一师回驻武平：一纵队第五师驻平远；第一师驻寻乌，四十四师驻安远。敌人为了巩固筠门岭的防守，常派以一个加强营编成的支队，向筠门岭外围地区作“游击扫荡”，甚是猖狂。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根据地，我们在整训中，以有力的小部队，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五、六个小仗，消灭了敌人一些前伸的小部队，在我调离二十二师不久，敌七师派出的加强营在周田遭我五个营的绝对优势兵力夜袭，全营被歼灭过半，敌营长朱省亚被击毙。“铲共团”在周田也被我全部歼灭。此后，敌人只得龟缩在筠门岭，不敢轻举妄动，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会昌。这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结果。

在地方工作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了错误的土地政策，使中农的情绪稳定下来，向我们靠拢，基本群众的政治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对“反水”的人，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欺骗和利用，号召他们认清敌我，欢迎他们回到革命这边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情况就有了显著的变化。这种人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叫嚷和报告敌人部队整训在紧张地进行着，各团自下而上地召开了会议，进行战斗总结，表扬和奖励了战斗英雄模范人物。整顿了连队党支部，调整充实班排连的组织，加强了领导。部队加紧军政训练，准备打仗。我们到前面阵地去检查整训和战备，一路看到部队出操、瞄准、刺杀，听到战士们喊着“杀！杀！”的声音；看到部队在野外进行班、排攻防演习。傍晚，连队点名时，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我们已好久没有看到部队这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了，一阵阵喜悦涌上心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呀！毛泽东同志到南方战线来，只有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变了。实践再次说明，按照毛泽东思想行动，部队就斗志昂扬，就打胜仗：地方群众就拥护，根据地就巩固。

毛泽东同志来到会昌，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了斗争形势，预见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红军广大的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眼看着中国革命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断送掉，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时候，他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光辉的诗篇《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到我们红二

十二师检查筠门岭战斗的失利。他们对红二十二师英勇顽强、勇敢杀敌、战斗组织指挥和战时政治工作，提不出什么批评，然而，却把我部队同地方机关和广大群众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诬陷为右倾机会主义和脱离战争的和平训练，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由，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的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当时，许多干部对于这种处理虽然不满意，但却没有认识到这是王明“左”的路线所致，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要严格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需要铁的纪律，个人受点委屈，受了不应有的处分，对教育自己和别的党员也有好处，我坚信事实真相终有被弄清的时候。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主席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问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毛泽东同志还找一些边沿苏区干部谈话，对赣南地区党政军的情况作了深入调查研究。”

他讲的是那样的生动，心情又是那样的兴奋。听完他的话，我走出屋子，站在静悄悄的星空下，一桩桩往事萦回心头……

我想起了在汀州医院治伤时，见到毛泽东同志的情景。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医院里，在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当时看来，这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了，我想战斗这样紧张，毛泽东同志还如此研究学问，一定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点着书本说：“你们也要好好学这本书，学会怎么干好革命。”我想起在中央政府警卫营工作的时候，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常常看到毛泽东同志总是工作到深夜以至天亮，为了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常常忘了吃饭、忘了理发……我把第五次“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

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时已经看得清楚红二十二师在南线的作战为党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向外线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在党内外都没有进行什么动员，缺乏应有的准备。在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日夜兼程行军赶路，人疲马乏，还是甩不掉敌人。部队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方去？怎样战胜面临的严重困难？这些问题在每一个红军战士脑海中盘旋着，红军战士多么渴望着正确的领导和指挥啊！

这种情况，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根本的转变。

## 我见毛泽东同志的一些回忆

邝任农

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7年了。人民一直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作为跟随毛泽东同志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过来人更是难以忘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经历的那些艰苦的岁月。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伟人的接触，回想起亲耳聆听他的教导，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便油然而生。

迎接红四军和毛委员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1929年1月。

1928年3月25日，中共寻邬县县委领导农民举行暴动。暴动队伍攻入县城，反动县长谢寅同县衙一帮人闻风向城北逃窜。我们将县衙砸个稀烂；烧毁了所有被捕革命者的档案；又打开监狱，放出二百多人。寻邬各区乡农民拍手称快，纷纷参加暴动队伍。靠广东梅县、兴宁、龙川的双桥区同时举行了暴动，打土豪劣绅，开仓分粮。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

未出四日，谢寅便纠集澄江靖卫团长谢嘉猷和三标区龙岗、项山、罗塘一带的反动团丁共300余人向县城发动反扑。暴动队伍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伤亡10余人。这时，双桥区的土豪伙同土匪（原是广东被打败的陈炯明散兵）约200余人也向双桥区暴动队伍进攻。28日黄昏，县暴动总指挥部通知暴动队伍撤退，各暴动队伍当晚到达指定地点。29日晨，暴动总指挥刘维护、古柏对大家宣布：“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组织决定，暴动队伍暂时解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分散隐蔽，待后再起义。”

寻邬农民暴动失败以后，土豪劣绅率靖卫团疯狂地报复，他们到处设卡检查行人，抄家，搜山，见暴动队员就抓就杀。刘维护、刘维鄂、潘叶芳、潘丽等暴动负责人惨遭杀害。其他暴动队员有四、五十人牺牲。地主老财、贪官污吏乘机搜刮民财，强迫农民交罚款，不少农民外出逃难，寻邬一片白色恐怖。

古柏、钟锡缪在长沙隐蔽后，经龙川、兴宁到梅县、平远与广东东江特委取得联系。秋季潜回寻邬组织剩余力量秘密打土豪筹款。成立短枪队，朱家侦为队长，我为副队长，坚持斗争。

1929年年初，传来消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经上犹、崇义、大庾、信丰已到龙南、定南，准备打安远，我们听后深受鼓舞，盼望他们早日到来。地主豪绅慌了手脚，有的准备逃跑，有的加固炮楼。农民们说，穷人出头翻身的日子到了；土豪劣绅完蛋了。

1月31日傍晚，古柏、钟锡缪、李大楠、李大顺和我赶到菖蒲迎接红四军。我们到达菖蒲时，部队已先到。古柏同志询问红四军的同志，毛委员在哪里？他们把我们带到红四军特务营，后由副官长杨至诚领到毛委员住处。

这是一间大厅，放着一张八仙桌，毛委员正坐在桌边看地图，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面目清瘦，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彩。看到我们进来，他立即起身同我们亲切地一一握手。这时，大家才发现他个子很高，而且十分年轻。朱军长也走进屋来，向我们问候，大家围坐在桌旁。毛委员十分关心地询问寻邬农民暴动的情况，当古柏同志谈到暴动失败，反动势力杀害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在缺少枪枝弹药和干部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时，毛泽东同志插话说：要很快地恢复农会，发展会员，分清地主豪绅与贫农、中农、富农的界限，放手发动贫苦农民向贪官污吏、

地主豪绅抗税、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发展壮大党组织。凡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又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都可参加党的组织，从斗争中培养干部。没有枪弹可向土豪要款买，从敌人手里夺，瓦解靖卫团，促使他们起义投降，要成立工农自己的部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很富感染力，语气坚定，经常用手势，他虽然很年轻，但他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显出一个成熟革命者的气质，他说：寻邬是闽粤赣三省边境，只要同邻县的党组织和人民密切联系，互相支持，对革命斗争是有利的。

我们同毛委员亲切地交谈，时间不知不觉流逝，大家仍感觉不到丝毫的疲倦。毛委员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他说，“红四军从井冈山出来是为开展赣南人民群众运动，创建根据地，牵制敌人向井冈山的“围剿”，现在红四军的后面就有刘士毅的部队在追击，企图乘我疲劳时，击溃或消灭我们。但我们也有打算，准备在对我有利，而敌人又疲劳时，消灭刘士毅一部，击溃其大部，这一时机是能到来的。”朱德、陈毅同志也都介绍了红四军的情况。当时李大楠同志向他们汇报说，我们为红四军准备了一些粮食和肉，并交给了杨至诚副官长，杨至诚向我们表示感谢，又提出帮他找一点止血药，他在大庾战斗中负了伤，伤口仍在流血，我们为他找来一小瓶碘洒和药棉，那天，毛委员和朱德、陈毅等红四军领导同志和我们一直谈到很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以后发生的事果然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话。

2月1日晨，红四军由菖蒲出发，经黄沙、腴田，到吉谭区的训下一带宿营。2月2日晨，刘士毅部对红四军发动袭击，红四军进行猛烈地反击。击退了刘部，朱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不幸被俘，后来在赣州遭杀害。红四军离开寻邬经福建武平，折转江西会昌、瑞金，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采取伏击战，一口气消灭刘士毅两个团，击溃其指挥部，奠定了发展赣南与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我们寻邬党的组织按照毛委员的指示，秘密地发展农民协会，扩大党员队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农会会员及其它群众组织成员的数量发展到八万以上，党员由十余人壮大为一百多人，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刘育英，刘维锻，潘立中、刘大白、李大顺、李大添、陈忠善、侯家宏、邝世声、邝月明等等优秀代表，后来都成了红军部队的干部。寻邬的工农武装在原短枪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二十一纵队，人数最多时达七百余人，这支部队在寻邬、龙川、兴宁、平远、会昌、安远等地与敌人进行过无数次大小战斗，俘获了不少人枪。寻邬县大队、区中队、乡分队也逐渐建立，妇女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1929年11月，红四军打广东梅县失利（当时毛委员仍在闽西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又返回寻邬。这时寻邬成立了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寻邬县委，古柏同志任主席和书记，各区、乡苏维埃亦相继诞生，寻邬的革命形势又变得对我们十分有利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破除迷信，讲男女平等，禁娼禁赌，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

这一切使大家看清，只有跟着毛委员走，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总想能见到他，听他讲话。

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后来，我曾多次再见到毛泽东同志，可却是短暂的。

长征路上，我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五师任供给部长。向遵义进发时，我

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我们正在行军的路上原地休息，突然有人说：“这不是毛委员吗？”战士们感到非常高兴，大家平时敬重的毛泽东同志站在路边，拄着一条棍子，看着行进的队伍，八角帽下他那双智慧的眼睛仍旧闪闪发光。我不禁走上前去，请他保重身体，毛泽东同志点了头，他向战士们挥动着手臂。大家在议论过去毛主席指挥红军打胜仗，现在我们多么盼望毛泽东同志继续指挥，取得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他在一条河的河滩上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我又一次听到了他那引人入胜的声音。他形象地将王明、李德军事路线比喻为“叫花子打狗”。他饶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些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打又不打，走又不走，好比叫花子打狗，狗咬人，叫花子不敢打狗，反而将自己的衣服扯的更烂了。”大家从他那形象的比喻中对机会主义的危害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坚定了跟毛主席走的信心。过草地时，我远远看见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坐在山边交谈，这时连绵的红军队伍从他们侧面走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跟随毛主席走上了艰苦曲折，但是必定能赢得胜利的道路。

14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占领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我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长兼政委。1951年，上面通知毛主席已来南京视察，我赶到毛主席乘坐的船上，见主席比长征时胖了一些，饱经风霜的脸更显出革命领袖的不凡，那双智慧的大眼睛仍旧闪动着的人的光彩，我赶紧向他敬了个礼，他伸出手来，我紧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还记得我，他问我：“身体怎么样？”“托主席的福，很好。”我回答。“你太瘦了。”主席大概又联想起在寻邬见到的我，我们彼此会心地笑了。

这次我与主席交谈，距离第一次在寻邬那次长谈整整过了22年。

1956年3月，我担任民航总局局长不到一年，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要我去汇报民航情况。我准备好提纲，3月10日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听其他部门领导同志汇报工作，那间屋子摆着一个长桌和一圈沙发，在坐的还有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我敬了礼，他们示意让我坐下，我坐在他们的对面。随后，我向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汇报了民航的基本情况，远景规划及现在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毛主席听的十分仔细，与二十七年前习惯一样，他时不时还插话细问。

当我谈到“两航起义”人员的情况时，他问：“现在两航的人怎么样？”“两航的人差不多都懂技术，但少数人思想还跟不上形势。”我回答，主席点了点头：“对他们的旧思想要进行教育说理，要重视他们的技术，他们飞行时间长，航空理论懂得多。”

毛主席还问我：“‘里2’飞机性能怎么样？”“这种飞机比较安全，但速度不快，最大时速到300公里，高度也不行。”“是不是苏联的？”“对，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的。”“民航最好的飞机有哪些？”“目前最先进的是伊尔12、伊尔14，还有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带回来的C—46、C—47。”

11时多，总理说：“吃饭时间到了，边吃边说吧！”我们走进旁边的一间餐厅，餐桌上已摆好饭菜，我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吴法宪坐在毛主席的左侧，毛主席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江西人。毛主席笑着说：“糟了，我被你们江西人夹击了。”他一句话就使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饭后，我们又坐到原汇报室桌前，我说：“我水平低，民航技术性太强，搞不来这个。”我向毛主席但露心里的想法。他摆了摆手：“什么都可以学吗。主要是把安全服务搞好，你争取吧！”总理这时从旁插话：“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争取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

我谈到，民航现在有些省未设省局，准备陆续设置。毛主席点了点头，并且指示，飞机用途很广，将来农林牧副渔业，探矿，工业都会用上飞机，民航要早做准备，我认真地记下主席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象当年在寻邬一样，只要照着他的话去做，日后一定会见效的。

直至下午一点，这次汇报才结束，我向主席、总理、总书记敬礼告别。

回去后，我们民航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很快就收到成效，两航起义留用人员经过党的教育改造，不少人都成了业务骨干，在培养民航技术力量和发展航空事业方面发挥出很大作用。民航的各级机构迅速建立和完善，飞机及航线不断增加，安全飞行逐渐得到保证，服务态度也不断改善。

毛主席的话坚定了我民航干下去的决心，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由一个外行，逐渐熟悉了民航业务，直到1973年，我才离开民航。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经历过的事已经在脑海里淡化了。唯有与毛泽东同志的接触，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也许是出于他的特殊感染力，也许是出于一个老战士对自己领袖的特殊感情。总之，毛泽东同志是难以令人忘怀的，尽管他并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但他在人民的心中，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曾率领亿万人民改变了历史，并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

王政柱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解放战争进入关键的一年，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西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一年。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我当时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是陕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在毛泽东指挥下由防御转入反攻，这一伟大转折的目击者之一。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伟大统帅毛泽东的怀念。

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推翻腐败的封建独裁统治，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大决战，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最后的大决战。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被我消灭的正规军66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71万余人），1947年春国民党蒋介石改为对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妄图断我两臂，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当时，蒋介石动用了34个旅，2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边区，其中以胡宗南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5个旅，在数十架飞机配合下，直接向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的延安发动进攻。这时边区只有临时组织起来的，以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简称西野）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的6个旅，25000人。敌我力量为十与一之比。根据当时党中央指示精神，西野的任务是坚决钳制胡（宗南）军，不使其转移兵力到华北和中原地区。

3月18日，即胡军进占延安的前夕，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才撤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的去向处境为全党全军极大的关注。从指挥全国作战适中、环境安定和安全考虑，党中央机关到华北任何一个地区，甚至只要过了黄河，也比在陕北好一些。3月25日，西野于延安的青化砭首次歼灭胡军第三十一旅，27日毛主席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4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央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对中央的决定，既是高兴，又有些担心。担心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敌人首当其冲的“重点进攻”情况下的安全和生活条件。因陕北部队少，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更少。情况较紧时，彭、习曾向中央提出过派部队增强中央机关警卫力量，但都被中央谢绝，连缴获美式卡宾枪也不愿接收一枝。彭总回忆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许多人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毛主席回答说，只要我们越打好仗、越多消灭敌人，我就越安全。彭总说，今天我们也是这个道理，最好的办法是打好仗，消灭敌人，打垮胡宗南军的进攻，用实际战斗行动来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边区野战部队虽然少一些，但部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号召下，确实打得英勇顽强，打得好，经常受到毛主席的嘉奖表扬，给西北野战军以高度评价。

敌人占领延安后，从3月25日至5月4日四十天内，西野部队在延安以北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连续打了三个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三十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刹住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猖

狂气焰。4月14日，毛主席通报说：羊马河的胜利“给胡宗南以重大打击，奠定了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实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为配合晋南陈（赓）谢（富治）集团南出陇海路，策应中原、西北，陷胡宗南两面作战的境地，西野于8月上旬进攻榆林，8月20日在刘戡、董钊两个兵团之间的沙家店消灭胡军三个主力师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8月21日，毛主席发出《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的指示说：“刘戡率七个旅进至镇川堡葭（佳）县一线，另三个旅进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八个旅昨日拂晓出击三十六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西野由一次消灭敌人一个旅发展为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兵力。10月11日，西野进攻清涧，又消灭敌人整编第七十六师，首次俘虏敌人师长廖昂中将。

七个月的作战，西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人的变化。蒋介石、胡宗南向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经过西北野战军一系列打击，使敌人处于虎头蛇尾，由一心“消灭陕北共军”，至少把我军“赶过黄河”的企图落空，转为节节溃败，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七个月，对边区人民、解放军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陕甘宁边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人口稀少，人民生活贫穷，人民为解决军队吃粮和支前任务，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敌人进攻摧残破坏，更是苦上加苦。彭总五月一日报告中央：“敌人三光政策，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军队补兵主要靠补充俘虏（习惯称为，“解放兵”），截止1948年上半年，连队“解放兵”占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用胡宗南的兵打胡宗南”。因部队少，战斗频繁，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是拖不住胡宗南的。只有消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达到粉碎敌人的进攻，最后战胜敌人。边区经济基础薄弱，作战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兵少了，没有实力，是难以扭转敌我态势，可是部队多了又养不起来。到了1947年后期，这个矛盾愈显得突出，中央原来命令陈（赓）谢（富治）集团于6月底7月初西渡入陕作战，7月19日，中央改陈、谢集团为南渡（7月27日陈、谢集团由“彭、习序列”改为归刘、邓直接指挥），除战略上原因外，粮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1947年底，仅有的西北野战军，如果不是从晋西北接济粮食，两个月的冬训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就是从苦海里锻炼出来的。战胜困难是革命的光荣传统。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直接指挥下，克服各种困难，团结战斗，始终保持着战胜敌人的旺盛士气，有苦不叫苦，以苦为荣。只抱着一个希望：“消灭敌人，早日解放大西北。”

10月11日，毛主席发给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的电报，对西北战场情况作了科学分析总结。电报说：“西北我军在彭德怀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地方三个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为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分村镇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

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

10月11日，西野攻占清涧据点后，延安以北只剩下榆林孤立据点。彭总考虑到西野下一步行动方向是南下关中，不如趁西野在北线的机会搞掉榆林，以解除中央机关后顾之忧。经中央同意，于10月27日进攻榆林。我围攻榆林期间，敌人飞机每天数十架次昼夜轰炸。原来分析我攻榆林时胡军增援的可能性小，但没有预料到宁夏马鸿逵部会来增援（18师师长马敦静指挥步骑兵十个团，号称三万人），另邓宝珊率傅作义驻绥远部队暂编第17师和一个炮兵团由东胜经扎旗南援。11月15日，我阻击东援之敌于榆林城西六十里之元大滩。沙漠缺水、寒冷，夜间露营、粮食严重困难，乃放弃攻榆，没有实现预期目的。

1947年12月4日至1948年2月4日，西野在绥德、米脂地区进行冬季整训。中央对这次整训“诉苦”、“三查”运动极为重视，被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2月5日，西野南下，2月29日至3月3日宜川大捷，歼敌胡宗南部精锐整编第二十九军（兵团）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新组建的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第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及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共三万人。击毙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等。

3月2日，中央致彭、习贺电：“庆祝你们南线进攻，全歼胡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大西北而战。”

3月7日，毛主席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称南下“旗开得胜，声威大震”，“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的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总观全局，说明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消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4月中旬，西府战役，攻占胡军后方基地宝鸡，第二次歼灭整编七十六师，击毙徐保中将师长。在西府战役影响下，4月23日收复延安，25日收复洛川。

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2日，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在陕北时间是一年又五天。这是伟大而光辉的一年，是可歌可泣的一年。边区全体人民、人民解放军能

够同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中央领导在一个战场同生死共患难、直接接受中央指示和关心，感到莫大的荣幸。

正当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的情况下，党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这是一个非凡的决定，显示党中央、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中央在陕北的一切举措都是留给后人的典范，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不畏强敌，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有坚定胜利信心的表现。国民党在美国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拥有现代化装备和运输工具，除东北外占据全国的所有大城市和海港。侵占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的延安后，国民党动员一切舆论工具来打击共产党的声誉和影响，叫嚣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

党中央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适得其反。”“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出：“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形势发展完全证明毛主席的预见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蒋介石这个看来庞然大物，在英勇的人民力量面前落得一败涂地，土崩瓦解，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二、共产党依靠人民、坚信人民的力量。党中央留在陕北，是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信赖。中共中央关于决定中央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通知说：“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最根本的是群众条件好。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持到最后的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人民是久经考验的人民，边区是全国主力红军的“落脚点”，又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投入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为了保密，中央机关编为部队代号“三支队”，司令员为任弼时，代号“史林”，政治委员为陆定一，代号“郑位”，毛主席代号为“李得胜”，周恩来副主席代号为“胡必成”。中共中央驻在陕北有十二个年头，毛泽东的名字不仅家喻户晓，毛主席的照片、挂像也是普遍的，亲自见过毛主席的人也不少。真正掩护中央机关、替中央机关保密的是老区革命群众。依靠人民、扎根于人民的观念，在老一辈革命家是根深蒂固的。8月21日，毛主席通报中央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安全转移到榆林东南一面二十里的梁家岔时，特别提到这里是“老苏区”，表达对“老苏区”的深情厚意。又如3月25日青化砭消灭三十一旅战斗中，西野部队两万人进出伏击阵地往返三次，头一天扑了空，有的人泄了气，认为一定是老百姓“走漏消息”或向敌人“告了密”，彭总向部队动员反复解释，一定要相信老区群众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要自己动摇决心。事后证明是敌人因补给耽误了一天。老区人民不愧为久经革命锻炼、觉悟高，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区不少的支前民工一直跟着部队进军新疆后才回来。

三、毛主席率领精干的中央机关，在战争动荡的情况下，指挥全国作战，处理了许多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及时地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工作效力之高实属奇迹。

中央留在陕北，正是西北解放战争最困难的一年。生活艰苦、环境动荡，给工作上带来很多困难。在作战转移中严重影响中央安全的有两次。一次是6月4日，董钊、刘戡各率四个旅向安塞和保安（志丹）地区“清剿”，这时中央机关尚在安塞靖边交界的王家湾、小河地区，西野部队在陇东庆阳、

环县地区作战。另一次是7月底，西野为配合陈、谢集团南出陇海作战进攻榆林，蒋介石亲自飞延安督战，组织董（钊）刘（戡）两军及“快速兵团”（钟松指挥的三十六师）援助榆林，进而要“聚歼共军于榆（林）、米（脂）、葭（县）三角地区。”中央机关从8月1日由小河地区出发经绥德、米脂向东转移，连续长途跋涉，尤其是进入葭县后情况十分紧张，彭总除命令左翼阻击刘戡部的许光达第三纵队负责保障中央机关绝对安全外，还通过电台和侦察手段具体掌握中央机关行动方向的敌我情况。直到中央机关安全到达梁家岔才松了一口气。8月21日，毛主席为了回答各地区对中央机关的安全极大关注，向各大区、野战军发电报说：“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石弯、绥德、米脂、葭县、通秦寨附近，二十日移至榆林东南一百二十里，镇川正北八十里之梁家岔（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及中央机关同志们的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中央为指挥全国解放区作战、分析形势，制定战略方针，各项政策，发出党内重要指示，中央会议报告讲话以及评论文章等等。4月，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7月，中央小河（靖边）会议（确定西野和陈、谢集团行动方针，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确定由陕甘宁、晋绥两区人力物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组建西野前委等）；10月，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作战经验》；12月，中央杨家沟（米脂）会议，通过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提出战胜蒋介石的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1月，中央亲自指导西野首届前委扩大会议（西野九个月作战总结和新式整军）；3月，毛主席《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毛主席和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副主席为了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远见卓识、呕心沥血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尤其是一切高级领导、革命家认真学习。

四、榜样是无穷的力量。党中央留在陕北和边区军民同生死共患难是对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坚定战胜敌人的胜利信心以极大的鼓舞。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炼人的意志。环境虽苦，心是热的，全体军民真心实意，竭尽全力关心爱护中央、毛主席，上下一条心战胜敌人的力量是无比的。军队饿着肚子打仗，群众饿着肚子献出自己的救命粮给人民子弟兵，都是抱着今天苦是为了明天过好日子。只要想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同我们一样受苦，大家就心悦诚服地再苦也不叫苦了。经过教育补充的俘虏兵也提高了觉悟。歼灭刘戡兵团的宜川战役的俘虏兵不愿意吃我们当时用钢盔、瓦罐煮的玉米粒、土豆，说这“是喂猪的，不是人吃的”。我们的“解放兵”对他们说：“我们先前同你们是一样的，是给当大官卖命的，吃得虽好一些，可是老打败仗。现在是为自己解放打仗，吃的虽然差一点，尽打胜仗。”说得俘虏兵无言以对。

最大的鼓舞莫过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到部队慰问祝贺了。刚打下蟠龙、消灭胡宗南起家的“天下第一军”的167旅。5月13日，毛主席派周恩来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由王家湾到真武洞（安塞）西野司令部，代表毛主席、朱德司令祝贺“三战三捷”胜利，并参加5万人的群众庆祝大会，周副主席一出现，欢喜若狂激动人心的场面，“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山谷。这是敌人占领延安后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

消灭胡宗南主力之一第三十六师的沙家店战斗刚结束，8月22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到中央所在地梁家岔会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向中央首长汇报情况，并对中央机关这次长途转移表示敬意。23日，毛主席、周

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到前东元西野司令部亲自来慰问祝贺沙家店战斗胜利，非常高兴地同正在参加开会的旅以上干部一一热情握手。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虽然比在延安时晒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身体更结实健康。毛主席勉励同志们说：“这一仗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了。”被接见的干部，无论是过去见过毛主席，还是没有见过毛主席的，都没有想到在陕北战场见到毛主席。在战场见到毛主席更显得亲切、更有意义。认为这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是一种特殊荣誉的享受。作为解放战争伟大历史时期，在战场上见到毛主席对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非常遗憾，这么重要的，同最高统帅亲切的会见，当时没有照像机留下纪念的照片。毛主席的慰问祝贺传达到每个部队，无不兴高采烈，久久传为佳话。

历史证明，有可靠的人民，又有人民信赖的伟大领袖，有忠于党、忠于人民，作为人民利益捍卫者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历史也是无情的。中国人民为了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换来了解放战争翻天覆地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后，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伟大的胜利，但也经历了坎坷、失误和动乱。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明，团结奋进，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珍惜光荣历史，保持红军的本色，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难忘的教诲

余秋里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个具有重大、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日子，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曾多次亲自聆听他的教诲，他那高瞻远瞩、富有深刻哲理的谈话，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给了我信心和力量，至今难忘。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不得不召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于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继续调集军队向各解放区进攻。到了这一年的6月，他认为已准备就绪，就从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1月初，蒋介石调集胡宗南10个旅、宁夏马鸿逵5个旅的兵力，积极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央军委电令晋绥第一纵队进驻陕甘宁边区。当时，我们358旅正在山西省山阴县整训。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部队即日夜兼程赶到临县，由碛口渡过黄河，经关堡、绥德到达延安附近的七里铺待命。部队到达延安以后，立即开展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立功运动。一天，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第一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部队沸腾了，大家欢欣鼓舞地准备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46年12月5日下午，我旅和独一旅的指战员整装集合在延安飞机场，等待毛主席的检阅。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林伯渠同志，在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的陪同下，顶着瑟瑟寒风，来到延安飞机场。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当时身穿一件灰色布大衣，围着一条深蓝色围巾，穿一双半旧的布鞋，裤脚还打着补丁。毛主席来到队伍前面，面带微笑，神采奕奕地绕着边排走到最后面，再从中间走回去，边走边挥手致意，然后才健步走向主席台。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和风势，他看到风比较大，又没有扩音设备，怕大家听不清他的讲话，就让随行人员找来一张大方桌，摆在了队伍中间。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登上大方桌，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反动派要进攻解放区，我们要反对他。在各解放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只5个月的功夫，就消灭了他39个旅。现在，他们又要进攻我们陕甘宁边区，进攻我们延安。你们来了很好，党中央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你们，党中央派我们当代表来欢迎你们。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的反动派消灭掉。”毛主席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充满信心地说：“在华北、东北，我们的军队很多，他们到处在打反动派。我们有力量，有很多的军队。解放区的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地区的人民称赞我们，外国朋友也称赞我们。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最后，他号召我们要搞好军民团结，他坚定地说：“军队要和边区人民团结在一起，把军民关系搞好，那样，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毛主席话音刚落，全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也讲了话。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接见，使干部战士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垮反动派的进攻，誓死保卫延安。随即在全旅开展了苦练技术、钻研战术的群众性练兵活动。训练场上到处呈现一派自觉苦练杀敌本领的生动景象。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中34个旅25万的兵力进攻延安。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敌我兵力对比是十比一。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收复了延安。我们358旅直接参加了保卫延安的历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多次受到西北野战军的嘉奖和表扬，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的接见和检阅。

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1947年11月，我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以后，结束了内线进攻，准备转入外线作战，举行战略反攻，将战火引向蒋管区。

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作战，兵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战士日益增多，在连队中的比例已经达到60%，有的达80%以上。这些解放战士，在国民党军队中受了许多反动的欺骗宣传，参加我军后由于战斗频繁，没有受过全面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因此，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情绪不稳，在战斗中有的甚至贪生怕死，畏缩不前。我们有些干部虽然为我军的不断胜利所鼓舞，但担心今后更加艰苦，斗志也有所减退。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军面临的伟大任务很不适应。彭德怀司令员决定进行冬季整训。

我和黄新廷旅长反复商量后决定，这次整训，首先进行国共两党两军对比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后来，我们结合解放区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发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这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工作中由于采取了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启发和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划清了阶级界限，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基本上解决了部队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严肃了纪律，增强了军民团结，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部队战斗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后，彭总告诉我，毛主席要接见我，了解部队诉苦三查的情况。有一天晚上9点多钟，我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先问了部队的一般情况，然后，他问我诉苦、三查是怎么搞起来的？我告诉主席，我们组织诉苦时先作调查，找出苦大仇深的典型，让他们先讲，引发大家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每个连队一开诉苦会，大家都争着倒苦水，会场上形成一片诉苦声。有的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一边喊口号，一边把枪举起来，表示战斗的决心。我们领导上很放手，用典型把群众发动起来，再顺着群众的激情引导群众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说：“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当天谈到晚十一点多，毛主席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再谈一谈。第二天晚上九点，我又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说，你谈谈解放战士的情况。可以看出，主席对部队里解放战士比重很大，非常关注。我说：“国民党军队的战士，除了个别的兵油子，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受不了就逃跑，就被打死。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分跟我们子弟兵一



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路新理等解放战士的转变情况。

四连有个战士叫路新理，受国民党欺骗宣传，中毒很深。从蟠龙解放入伍后，一直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见了都头痛。见夜行军走山路，他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顶解放军帽子，他见没人便扔到地上用脚踩；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一转身便撕了。攻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把头埋在地下，不瞄准就放枪。诉苦座谈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适逢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他头也不回，直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在土坎上。接着点燃插好带来的蜡烛和供香，然后跪下磕了三个头，一边轻轻诉说一边痛哭起来。指导员先在一边悄悄地听着，当听到最伤心处，也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指导员再也忍不住，便走上前去和路新理抱头痛哭。原来，路新理顾虑自己是俘虏兵，一贯表现不好，担心说了全家的悲惨遭遇同志们也不理解、不同情，才跑到野外来祭奠父母。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哭着上台，痛诉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原来，路新理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自己稍大时也帮着打短工。父子俩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四口人，父亲硬是被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苦命的父亲的遗体，又领着妹妹讨饭来到晋东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盐场只有工具，没有防护鞋，脚上的布鞋一湿，双脚被盐汁蚀烂，疼痛难忍。但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就咬着牙硬撑。后来，母亲也病饿交加，离开了人世。自己没钱埋葬，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还是一块逃难过来的乡亲们，凑钱帮着让母亲草草入土。母亲死后，他每天带着九岁的妹妹伏在母亲坟头上哭。盐场的大叔、大伯们劝住他，就继续在盐场干。可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到盐场抓兵，他被抓走了，眼睁睁看着年幼的妹妹哭哭活活，也无济于事，从此，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一点不知道了……。路新理泪流满面，说到这里再说不下去，嚎陶大哭起来。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讲清楚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1月20日，我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358旅开展诉苦三查的情况。

杨家沟会议以后，毛主席把诉苦三查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战士们在这次运动中所激发的阶级觉悟，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这次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29军，毙伤俘敌近3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宜川大捷。

1948年3月7日，毛主席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了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文中指出：“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在阐述胜利的众多原因时，毛主席特别指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

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195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当天下午到毛主席办公室开会，并特别嘱咐我，要早一点到，毛主席要和我谈话。

我接到通知后，一直在考虑，主席和我谈什么呢？我想到前几天开会，周总理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秋里同志，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我当时思想毫无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总理说：“你考虑考虑，毛主席还要找你谈话。”我想，毛主席找我谈话，是不是谈这件事呢？下午，我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准时来到毛主席住所，主席让我坐下以后，对我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我说：“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主席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他问我：“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说：“43岁。主席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我听了主席幽默风趣的谈话，不禁笑了起来。

接着，主席神情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主席稍微停了停又说：“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主席见我默默地听他谈话，又转而问我：“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我赶紧说：“不是。”主席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主席还笑着说：“你如果转业，要发一笔财呢！”主席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了毛主席办公室。我对主席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着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主席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主席和我谈话的时间不长，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成了我的座右铭。在以后二十四年多的经济工作中，如果说我能学到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知识，做出了一些成绩，都是得益于毛主席的亲切教导。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年了。他的伟大的革命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正满怀信心地迈向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前途似锦。

## 功绩永垂青史风范长留人间

江 华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有的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有的借丰厚的著述流传千古，有的凭精湛的技艺长存于世。但是，只有一个人，他以伟大的智慧和胆略，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培育了亿万人民，造就了中国的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明天；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没有他，中国人民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他的功绩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们将千秋万代景仰和怀念他。他，就是毛泽东。

—

我在家乡小学读书时就听说过毛泽东。那时，湖南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共产党员韦汉等人在江华县开展革命活动，在县立高小建立了学生会组织。韦汉经常召集我们这些学生会干部讲述革命的道理。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湖南有个毛泽东，是共产党的负责人。1925年，我考入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又转入了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就知道得更多了。当时，第三师范是湘南革命的摇篮，三师的党组织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在大革命中，我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非常赞成他的观点，对他也就更加钦佩。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8年5月在宁冈县茅坪村的一间简朴的屋子里，那时，毛泽东同志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兼湘赣特委书记。我由湘东特委所属的安源调到湘赣特委，任茶陵县委书记。井冈山艰苦的斗争生活，使他有些清瘦，但他那闪烁着睿智的亲切的目光，一下子扫掉了我的局促不安，他身上的那种超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缩短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距离。他听说我是从安源来的，便关切地询问安源煤矿和我沿途所见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当时，我斗争经验少，知识不多，有些话还很幼稚，但他却耐心地静静地听着，很少打断我的话，用目光鼓励我说下去。这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同志的谦虚、平易近人的态度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之后，按毛泽东同志的嘱咐，我先去红四军几个团转了几天，然后到了九陇山区的茶陵县委。

1928年6月，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红军采取游击战术，依靠根据地群众，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利用这胜利后的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正在这时，湘赣敌军不甘心失败，又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而湖南省委却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要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同志于6月30日在永新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他根据湘南敌军强大的情况，认为红军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军的“会剿”。但在二十八、二十九团打下酃县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却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利用红二十九团部分官兵的乡土观念，煽动诱惑部队离开酃县，向湘南进发。毛泽东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报告，非常着急，立即通知我从宁冈赶到永新。他向我介绍了紧迫的形势，

让我送信给率二十八、二十九团的朱德、陈毅同志，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或佯攻茶陵，转回永新来，同三十一、三十二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敌人，粉碎敌人的“会剿”。他还说，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攻打或佯攻茶陵，并一再叮嘱，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7月17日，我拿着毛泽东同志的信，带着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城出发，经宁冈县城到湖南酃县县城，一天一夜越两省三县城，跑了130多里，在县城的一个大庙里见到朱德、陈毅同志，交上了毛泽东同志的信。第二天，部队出发往回走，过酒渡河时，二十九团的官兵硬是不过河，非要去湘南。经过再三说服劝告，就是不听，在此情况下，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我只好回到宁冈。后来二十八、二十九团与范石生部战于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即自由行动，散回宜章老家。这一行动使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根据地内，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也遭到挫折，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十之八九。史称“八月失败”。

红军粉碎敌人第一次“会剿”的胜利和八月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根据”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其中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他在分析八月失败的原因时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从1928年5月到1929年1月，我在井冈山战斗了八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我逐步理解和认识了毛泽东同志所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即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而我们党为找到这条道路，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总方针，开始了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战争夺取政权的新时期。但是，如何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到了全党面前，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只有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夺取政权这一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开始时，仍然仿照十月革命的经验，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决定起义军南下广东，先取潮州、汕头，以广东为根据地，再行北伐。广州起义，计划固守广州，进而夺取全省政权。秋收起义，也是以夺取长沙为目的。这些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城市为中心，走先取城市后取农村的革命道路，结果都未成功。这不只是哪个人缺乏经验，而是全党也缺乏这个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全党

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井冈山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之中，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一建立根据地的根本问题，从而为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开端，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创性贡献。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一致。那时，井冈山被白色政权四面包围，敌人重兵不断“会剿”，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十分艰苦，“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少人存有疑虑。尤其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有的同志不大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胜利不剃须。毛泽东同志针对各种思想状况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增强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记得是在“八月失败”之后，我因病住在大井的红光医院中医部，一天，毛泽东同志来看我，谈到斗争的形势，豪情溢于言表。他说，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五百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他还充满期望地说，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气魄感染了我。我说，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常闹土匪，从清朝到民国，历代统治者不知剿了多少次，总是剿不干净。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群众，有正确的政策，这是土匪所不能比的。既然土匪能够生存，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后来，以至我在浙江工作的时候，他还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占山为王”的道理，他说，“我们在井冈山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又经过来回数不清的小战斗，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对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未能回井冈山，转而向赣南闽西进军，在更大的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中央红色割据地。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拿起枪杆子，学井冈山的办法，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数十个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在神州广阔的大地上到处燃烧，即将成为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井冈山的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克服了一道道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井冈山的红旗插到了北京，插遍了中国大陆的山山水水。

## 二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武装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军队建立和壮大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为这支军队的成长壮大，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来的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缔造的部队，当然是从属于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红军建军的初期，这个建军原则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红四军成立以后，最高指挥权一直属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重大的行动，都是由前委作出决策。为了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红四军成立了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兼任主任。1929年3月，打下汀州以后，又在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同志仍兼主任，谭震林同志任副主任，我任秘书长。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后，被迫转战赣南闽西，强敌跟追，部队处于动荡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之中，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逐渐暴露出来。有些同志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有怀疑，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该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受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政治部只能对内”等等。这些思想都严重地影响了党对军队领导权的确立。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就要不要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设立红四军军委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表面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个组织，隐藏在背后的却是党和军队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当时是由前委代表）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七大”虽然否定了设立军委的意见，但一系列原则问题的争论并没有解决，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一时未能被多数代表接受。大会在最后改选前委时，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去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红四军“七大”以后，陈毅同志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党中央在李立三、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听取了陈毅同志的汇报，写出了对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明确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七大”争论的主要问题。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同志返回红四军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此时，红四军南下广东作战失利，广大指战员也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正确。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志在军内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会议决议。大会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多项决议，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前委书记。这

样，古田会议在实质上已经为“七大”争论的问题作了结论。古田会议决议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建军的文献，它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上。这个决议先后在红四军和其他部分红军中实行，这样，就使整个工农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新的经验，但其基本精神还是继承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原则。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的任务不仅是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筹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三大任务，以后又进一步明确，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工作队。这是红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的斗争中，我们每到一地，都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在情况紧急时，也不忘向群众作宣传。红四军下井冈山时，我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兼工农革命运动委员会职工科科长，后有追兵，前有堵敌，我们来到大庾县，立即开展群众工作。我去工厂作调查，找木工、店员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和各项政策。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哪里，所到之处，土豪劣绅望风而逃，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赣南闽西大地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火焰。毛泽东同志还十分关心武装群众，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经常从主力部队抽调人枪支援地方红军和赤卫队。1929年2月，红四军在东固与地方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并赠送给红二、四团一部分枪支。当时有些负责人思想不大通，给了些坏枪，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其实道理很简单，地方武装发展了，又会反过来支援主力部队，使主力红军不断壮大。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创立了三级军事体制，逐步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系，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为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巩固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内部关系上也同旧式军队有严格区别。毛泽东同志积极倡导在红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发扬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不准打骂士兵和枪毙逃兵；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提意见的自由；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结余的伙食尾子平均分配；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民主制度使军队形成了新型的良好的内部关系，促进了团结，增强了战斗力。从井冈山下下来时，红军处境非常险恶，敌人穷追不舍，我们有时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但大家没有怨言，上下团结一致，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这是与军内的民主制度，和谐的官兵平等关系分不开的。

红军来自工农，是工农子弟兵，是为工农利益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的军队。要保持同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建立在官兵自觉的基础上；第二、它是铁的，不容有丝毫含糊，早在红四军建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纪军规。但是，由于红军的一部分来源于旧军队，又处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同志不大习惯执行严格的纪律，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毛泽东同志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经常进行说服教育，提高大家执行纪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严肃批评，从严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1929年春节，我军在大柏地消灭了尾追的敌军刘士毅师的一部分，这是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仗打完了，部队宿营，但吃饭却成了问题。开战之前，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要吃饭，从哪里去弄粮食？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前委的同志住在一个雇工家里，屋里有两箩谷子，但主人不在。我请示党代表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反问我，饭总是要吃的，你说怎么办？我说，只好先把谷子吃了，给主人留个条子，将来归还。毛泽东同志连说，这个办法好。立即通知部队照此办理，吃了房东的粮食，留条子，出布告，以后赔偿。战士们打了胜仗，又有饭吃，都很高兴，司务长也不再为没粮食发愁。大家都说党代表做了好事。朱德同志说，这是逼上梁山，没得别的办法呵！后来，我们再回大柏地时，由军需处按条子赔现洋。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红军真正是自己的军队。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大柏地战斗后不久，红四军在东固与赣南独立红二团、红四团会师，然后东行至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其时，有一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三十一团军需处截留下来，杀给部队吃了。毛泽东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团军需处处长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极了，还接连说要把负责人撤职。

在毛泽东同志的严格要求和教育下，红军的纪律成为上下一致共同自觉遵守的准则。红军既是勇猛之师，又是仁义之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水乳交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所造的谣言，什么“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不攻自破。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红军，支持红军，并把命运和自己的军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红军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不论是在军队建设还是在党的建设方面，执行严格的纪律，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有无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纪律，党就会变成一个各行其是的松散联盟，就没有团结和战斗力，就不可能战胜任何敌人。纪律的中心在于自觉遵守，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来说，纪律是党的灵魂，有纪律就有党，没有纪律就会亡党。现在，我们的党纪、军纪、政纪和其它方面的纪律比过去完备得多，关键在于严格地执行，在于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必须及时严肃处理。否则，就等于没有纪律。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最核心的，就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在军队长期做政治工作，体会最深的就是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领导的具体方式在各个部门不尽相同，是相对的，但要坚持和保证这个领导是绝对的，不能动摇。近几年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演变，1989年我国出现的政治风波，给我们敲了警钟。血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 三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向背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毛泽东同志是最早关心农民问题，最早提出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出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了解。他在广州和武汉亲自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大批的农民运动干部。他首先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

最忠实的长期的直接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以农民为主体的秋收起义，并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农村中站住了脚跟。此时，他便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上来。

中国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据毛泽东同志 1927 年在湖南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在井冈山地区，地主豪绅阶级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却占有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永新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占有，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经济根源。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和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党我军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必须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用武装斗争保障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又以上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支持武装斗争，这三者的紧密结合，就是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斗争。红军的策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利用战斗的间隙，迅速开展土地斗争，使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1928 年 6 月，红军粉碎了湘赣两敌的第一次“会剿”，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毛泽东同志在永新禾川中学（现永新中学）召开了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一部往吉安边界，毛泽东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一营往永新西乡一带。茶陵县游击大队也参加了宁冈古城地区插牌分田。

由于处在战争环境，所以要争取时间，突击分田。分配土地。一般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写标语，宣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二是做社会调查，深入各阶层摸底了解，掌握当地的土地、人口、地主剥削程度、工商业等各种情况；同时，也因势利导地进一步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这样做，情况就有底了，群众也提高了觉悟。三是分田地。通过调查摸清情况后，即组织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分粮分财物。在分配给农民的田地上插上牌子，写着亩数和该户的名字。牌子一插，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地主手中的剥削凭据——田契、债单统统烧掉。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当时土地分配的办法，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打乱平分给农民耕种，一般是以乡或区为单位，按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均分田地，也有不按人口，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田地分配后，禁止买卖。土改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召集我们各县委书记开会，检查工作，交流情况，总结经验。

1928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内容基本上如同上述。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在当时进行土地分配，没有任何经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而最主要的是，这个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权利，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

重要作用。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4月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井冈山分田的经验教训，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调整，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土地”。到1930年、1931年，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土地政策，土地归农民私有；分得的田地允许买卖；分配的办法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对工商业也强调保护政策，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只没收其田地封建剥削部分，对其工商业部分予以保护。这些政策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指责和批判，但实践最终证明，它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其基本的政策依据，即源于此。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他始终关注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把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可以说，农民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一条红线。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个体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任凭这种现象发展，不仅会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而且会削弱以至瓦解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工农联盟，危及整个政权的基础。毛泽东同志代表了广大翻身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在老解放区变工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十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方针，主张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并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规划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前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宪法”。他号召农民科学种田，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为今天农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一直在浙江省工作，毛泽东同志多次到浙江农村视察，还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基层搞调查研究，那时，我每年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内下农村。他指示，地方工业要为农业服务。浙江办的半山钢铁厂、绍兴钢铁厂，当时就是为了解决农机具而兴办的。浙江缺乏化肥，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由陈云同志亲自抓，建立了衢州化工厂。在建厂过程中，有一次我陪毛泽东同志路过衢州，他要去看看工厂，由于各方面条件都不方便，经我们劝阻，他才没去。50年代、60年代建立的这些工厂，至今仍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理论。《决定》指出：“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我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地贯彻《决定》的精神，全党重视农业，真正把农业基础摆在经济建设的首位，我国的农业就一定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 四

毛泽东同志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长我十四岁，既是领袖，又是老师和兄长，我为自己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数十年，能亲身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这不仅由于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写下了象《实践论》《矛盾论》这样哲理极强的哲学专著，而且还在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谈哲学是 1929 年 4 月。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同井冈山突围下山的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五军在江西瑞金会合，然后开到于都，前委在这里开会。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蒋介石同其他军阀相比的特点和优势，分析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我军利用蒋介石抽调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桂系军阀作战的机会，在赣南分兵游击，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同志同陈毅、谭震林和我一起在河边散步。毛泽东同志停下来问我们，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我们都没有回答。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他用这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我进入抗大学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给我印象最深、最有教益的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哲学课。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常常是引用一些通俗的事例，如人手掌上的拇指和其它四指的关系、象棋中的攻防关系、战争中的外线和内线的关系等等，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抗大也有别的教师讲哲学，所用的一些物理、化学的例子，总听不明白。听毛泽东同志这么一讲，就豁然开朗了。我们结束在抗大学习时，哲学课还没有讲完。中央又举办了一个哲学训练班，邵式平同志任班主任。学员都是中央和军委机关以及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还有抗大的部分学员，共一百多人，仍由毛泽东同志讲课。我也参加了这个学习。有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听课，但有个别人不但来听课，反而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在这些人看来，还是出国留洋、啃过洋面包的人懂得哲学，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课，不仅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揭露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实质和对革命的危害。从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干部的头脑，教育干部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一点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现在回想起来，过去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凡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辩证法办事，工作就顺利，有成绩；否则，就不顺利，甚至会犯错误。

听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课，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对我以后的革命和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开始懂得一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记得我在中央军委参谋部工作时，西路军一些同志陆续回延安，由我们接待安置，送大多数同志到抗大学习。我们还接待安置了一些从其它地方来延安的干部。在工作中，有时同管生活的副官处闹些意见。一次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说起四局同副官处有矛盾，闹磨擦，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认为别人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军委哲学学习小组组长，也参加了小组会，他听到我这么一讲，笑着说，刚学了哲学就用上了，知道什么是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我因在医院做手术未听到报告。后来，在机关哲学小组学习中，认真读了几遍，感到非常振奋。《论持久战》不仅是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在山东敌后抗战时，带着它，随时翻阅，每次读来，都有一些新的启发。我们还把这本书作为山东根据地政治、军事干部的必读教材，以此武装干部的头脑，教育部队和人民。

1943年冬，我从山东敌后回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同志到党校来，他关切地向我询问了山东敌后以及我回延安途中所见的情况，特别问了这些地区群众的生产。我简要地作了汇报。关于沿途所见的情况，我说，一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生活都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破烂。毛泽东同志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察言观色。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了解到了群众生活的基本情况。当然，这还不够的，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色。“察言观色”，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毛泽东同志赋予了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他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他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挖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样，就可以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少犯错误，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快些，更好些。

## 五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贡献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新中国诞生了，我们党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国家也成了各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但是，在胜利的条件下，党会不会改变性质，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对于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直至晚年，始终殚心竭虑，时而大声疾呼，时而苦苦思索，未敢稍有松懈。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仍在进行，毛泽东同志就预计到我们党在今后有可能掌握全国政权，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他向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希望全党从李自成农民起义取得

了政权后，由于腐败迅速垮台的教训中总结经验。并引以为戒。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5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筹卿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他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高级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和平演变阴谋的警惕性。1959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开会，会上印发了杜勒斯的三次演讲材料。他说，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什么是杜勒斯他们说的“和平取胜战略”呢？用杜勒斯自己的话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从那时候起，毛泽东同志就逐步形成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对于我们在当前复杂尖锐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其主要方式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发生变化，来达到改变我们整个社会制度的目的。6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反修防修，并谆谆告诫全党，要防止修正主义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对于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他深恶痛绝，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他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变成压迫人民的老爷。

在1964年6月专门谈和平演变问题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给予充分的关心和重视。他提出了挑选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并且把政治标准，即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以后，他又主张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体制，让青年一代在老一辈的传帮带下接好革命的班。他还强调，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的关于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思想，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培养接班人，选好接班人，是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创建了新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他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国人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老一辈传下的火炬，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生机勃勃地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革命。道路可能曲折，前途必定光明。我们这些毛泽东同志麾下的老兵，感到由衷的高兴，充满必胜的信心。待到与他老人家重逢之日，定当举杯共庆，含笑九泉。

## 革命生涯中难忘的导师——回忆毛泽东

郭述申

一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5月,当时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进行了空前野蛮的大屠杀。接着又以“清党”为名,在广州等地实行白色恐怖,使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倒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同志正在武汉参加领导全国的革命活动,向反动势力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又准备在武汉举行。在这种形势下,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沿岸劳动会议在汉口召开了。这是国际工人阶级对处于危难中的中国革命的大力支持。5月31日,全国农民协会和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汉口普海春饭店举行宴会,欢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沿岸劳动会议的代表。参加这次欢迎会的共有一百多人,除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的负责人外,还有武汉三镇的农民代表。我当时以湖北省农协常委的身份,代表省农协参加了这次欢迎会。在这次欢迎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毛泽东同志。

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农协致欢迎词。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衫,身材高大,举止稳健,气度不凡。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和有力的手势,使他的讲词更加洋溢着革命的热情和雄辩的力量。他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要靠各国人民的团结斗争。他说:国际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中国革命的群众运动,太平洋沿岸的工人阶级首举义旗,反抗这一残酷的屠杀。中国农民自当更加团结,追随其后,作殊死战。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的主要的力量,尤其需要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于工人运动的影响与指导,这证明工人阶级天然的是农民的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无可限量。他对中国革命特点的阐述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精辟论点,激励着到会代表,也使我难忘。毛泽东同志致词后,代表团团长、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和其他国家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代表湖北省农协致了诚挚的欢迎词。夏口县第一区农民代表也发了言。大家都谈到,中国革命运动离开农民即失去革命基础,中国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太平洋沿岸工人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所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最后,代表团团长罗佐夫斯基向毛泽东同志赠送了一枚纪念章,并亲手佩戴在他胸前。

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会上的讲话,精辟地说明了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以及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等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这次讲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思想,在党的五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这些思想是当时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的。

二

不久,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一再退让,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走向低潮。“七·一五”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国民党要改组省农

协。我根据党的决定，发表了反对国民党改组省农协的声明，并经组织派遣到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工作，准备发动秋收起义，1930年，中央又派我到鄂豫皖苏区特委工作，在创建和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我们学习并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革命根据地。在那时我们听到了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消息，知道了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受到极大的鼓舞。

我和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见面，已是八年后的1935年11月初的事了。我从鄂豫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接连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10月底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要来军团部。当时军团部住在陕西省甘泉县道佐铺。军团长徐海东到前线部队去了，准备攻打张村驿等几个土顽据点。我和程子华在军团部，听到毛主席要来的消息十分高兴。因为在鄂豫皖和陕南几年的艰苦斗争中，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十分困难，经常为不能得到中央的指寻而焦急，现在就要与党中央会合了，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们在陕南时，就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要北上，为迎接党中央、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先期到达陕北。我们打崂山战役后，听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吴起镇。10月底，党中央还派人送来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带来了党中央的热情慰问和鼓励。从那时起，我们就盼望能早日见到中央领导同志。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子华同志立即派人去通知海东军团长，海东同志很快骑马赶回军团部，第一句话就问，毛主席来了没有。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将领，还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因此十分着急。他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贾拓夫、李一氓等同志就到了。毛主席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并向彭德怀同志介绍我说，这个大个子就是郭述申，他在湖北搞农民运动时我就认识他的，并拉着海东的手询问了好半天。我们向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的作战情况。毛主席对我们的行动给以充分肯定和鼓励，并问我们下一步怎么打法。海东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表示同意军团的作战部署。此后不久，我们就和中央红军会师了。自此，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我们就经常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作战和工作，先后参加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1935年11月初，中央召开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向广大指战员讲了话，他深刻地阐明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在这次庆祝会师大会上，萧华同志和我也分别代表两个军团的指战员讲了话。接着，我们就准备迎接直罗镇战役。

直罗镇战役前夕，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在鄜县（今富县）张村驿附近召集干部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主席说：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毛主席还风趣地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会后，毛主席把海东同志和我留下谈话，向我们了解红十五军



团的情况。最后他说：作战方针已定，可准备粮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们粮食筹备得怎么样？怎么运送？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听过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我们感到这次战役已经胜利在握了。果然，我军很快取得了直罗镇战役大捷，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毛主席亲自指挥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准备对日作战。红军东征战役取得很大胜利，蒋介石调集十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的去路。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我们红十五军团掩护全军西渡黄河后，也回到了黄河西岸，住在离河边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参加会议。来到会场，看见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一间不大的平房里挤满了人，有些还坐在炕上。我去时会已经开始，毛主席正站在窗前讲话。我进门后就坐在恩来同志身旁。会上，毛主席总结了红军东渡黄河战役的伟大胜利，最后说，这次东征战役我们撒了两网，一网撒到了太原以南，一网撒到了临汾以南，收获是很大的。但是，可否设想把网撒到京汉铁路上去，胡宗南的部队就可能被吸引到京汉路上去。我们则有太行山脉作依托，那样战争的局面就会大不相同了。毛主席这短短的几句话，是对东征战役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东征战役后，我参加红军大学的学习。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办的第一所大学，我是红大的第一期学员。当时红大分为一、二、三科，我在第一科学习。第一科的学员多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林彪、陈光、罗瑞卿、彭雪枫、刘亚楼、苏振华、张达志、武廷（朝鲜同志）等等，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的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了消灭战争，就必须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为了消灭红军，就必须发展壮大红军；为了消灭共产党，就必须发展共产党。我当时听到这样讲法，还不能立刻领会其深刻意义。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并经过仔细思考，我才领会到这几句话的含意是非常深刻的，充满了辩证法。

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矛盾论》时，又阐明了这一辩证思想，他说：“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在这期学习中，毛主席亲自为我们一科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他几门课，如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同志讲授。毛主席在讲课中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从革命战争规律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多是我们这些学员亲身体会过的，大家十分爱听。在讨论中，他再把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他就这样边讲边听取学员意见，边修改自己的讲稿，最后形成了后来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的著作。这是他吸收了全党同志的智慧，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我在这次学习中，亲自感受和理解到毛泽

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 三

红大学习后，我参加了红三十一军援助西路军的准备工作，后在湖北省委工作一年，以后又参加了新四军五支队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正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当时在实际工作中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最主要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坚持全面抗战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而明确的回答。我列席了六中全会，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受到深刻的教育。会后我即出发到前线，传达和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以后少奇同志又到皖东进一步对六中全会精神作了深入阐述。在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的指导下，新四军五支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这一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坚决实行这一方针的地区和部队，就遭到失败和挫折。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941年3月，我和戴季英同志从淮南半塔集（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各地出席七大的代表正在陆续到达延安。我们到达后去看望毛主席。他和我们互相问候之后，就向我们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他还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

在延安时，我有较多的机会和毛主席接触，经常听他的报告，他虽是全党的最高领导人，却平易近人。他作报告或与我们谈话，常常是谈笑风生，引经据典，以古喻今。他那渊博的知识，总能吸引、征服听众。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杨家岭毛主席住处参加谈心活动，这是在他家经常进行的活动，内容不限，谈工作，谈哲学，有时也了解一些同志的个人经历。那次参加谈心的有周恩来、陈云、彭真、任弼时等同志。大家谈兴很浓，直至吃饭时间，毛主席说：到吃饭的时候罗！这是用我的稿费请你们吃饭的。1945年元旦，我和中央党校的同志一起到毛主席家拜年。他正在院子内抱着小女儿玩，见我们来后就谈起来。他说，我们干了二十多年革命，没有学会积蓄力量，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这就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今年各根据地生产做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到还是晚到，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讲了我们都很关心的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南下的消息。他说他们在五十天内穿过了两省，顺利地到洛阳。以西趁结冰时渡过了黄河。我们1944年秋天，在欢送王震同志南下的大会上，还听毛主席说到要发扬松树精神和柳树精神，南下支队就是以松树的稳定性和柳树的灵活性到敌后去战斗的。

### 四

从1941年到1945年的五年中，我有机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参加了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们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进入了中央党校各部学习。这场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毛主席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这些报告成为整风学习的主要内容。他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党的实际、个人的实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文风中的党八股三个大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我结合文件学习，针对我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写出了一些心得笔记，其中一篇“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四条标准的反省”一文，毛主席阅后，在1942年8月25日亲笔批文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文章中的错字和标点符号都作了改正。毛主席对干部的教育和关怀认真细致，使我深受教育。在党校一部学习一段后，我被调到党校三部工作。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过程中，经常召开整风学习小组汇报会，研究整风中的问题。关于整风审干的九条方针，就是在这些会议上逐条讨论总结形成的，由于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使整风审干工作得以排除干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全边区和各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上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下到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参加了生产，我们党校三部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思想教育，收到显著的效果。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文艺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座谈会的指引下，延安开展了一系列为群众所喜爱的文化艺术活动，如京剧改革、广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等，党校三部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些活动。

党中央为了贯彻整风精神，在召开七大以前在延安分地区召开“山头会”，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座谈了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并克服了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山头主义”思想。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觉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是一次飞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大会上得到生动体现。毛主席的开幕词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中的经验教训，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毛主席曾两次讲话，反复阐述了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的方针。在闭幕词中毛主席要求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去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受到的教育和鼓励，终生难忘。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我到东北去工作。我向毛主席辞行时，他说，党的七大开过了，要按七大的方针办事，到前线去代我向同志们问好。

我到东北后，立即就投入到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中去。直到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路过沈阳时，我又见到了毛主席。东北局在毛主席下榻的宾馆欢迎他，会见时，毛主席讲了去苏联和沿路参观苏联的工厂和农村的情况。他说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这一条约，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不管别人有什么议论，这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事。毛主席还提出，东北

是我国工业基地，东北的任务是出干部、出机器。同毛主席一起由苏联来的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同志也参加了会见。

以后，我在东北工作十几年，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为出干部、出机器而工作。

毛主席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传统精神，人们称为延安精神。毛主席在延安工作十余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的最灿烂时期。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指引全党全国人民，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又战胜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干涉和封锁。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有幸在延安工作、学习近八年，多次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诲，汲取了巨大的力量。今天，重温他的文章和回忆延安精神，更感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当前困难、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锐利武器，我们应该用这一武器武装全党、全国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 毛主席关心机械工业

段君毅 汪道涵 周子健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每当想起毛主席，想起数十年间他领导我们干革命、搞建设，他的音容笑貌就频频在我们心中涌现。我们都曾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多年，亲身感受到毛主席对机械工业的关心，就此忆述，表达我们对毛主席殷殷怀念之情。

### 一、对机械工业的地位、作用的精辟论述

毛主席非常重视机械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曾作过高度概括与精辟阐述。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懂得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工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过去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1957年3月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1958年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当年还对于有关机械工业若干方针政策性问题作过重要论述，诸如：什么机器都需要工作母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工业要注意成龙配套，注意质量第一；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等等。我们当时有幸得以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工作，言犹在耳，益增感奋。

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建国以来我们坚持进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化；同时，也正是由于我国几十年来贯彻执行“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科学技术通过机器装备转化为生产力，机械工业广大职工，奋发图强，持续努力地工作，为我国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技术进步，品种发展的机械制造工业体系，从而不断扩大提供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建设事业以更充分、更先进、更适用的机器设备，才使今天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人们都感受得到的重大变化。三四十年前毛主席对机械工业地位与作用的精辟论述，今天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机械工业正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引进、消化、创新高新技术，切实掌握设计和制造技术。多年来我国机械工业曾处于的“吃不了，吃不饱，进口的冲击，出口的竞争”的状况，正在和行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改进。并且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国在机械工业加强自身技术改造的同时，各个产业部门都需要进行技术改

造，方能“适者生存、敏者发展”；机械工业应当为此做出较大的贡献。

## 二、强调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

1952年下半年，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不久，毛主席指示我们发布机械工业的“安民告示”。亦即要求初建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面对全国机械战线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战略和方法上“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机械工业面临的历史任务、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干什么和怎样干。它既是指引全国机械战线广大职工的行动指南，又是激励大家图强实干的思想动员。

1953年初，我们在研究草拟《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的过程中，毛主席进一步示意：应该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做为文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认真修改后，由部长黄敬和君毅、道涵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汇报，其中提到“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必须加强企业中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使全体职工了解工作的意义，工作的方针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使广大群众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而奋斗。……企业中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应该密切围绕企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中心任务而进行，……使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我们成为具有政治头脑的经济工作者，而不是狭隘的事务主义者和短视的经济工作者，才能使我们逐渐懂得业务，成为内行，具体切实地指导企业，而不是‘一般的’、‘从空中’领导企业；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们在企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时，毛主席说：“这一段写得好，这一段很重要，任何工业部门都要有这一段。”毛主席并为此亲自主持拟定了《中共中央对“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的批示》，批示中说：“第一机械工业部强调指出加强企业中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必要及其方法，中央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这个文件下发后，机械工业广大职工掀起了学习、贯彻的高潮，激励起了国家主人翁责任感，人人争做贡献，大家一个共同心愿——一定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任务。1956年在中南海机械工业展览中，我们对毛主席说：主席批准的1953年“安民告示”对机械工业有很大推动，毛主席继续鼓励说：“你们经常研究方针政策，这很好。”

## 三、无论制造什么设备“都要有个工作母机”

1956年6月，一机部在中南海瀛台举办第一次汇报展览会。主要是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机械工业的成就和今后展望。分综合、通用机械、机床、重型机械、电机、汽车、拖拉机和仪器仪表等部分。毛主席每次看两个小时，前后一共看了七八次。看得非常仔细，问得非常详尽。一台IA62车床，床头箱打开后，毛主席说：你们看，两个轴之间有齿轮咬合在一起，而咬合的齿轮又是相反的方向，如果是同一方向就没法转了，这就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当看到液压，电器等，毛主席说：这里边也有联系，有辩证法问题。毛主席又说：宇宙是非常大的，但又能分得非常小，分到电子、原子、原子核，还可以再分。当看到新试制的双轮双铧犁等农具的介绍后，高兴他说：不错，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应该推广，以后再加以提高。君毅汇报锅驼机受农民欢迎，就是水锈不好处理。毛主席说：“你们知道这个毛病，为什么不写出来？”我们回答说：是，应该写出来。毛主席这样讲求务实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益。

1958年7月2日，一机部在中南海举办了机床与工具展览会，毛主席仔

细听了济南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16 仿型车床的结构、性能与特点的汇报。汇报到无级变速机床，他对工作人员刘传陆说：“无级变速提法不科学，一个速度变为另一个速度，都是量的变化，怎么能说无级变速呢？”

1959年9月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说：“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

有感于毛主席对机械工业、“工作母机”之如此关注，第一机械工业部于1960年春在中南海举办了工作母机展览会，毛主席到展览会进行了长时间的参观、了解。当时君毅和子健在瀛台桥迎接毛主席，一见面毛主席说：君毅你这么高，是不是少数民族？君毅回答：不是少数民族，我是山东人。毛主席说：啊！山东大汉。当看到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东风牌万能螺丝车床时，毛主席问怎么叫万能？工作人员冯有禄说它能车外圆、内圆、端面，能挑螺纹等，有多种功能。当看到程序控制车床时，毛主席问工作人员：怎么叫程序控制？回答说是用一系列电器来控制动作，里面有时间继电器，毛主席还进一步问明白了时间继电器的功能。

毛主席还问及我国机床的产量、品种，在场的赵尔陆同志汇报了当时机械工业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毛主席看到发电机，说：现在出名的是上海电机厂，还有上海机床厂，他们做了些新东西，想去看看。赵尔陆说是搞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现在又在搞气体冷却。道涵说：发电机在发电过程中散热问题是个关键。双水内冷就是转子、定子都是用水冷却。现在又在研究用一种氟和氯液做冷却剂，在60度以下是液体，60度以上就变气体，可以吸热。毛主席听得非常专注。在看到机械工业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君毅汇报自动化以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毛主席说：“对，有材料问题、动力、人员、劳动组织、工资等问题都要在发展中有所创新。”毛主席边看边谈，兴致很高，他说：“生产力革命，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衣、食、住、行、用的问题。”毛主席还和在场同志款款谈心话家常，他问大家：“你们现在忙不忙？你们看是忙好还是不忙好？”我们说忙，工作方法有关系。主席幽默地说：“我看你们一个个都面带红光，很健康，看来还是忙些好。”毛主席这些话使在场的同志们感到亲切温暖，初见毛主席时的拘谨都消失了。

我们亲见亲闻毛主席几次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时是那样的专心致志，求真究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才转到下一个问题。他与同志们平等探讨，他还不时对一些问题予以辩证地解说，予以高度概括，使人深受启迪。

30多年前毛主席参观工作母机等展览的情景，我们记忆犹新。现在，我国的“工作母机”制造业，即通称机床工具工业，已经发展为近千家企业，能生产约5000个品种，1992年数控机床已生产4000多台；从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和第一汽车制造厂改造所装备的机床来看，其中，国产机床设备均占70%。我们常常想起毛主席当年所说，无论制造什么设备，“都要有个工作母机”的话。

#### 四、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主席一贯重视农民和农业问题。在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文章、报告、讲话和他主持制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不体现他的这个战略思想。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领

导农民这个革命同盟军的论述。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取得政权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适应这个重大变化与发展，毛主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农、轻、重”方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等。主席非常关注农民和农业机械化、倡导农业机械化。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敬曾认真调查研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问题，并给中央写出报告，受到毛主席的赞许。第一机械工业部对农业机械以及农具的设计制造、实验、改进和推广相继作出部署，认真推进。1958年毛主席亲自审批了洛阳拖拉机厂的发展计划，指出：各种拖拉机样式、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地形，并且一定要能综合利用；其成本要尽可能降低。毛主席还对各种农具、特别是各种新农具的设计、推广非常注意。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参观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观看改进的双轮双铧犁，兴致勃勃地亲自驾扶犁地，体会比旧式木犁省力，容易操作的优点，鼓励要多作农具的研究改良工作。1958年4月他参观了广东省农具改革推广评比展览会。会上展出好几部不同的手扶拖拉机，他一一抚摸。了解其功能。看到改良的犁耙、双轮双铧犁，他赞扬群众的首创精神。看水泵抽水和龙骨水车（脚踏和手摇）操作表演时看得专注，鞋子弄湿都不顾了。

同年的8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各级党委要摸清情况，全省全区有多少农机具需要改良，多少农具需要装上滚珠轴承，订个规划，哪个先改，哪个后改，什么时候完成，要有个具体安排。1959年4月27日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写道：“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表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一重要方针的内涵愈益丰富、愈益深化。

1959年在毛主席倡议下，成立了农业机械部，任命陈正人同志为部长。当年10月31日主席在《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中写道：“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几十年来，前进的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一方面日益增加提供的农机农具促进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几千年来使用落后农具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使用起农业机器和新式农具。培养出越来越多的能工巧匠，并从而促使农民群众文化技术知识的增长；而且也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施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以来，发展科学种田，发展乡镇工业，开展多种经营，实现劳动致富，孕育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毛主席当年倡导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其意义是深远的。

五、“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

“将来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

1950年初，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时，就和苏方商定，由苏联援建我国一个年产三万辆的中型卡车厂。回国后毛主席说：在沈阳和哈尔滨之间，就建在长春吧。党中央、政务院确定在长春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2年秋，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班子。讨论到饶斌同志任厂长时，毛主席问：就是那个白面书生吧？他有没有魄力做这工作？列席会议的君毅回答说：我们议过，可以胜任。中央任命了饶斌担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1953年6月，毛主席批示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批示》，责成有关部门给予这个厂的建设以最大的支持。当年7月15日这个厂举行奠基典礼时，由该厂六个青年共产党员，将镌刻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端端正正地抬放在基座上；出车前，绘制设计近200个汽车标志图案，也是经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选定了圆圈内有“解放”二字、两侧伸展双翼的图案，毛主席还特意为此写了“解放”二字。在全国各方支援下，全厂职工经过三年的奋发努力，工厂如期建成，“解放”牌汽车投产出车，开创了我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新纪元”。

1956年，毛主席在讲述《论十大关系》时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制造汽车，不晓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先搞卡车，不搞轿车，所以我们每天只好坐外国的车子来开会，哪一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们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1953年试制出我国的第一辆轿车——“东风”牌轿车，送进中南海，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乘坐了这辆轿车。全厂职工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生产出“红旗”轿车，在国庆十周年天安门阅兵典礼中，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分别乘坐了“红旗”牌敞篷轿车进行检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乘坐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红旗”牌轿车。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到第一汽车厂视察，高兴地看着解放牌汽车开出总装配线。毛主席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

1956年，毛主席在参观机械工业汇报展览时说：“我们一个省顶欧洲一个国家，将来我们还要有第二汽车厂，第三汽车厂，生产更多的汽车；将来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

1958年6月，毛主席又说：“第二汽车厂还要搞，地点是否在南方。”1964年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把第二汽车厂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切指示下，选定厂址，设在湖北十堰，1969年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建设，1975年开始出车。

饶斌同志在“文革”前受命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文革”中被隔离，迟未解放。1969年夏，毛主席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说：“饶斌在哪里？”曾思玉同志说：他还在劳动。毛主席说：“他是个白面书生，吃过几年面包，没有什么问题嘛！”不久，饶斌同志被解放，继续抓二汽建设。他带领全厂职工艰苦奋斗，在李先念副总理亲自关怀、过问、指示和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产品设计、工厂设计、设备制造和施工安装，都贯彻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建设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展，部里把二汽建设作为重点，子健自始至终抓二汽的建设工作，在十堰那样半山区的艰苦条件下，广大职工万众一心，用“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期待”的忠诚信念来激励自己而坚持奋战，众志成城，建成我国第二个汽车生产基地。

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毛主席“奠基”“培育”的我国的汽车工业成长起来了。1992年全国生产各种汽车百万辆（其中轿车16万辆），有力地支援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壮大，以及提供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开始了汽车出口、参与国际间的汽车竞争，实现毛主席当年说过的“我们的汽车也要出口”的愿望。

## 六、“成龙配套”“质量第一”

1959年君毅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毛主席说：“机械工业无非是质量、规格、品种、成龙配套。”成龙配套，是机械工业的一个特点，一台单机由很多零件组成，不配套不能用；一套机组，一条生产线又包括许多单机；一个建设工程项目的成套必须在单机、机组生产线成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好，形成生产能力。当时，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就建立起设备成套机构，制定了设备成套管理的方针政策、制度和办法，加强了机器设备的成套工作。

1961年，国家为了迅速发展冶金工业，提供生产航空、导弹、原子能和电子工业所急需新型材料的设备，要求机械工业提供：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辊宽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辊宽2800毫米铝板冷轧机；直径2—80毫米钢管冷轧机；直径80—200毫米钢管冷轧机；辊宽23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辊宽700毫米、20辊带钢轧机；1万吨油压机等九套大型成套设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君毅建议并即获准调沈鸿同志主持此项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怀下，经过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等有关工业部门及其科研院所和许多企业的协同努力，九套大型设备的主机与辅机，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以及在时间进度上互相配合衔接，花了七年时间，终于完成任务。九大设备制造成功是认真贯彻毛主席务必搞好“成龙配套”大力协同的指导思想的结果。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具备提供大型现代化冶金、矿山、化工、能源、交通运输以及重大建设工程等所需的成套设备的能力；而且也已经能够进行成套设备的出口，例如我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成套”出口电站设备——从设计、制造、运输、安装、调试直至交钥匙运转发电。

大跃进期间，机械产品也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严重问题。毛主席当时对工业产品质量问题非常关注，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质量第一”这个重要方针。他说：“数量不可不讲，把质量提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部党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整顿企业生产秩序，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检验，并召开电话会议，由道涵部署提高产品质量工作；1961年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工业七十条》，在部召开的全国机械厅（局）长、直属厂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求全体职工必须树立毛主席指示的“质量第一”的思想，并对提高产品质量工作做了具体安排。经过30多年的实践，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愈益体会“质量第一”方针的重大现实意义。只有坚韧不拔地贯彻执行“质量第一”的方针，采取重大举措，有步骤地解决当前众所关注的工业产品质量问题，我们才能真正有能力、有资格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从而较快、较好的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七、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1958年，毛主席找几个部的领导同志谈话，到会的有：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的同志。主席问：彭涛（化学工业部部长）怎么没有来？回答说：到十三陵劳动去了。主席说：“哟！尚书还去劳动！历史上应该写一笔呀！”

多年以来，毛主席总是谆谆教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勤奋学习，“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要学

经济，学技术，学管理，不作官僚主义者、甚至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毛主席曾多次到机械工厂视察，1950年他从苏联归国，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1953年视察天津机械厂；1956年1月视察天津第一机床厂，看到工人创造性地解决了丝杠变形问题时说：搞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1956年5月，视察广州重型机器厂；1957年7月视察上海机床厂；1958年2月，先后视察沈阳213机床电器厂和长春第一汽车厂；同年9月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1960年3月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1961年5月，毛主席到上海电机厂，和全厂职工一起欢渡五一劳动节，认真听取了制造双水内冷发电机的汇报，主席非常高兴，赞许职工艰苦奋斗、不断创新的精神。毛主席视察工厂，总是深入了解情况，和有专门知识、有经验的人研究探讨问题，并给予指示，他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亲切交谈，广大职工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1961年3月，经毛主席倡议，中共中央发出认真调查研究的信，要求县级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要联系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入基层，亲自进行系统的调研。部党组认真学习，积极贯彻。君毅和党组其他同志每年都到基层了解情况和蹲点，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先后提出《关于机械工业七十条（草案）》、汽车托拉斯的方案，和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建厂设计能力3万辆提高到6万辆的改造方案。今天想来，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与职工、专家谈心、请教，很受教育，并且深感毛主席教导的英明正确。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不断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全国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之际，回首峥嵘岁月，展望光辉未来，可以预期，21世纪的更加繁荣昌盛的中国，行将展现和屹立于世界人民面前。

## 领袖情——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的片断回忆

方志纯

毛泽东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他叱咤风云的一生中，和许许多多的人有过接触，有过交往，给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有幸曾和毛泽东同志接触，有幸曾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温暖。

### 一、“你们那里好得很嘛”

这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我在江西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1933年初，中央电令在赣东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红十军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我随军到了黎川一带。

接着，我和邵式平同志受赣东北党组织和方志敏同志的委托，带着汇报材料和中共赣东北省委的报告，从黎川出发，前往党中央所在地瑞金汇报工作。

我们到了瑞金城，来到中央机关，向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同志汇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已从上海迁到了瑞金。

在博古同志办公室，我们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便将汇报材料取出，送到博古手上。

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央汇报工作，所以材料写得比较详细，比较长。博古接过厚厚的一迭汇报材料说：“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我年轻气盛，心里就冒火了，当即顶了过去。邵式平同志见我越说越激动，连忙拉了我一把，然后用一种调解气氛的平和口气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办公室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决定还是找毛泽东主席去。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是感兴趣的。早几年在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就这样称赞过我们：“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中间也包括对我们赣东北根据地的充分肯定和科学总结。

“走，找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商定，找毛主席汇报去。

我们向毛主席住地——沙洲坝走去。一路上，我边走边想：毛泽东，我早在大革命时期起，就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响亮的名字，可是却一次也没有见过面。毛泽东是个什么模样的人呢。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毛主席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主席，得知有人前来找他，立即高兴地走了出来。啊，我心目中十分崇敬的毛主席，今天终于见到了您！

毛主席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射着深沉、睿智、温暖的光芒。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

我们走上前去，向毛主席作了自我介绍。这时，毛主席用他那有力的双

手，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欢迎，欢迎。”然后拉着我们进了屋。

一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我们初次相见时的紧张心理。我们告诉毛主席，红十军已经调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毛主席听了，感到有点惊讶：“哦……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这时，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的政治、经济问到历史、地理，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为了叙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怎么？不谈呐？”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毛主席站起身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毛主席把我们送到门口，他凝望着夕阳映照下的根据地的大好河山，饱含感情地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多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多谈一谈。”

毛主席握着我们的手，沉思片刻，意犹未尽地说：“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问我们：“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我们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然后又关切地问：“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我们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营）、大队、中队（小队）。至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

汇报到这里，我们有些担忧地说，这次红十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新红十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

毛主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象看见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是指示我们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跳到根据地外去打，而不要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认为在敌人对我们实行大筑其“乌龟壳”的策略面前，没

有大炮是不行的，总想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因此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枝，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一仗再说吧！”毛主席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然后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嘛？”毛主席这一番话，使我们的思想终于豁然开朗，亮堂了许多。

旋即，毛主席回到座位上。这时，话题开始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我们把红十军干部、战士当前的思想动向作了汇报后说：“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我们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们回答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我略带气愤地向毛主席反映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他一顿克呢。”接着，我们便把在博古同志那里汇报时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严肃地说：“这就不对喽。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毛主席这种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弋横暴动时，毛主席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我们说有。有人遇到挫折，就想埋枪逃跑，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

当我们谈到红军打下了景德镇时，毛主席高兴地接着我们的话说：“我晓得，我听到你们打下景德镇的消息很高兴。景德镇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打下它影响大着嘞！”

当我们谈到红军的作战原则“扎口子、切尾巴、吃补药”等办法时，毛主席开始没听懂，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便向主席解释说：“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切尾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打小仗，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好得很，生动活泼！我们这里也总结了十六个字。”

我们说，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更全面、更科学。这次我们到中央苏区来，就准备好好学习，带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谦逊地说：“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都要互相学习。”并问邵式平同志，“你学过军事没有？”邵式平同志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吏地的。”

毛主席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当我们汇报到敌人烧了群众的房子，我们军队便帮群众盖房子的事时，毛主席又站起来，郑重地说：“很好，应该，应该。这一条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到哪里也不忘为群众做好事，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之师。”

在汇报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非常关注，并给我们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在谈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时，毛主席幽默地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垵要塞。毛主席插话说：“这里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我们接着告诉毛主席说，我们在马垵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主席听后，表扬我们说：“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嘞！可就是这么一些人瞎指挥！”

最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鼓励我们，叫我们把赣东北根据地建设得更好。毛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选到了罗霄山脉中段……”我们也说，我们暴动选了好久，最后选到了弋横这块地方。这地方东接浙江，南通福建，北连安徽，西达南浔，是四省的咽喉之地，是反动派统治的薄弱环节，群众基础又好。同时，这地方偏僻，四周多山，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磨盘山等等，地理环境优越。

毛主席听了，不住地点头说：“这地方好，很好嘛！”毛主席露出满意的神色说，“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毛主席的亲切话语，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我们满怀深情地告别毛主席，回到了部队。不久，即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投入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大家满以为马上可以回赣东北了！可是由于王明路线的统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未能得到贯彻，同志们回赣东北的愿望也就没有实现。

红十军被留在中央苏区并改编为红十一军了！

我们浴血奋战亲手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我们日日夜夜思念的赣东北根据地，由于失去军队的有力支持，在王明路线的瞎指挥下，不断被削弱，最后终于被断送。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教训啊！

二、“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

延安，革命的圣地，战士心中的一盏明灯！

1937年10月间，我终于踏上了这块梦魂牵绕的土地。

风，裹着高原的黄尘，一阵阵呼啸而来，冷嗖嗖的。但是，我们全然不觉得寒冷，以至忘了自己身上穿的还是南方带来的单薄衣服。也许是年纪轻，血气方刚；也许是身上有一股奔涌不息的革命热情，一踏上延安这块土地，

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温暖如春的世界。

殊不知，来到延安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还是1933年那次我和邵式平同志在瑞金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我们原以为一打完仗就可以回赣东北。那知，第四次反“围剿”一结束，中央组织局的同志就找我们谈话，另行分配了我们的工作。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大部分被调离，邵式平同志调闽赣省苏维埃负责，先搞筹备工作；我调任红三十一师政委、黎川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黎川中心县委书记。

接着，我们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仗越打越糟，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当时，我被留在南方工作，直到“西安事变”以后，才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

到延安不久，我就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了。

有一天，毛主席来党校讲课。课间休息时，毛主席来到学员中间。本来，我想走上前去向毛主席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我，因为我和毛主席只是在瑞金汇报时接触过一次，时间又隔了这么多年，哪知，毛主席居然还认识我。他很快发现了我，并且主动和我打招呼。我赶忙向前跨了几步，来到毛主席的跟前。不等我伸过手去，毛主席却早把手伸过来了。他用力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我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异常兴奋地回答。这时，毛主席又告诉我说：“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毛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随邵式平同志在瑞金向他汇报的事，显然他还记得。我说：“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接着又叮嘱，“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好，好。”我连声答应着。

我知道，毛主席对我们赣东北的干部，对我们赣东北这块根据地是非常关心的。就在我们瑞金那次向毛主席汇报后，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又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表扬、鼓励和指导。毛主席高兴地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业、农业、贸易、财经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和亲切的鼓励。

自然，我们赣东北的干部对毛主席就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此刻，当我听到毛主席要我到他那里去谈谈这句话时，激动不已，心里充满了快愉。是啊，我有多少话想跟毛主席去说啊！自从在瑞金告别毛主席后，我即投入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在江西的密林里，在闽赣的丛山中，在反“围剿”的激烈战场上，在游击战的艰难岁月里，我是多么想念党，想念毛主席啊！可是，此刻，我又想，毛主席那样忙，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啊？我的心情一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

没想到，毛主席倒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上。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四点多钟，我随李富春同志兴冲冲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自到窑洞门口来迎接我们。毛主席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显得很有精神。

进到窑洞，毛主席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这是一个四壁简陋的窑洞，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室内有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几张椅子。方桌上摆满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纸、笔、墨、砚等。

待我们在椅子上落了座，毛主席关切地问我：“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习惯！”我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这就好，四海为家嘛！”毛主席笑着说，“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望着毛主席，点了点头。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我心情沉重地说。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主席语调凝重而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毛主席的话语，更触动了我的情绪，我有些激动地说：“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十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主席打断我的话，无限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十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该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我忿忿地说。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主席沉默片刻之后，关心地问道：“现在赣东北怎么样？”我告诉毛主席说：“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接着，我们谈起了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始终关心着这些同志们，他知道我也惦记着南方的战友，便将南方的几个主要游击根据地的情况，给我作了介绍，并预言说：“‘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

最后，毛主席关切地问我：“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对毛主席突如其来的问话，我一时无言以对。想干点什么工作？老实说，我心中一点底也没有。我当时倒是很想得到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因为，我从1924年投身革命以来，几乎整天都是忙于工作，忙于打仗，条件恶劣，环境艰苦，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学习，读点书。而在参加革命前，又由于家境窘迫，只读到小学就辍学了。眼下对自己来说，似乎最需要的是坐下来读点书。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抗日的烽火已点燃，紧张的战斗在召唤。

毛主席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意识到我有什么话想说，或者是有顾虑，或者是胆怯，因而不敢开口。于是，他鼓励我：“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态度，打消了我思想上的顾虑，于是我便把心里的想法端了出来：“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主席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

高认识。”说到这，他又对坐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李富春同志说，“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李富春同志说：“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暮色降临，夜霭低垂，我们起身和毛主席告别。这时，毛主席紧紧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毛主席的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没料到，我的想法，竟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我挥手和送我们到窑洞门口的毛主席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温暖的窑洞。

以后的事情，真叫人高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我结束在延安党校的学习后，又被派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三年。要求如愿以偿，机会千载难逢。我从内心感激党、感激毛主席！

### 三、“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啰”

久违了，延安，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我是1938年春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的，1941年结束在苏联的学习，取道新疆回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逗留期间，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无理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7月间，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在延安，我们全体同志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为了照顾我们的身体，党中央还决定让我们安心休养三个月。这期间，根据中央的指定，张子意、马明方同志和我对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向刘少奇和中央组织部的几位领导作了汇报。我还代表狱中党支部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忙完了一阵子之后，我单独去拜谒了毛主席。这次见面，毛主席比较详细地询问了新疆监狱中的一些情况，询问了毛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毛主席告诉我，朱旦华同志已经带孩子来过他这里，关于泽民同志牺牲的情况已陆续听到一些，他想问问我还知道一些什么情况。

我告诉毛主席，我和泽民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就熟悉。在新疆我们又相逢在一起。据我所知，泽民同志在新疆是工作得很出色的，盛世才反动政府对他又恨又怕。1942年9月的一天，盛世才突然下令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又将他秘密关进了监狱，并进行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决不脱离共产党，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间残忍地把他杀害了。

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了。看得出，毛主席的眼圈，这时也红润了。然而，毛主席却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劝说着我：“不必太难过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

是啊，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解放，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啊！光毛主席的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当时已有好几个人……我想，烈士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的！

最后，我把在苏联学习的情况简单谈了谈，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接着，毛主席问起了他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时的表现：“岸英、岸青怎么样哇？”

“很好哇！”我告诉毛主席说，开始时，这两兄弟和我们在一起，由任弼时同志安排他们学习文化。后来，他们离开我们，到苏联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去了。据说，他们俩学习都很用功，成绩不错，反映很好。特别是岸青，真聪明，参加音乐晚会，歌子听人家唱一遍，他也马上就会唱会弹。

“你过奖了，别跟他们吹！”毛主席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我知道，毛主席对自己的孩子一向要求很严格，不喜欢别人替他们吹，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怎么是吹呢？但这样的事，当然不好与主席争辩，于是，我喃喃地说：“主席，岸英、岸青确实表现不错……”

毛主席嫣然一笑，掉转话题问我道：“这么多年没有回老家，家里的情况清楚吗？”“不太清楚！”我回答说。毛主席神情庄重他说：“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我沉吟片刻，记不起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人，便回答说：“我家没这个人。我1933年初离开赣东北时，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毛主席凝神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这个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还贴出了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

“啊……”我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主席，显得有些茫然。

——多少年，我一直把这件事铭记在心中，直到解放以后，才搞清事情的真相：有一次，我碰到倪南山同志，谈话间，我向他打听起“方志诚”这个人来，因为倪南山同志是红军北上抗日，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有没有“方志诚”这个人，他应该知道。我问道：“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叫‘方志诚’的？”“没有哇！”倪南山同志回答说。“怎么没有呢？毛主席在延安还问过我嘞！”我告诉他。倪南山同志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我说：“啊，有，有！有个方志诚，那就是你呀！”

倪南山同志见我很惊讶，便笑着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一再叮嘱我把身体养好，准备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纷纷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担任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47年春天。初春的陕北高原，还是千里冰封的时节。这是一个晚霞绚丽的傍晚，我们陪毛主席在延河边上漫步。

刚走几步，毛主席就收住脚步，把脸转向我，问道：“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哇？”我知道，毛主席问的是我们部队对撤离延安的看法。当时，胡宗南正调集兵力大举进攻延安，延安中央机关、学校和驻守部队的家属、小孩已经陆续撤离，看样子整个中央机关和驻守部队马上也将撤离。同志们都清楚，我军历来的战略思想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要放弃延安大家是想不通的。我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说：“部队有情绪，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延安，同志们认为，丢掉延安影响不好！”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舍不得？不就是几眼窑洞、坛坛罐罐嘛？”毛主席轻松地一笑，幽默地说，“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我疑惑地望着毛主席。

“我们放弃贫瘠的延安，让罗贵波同志在晋东南好搞一块肥肉。这不是

丢块骨头换块肥肉？”毛主席解释说。

“不过，延安可是块硬骨头嘞。胡宗南想啃这块骨头，是不好啃的呐！搞得不好，可要崩断他的牙齿，或是哽住他的喉咙呐！”毛主席风趣地说着，轻松地迈着步子。

听着毛主席的精辟的分析和风趣横生的比喻，我很快就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毛主席的话就像他写文章一样，他可以通过一两个形象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很通俗地表达出来。毛主席继续说：“我们准备放弃延安，引胡宗南进来。要告诉同志们看得远一些，想得透一些。”

毛主席停下步来，眺望着晚霞辉映的延安城。他那饱含深情的双眼，似乎有点湿润。看得出，他虽然劝我们对放弃延安要想得通，但一旦真要放弃延安，他自己也是恋恋不舍的呀！

放弃延安，战略撤退，胡宗南一进来，延安可就要受蹂躏了，我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声：“这该死的胡宗南？”

“怎么，你不喜欢胡宗南！”毛主席脸上恢复了平静，微笑着幽默地问我，“你不喜欢胡宗南来延安城！”“当然不喜欢！”我不加思索地说，“您也是不会喜欢胡宗南真来延安的。”“不，我喜欢。我巴不得他早点来，来多一点人才好呐！”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略带忧虑地说，“胡宗南如果是聪明的，就不会来；如果是愚蠢的，就肯定会来，他要真不来，我还要想办法请他来呐！”

听毛主席这么一说，胡宗南要是真的不来延安，我们这“骨头换肥肉”还换不成呢，刚才我还怕胡宗南进延安，现在也有点愁他不来了。毛主席见我真的犯愁了，便笑着对我说：“你放心，胡宗南貌似有点小聪明，其实是个蠢家伙。”毛主席顿了一下，右手用力一劈，作结论说，“反动派都是愚蠢的！”“引胡宗南进来，关起门来打狗。”我体会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此仅其一。”毛主席指出，“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牵制敌人，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让他们按我们的意图走。”“胡宗南进犯边区后，我们不要立即切断他的后路，要让他多进来一点。同时，也不要急着打他。我们要拖住他，跟他打蘑菇战。要知道，胡宗南可是三十万兵啊，拖住他，就可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毛主席分析了刘邓大军挺进黄河以南的战略意义，同时又为他们担心。他说：“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向大别山挺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历来是兵家一忌。可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们还是勇敢地向敌人后方挺进了！”

毛主席登上一个小土坡，凝视着远方，似乎是在注视着全国战局，怀念和祝福着战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多拖住胡宗南一个兵，就给刘邓大军减少了一分危险，他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挺进大别山，打开新局面！”

啊，原来是这样！毛主席这一席话，使我又一次亲身感受到毛主席那博大的革命胸怀，超凡的战略眼光，又一次打心眼里钦佩毛主席的伟大牺牲精神：为了实现刘邓大军的战略转移，为了解放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宁愿自己多拖住些敌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以减轻战友的负担。

#### 四、“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

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央社会部机关驻地——北京西郊青龙桥一带的东北义园，乘坐吉普车，直驶西山。我的心情有些紧张，情绪有些激动。因为，我马上就要见到毛泽东主席了。虽然，每次见到毛主席，难免有些紧张和激动。但是，今天的心情却有些异样，有些难以抑制，因为这是我

即将离开中央机关，向毛主席去辞行啊！以后，就不知要隔多久才能见到他。

我知道，决定我到南方去工作，这是3月份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中央机关组成了南下工作团，其中包括由我负责的、大约六七十人组成的南下江西的这支队伍。

但是，当时没有立即向我发布南下的命令，我仍滞留在中央机关待命。因为，西柏坡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还很猖獗，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情况比较复杂，局势还不稳定，而我们中央社会部面临的任務相当繁杂，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陈刚执意要把我留下，并请求中央暂时不要下达命令。到了五六月间，才命令我们南下，并任命我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民政厅厅长。接到命令的几天来，我一直处于紧张、兴奋之中。我一面移交工作，一面抽空去拜访领导和同志们，向他们辞行。毛主席的工作那样忙，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搅他。但是，我又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况且，从我所面临的新的工作任务来看，也有必要向毛主席请教，面聆他的教诲。

工作人员把我引进了一间简朴的会客室，说“主席还在休息，你在这稍候一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毛主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用他那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叫你久等了把？！”见到毛主席走过来了，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起身讷讷地说：“不，刚到的！”

毛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很宝贵，我把想说的话浓缩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

“哦，晓得，晓得。”毛主席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主席跟我很熟，我仍显得有些拘谨。

“嗯……”毛主席沉吟了片刻，递给了我一支烟，同时又点燃了他手中的烟，接着便说开了：“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啰！除台湾、海南岛和西藏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说到这，毛主席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接着，毛主席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主席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我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主席接过我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工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

“我担心……”我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主席鼓励我说，“只要善于学习就

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我点头回答着。

毛主席继续鼓励我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喇，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主席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教育，增添了我不少信心和勇气。于是，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请放心，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永不脱离群众。”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江西省委的主要组成人员身上，当时，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率领的声势浩大的南下工作团，早已抵达江西，并开始了工作。中央决定，由这些负责同志再加上我，组成江西省委。毛主席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啰，要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

谈话结束了，我眼含热泪告别毛主席，驱车赶回驻地机关。这时，我的心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国，飞向了可爱的故乡。但是，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却依然萦绕在心中。我陶醉在幸福之中。五、“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嘞？”

1959年6月29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从九江港的码头，把毛主席接上了汽车，然后趁着熹微的晨光，沿着登庐山的公路，缓缓驶向峰顶。

公路崎岖，九曲十八弯。山道险峻，车队飞舞盘旋。

庐山象个谜。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汽车驶到半山腰，水箱里的水滚沸了，司机小高说需要停车加水，顿时，几部汽车都停了下来。

这时，毛主席推开“吉姆”牌轿车门，轻捷地下了车。他没有吱声，沿着上山的公路，往前迈着矫健的步伐。大家随后而行。走了一段路，毛主席停下脚步，侧转身，反剪双手，举目朝山下远眺着。啊，长江如带，鄱湖似镜，苍穹辽远，大地翡翠……事后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正酝酿着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7月1日写成的七律《登庐山》。

片刻，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我们：“有什么吃的吗？”

这一问，弄得我们有点发窘。原计划，在九江吃饭。可是，毛主席一登上九江码头，就又马不停蹄地上山了。我们只好改变计划，上山后吃饭。是啊，主席工作了一个通宵，怎能不饿？可是这半山腰又哪里能找到吃的？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之时，有个工作人员给解了围：“我那里还有点水果。”

这吮，加好水的汽车已缓缓开过来了。汽车盘旋而上，终于安全驶达目的地。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毛主席被安排住进了东谷“180”

号院。

与此同时，我们还先后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迎上了山。我作为这次会议会务和保卫方面的负责人之一，事情特别繁杂、责任特别重大，自然也就特别忙碌了。

会前，为物色保卫、交通、戏剧、医务、招待、烹饪、理发等方面的人员，曾进行了一番紧张、细致的严格审查挑选工作，又对庐山一栋栋别墅进行了极为缜密的检查、清扫和整理，对整个庐山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精心的部署。

等到中央首长全部上山以后，我又挨家挨户地了解住宿、伙食、安全保卫、娱乐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这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跑一遍整个桔岭，而“180”号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是经常要去的。但我一般都是和毛主席的工作人员接触、攀谈，毛主席工作那样忙，我很少去惊动他，偶而遇上毛主席，他便要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有时我问到毛主席“睡得安静吗”、“伙食怎么样”时，毛主席总是满意地笑着说：“很好，很好！”

其实，我很清楚，毛主席睡的是普普通通的木板床，吃的也是普普通通的家常饭菜。每餐，一般都是一小碗汤、四小碟菜，两劳两素，无非是茄子、苦瓜、豆腐豆芽，有时，红烧肉、河虾之类轮着吃。而辣椒，则是他哪一餐都离不了的。而且总喜欢吃红锅煎的，不喜欢吃用油炒的。他说这样煎的辣椒，又香又辣又省油，好吃！工作人员很有意思，有几回还悄悄地捉来几只麻雀，给毛主席尝尝鲜。

这次上庐山，毛主席和往常外出一样，带来了许多书——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好习惯。他的一生，不知读了多少书。马列经典著作、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包罗万象，他都涉猎。《红楼梦》、《水浒》之类的书，他都读了几遍。

记得在延安时，我就曾看到毛主席有不少藏书，还有专人管理。1947年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别的东西都舍得丢，就是书舍不得丢，千里转战，百般珍爱，一直把那些沉重的书带到了北京。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工作，都要叮嘱工作人员，把一些急需的书带上。

读书，成为毛主席生活的一大乐趣，更成为他一种独特的工作方式。毛主席外出每到一地，除了到人民群众中作调查外，还总要向书本作调查，从书本中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知名人物。

为了给毛主席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看书的环境，我们在东谷“180”号，按照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在室内摆上了几溜书架，对原有的床、写字台、茶几、小圆桌的布局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不等毛主席走进房间，工作人员早已将携带的书籍和文稿，井井有条地摆在了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

尽管毛主席带来了这么多书，但还感到不够用，急着要看的书，就嘱我们尽快帮他借来。记得，我们帮他借的书中，有清朝同治年间修的《临川县志》、《铅山县志》、民国年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以及《临川四梦》、《桃花扇》等等。这件事给予我的印象真是太深刻了！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又已年过花甲，还以极大的兴趣挤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实在令人敬佩。

有一天，我象往常那样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坐下来，毛主席就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起了读书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给我借来这么多书。”接着，他掉转话题说：“读书是很有兴味的。一个人只有多读书，知识面才能宽。”

我聆听着毛主席的教诲，不时地点点头。

毛主席很了解我们这些干部的情况，他体贴地说：“当然啰，你们担负的工作很多，确实很忙，坐下来读书有些困难。这就要看你会不会挤时间啰！”

毛主席说到这里，神情有些严肃起来，他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总之吧，要想办法多读点书。治国安邦，不读点书，怎么行呐？”

当谈到读什么书时，毛主席说：“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除了马列的书外，还要读些历史书。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领导者，知道一点历史有好处，可以学习历史的经验嘛。”他又补充说：“当然啰，历史书也有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去评判。”

谈着谈着，我突然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忙，不应过多地打扰，便准备起身告辞。这时，我又想到，还应借这个机会征询一下毛主席对文艺活动的意见。我说：“主席，我们剧团演的戏怎么样？”

话题转到这里，毛主席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说：“你们省赣剧团演的那个《还魂记》，我看了，演得很好嘛！它是明朝汤显祖写的。汤显祖是你们江西临川人，人称东方的莎士比亚。除了《还魂记》，还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统称‘临川四梦’，写得都很好。你看过没有？”“没看过”，我如实地告诉主席说。

“嗯，历史书还是应该多看一看，包括这类古籍，很有意思！”接着，毛主席又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

毛主席沉思了片刻，忽然问道：“你们赣东北的铅山有个费宰相，晓得不晓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位“宰相大人”，又有点发窘。毛主席见此，便把这个人的情况简单和我说了一遍，并告诉我说：“这个人死后就葬在铅山县。”

我像听一个新奇的故事，听着毛主席的讲述，又一次为毛主席广博的知识所感动、所钦佩。后来我查了铅山县志，发现果真有此人，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宰相，姓费，名宏，字子充。费宏在世时，三次入阁，终年六十八岁，死后葬于铅山，传说其墓地原有石人、石马等石雕，还有石牌坊。一次，我路经铅山时，特意到了离河口约十几华里的费宏墓地察看，原来仅存墓室，牌坊、石雕已荡然无踪。

毛主席接着又说：“江西有的县，不是流传‘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的说法嘛，铅山这地方就有这样类似的说法”。毛主席说到这里，站起身，有些感慨地说，“铅山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你们江西大部分地方我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赣东北，有机会我是要去的。”“非常希望主席到赣东北去视察！”我站在毛主席的跟前，心情激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还和我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和我有过多次接触。这里记下的只是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记忆犹新的零碎事情。后来，我还时常想起和毛主席相处的往事，时常想起毛主席对我的关心，脑海里常常浮现他老人家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耳畔常常回响他老人家亲切的话语、谆谆的教诲，领袖情，同志心，终生不能忘怀。



## 谆谆教导殷殷情怀

江渭清

恩格斯曾经称颂马克思：“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我以为，用这个意思称赞毛泽东同志也是恰当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并开创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他的光辉思想体系及丰富社会实践，不仅为我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有口皆碑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极其宝贵的不朽的精神财富。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纪念他——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巨人。

我长期在江苏工作，建国后毛主席先后来江苏 20 余次，我有机会聆听毛主席对我们省、市各项工作所作的多次指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现作片段回顾，谨以此文表示对他老人家深切的纪念。

1949 年 4 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指挥下，我们第三野战军的第八兵团率先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城，七、九、十兵团攻占了上海、杭州、福州等城。第二、第四野战军一鼓作气乘胜南进、西进，解放全中国；我和一部分领导同志奉命留在南京，负责接管刚刚解放的这大大都市。

是年 9 月，我作为第三野战军的正式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事。会前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在北京饭店大厅里与我三十年代就打过交道的张治中先生一起，陪毛主席散步、聊天。那天主席兴致勃勃，笑哈哈地听治中先生讲当年我俩在长沙谈国共合作的故事。我也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主席还是在中央苏区瑞金的往事。主席说：“是啊，那时的政权只是几块根据地，是全国政权的雏型，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几天后，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五十年代初的江苏开始并没有行政省的建制，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区，徐海地区属山东管辖，而南京是中央的直辖市。当时，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刘伯承同志，副书记是宋任穷、副市长是柯庆施，我是市委副书记兼总工会主席。二野向西南进军后，接替刘伯承、宋任穷同志的是粟裕和唐亮同志。刚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政权，执政党肩上的担子是非常沉重的。作为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繁重的公务活动。

解放后的头三年，还是经济恢复时期，我们逐步在旧中国留下的落后、停滞、几乎濒临崩溃的破烂摊子上恢复、改造、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在百忙的工作中，仍然非常重视和关心南京市的各项工作，因为南京曾是“虎踞龙蟠”的六朝古都，又是原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在海内外的政治影响太大，全世界都在瞩目，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能否管理好象上海、南京这样的大都市。主席对南京的工作曾多次作重要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市委一班人，务必用革命的干劲、科学的态度，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将南京这座臃肿、膨胀，为官僚消费服务特点的城市，变为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这个观点，他不仅在会议上讲，还给我

们发过文件、电报。

改造、建设南京城，这是党的事业也是光荣艰巨的任务。当时市委负责人中，我是分管总工会和工业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副书记。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首先将苏北、皖北流落在南京的 20 万贫困农民趁土改之际疏散回原籍，参加分配土地和生产。处理散兵、“游勇” 10 万回各省安排，妥善安置娘姨、奶妈、孤儿及娼妓 10 万人，这样一来安定了民心，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环境。当时，市委分工由我负责组织一批同志下基层，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国民党的堂堂首都、号称大都市的南京城，被蒋介石统治管理了二十多年，全市的产业工人只有万把人，基本上没有象样的重工业，虽然有些电讯工业，也纯系修配性质的，而工业产值仅有八、九千万元（旧币），实在是可怜可悲得很。

怎样才能使南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大城市呢？我们决定乘当时刚开始抗美援朝的大形势，首先发展有线电、无线电、电瓷、通讯、机械等工业项目，边生产边支援朝鲜前线；同时，也逐步建立起化学、纺织、食品、建材、五金、汽车等轻重工业。为保障这一决策的有效实施，我们从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反复挑选，派出一批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去担任几家有名的大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如槐亚东、李乐山、杨益林、冯伯华等同志就是我们最早派去搞电子通讯和化学、机械工业厂的领导人。我们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团结使用了一大批有知识、懂管理、通技术、精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初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大工业生产终以崭新的面貌开动起来了。三年后，南京市、苏南和苏北行政公署合并，成立了江苏省，南京被划为省会城市，当时我调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样，因工作关系直接听到毛主席指示和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主席始终不渝地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这的确是泱泱东方大国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主席曾对我们讲，要求得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在全国、各大区、各省都要有结合地方特点的合理工业布局。根据主席的这一思想我们省委也反复考虑在传统的农业大国如何去体现“以工业为主导”，又怎样来布局江苏地方工业的问题。后来这些都在我们江苏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做出了答案。有了头三年经济恢复的良好基础，我省决定大体上苏南以发展轻工业基地为主，苏中、苏北以发展粮油食品加工业基地为主，而南京市和徐州、海州则以发展重工业基地为主。经过五年的努力实践，据 1957 年底统计，全省的工业总产值已达 32 亿多元，比 1949 年底南京市加苏南、苏北和徐、海合计数增加了近三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展。就其中的汽车制造业来说，南京的汽车工业在五十年代已跃居全国之首。主席曾提出，要东北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厂长去南京汽车厂学习，当一年副厂长，认真学习他们的设计、工艺及生产管理经验。

毛主席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博古通今，深谙中国国情。新中国建立后，主席曾用了大量精力关心和指导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事业。他老人家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要特别注意农村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达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主席的这一思想，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早在 1950 年 8 月，毛主席就对淮河的治理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请周恩来总理布置江苏、安徽、河南三个省的省委，要把治淮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他

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后来，我陪同主席在苏北地区视察时，他又当面向我交待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的，深知农民的疾苦，不首先解决其温饱问题，几亿农民怎会拥护我们？历代苏北、皖北水患严重，农业落后，一月无雨就旱、一月三雨便涝，要彻底改变这种面貌，必须先从水利着手，解决命脉问题啊！主席的指示真是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我们江苏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组织班子，发动群众，具体实施，打赢了一个又一个水利战役。如：治理淮河、拓宽运河、导沂整沭、疏浚入江水道、修建大型河闸、建设机电排灌网等等。党和政府有关兴修水利的决定，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江苏大地，尤其是苏北农村，千百年来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天灾人祸不迭，民众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号召全党重视农田水利工作，首先解决几亿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确实具有无比的感召力。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用智慧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在与天斗与地斗中焕发出冲天的干劲，体味着其乐无穷的哲理。有许许多多战天斗地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亲临过现场的人必将终身难忘。就说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吧，五十年代初全面开工，西起洪泽湖、东至黄海边，全长 336 华里，沿渠 18 个县的 72 万民工，仅凭着手挖肩挑，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土方 7320 万立方米，胜利竣工。这在当时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应当算是个奇迹。加上不久又竣工的新中国第二大闸三河闸，可使里下河地区 1500 万亩农田免除洪涝灾害，加上其他配套水利工程，可灌溉苏北 2580 万亩农田，这些都是治理淮河最关键的工程，在国际国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许多友好国家曾派代表团前往参观学习，对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短时间内就有如此巨大的改观表示由衷的钦佩。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实践又一次证明，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一旦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就产生了治好淮河的巨大物质力量。

主席多次来江苏视察，我作为省委班子的班长也多次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听从教诲。可以说每一次与他老人家谈话，都少不了要谈农业，谈粮棉油，谈农民生活的改善。他说，江苏应该是产粮大省，逐步解决了水利问题后，就要紧抓科学种田，粮、棉、油、猪、麻、桑、茶、蔬等 12 个字都要讲科学。他老人家自己就用时间钻研植物栽培学、土壤学、植保学、肥料学、种子学等科学知识，并要求各大区的书记、各省的书记这些高级干部也要学。主席每到一地视察，常会给当地的领导干部出题目考试，题目看起来很简单，例如：如何种植小麦、水稻？如何进行棉花的播种和田间管理？有时算起细帐来令人吃惊。我记得他就考过我几次，有一次是问我一亩棉大约要种多少株棉花？一株棉花大约有多少棉桃？我因为曾向农业专家请教过，并啃过几本农业科学知识的书，所以那次答题使主席比较满意。他最恨不爱学习和不懂装懂的领导干部；他习惯鼓励、启发领导同志努力掌握科学知识用以指导工作。谁要是在他面前公然说假话，一经发现，必遭批评，而主席平时是很少发脾气的，总是循循善诱的。

五十年代后期，毛主席亲自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他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各地基层作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是当时科学种田经验的高度总结。全国广大农村，在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后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农业生产都会有所发展。大凡年长一点的同志都会记得，毛主席一贯要求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实践、实效，他当年就提倡各地党委书记都要亲手种植试验田，用自己动手、亲身体

验的方法来取得发言权，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他老人家虽年事已高、日理万机，但也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的院子里开了一块地，亲自种上粮食和蔬菜。我们省委的许多负责同志，以及地（市）、县的领导同志们，当年也都这样做过。干任何工作，没知识、不懂行，又不肯学习，就一定干不好；是领导干部，就免不了要说空话、瞎指挥；这样的人说得越多、指挥得越起劲，其损失就越大、后果就愈严重。这早已成为一条沉重的历史教训。

我们的南京城是座美丽的城市，除去古迹名胜以外，她的植树绿化也是闻名于海内外的。由此，我又想到了毛主席对我们江苏城乡绿化造林工作的多次关怀。1953年2月下旬，主席在陈毅、罗瑞卿同志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当时我们正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省、地、市、县负责同志，并讲了话。第二天，会议照常举行，我陪主席一行去中山陵谒陵。时值初春，天气寒冷，但出了中山门，看到一排排整齐挺拔的法国梧桐树和雪松、宝塔松，老人家颇有感触，加之，他又去了紫金山天文台参观，登高望远群山苍翠，可俯瞰石城却是色灰一片。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都绿化起来呢？”接着又说，“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我说：“主席，请过几年再来看吧！”他笑了，“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两年后，毛主席在谭震林等同志陪同下又来南京视察，那次我随他一起去栖霞区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主席与农民群众交谈得非常高兴，当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过话题问我，“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我回答道：“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接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主席听了点头称是，末了只提出这里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我回答说，“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老人家听了很开心，“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还是做得很不够的。

自从毛主席第一次向我们交待了绿化南京城的任务后，我们省委就找了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们共同商量，最后决定：以法国梧桐为基本品种，带上雪松和宝塔松，三年育苗、三年绿化，让南京城区凡是能植树的马路，通道两旁，统统都美化起来。绿化的区域逐步扩大到郊区，也有种植白杨、垂柳、刺槐等品种的；而城区的一些新辟干道，后来也种上了雪松、宝塔松等大株植，并将生长期缓慢的矮小品种龙柏树、冬青树作为城市美化的点缀品。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了几十年，确有成效了；接着再搞几年，绿荫成行成片了。如今的南京城市绿化之所以蜚声海内外，历史地看，这离不开毛主席当年的远见卓识，也离不开南京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这使我想起了六十年代，全国评选绿化先进城市时，南京就已名列榜首了。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全国各大区及省、市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会间我顺带讲道：“前不久全国绿化先进评比，南京是第一，广州是第二，北京是第三，这样评似有不妥，我建议总理向主席汇报，是否应让北京市当第一，因为是首都城市，要考虑在全国的影响……”总理听我一说，哈哈地笑了起来，转过脸便对陶铸同志说，“渭清同志的这个建议是为顾全大局啊，我首先表示同意，那么你们广州的那个第二名，是不是应该让给江苏南京呢？”陶铸同志非常顾全大局，连声答道：“总理，应该的应该的，我完全赞成！”

再说五十年代，我还陪同主席视察过徐州，有一天，老人家兴致很高，我们一起登上了市郊的云龙山，那时山上刚开始搞淮海战役纪念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为淮海大决战中牺牲的烈士题了辞。云龙山是座高大的石头山又称作“童山”，除去少许杂草、灌木几乎不长树，主席见此景况皱起了眉头，说道：“渭清啊，你说这石头山上没有植被，能不能搞绿化造林呢？”我想了想，回答说，“世上无难事嘛！石山绿化一是可以搞人工植被来解决；二是可以在石头上打眼，再向洞眼石缝中填土，播柏树种和植小柏树苗，我看总是有办法的。”主席说，“那好嘛，就按你说的办吧。”我们一行下山时，老人家还叮嘱道：“这么大的一座山，荒秃秃的多可惜，我问过专家，种一棵树就可以含吸住一吨水，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又能美化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岂不一举多得。”后来，徐州的同志们对山况作了调查，云龙山石是大片石灰岩构造，不适应马尾松生长，只能种柏树，因为柏树能抗旱。有了科学性，加上领导和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号召，彻底改变了童山的面貌。如今的云龙山，早已柏树满山青翠一片，加之1958年又在山脚下挖了一片人工湖，水波粼粼湖光山色，大大美化了古彭城。我们江苏的广大干群，从自己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中加深领会了毛主席心中深违的思考，这是造福后人造福全人类的千年万年大计啊。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十七年了，他老人家生前20余次来江苏大地视察指导工作，在许多工厂、农村、学校、矿山、军营、机关都留下了伟人的脚印，他对江苏地区各方面工作给予了亲切的关怀，这段光辉的历史是我省人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伟绩，早已在十二亿中国人民心中铸成了不朽的丰碑。我们如今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就是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为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 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

陶鲁笏

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情地缅怀这位为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创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开创中国的社会主义宏业而奋斗终身的历史伟人。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12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现将我记忆中的有关毛泽东同志的几件往事记录下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同志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论述，我曾多次听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而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武昌会议和一次上海会议上的讲话。这四次会议我都参加了。而且都作了详细的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同志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同志先找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五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他停在郑州的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噢，还是老人手。”又问：“你们有什么新闻？……”会上，陈伯达汇报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时讲到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奇谈怪论，毛泽东同志听后沉默无语。

之后，其它省、市委的同志和中央部分同志相继分批来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本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并要我们联系实际用心读三遍。他还用了三天时间听取了各省、市同志的汇报。

10日清晨，大家被突然通知到一个小礼堂开会。一开头，毛泽东同志便气愤地说：“现在秀才（指陈伯达）要造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开课，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于是，他用一整天的时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这本书，驳斥了陈伯达的错误观点，对于斯大林著作中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有肯定和发挥，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针对当时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指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同时，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从现实出发，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商品生产是个经济法则问题。现在有些人，对于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积极意义毫不估计，避而不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现在我国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和巴西还落后。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

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你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你就要剥夺农民。农民有三权：生产资料权，产品所有权，劳动权。你只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就要剥夺农民这三权。现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产，你没有人民币怎么行！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俄国革命胜利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仍有保留。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想在我国废除商品，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同志只能是象斯大林所说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公社要扩大社会交换，要尽量生产能和本地、本省、本国和世界交换的东西。公社不能‘小国寡民’，要搞多种经济作物，要搞工业，扩大生产可交换的产品。农业人口可以减少一半，就地搞到工业中去。为什么要5亿人口搞农业？农业和工业要有一个大的分工。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商品、工资、价值法则、经济核算、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在目前阶段还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为了消灭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正如为了消灭专政而加强专政一样。商品，如斯大林所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货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包括拖拉机）、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这样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斯大林把拖拉机完全由国营拖拉机站垄断，不卖给集体农庄。赫鲁晓夫不是把农业机械卖给农庄了吗？农庄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嘛！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上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武昌会议。他讲到商品交换时，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是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个重大修正。”他说“生产资料归根到底是制造生活资料的”。他批评斯大林对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为了扩大积累，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竭泽而渔。他还针对有些同志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否定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主张，明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并且尖锐地指出，“一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物资）的“共产风”，是对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否定，是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是对农民的剥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左”的修正主义。

1959年2月3日至12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一中心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作了系统的阐述。在会上，我汇报了会前我在洪洞县蹲点时目睹公社干部把富队的粮食无偿调给穷队，富队社员愤怒地群起阻拦以至相互殴打的情景。当时我对县社干部说“队与队之间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不能强行拉平，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消灭差别，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道理一样”。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并强调说“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水平，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的过

程，也是人民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这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仍然是而且只能是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归公社所有，即公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此外还有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而已，希望也即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不但有大型机械，而且有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这样经过若干年，即可在所有制上，由基本上队有变为基本上社有。”

为了纠正“共产风”，毛泽东同志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当我作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向他汇报说“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时，他非常敏锐地指出“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毛泽东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14句话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他还说“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上海会议。为了继续纠“左”，会上产生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讨论过程中，我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个山西省县一级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14句话”方针的情况的报告。他看后当即加了《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署名写了“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的按语。他还在报告的6处写了批语，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我的报告中讲到运城县五级干部会议宣布将公社扣用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全部算清退还，社员们听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以此实例证明，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提出的旧帐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同志写了如下批语：“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作者注：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作者注：应为一个县）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这段旗帜鲜明的批语，尖锐地指出了价值法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怀。

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由于种种原因，在理论上没有继续深入的探索，在实践上更没有一贯地坚持下去。

温故而知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循价值法则的正确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嘛”

1959年春的上海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



在毛泽东同志的对面。由于我对分配给山西的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刚说完，毛泽东同志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时不得其解。接着，柯庆施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也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说“现在的问题是，跳的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圣说：“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用实例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泽东同志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已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也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已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从1959年到1962年这四年时间内，毛泽东同志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在同高指标的错误楔而不舍地作斗争中，有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真知灼见：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5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2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改革计划管得太死，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业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上作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了高指标错误在认识上的原因，然后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类”。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在著名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郑重地进行自我批

评，并承担责任。他强调要好好总结经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他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100 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正确估计国情国力，纠正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而得出的比较符合客观世界的战略思路。由此我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建国起，用 100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和为实现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路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他说，善于从自己的失误中学习，正是一个党成熟而伟大的表现。

“为什么不早提出来”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而且身体力行。《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 40 条》）的形成，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

1955 年秋，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汇报会议。会议开始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 15 条意见。他说，这 15 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才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我被指定参加了这个小组。经过杭州会议，在 15 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形成了《农业 40 条》的前身——17 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作些调查研究。当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征询农业 17 条的意见》中，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究竟是否可以全部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除了 17 条外，是否还可以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等等。

1956 年 1 月间毛泽东同志召集福建、安徽、山西、上海等 17 个省、市委书记，在中南海开了 5 天会议。这次会议前，他已找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议过一次，17 条已经发展成为 22 条。这次会议也同杭州会议一样，一面讨论，一面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由 22 条发展成为 40 条。

在会议上，我汇报说：“为加强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发展工农业生产，山西从 1951 年开始，每年春节组织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活动，特别是 1953 年 12 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春节期间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后，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规模更大，效果更为显著，出现了许多工农相互支援的生动事例”。毛泽东同志听后很赞赏。他说“这很好嘛！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要写进 40 条，你负责起草。”这就是 40 条的最后一条。

《农业 40 条》是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产生的。而它的实现，仍然要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同样是全党的模范。《农业 40 条》公布以后，他连续好几年都抓贯彻执行，而且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农村、田间，以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的精神，向有经验的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并且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于 1958 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并以

自然辩证法讲解了这八个字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共同促进增产的规律。从此，“八字宪法”就成了农民实现“40条”的农业增产目标和提高科学技术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阴历大年初一的一次讲话中说：“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一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后来，在1960年当他听到有人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有不同意见时，认为有道理，就把消灭麻雀改为消灭臭虫。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这样从善如流、集思广益、言传身教，使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在全党蔚然成风。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强调讲了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还特别表达了他曾有这样一个心愿：“骑马从花园口到通天河，然后沿长江顺游而下，用三年的时间走遍全中国调查一番。”这廖廖数语，活现了毛泽东同志旺盛的求知欲和调查国情、振兴中华的雄才大略。

“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

1958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我回到太原后，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緱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

喜县”（作者注：左邑即现在的曲沃）。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

“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

大泉山是山西省阳高县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过去，这里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山山和尚头，处处裂嘴沟，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满野黄土坡，十年九不收。”粮食亩产不过50斤，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山上的一位居士张凤林解放前曾为绿化大泉山奋斗了10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地主豪绅的压榨摧残，他的理想哪里能够实现？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依靠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集体力量，经过7年的努力，他的理想才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1955年，毛泽东同志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中共山西省委把阳高县委书记王进写的介绍大泉山的文章送给了他。他亲自动手修改了此文，并把原来冗长的标题《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上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为简明、生动、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很高兴地看完了这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3年、5年、7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象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40条》。当谈到水土保持、绿化全国的问题时，我又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大泉山采取挖鱼鳞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四条办法绿化荒山的经验。我说：“1953年，我到阳高县调查时，发现了这个典型。当时，县委书记王进、大泉山村党支部书记高进才以及张凤林陪着我参观大泉山，从山上转到山下，边走边看边议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山坡上由上而下，遍挖鱼鳞坑，每坑的边上都植了树，树小时坑内种农作物，当年即可得利，树大后就停止种植。为保护鱼鳞坑免遭水冲，他们在山坡上打了一道一道的拦水埂，埂里挖连环卧牛坑，使之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遍压杨柳枝条，使坑又结实又长树。这样，遍山挖鱼鳞坑，就可遍山蓄水，遍山植树，而且树的成活率高，他们把这个办法叫做‘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加上他们在沟壑里也由上而下层层打坝，节节蓄水，分段拦沙，每筑一坝，就修一台地，成为良田，沟底两岸全部营造了护岸林，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治理水土流失、化害为利的有效措施。1954年实现合作化后，更加快了大泉山面貌的改变，使过去的荒山、荒坡、荒沟成了梯地成排、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花果满山的优美景地。这就是张凤林和大泉山人的创造。毛泽东同志听了以上汇报后高兴地说：“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你回去后对他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在报纸上大量报道大泉山，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发一套。”

毛泽东同志对大泉山经验的肯定和对张凤林的赞扬，极大地鼓舞了大泉山人。两年后，他们进一步控制了水土流失，基本上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而且他们的经验，在大泉山高级合作社的8个自然村迅速得到推广。在1956、1957两年，他们利用冬春农闲时间，组织全社劳力，上山下沟，挖鱼鳞坑，植树造林，筑坝造田，在6个山头栽树2000多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7年，大泉山高级合作社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同时，在毛泽东同志

写的按语发表后两年内，全国先后有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 3 万多人到大泉山参观学习，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和苏联水利专家等也到那里参观过，对大泉山的绿化荒山和水土保持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8 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在两次讲话中提到大泉山和张凤林。一次说“我们的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用鱼鳞坑的办法绿化荒山，是大泉山的一个和尚创造的。不同群众接近，任何东西创造不出来。”另一次说“大泉山治理水土流失、蓄水用水的经验，一经在全国推行，更发展了，更系统化了。”

毛泽东同志对大泉山的关怀，成了大泉山人征服大自然、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大动力，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泉山村的巨大变化更是令人鼓舞。到 1990 年底，他们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3000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81%，先后建成大小蓄水池 108 个，真正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过去的荒山、荒坡、荒沟早已变成年年增值的“绿色银行”。他们用林业的收入启动农、牧、副、工各业，使五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如今的大泉山正如当地群众传颂的歌谣：松柏杨柳绿满山，层层梯田平展展，村里村外机器响，清清流水绕山间，科技兴农见实效，生产旧貌换新颜，脱贫致富五业旺，文化教育大改观。我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天有灵，看到大泉山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再次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动情地说“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7 年了。17 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并率先垂范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优良传统更加深入人心，继承和发扬这些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政治保证，是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政治保证。

（王春明整理）

## 纪念毛泽东同志做好农村卫生工作

钱信忠

时间过得真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指路明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 17 年了。在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几十年来毛泽东同志对卫生工作的关怀，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教导，浮想联翩，倍感亲切。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非常关心，做过许多指示和批示，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关心群众，关心和重视占全国人口近 90% 的农民的卫生医疗工作。

关心工农卫生保健，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方针，早在 1928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列为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之一；1933 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之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生活”、“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并主张实行社会保险，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等，成为新中国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1950 年 8 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在交流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毛主席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后来增加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四大方针，它是我们党在卫生工作方面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四大方针的第一条“面向工农兵”，明确规定了卫生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旧中国，长期以来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是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又最为严重。许多流行病、地方病在农村肆虐流行，危害农民的健康和生命，毛主席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在 50、60 年代他对血吸虫病等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的多次指导中体现出来，他老人家还特地为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写了《送瘟神》著名诗篇。我们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好乡村人民的医疗卫生服务，在总结、仿效了民主革命时期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三级医疗卫生网。在 1950 年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指出了“县设立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在 1956 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列入了 18 种要基本消灭和积极防治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 年，在毛主席批示同意并肯定了“山西稷山县农村人民公社卫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又提出合作医疗（保健）制度。1965 年，我当部长后，还就在农村卫生工作加强粪便管理，保护水源和水质等重要措施，向毛主席当面请示过，毛主席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具体内容，要求卫生部先抓好工作，取得经验后推广，但不要用它同意作为号召急于在全国推行，卫生部即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在农村实行“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炉灶、改牲畜圈棚、改室内外环境）为重点的控制疾病流行的措施和办法。

农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无疑是正确的，

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 1965 年 1 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当面指示过，并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的那么长！”。我回到部里，立即召开党组会传达讨论了毛主席的批评指示，并于当月 20 日，向毛主席呈上报告，决定在 15 所医学院中开办三年制的班，为农村培养医生，毛主席于第二天就作了“同意照办”的批示。1965 年 2 月 6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 4 月初，全国各地就有 1500 个医疗队，18600 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局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平心而论，我们卫生部门对毛主席的指示是跟得很紧，抓得很紧的，党中央（中宣部）和国务院也是知道的。直到 1965 年 6 月中旬以前，毛主席再没有提出过任何批评，并还对《报告》中关于培养的脱产卫生员的做法表示赞许。至于后来“6·26 指示”对卫生工作的批评，说不是毛主席对卫生部领导和医疗界人士的公开批评，也不是毛主席的亲笔批示，更不是政治局讨论后批发的文件，不足为据。我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关心农民卫生医疗保健的思想，是一贯始终的。“6·26 指示”并不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卫生事业遭受曲折，也不是他本人的意愿，我想，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应该贯彻他关于要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精神，搞好农村医疗保健。正如李鹏总理 1993 年 3 月 15 日在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要求的，要“加强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城市新型的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严格医药管理，加强劳动保护，重视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扶持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村基层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为使我国农村卫生工作取得更大成绩，为“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出新的贡献，实现毛主席的遗愿，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

## 毛泽东同志和西藏的革命与建设

阴法唐

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正在掀起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坚定从容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强国迈进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

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纠纷愈演愈烈，世界上许多政治家为此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在此情势下，重温毛泽东同志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实践活动，对正确认识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从1950年参加解放西藏起，两次在西藏工作，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在藏工作期间曾荣幸地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对毛主席关于西藏革命、建设的指示和他直接主持的有关工作，有一些粗浅的了解，现整理出来，供研究、借鉴，并请批评指正。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上，十分注意吸取历史上和国外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重大课题，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宝库，为中国的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最晚解放的西藏，问题特别突出。它地域辽阔，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自然环境异常，社会历史情况特殊，民族宗教问题突出，内有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外有帝国主义的羁绊，又有较深的民族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西藏工作不仅艰苦，而且“斗争最复杂、最尖锐”。因而毛泽东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是比较多的，在这些指示中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如“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慎重稳进”，搞好上层统战工作，“六年不改”，“边平叛边改革”，“对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稳定发展个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等。毛泽东同志解决西藏问题的构想和布局，从来都是从全局着眼，以广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和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的众多指示涉及西藏革命、建设的诸方面，既丰富又具体，并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多种政策和策略。有些看来好像仅仅是一些细枝末节，但都同他那宏伟壮阔的战略相联系。

一、“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尽快统一全中国，造福西藏人民

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是我国的西南边疆。汉藏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源远流长。公元十三世纪元朝以后，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后，我国历代中央政府为了行使国家主权，都在西藏委任当地官员或派驻藏大臣，有效地管辖着西藏的事务；为加强防务，还派部队驻藏或组建藏军；清乾隆皇帝，应八世达赖请求，派兵入藏击退异族侵略。这些举措，对抵御外侮、平定西藏内乱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继承者，理所当然地要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解放战争后期，在祖国大陆其他各民族已经或即将获得解放时，西藏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策动、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制造



驱逐汉族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并派出“亲善使团”到美、英、印度等国游说“独立”，从各方面加紧从中国版图上把西藏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同志从总体战略上考虑，解放西藏、经营西藏，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造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毛泽东同志关于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和发展，也有变化和调整。1949年10月13日，解放战争正向华南等地发展之际，他明确了经营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负。11月23日，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西南为早等原因，他又曾考虑由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后来他又根据彭德怀同志的建议，以及成都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宋希贤两大集团等情况，于1950年1月2日将进藏任务重新进行了调整。他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提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就是从这以后光荣地落到了以我们二野十八军为主和青海、新疆、云南几支兄弟部队的肩上。

## 二、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经营西藏的特殊模式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下达解放西藏的任务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即立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整个西藏的问题。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历史上，西藏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离间，原西藏地方政府一些人又对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态度，造成汉藏民族间的隔阂和西藏内部的不团结。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有利于避免无益的内耗，减轻国际国内震动，消除民族隔阂，增强民族团结，并以实际行动支持西藏的爱国进步力量和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这不仅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国际影响也好。而且，当时解放战争已获全国性胜利，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西藏人民仇恨帝国主义，热切地盼望解放；新中国废除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制定了崭新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一些国家也承认了我们。这些有利条件都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不仅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亲自过问进军西藏的口号、西藏代表来谈判的地点、与西藏谈判的条件等具体事项。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怂恿支持下阻挡我军和平进军，拒绝和谈，并害死斡旋和谈的格达活佛，而我们不得不发起昌都战役时，毛泽东仍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从此，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各民族团结友爱的祖国大家庭怀抱。十七条协议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除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原則外，规定西藏内部制度不予变更，原封不动。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较

长时间内保留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现在看来是一种近乎“一国两制”的模式。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同志转向关注执行协议的问题。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就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表示希望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保证实现协议和破坏协议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毛泽东同志立足于政治解决,即使对1952年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反对协议、策划骚乱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现的多次局部叛乱,毛泽东同志都坚持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对支持伪人民会议的个别头子只是敦促达赖喇嘛撤销其职务,对局部叛乱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另一个创造是坚持和平改革。虽然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也作了肯定,但规定“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直到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我们被迫进行边平叛边改革时,毛泽东同志仍然确定对未叛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他指出:“对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由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保证他们在改革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把在内地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用于西藏的农奴主分子,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加上政治安排等,对西藏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特殊照顾比对内地资本家还要优厚。在群众运动中对爱国人士也保护过关。这样,就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到最低限度,达到了既消灭剥削阶级、又团结绝大多数人的目的,对保证西藏的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重大作用和良好效果。

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明确规定“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但在具体进行这一工作时,毛泽东同志又很慎重稳妥。和平收回印度继承的英帝国主义在藏的特权,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组成部分,完全体现了以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途径。这是新中国用谈判方式解决帝国主义遗留下的在华特权的第一例。

### 三、建立崭新的平等团结关系,实现共同进步

西藏在解放前不仅存在着汉藏民族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工作中解决团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把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作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就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接着他又指出:“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同志要求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并指出,“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忙汉人的。”他还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加强监督,进藏人员如果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有批评和向上反映的权利。他还坦诚地表示,共产党是帮助西藏的,如果不能帮助,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这都说明毛泽东同志坚持党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诚意。共产党的政策既不是羁縻政策,也不是压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根据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况，加强团结首先要加强对上层的团结。西藏上层特别上层中的主要人物，有剥削压迫群众的一面，还有代表群众，维护西藏民族利益的一面，搞好和他们的团结，对团结整个西藏民族至关重要。这是在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十七条协议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协议签订后，以协议促团结，以团结上层来保证协议的实现。实现协议，包括一系列的工作，如上层统战、影响群众、培养民族干部、筹备和成立西藏自治区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其中又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开展影响群众工作和其他工作，都要首先搞好上层统战工作，通过上层接近下层。搞好上层统战工作，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也有利于进行群众工作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就把统战工作称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为解决西藏问题，他又将其定为西藏的主要工作。当时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所开展的统战工作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对象主要是上层人士，劳动人民还处在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但从性质上说又比较宽，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反帝爱国的人都要争取、团结。当时上层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

毛泽东同志重视团结西藏上层，始于和平解放西藏之前。1949年10月，他以他和朱德同志名义给班禅回信；1950年12月，他又直接给西藏边远地区阿里地方的藏政府代表才旦朋措和扎西才让写回信，耐心而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做解释工作，要他们发挥促进和平谈判的作用。

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更是直接对西藏地方官员、贵族、上层喇嘛等进行工作，亲自接见西藏来京的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等，诲人不倦地进行谆谆教导。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但没有变更，还给他们安排了国家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对他们极其关心、爱护和尊重，几次接见都同他们耐心地进行长时间谈话。1955年，达赖喇嘛准备从北京返回西藏时，毛泽东同志亲自赶往达赖下榻的宾馆送行，使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感动得不知所措。达赖喇嘛当即对毛泽东同志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同志不仅把他们当作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还热情诚恳地把他们当成好朋友，和他们肝胆相照，促膝谈心，在谈话中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交谈的问题极为广泛深远，如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问题，毛泽东同志拿一些通俗易懂甚至涉及宗教的故事去启迪他们，跟他们讲释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的故事。毛泽东同志对达赖、班禅说，释迦牟尼“当时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为众生免除痛苦”。据可查的文献，从1953年至1958年，毛泽东同志谈这个故事不下5次。毛泽东同志广议中外，纵论古今，不仅谈到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而且谈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设想，对他们提出，对布施（礼）可不可以少收一点或者不收，“你们今后有些开支，国家可以帮助。”在多次面谈中，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西藏不改革的弊端，如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人口不能繁衍等，而且指明改革的前景以及西藏上层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认识，打消他们的顾虑，坚定地团结他们，争取实现不流血、不出乱子地进行社会改革。毛泽东同志曾当面对达赖、班禅说：“你们根本不前进，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欢迎你们进步，但是你们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

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

达赖、班禅在西藏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多次亲切地和他们书信往来，对他们的进步，都回信予以表扬，对他们思想上的迷惑，也及时指明方向。直到达赖背信弃义走上叛国道路前，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亲自对西藏上层进行工作，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也大力进行统战工作和开展影响群众等工作，西藏和平解放不久，国家在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修通了川藏、青藏两条大公路和当雄机场，建成一些中小型厂矿和电站，开展了内外贸易等，既保证了军供，又兼顾了民需，因而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影响不断扩大，西藏人民与我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联系越来越密切。以至以后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和在“稳定发展”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开展经济建设。

毛泽东同志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认真贯彻宗教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寺庙的叛乱和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修复开放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信教群众是满意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在十七条协议中对西藏也作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同时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还规定设立军政委员会。但由于后来西藏地方政府害怕，毛泽东同志决定推迟成立军政委员会，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直接筹备成立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西藏人民在全国各族人民、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积极支持下，艰苦奋斗 16 年的丰硕成果，是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良好开端。从此，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得以阔步前进。

#### 四、慎重稳进，带来西藏的飞速发展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处处都显示出他那气吞八荒、囊括四海、只争朝夕的伟大胆识和气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他常常以历史的大手笔，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唯独在西藏问题上，他显得慎之又慎，正像他表示的“我对西藏的事情非常谨慎”。他在处理西藏的各种问题时，还表现得特别温和、特别宽容，特别耐心。许多事情宁可不做，也不强求，只要不是根本问题，都可让步，能妥协的尽量妥协。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因而取得特别巨大的成功。

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著名方针。以后还提出过极端谨慎、稳步前进。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又提出了“稳定发展”的方针。这两个方针不仅使西藏得以从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稳步而又较快地解放出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

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它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地区”，从本身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的关系及帝国主义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造成新的隔阂，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同志对西藏问题十分关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五十年代，事无巨细，每必躬亲，如给班禅相片题字那些字不写，张经武给西藏寺院的乞丐发放布施何时适宜，给达赖送的礼除文物外清理转民委等事宜，他都亲自处理。后来才逐渐把西藏一些事务交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处理。他对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求极严，发现有不当之处，立即纠正。如1952年4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的复电中指出：同意西南局的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与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凡关于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电报中对在拉萨创办拉萨小学一事西藏工委事先没有向中央报告请示，给予批评。同年12月，又对西藏工委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而未向中央报告，给予批评。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待。”还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毛泽东同志把处理西藏问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并规定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使我们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得以少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保证了西藏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那些不谨慎、没有认真按照中央指示和规定做的，都碰了钉子，造成了损失。

“慎重稳进”方针是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正确方针，全面理解、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就能收到良好效果。它的涵义是既要慎重又要稳步前进，不是只稳不进，也不是只进不稳，而是稳和进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偏废，但又根据不同时期情况的变化有所侧重。在西藏解放初期和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慎重是主要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平叛改革的形势，则“当进就进”，进中求稳。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在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前进是主要的，不能借口“慎重稳进”设置改革开放的障碍，但又不是不顾条件地蛮干冒进。归根到底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能进则进，需退就退，退是为了进；能快就快，需慢就慢，慢是为了以后的快，看准了的可以做的就进，甚至还可快进。十七条协议签订前，部队虽已进至昌都以西地区，但为促进和等待和平谈判。仍然按兵不动。协议签订后，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铺平了，就迅速进驻拉萨及若干国防要地。否则就可能失掉时机，这就是该快的要快。

1956年，我们对形势估计不当，过早地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但因工作基础、干部准备、上层态度等条件都不成熟，毛泽东同志发现后立即刹车，果断地确定至少“六年不改”。主观上想快，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只能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不仅不能实行改革，还要收缩，导致机构精简，进藏

部队和工作人员大批内调，结果不但没有快，反而慢了。反之，慢一些，稳一些，甚至作些必要的退让，结果反而快了。“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他们却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企图达到永远不改，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毛泽东同志预料的西藏劳动人民翻身的时间提前来到了。广大群众和爱国进步上层人士，对比共产党和反动上层，看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行动，看了八年，悟清了道理，一说平叛，就很快站到我们党方面，孤立了叛乱分子。驻藏人民解放军被迫和西藏人民一起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所以稳和慢带来了快。虽然西藏情况特殊，但是平叛和改革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一跃而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平叛改革基本完成后，我们急于在西藏搞合作社，并搞了一些试点。毛泽东同志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他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随后，在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下发的中央文件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在贯彻这一指示的过程中尽管也出现过某些失误，但总的形势很好，西藏从1961年至1965年被人们称为第一个黄金时代。

当前，西藏发展的新的机遇到来了，从慎重稳进到加快步伐，历史与现实都要求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继续不失时机地开拓前进。

历史作证，雪域作证。青藏高原跨世纪的巨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当勤劳、勇敢、朴实、智慧的西藏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的领导下，从容地走向二十一世纪时，巍巍的喜马拉雅山，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将永远铭记毛泽东的不朽功绩，他的音容将永远映照在西藏高原上。

## 忆 50 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

杜润生

—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 年 6 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 2 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 3 亿 1 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巴”。但这个尾巴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 50% 左右，有的地方 40% 几，最高 50%，没有 70% 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只友 40% 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49 年底 50 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篇。少奇说，中央一致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

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

## 二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2 年 11 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叫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驻地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



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毛后来批他的“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件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三个文件，毛主席都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未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

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700亿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

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785亿斤，比上年多收178亿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

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 尽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 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 毛主席的合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

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 15 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 53 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 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 三

1955 年 3 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 年至 55 年度购粮 891 亿斤，增加 106 亿斤），有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 1955 年 1 月 10 日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 3 月 8 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 年以前 1/3 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 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 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

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

有 1/3 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

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

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

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

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

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 人去诗情在——追忆我与毛主席谈诗及其他

臧克家

毛泽东的大名，如雷灌耳，他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带点神秘性的伟大人物。1945年8月从重庆《新华日报》上得知毛主席为了与国民党和谈飞到了重庆，我很高兴，又很激动。毛主席的到来，给生活在这座少见太阳多见雾的山城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之光。

我立即从远郊住处赶到市里。恰好这一天，毛主席缓步经观音岩向中苏文化协会走去。他身材魁伟，头戴一顶灰白色布盔，神态自然，周恩来同志紧跟在身后，群众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拥集于周围，场面十分动人！我一直追随后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没过几天，叶以群同志通知我：毛主席召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地址在张治中的公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到会。徐冰同志在门口迎宾，向毛主席介绍，临到我，说：“诗人臧克家”，毛主席笑着和我握握手。出席座谈会的大约20人左右，现在清楚记得的只有张奚若同志一人了。毛主席亲切而和蔼地和每位同志交谈，时间短，话不多。我向毛主席发问：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主席回答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这两句话，给我增加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毛主席这次到重庆，我和许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毛主席本人，大智大勇，磊磊落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与毛主席座谈之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写了一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的颂诗，用何嘉笔名，发表荏9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

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怀仁堂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界的一次盛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开幕式，我又见到了毛主席。他站在主席台上，亲切而庄重地向几百位文学艺术家致意：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话不多，意义深，事隔四十多年，声犹在耳。

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我仰望毛主席站在巍巍天安门城楼上，气壮山河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像宏钟，像春雷，震天动地，激奋人心；这声音，像革命的狂飚，冲上九霄！我心激动，眼泪流。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重重痛苦的经历淤积在胸中，这时，革命洪流一下子把它冲掉了。

以后，我参加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文代会，只能在会场里，远望毛主席。虽然也曾在中南海的草坪上和毛主席一起照相，但没有机会接近他。第二次和毛主席见面，谈诗论文，是在1957年1月14日那一天。话，说来就长了。

1956年我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后，负责筹办《诗刊》。10月，副主编徐迟倡议，给毛主席写信，把我们搜集到的18首毛主席诗词送上，请求他校订后交明年1月创刊的《诗刊》发表，我和全体编委及全编辑部的同志都举双手赞成。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写好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由主编、副主编及全体编委签名，送上去了。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毛主席的回音。

1957年1月12日，毛主席写给我和《诗刊》编委诸同志的亲笔信以及经他亲自校订的18首旧体诗词送来了。整个《诗刊》编辑部和作家协会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欣喜如狂！毛主席在信中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他很自谦，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主

席的信和 18 首诗词将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喜讯，到处轰传，创刊号一出版，热情的读者排长队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当我正在奢望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向他请教有关诗歌诸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召见我的喜讯传来了。1月14日上午11点，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袁水拍同志忽然给我来了电话：“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来接你。”那时，我住在笔管胡同7号人民出版社的宿舍，没有电话，电话是由斜对门的油盐店传呼的。幸而我当时身体衰弱，极少出门，没有误了大事。我心情兴奋紧张，不时看手表，在等候下午3点钟！我的住处到新华门，二十多分钟可达，我心急却嫌路远。车子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进入殿门，房间空阔，静寂无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殿内静静的，静静的，我的心却很紧张，很紧张。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呵，毛主席站到我们身旁了。他安祥和蔼地同我们握手，让座，自自然然地从烟盒里抽出支香烟让我，我说：“我不会吸。”主席笑着说：“诗人不会吸烟？”毛主席的神态和谈话，使我的心平静怡然了。主席问：“你在北大教书？”“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我回答。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我趁机问：“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主席反问：“你看应该怎样？”我说：“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主席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话没说几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无忌了。谈起《诗刊》创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我说：“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你说印多少？”主席问。我说：“公公道道，5万份。”主席想了一下，说：“好，5万份。”我天真地说：“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水拍用眼光向我示意，赶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上面的话，仅仅是个开场白，随着情绪的高涨，无拘无束，越谈越多。主席先从国际重大事件开头，谈了他的看法。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只默听，没法插嘴。他忽然向我们发问：“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问得突然，我们说：“不知道，主席看呢？”“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我们会意了。

诗人嘛，谈话总是离不开诗，不多时，话入到主题上来了。毛主席是喜欢、看重民歌的。他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毛主席喜欢三李，是人人皆知的了，但他对我们并没有提及，只说：“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又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毛主席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经水拍重复了一下，我才明白。

一看表5点了。不能再多占用主席的宝贵时间，我们便告退了。他送出殿门，站在那里远远地向我们招手，高声地嘱咐：“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回到家中，想到与毛主席亲切会见的情景，我心情激动，诗思潮涌，21日，一气呵成了《在毛主席那里作客》这首长诗。



毛主席是诗人，品格高，重感情，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每有新作，总先送一份给我。《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前，送到我手，我改动了一点点，马上收到毛主席 1962 年 4 月 24 日的回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一句，下面还画了重点符号。主席先后给我写过 7 封信，1961 年 11 月 30 日来信，想约我和郭沫若同志去谈诗。无奈他太忙，抽不出时间，未能实现。

我主编《诗刊》，有个便利条件，不时给主席去信索稿，总想他有新作争先在《诗刊》上发表，以增加《诗刊》的声价。主席每次发表诗词，各报刊总约我写点文章。对主席诗词中的某些字句，应该怎么理解好，我请求解答。田家英同志便在电话上告诉我。比如，他说：《送瘟神》第二首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句，不要讲得太死。又如，毛主席的某一首词（我记不清题目）中的几句，是受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影响等等。我所写的有关毛主席诗词的短文，都是即兴走笔，有欣赏之情，而乏研究之功。可是，我有独具的条件，可以直接向作者请教。有些理解各异的字句，通过我的文章，把毛主席的原意传达出来。60 年代初，袁水拍约我和叶君健同志（在外文出版社负责翻译主席的诗词）一起研究有关毛主席诗词理解各异的一些字句，打印出来，请教主席。主席当面对水拍做了回答，约有十七八处。水拍向我传达时，我在一张记有请示问题的薄纸上做了记号，年代久了，有些模糊不清了，现在我还珍存着它，成为“珍贵的孤纸”了。

1963 年，《毛主席诗词》要正式出版了，先印了少数征求意见本，送我一本，我认真地一读再读，准备了 23 条意见，事前曾和《诗刊》副主编葛洛同志在电话里商讨过。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到通知，要我到钓鱼台去参加座谈会。大厅里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着毛主席用铅笔写的几张条子，字很大。一张写着：“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一议。”一张写着主持人的名字。一张排列着邀请参加的人的名字，记得有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和我，另外还有少数几位我不熟悉的同志，可能是有关出版社的负责人等等。这次会，主要由田家英同志汇报了这次出书的情况，他说：各位看了征求意见稿，会看到其中有些未曾发表过的作品。这次破例，先由出版社出版之后，各报刊再转载。听了这番话，我有点失望，我是带着为让《诗刊》优先发表的希望去的。田家英同志讲完话，大家一致赞扬毛主席的诗词，说它的出版，意义重大。有的老同志不无遗憾地说：主席的作品，恐不仅是这些，在长期战争中一定有的丢失了，有的，今天只留下了残句。对于书稿的内容谈的人少。最后小平同志说：我看其中有三篇可以请作者考虑一下，可否抽下。

座谈的时间不长，就散会了。我把我写好的 23 条意见交给田家英同志。《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后，我查了一下，有 13 条意见被采纳了。例如：《七律·登庐山》中的“热风吹雨洒江天”一句，“热风吹雨”原作“热肤挥汗”，是毛主席接受我的意见改的。足见毛主席的谦逊精神。

自 1956 年以来，我写了一些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文章，与周振甫同志合作，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1990 年，经增订出版了新一版，改名为《毛泽东诗词讲解》，总印数已达一百二三十万册；前年，我又和蔡清富、李捷同志主编了《毛泽东诗词鉴赏》，两年之间，印数就到了十二万册。可见毛主席诗词影响的深广。

几十年来，我与毛主席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对他的为人、诗品极尊重，极景仰。每忆往事，情深意切。他的人，远了；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却更近了。今年是他老人家百岁诞辰，我用这篇短文来表达我深深的怀念之情。

## 记延安时期毛主席几次难忘的教诲

缪海稜

延安，革命的圣地，在这里我度过了青年时期最重要最难忘的一段生活。它影响着我的思想发展，影响着我的健康成长，影响着我的未来旅程，影响着我的一生事业和理想的追求。

我在延安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战斗过，我是喝延河水，吃陕北人民的小米、住延安的窑洞长大的；我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奶浆哺育成长起来的。提起凤凰山、杨家岭、枣园乡、王家坪、清凉山……这些地方，我特别感到亲切。在抗日军政大学、在马列学院、在中央党校、在中央大礼堂，在中央机关工作部门，我听过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传奇式的讲课，听过党中央领导同志精采的讲话，特别是听过人们最敬仰的毛主席的深入浅出、夺人心魄的报告、讲话和谈话。他那宏亮的声音、雄伟的气魄、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智慧，幽默通俗的语言，巨人的手势，打动着听众，征服着每一个听众的心，使听众自觉自愿地跟着他走，跟着他指示的方向前进。

我直接听过毛主席的演讲，报告不少，例如最著名的《论持久战》，这是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洪钟。当时正是国内“亡国论”与“速胜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迷雾笼罩着重庆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其精辟的持久战理论，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上述两种错误的唯心主义谬论，好像太阳照耀大地，使人们从大雾中走出来，眼界豁然开朗，使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看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的希望。只有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才是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正道和法宝。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党和边区人民处在重重封锁与困难之中，而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又需要冲破阻力，求得进一步发展，全党需要巩固胜利，加强团结的时刻，毛主席英明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整顿三风的伟大号召，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次整风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的认识，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把中国共产党建设为一个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的马克思主义大党。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或纺线或种地，或发展副食品生产或开办小型工厂，用自己的双手既解决了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又培养了劳动观念和实践观念，它和整风运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与高尚的革命品德。这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巨大的。无论在当时，在今天都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在今后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我不仅聆听过毛主席的报告、谈话、指示，而且亲自参加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思想上立场上作风上都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益和锤炼。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的洗礼，强化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人生观。懂得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永远保持革命的青春，就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才能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党给我的教育和影响之大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仅仅记得一些枝叶、片断、点滴，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

获得整体的感受和认识。当然，离开了具体亲身实感，印象也不会在长久的记忆里生根。下面我想从一些在学习上工作上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来谈谈自己的具体印象和感受。

毛主席要我们“多想”

那是1939年的夏季，我刚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负责主持通讯科的日常工作。新华社和《新中华报》社分住在杨家岭后山沟的两排窑洞里，那时新华社的机构简单，只有编辑、译电（分中文、英文、日文）、通讯、油印（刻腊版出参考消息）几个科，不过二十多人。在一间较大的窑洞集体办公室里，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都是摘抄马克思列宁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两条：一条是列宁对青年人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另一条是毛主席对《新中华报》的题词“多想”。记得在抗大学习时也读到过毛主席的许多题词，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斗争中学习”等等。但是，毛主席为什么要对办报的同志强调“多想”来勉励大家呢？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办报纸、搞新闻工作会在国内国际社会各个领域里碰到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和问题，有正面的反面的，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新闻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认真地去思考去分析，弄清楚真象与假象，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主流与支流……当然需要多想。孔子说：“行成于思”，“三思而后行，再思可也。”有些复杂的问题，一时想不清楚，想不周到，避免片面性，就需要反复思考。

但是，当时我们的社长向仲华同志特别向我们讲述了毛主席为《新中华报》题“多想”二字的背景，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思，要人们善于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者。当时，王明重新出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有严重错误的与党中央正确路线对立的小册子，并到处发表讲演，自称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权威。他在延安女子大学讲课时，自以为精通马列主义，能背诵马列著作的某些论述，常说他引用的话在马列著作中文版某卷某页，然后当场要他的助手或课代表查证。学生查看，果然不错，弄得一些青年学生误以为他真了不起，能记诵马列词句，一定读过不少书。王明善于夸夸其谈，伪装博学，又很傲慢地吓唬工农分子，一些不明底细的青年人不免受骗，盲从附和。其实，王明不仅在政治路线上理论上反对毛主席，而且是一个十足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典型，历史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战中又犯右倾机会主义，终致叛党。毛主席当时提出“多想”也是要大家学会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不要被洋教条吓倒，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经过仲华同志的指点，同志们就更感到毛主席题写“多想”的特殊重要性了。

一定要把新华社办好

1939年，新华社在建立和健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网工作中，为了培养通讯员的采访写作修养，主办了一个业务刊物《通讯》，这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明出版这个刊物的性质任务和目的，请毛主席题写刊头，毛主席很快写了《通讯》二字，一式三份，让我们挑选，这就是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上的那个刊头。毛主席的题字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更加重视组织和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通讯》虽然是油印的32开本，一出来就受到广大通讯员的欢迎和热爱。从第三期以后就与新中华报社、延安青年

记者学会合办，一共出版了八期，直到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报社另行在副刊版上出版不定期的“通讯员之页”。

那是1940年年终，我受社长向仲华同志的指定，就一年来新华社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党报委员会和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通讯社在党中央领导和关怀下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并检查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较少，对外电抄收情况不好、不稳定，每天编播发稿数量太少，不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提出了改进的意见。没有想到毛主席不到三天就看过我们的报告了，而且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这个报告我看过了，通讯社这个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现在的规模还很小，但是它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存在的问题应予以适当解决。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人王明看的。当时，王明对毛主席的批示甚为不满，便把向仲华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满脸怒气，以讽刺的语调说，“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嘛，毛主席都说好，那还不好吗！”然后话头一转严厉地责问道，“谁让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我如实地回答“是我写的。”仲华同志忙说：“是我要他写的。”我们认为年终应该向党报委员会和党中央写个工作总结报告，让领导上了解新华社的工作情况，求得中央领导的指示，好进一步改进工作。王明气虎虎地说“为什么不先送我看呢？”我赶快说，我们是送给您和党报委员会的同时送给毛主席的，因为毛主席天天都要了解新华社抄收外电的情况……王明打断我的话：“你们这是向毛主席邀功请赏嘛！”我还想说明我们写报告的动机，向仲华扯了我一把，“不要说啦，他刚入党不久，来社不久，有不对的地方由我负责。”王明更不高兴，“既然你负责，为什么要往毛主席那里送呢？”向仲华又重申了一遍理由：“我们想让毛主席党中央经常了解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好改进新华社的工作。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觉得新华社的工作要赶快加强，特别是目前抄收外电的面还很小，我们在外又没有自己的记者。”王明根本不听这些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他故意讽刺向仲华：“老同志怎么还不懂得组织原则？”仲华说：“我们没有违反组织原则。”王明武断地说：“不要和我争辩！下去好好检查自己。”事后向仲华和藹地对我说：“你是新同志，你不了解党内斗争的背景，今天王明的怒火是冲着我来的。我了解他的底细，他反对毛主席，他是想借此整我们的，使我们俯首贴耳地听他那一套，不要贴近毛主席，此人用心很坏，他老早就不满新华社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政策，你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文章啊！”

同志们读了毛主席的批示都十分高兴，受到无限的鼓舞，都比过去更加认识办好新华社工作的重大意义，决心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无论是抄报的译电的编稿的搞通讯员工作的还是刻钢板搞油印的，都说毛主席在百忙中还那么关心新华社工作，我们还能安于现状，不求进步吗？我们抄不好外电，译不好电稿，油印不清楚参考消息，那将影响毛主席及时全面了解国内国际情况，还会影响党中央的决策呢！

的确，毛主席对新华社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毛主席总是特别关照新华社要尽一切可能抄收各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而且把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同盟社发的英文译稿和塔斯社、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比较查看，找出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由于当时新闻电台用莫尔斯抄收，电力弱，信号不强，抄收电稿不清楚，有时只能猜译；翻译员称之为认

“天书”。1939年、1940年间毛主席住在杨家岭，新华社译出的电讯稿重要的要及时送给他看。毛主席在夜间工作，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派通讯员把他看过的电讯稿退回新华社刻印。最引人注意的，大家都争着看毛主席在译电稿上作的标点、记号和批示，有时指出译文的脱漏和疑问，或指示要把几个通讯社发的同类消息报道加以比较，把说得不一致的段落标出来，有时对国际上某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不仅批示要特别注意抄译，而且提出处理的意见。毛主席还亲自动手为新华社撰写消息和评论，有时在电讯稿上加眉批或旁注。同志们每天抢着看毛主席圈阅过的电讯稿，关心看他批示的话，把这看成是一件快事，成为议论的话题，也以此作为对自己难得的教育。的确，同志们从毛主席批示的电稿中得到不少的教益和启示，看出他观察事物的敏锐和深刻，看出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看出他从零散纷繁的国际电讯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和发展动向。在那个时期，在被封锁的延安山沟里，毛主席主要从新华社日常抄收的电讯中来了解天下大势，有时派他的秘书来到译电室探问最新的消息。毛主席在参观清凉山千佛洞印刷厂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多种渠道，但主要是靠新华社靠你们的。我们知道毛主席每天忙于党务军机大事，忙于对敌斗争，但是不管怎样忙，每天必读新华社的电讯。他多次指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国际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不仅延安时期、战争时期如此，在全国解放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党面临的情况、任务和局势更复杂了，毛主席仍然重视从新华社得到的信息并关心着新华社事业的发展。

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为皖南事变大声疾呼，怒斥国民党反动派

我很难忘记毛主席在皖南事变时的极度愤怒心情，当毛主席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几夜没有睡觉，一是痛心新四军人员无端遭受重大的损失，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无比愤怒。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研讨后，连夜把皖南事变的情况通告全党全军，并立即亲自起草为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谈话：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当时，已是深夜，寒风呼啸，新华社接到毛主席送来的紧急文稿，指定新华社赶紧抄一份播发全国各界，派人将原稿送交印刷厂紧急排印。向仲华同志指定我负责亲自送稿到清凉山千佛洞印刷厂作为特急稿处理，以便第二天一早在《今日新闻》（铅印）上头版头条刊出。

夜色漆黑，伸手不见掌，从杨家岭到清凉山的路是崎岖不平的，我顺着延河岸边向东走，要经过延安女子大学和王家坪，大约有三里多路，我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着木棍，把文件紧裹在怀里，冬季寒风凛冽，听见远近有狼嚎，我顾不得寂静中的这些可怕的声音，只管往前赶路。我知道狼是怕火怕灯光的，因此，提着灯并不胆怯，只是河边的沙石路凹凸不平，不好走，跌跌绊绊的，虽然寒气逼人，还是走出一身汗来。一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听说是毛主席为皖南事变撰写的紧急文电，都立即抢着赶排赶校赶印，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我回到杨家岭新华社窑洞，天已经有点蒙蒙亮了。忙碌一天的同志们还在睡梦中。

我在校读清样时，对中央军委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特别感兴趣，感到它蕴藏着难以估量的重大意义，谈话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由来已久的蓄谋，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图谋与日寇勾结起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早就图谋用反共反人民军队的手段来实现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

降的目的，皖南事变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突然行动的大暴露。

谈话一方面指出共产党和爱国力量面临的严峻形势，一面指出不管反动派如何捣乱，最后必将失败，抗战必然胜利，并指出取得胜利的各种有利条件，指出反动派必须受到惩处。

这篇谈话义正词严，分析透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理服人。谈话以坚定刚毅的语调说，“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出何等代价……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事实的发展和结局是日寇和亲日派的惨败。这篇谈话气势磅礴，力能拔山，使人读了既能明白皖南事变的背景，认识国民党反动派丑恶的嘴脸，又能激起全国人民对反动派的仇恨，而更加团结起来进行抗日爱国的斗争。我又一次深深感到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不可摇撼的稳如泰山的巨人气概。

毛主席是用宽边宣纸写的文稿，不受拘束，字体流畅，笔底千钧，字里行间显示着摧枯拉朽，不可阻挡，无所畏惧的气魄。当时，我们缺乏文物保护的意识，几个同志争着保存一张手稿以为珍贵的纪念，可惜后来在战争中丢失了。一想起此事，就不免自责惋惜。

记得第二天天亮，吃过早饭，我又受命赶到延安城内经国民党肤施县邮电局发了急电，发给重庆《新华日报》和全国新闻界，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青年记者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

194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把《新中华报》、新华社出版的《今日新闻》并入《解放日报》，几个新闻机构都搬到延安城东关的清涼山上，在组织上业务上新华社仍然保持独立的机构，但是党和行政领导都统一在一起，两社共一个采访通讯部，我也调入《解放日报》采通部工作。

当时中央印刷厂、新华社和口语广播部以及新闻出版发行部门都住在清涼山，于是清涼山便成为党中央延安时期的重要宣传基地，那里聚集着一批有马克思主义办报经验的知识分子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接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教育，经过政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锻炼，从这里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新型新闻工作者，成为全国解放后新闻界的领导骨干。

在这里能及时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听到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评论。我担任解放日报记者，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一些重要会议。

记得1941年11月6日，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毛主席应邀要在这天下午到参议会上发表演讲。在开会之前，毛主席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的休息室接见部分党外高级民主人士参议员，大家早就在静静地等候着，大约不到两点钟，毛主席穿着普通的八路军棉衣来到休息室，他迈着刚健稳重的步伐，笑容满面地和大家亲切握手交谈，一一询问姓名，哪个地方来的，现在做什么事，……人们都十分欣喜的回答，并向毛主席致敬问好。

当时我是《解放日报》青年记者，在场采访，毛主席也和我握了手，看了看我，亲切地问了我的名字，便幽默地说：“大海也不平静，有时也有波

涛起伏啊！”接着问我《解放日报》社有多少记者？从哪里来的，读过什么书？我一一回答，谈到学习时，我冲口而出地说：“什么书都喜欢读一点。”毛主席看出我的幼稚，便和蔼地说：“青年记者嘛，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这时我感觉到我的答话反映出我的学习缺乏重点，没有根基，学无所主，自以为是。毛主席的话虽然简短，但是，切中了青年人的要害，抓住了做好记者的根本。毛主席这次谈话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我在工作中犯某些错误，归根到底也还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毛主席在这次参议会上的讲话，中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突出地讲共产党人要善于与非党人士共事，要懂得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员都是少数，党外人士是最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之所以得民心，正在于此。

第二年，1942年5月，毛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解放日报》曾派记者参加，在会上他主要就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的原则以及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即文艺为人民服务 and 怎样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就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表了系统的重要讲话，这对记者也是同样适用的。毛主席当时还要记者和干部读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后来又加上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毛主席还要党的宣传工作者研读鲁迅晚年的杂文，他赞扬鲁迅杂文观察问题非常深刻，富于辩证法，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尖锐泼辣的文风，指出鲁迅的心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记得1941年5月，毛主席就曾经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深刻地系统地阐明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学习态度和方法，还举出一副对联，给那些好空谈不好切实学习的人作了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至今发人深省。

“脱帽，敬礼，赔不是！”

1941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我担任报社记者，在延安市采访，翌年春，我作为报社特派记者兼陇东专区通讯处主任，在陇东专区六个县乡进行巡回采访、调查研究，将近一年。1943年春，忽然接到报社通知，要我速回报社参加整风学习。开始在报社整风，学习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谈学习心得体会，端正对整风运动的认识，对党的认识，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提高对马列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觉悟。心情是舒畅的，大家有说有笑，自己找思想差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感到革命队伍生活的亲切温暖。

后来运动转入审干阶段，康生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假坦白典型，号召有问题的人要主动坦白，否则，查出问题，要从严处理。人人要交代清查个人在国民党区的社会关系、家庭历史。当时康生怀疑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共产党输送来延安的革命青年，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是受反动组织指派怀着特殊的目的来延安的。一些热心革命，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投奔共产党的纯洁青年，怎么接受得了？处在被围攻之中，只得坚持为自己清白的历史和政治面目采取辩护，寻求证明的老实态度。因为当时



从同一个地区来的青年，说明的历史环境和来历都是一致的，康生便认为这些人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加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作了假坦白，更造成混乱，互相纠缠不清，于是，实行隔离审查。我被转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位于偏僻山沟的单位接受审查，每天纺线、学文件，交代思想和“问题”，不能自由行动。处在这样的境地，当然，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也是怀疑的，但是，对党还是信赖的。后来慢慢的让三三两两的上山砍柴、背柴，望见天日，可以相互笑谈、歌唱，更坚信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考察，特别是经过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南方局做了深入的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彻底查清四川地下党的情况及其领导的外围革命组织的活动，是可信赖的。这时一些假坦白的人也以悔恨的心情重新澄清了做假坦白的荒唐编造。整风审干运动中出现的极左的偏差，这时已经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纠正，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审干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样被审查的青年干部都增强了对党的信任，认为所谓的“问题”迟早会“水落石出”。同时，党组织对被审查者逐个进行严肃认真的甄别。和我谈话的负责同志对我讲了整风审干的重大意义，弄清队伍，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可以更好地战胜敌人。还诚恳而郑重地传达毛主席的话：凡是搞错了的同志，都要给予纠正，并且要向他明确宣布经本人同意签字的组织结论，还要向他们“脱帽，敬礼，赔不是”。就是说，宣布去掉强加的莫须有的帽子，向他们举手、道歉，赔不是，好同志就是好同志，受点委屈不要放在心上，大家一条心，好好干革命，今后要努力学习，未来的日子，要走的路还很长呢！我当时禁不住哭了。也在思想作风上作了自我批评。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虽然对康生搞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破坏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甚为不满；但是，通过这次整风审干运动，证明最英明最伟大的还是共产党，还是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共产党的政策是深得人心的。心里真的理解了，也就没有疙瘩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到报社，恢复原来的记者工作。

##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欣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新闻战士。他最善于运用报纸团结人民，指导工作；他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关心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的新闻实践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他所撰写的新闻、评论作品，许多传诵一时的名篇，都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观摩学习的范文。当我们隆重纪念这位历史巨人百岁华诞的时刻，缅怀他的新闻实践，他在生前对新闻事业的关注，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自从我投身党的新闻工作，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建国以后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谆谆教导，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从1957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这个报纸经常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并且有幸多次得瞻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尽管时间过了很久，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曹家铸下放农村锻炼后，在一个普及哲学知识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借《水浒传》第38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从哲学上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显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对条件的依赖性，同时指出，我们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去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促使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在此之前，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一阵“共产风”。这篇文章就是联系当时出现的“共产风”，以黑旋风和浪里白条打斗的事例，谈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受一定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只能在将来，在另一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事。”当时“共产风”正是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弄出来的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倒是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对条件依赖的客观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事物的转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条件，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像李这一样，注定是要碰壁的。”

因为这篇文章富于创见，文笔生动，发表又很适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看到一位大学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实际锻炼，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活泼，深受农民欢迎的哲学文章，自然会非常高兴。

—

1961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

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而研究和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机床），“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这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篇。毛泽东看过后，就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信未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可见毛泽东是此文一发表他就看过，第二天就写了这封信的；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机床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推荐和他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写给作者的信，不但激励了文章的作者们，也使我们报社编辑部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 三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读者为主要对象，学术与文艺问题都是它的宣传重点。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光明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在版面上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多次有计划地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大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他尤其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且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翌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摩尔根学派的著名学者李汝棋教授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他以亲身体会感到青岛会议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取得了重大成果。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亲自把文章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了一个按语：“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

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错误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青岛会议促成遗传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出现了可喜的团结现象。以后大学里恢复了摩尔根学派开的课。但是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门户之见仍严重存在，许多地方摩尔根学派依旧受到压抑，1957年有的单位还有人企图把他们都划到右派里去；有人说，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还出现了“粉碎”摩尔根学派的说法。

1959年至1960年间，我们派记者接连访问了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许多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青岛会议后几年间两大学派继续争论的情况，重温毛泽东对李汝祺文章写的按语，于1961年2月至8月间，在报上组织关于遗传学的讨论。这次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文章，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少针锋相对的“较劲儿”，也未发现乱扣帽子的现象。8月24日，谈家桢向本报记者表示，对讨论比较满意，认为对活跃青年人的思想有显著的效果。还说，目前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应该切实地做些实验室工作。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见谈家桢。1958年1月4日午夜，毛泽东派他的专机到上海把谈家桢和赵超构、周谷城接到杭州去聊天，同他们三人一起聊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每次同谈家桢见面，都先询问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亲切的会见，谈家桢本人和摩尔根学派学者都受到极大鼓舞。

#### 四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1959年初，为了打破反右派斗争以来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我们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学术争鸣。

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前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讨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用。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有一天，毛泽东在北戴河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 五

毛泽东特别爱看研讨哲学问题的文章。尤其关注逻辑学研究的进展。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就曾得到他的关切。1959年6月7日，毛泽东在致章士钊的信中，提到章著《逻辑指要》“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在“筹策”中，提到“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显然，毛泽东对于这种“争论繁兴”的盛况是十分高兴的。

周谷城回忆说：“有一次主席用长途电话要上海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实际上，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毛泽东曾多次找周谷城谈逻辑问题。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绝大部分都不同意周谷城的意见，使他不无顾虑。毛泽东在见面时总是鼓励他：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讨论。毛泽东还曾多次找来包括赞同和反对周谷城观点的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到中南海和周谷城聚会，共同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先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谈论逻辑的文章。这个报纸同时也发表不少持有不同意见、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据我听到，所有这些周谷城所写的文章以及同他争论的文章，毛泽东是很留心看的。有时刊有这些文章的报纸刚一出版，有关同志一早就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邀约前去交谈有关这些文章争论的问题。当周谷城将他就此问题写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的时候，曾写信请毛泽东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复信周谷城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信中所说“对逻辑无多研究”，自然是谦逊的话，猜想所以不愿“插入一手”，还是为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怕会影响争论双方充分地发表意见。

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毛泽东看了，当天上午就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干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在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 六

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设》月刊第12期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美学界引起争论。汝信、朱光潜、王子野、陆贵山、孟伟哉等许多人，都在《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

---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公司出版）第61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山版社）第559页。

《我所感受的团结》。《文史文章》（文史资料出版社），第一辑第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关于“时代精神”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讨论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各方来稿踊跃，仅1964年夏、秋三个月，就收到二百九十篇（批评周谷城的二百五十九篇，赞成他的三十一篇），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金为民、李云初看了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的形式，寄来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写道：“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同时批评姚文元说：“他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质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

毛泽东重视这场讨论，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文章，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这样。7月6日，他在看过报社排印的这篇文章清样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 7月6日

我在当天得知此事，为免我们报纸发表此文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与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商定：我们即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请他们把序言标示的日期往后移一天。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这两篇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

七

1965年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的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楔序》、《楔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行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名书法家与当时名士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楔”，会上各人作诗，并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类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法帖相传之本，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兰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扬，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历史上仍然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论它的真伪。由于积重难返，每次提出，必遭反对，当时没有条件展开争辩。因此关于《兰亭序帖》真伪的争论，在我国书法史上将近千年从来没有解决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老问题。

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

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上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认为是唐人所伪托的贗品。

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当时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同意此文看法，写了一篇《〈兰亭〉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在多处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总之，《兰亭》而视有真贗，绝不能逃唐文皇睿赏矣。”高的文稿写成后，曾先寄给章士钊看过。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7月14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毛泽东“忞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在他当时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持反对说者为“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譎，不中于实”。）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章士钊在信中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后写道：“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週（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于处理，感逾身受。”随信附寄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说：“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

毛泽东看过高二适的信和文章以及章士钊的来信，7月18日曾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迭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兴。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当天就约我和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在报纸上组织这场讨论；希望早日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

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其后郭沫若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大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份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毛泽东看清样非常仔细，不但改正了排错的字，有的地方还作一些批注。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讲到“《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临川王原是刘义庆的官衔，在清样上，后面有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字句。毛泽东看到这里，就在清样上批注说：“《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鲍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宋室传（见《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来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这一段批注，就是毛泽东信中说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讨论表现了极大兴趣。郭沫若的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注。有的写信给郭沫若或《光明日报》编辑部，无不赞成就此问题展开“争鸣”。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也有一些文章持论相反，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兰亭》真伪的争论，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讨论比较热烈、活泼，参与讨论者都能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其后，文物出版社曾将这次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报纸的传统，《光明日报》创办了几种学术性专刊，成为它的特点之一。《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等主要专刊，都是报纸创刊后很快办起来的，以后又创办了《经济学》，都受到知识界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1958年元旦创办的综合性的《东风》副刊，由于它集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于一体，逐渐也成为具有特色的副刊之一。

除《东风》副刊外，《光明日报》的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文、史、哲、经几个主要专刊的编委会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而且都有一支学术界知名人士为骨干的作者队伍。专刊、副刊都联系了广泛的作者，拥有众多的读者。当时由于国家纸张困难，报纸限量发行，供不应求，专刊曾经经过邮局单张订售，以满足读者需要。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几个专刊。大概是因为这些专刊经常发表学术、理论文章，能够反映较多的学术思想的信息。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记得有相当多的次数，每逢这个报纸发表了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常在文章见报的当天午前，就听说毛泽东已经看过，并且告诉别的同志看看，由于有的同志手边没有报纸，临时打电话索取当天的报纸，就把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带给我们了。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意我们报纸的学术讨论，爱看勇于探索、具有新意的文章。他所注意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不乏誉满全国的年长学者，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说明，他不但常看我们的报纸，而且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

1965年9月22日，《史学》专刊第315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中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新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同时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仍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毛泽东看了，十分赞赏。这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现在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1959年3月1日，《文学遗产》登载马茂元一篇短文：《柳宗元的诗》（是作者所写的《读书札记》）。毛泽东看了，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曾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同年12月27日，《文学遗产》发表了晏震亚写的《如何评价〈文赋〉？》。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曾把这篇文章批转给一位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在专刊问题上我们有过失误，是经毛泽东同志指点才得以迅速纠正的。开头几年，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这些专刊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猛增，篇幅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慎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学术研究中“左”倾思潮影响，这年10月编委会一度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哲学》、《史学》、《文学遗产》、《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我。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我们还收到有些读者来信，也不赞成这些专刊停刊。）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告诉读者。11月2日，又在报上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

这样就及时地纠正了这个错误决定，使这些专刊得以未曾间断地继续出刊。随后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毛泽东意见的精神，制定了改进计划，逐步采取措施，在报社编辑部年增设机构，建立了专管学术、理论宣传的学术部，除同有些专刊的社外编委共谋改进和协助组稿外，并将《哲学》、《文学遗产》两个专刊改由报社学术部主编。与此同时，学术讨论除在各个专刊上进行外，还扩大范围到正版，即在正版上也刊登学术文章，组织学术讨论。有时，还把写给专刊有份量的又为广大读者关心的学术文章，移到正版刊登；并在正版显著地位辟设经常见报的《学术简报》专栏，及时反映各地学术界活动情况、摘要介绍其他报刊重要学术文章的内容，以增强有关学术信息的报道。这样，报纸逐渐成为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学术文化的阵地。

十

毛泽东特别厚爱《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面发表的写得好的诗词。

1962年1月，毛泽东曾把《东风》发表的诗词，批作文件印发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主要由于党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动摇了信心。1961年12月28日《东风》刊登了民主人士吴研因（民进成员）、钱昌照（民革成员）写的四首七绝。诗人们兴致勃勃，描绘出一派兴旺景象，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就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大会

---

吴研因写的《赏菊》，全诗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竟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钱昌照《七绝二首》：《芦台农场》：“麦酋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芋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秘书处即用大字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曾将毛泽东批示的这张报纸，和用三号字排印的文件拿到报社编辑部传阅，大家看了，异常感奋。两位诗人听说，更是万分激动，大受鼓舞。

1965年10月16日，《东风》发表了叶剑英写的一首律诗：《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二岁生日。这天毛岸青、邵华夫妇前往看望，他高兴地为他们亲笔写了这首诗（书写时把题目改成《远望》），并在侍未写上“10月16日光明日报”。197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手迹。同时发表了叶剑英所写有关此事的《说明》。毛岸青、邵华为此手迹发表所写的《重读〈远望〉志更坚》中说：“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记忆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3年元旦，《东风》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词，引发了毛泽东的唱和，1月9日他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未注明“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在此以前，郭沫若写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也曾唱和，这些都已成为诗坛上的佳话。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书的红学家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文有新意，我们曾在报社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及21日又在《东风》副刊上选登了其中的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加以注明。毛泽东看到了，饶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登此文的两节，一定有其全文；并叫人打电话来。我们当即送去刊登吴著全文的《情况汇编》和《红楼梦探原》一书的英文版。

十一

最后，我还想起请毛泽东同志题写报头的事。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造诣很高，功力深厚，是举世公认的。他的笔力苍劲洒脱，气势磅礴，为国人所喜爱。我到报社工作不久，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提议换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开头他认为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给写。情况并非这样，郭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

有些同志担心没有希望了，我却坚信广大读者的这个心愿终会实现。在这方面，当时我曾想起先前听到过和经历过的一些有关毛泽东给报纸题写报头的事情：1938年5月，中共晋西南区党委成立后出版的油印报纸《五时时事》，毛泽东就曾给它题写了报头，还写了“毛泽东题”四个字。1940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区党委创办《抗战日报》（1942年8月以后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也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又给改名《晋绥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并叫延安解放日报社印刷厂制成铅版，和他题写的手迹原件一齐送到我们报社。《抗战日报》从1946年7

---

这首《满江红》并附郭沫若原词，均已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

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这新写的报头一直用到1949年5月1日报纸终刊。1953年我从朝鲜前线回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工作，院党委决定为全院师生和工作人员创办一张报纸，曾请院长兼政治委员陈展恳求毛泽东同志起个报名、题写报头。当时有些同志没有信心，以为毛主席的事情那样多，对于一张学院内部办的报纸，未必会写。可是，1953年夏季的一天，陈赓去北京开会回到哈尔滨，一见到我就高兴他说：我给你们求主席题写了报头啦！说完，他便把一张大约一尺见方的宣纸打开，只见上面已有毛笔写的几个报头，有个题作《军事工程》，其余都是《工学》，字是竖着写的。陈赓指着一个旁边划了圈儿的《工学》说：这是主席自己圈的，就用这个。还讲，主席圈定“工学”的时候说：“‘南京，（指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叫《军学》，你们叫《工学》好。”1953年9月1日，当全校师生拿起《工学》报创刊号时，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无不感到非常兴奋和无限喜悦。

后来，看到毛泽东同志手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后面，有“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字样。征得他的同意，1967年1月1日，即以这里头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沿用至今。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闪耀在眼前。他对《光明日报》的亲切关注，深深铭刻在脑际，铸成牢固的记忆。时光的流逝，丝毫不会磨灭他的光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迎面袭来的不论是惊涛骇浪，或者是凛冽寒风，只要想起毛泽东同志的关切和教诲，心里就会感到无腋温暖，倍增同一切困难拼搏的勇气，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关注，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前进。

##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沈 鸿

1942年的一天，“茶坊”工厂接到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毛泽东主席约见沈鸿。于是我和厂长毛远耀策马起程。从安塞到延安的上路上，残雪未消。人和马的口中，都喷出白气。

到达军工局已是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毛远耀陪我从大砭沟（军工局驻地）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的窑洞。一进门，一个身躯伟岸的人立刻站起来迎接。不用说，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毛泽东了，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亲切握手，又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

一落座，毛泽东就对我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啰，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我连忙说：“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的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自力更生”这个词儿，是我到延安以后才听说的。现在毛主席亲口道出，感到含义特别深刻。一直到近几年，我翻遍《辞源》、《辞海》都未见到“自力更生”的词条。我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的创造发明。

接着毛泽东问我是从哪里学到制造机器的。我说：“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接着毛泽东谈到边区经济的现状。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提的“搞重工业、大军工、大盐业计划的“建议”，我在军工局已看到毛泽东的“批阅”件。我还记得“建议”中有这样的话：“若使飞机蔽天，坦克塞野，战而下胜者未之有也！”

听罢毛主席的话，我心中暗暗佩服眼前这位巨人既有远见、又有十足的实干精神和洞察力。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我手中。

毛泽东笑着对我说：“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我笑而不言。心里思忖，跟上共产党，坚决于到底。“资本家”这根弦早已不系在我心上了。

谈着谈着，毛泽东问起了上海的情况。我告诉他，孔祥熙、宋子文怎样开纱布交易所、怎样一抛一购，转瞬间把上海的棉纱大工荣宗敬的财产弄走了一半，使这位民族资本家、大老板，恨得咬牙切齿，盼望共产党早点来哩。说得满室人哈哈大笑。

还说到宋子文的“扬子公司”怎样垄断从美国进口的军火，赚了大量的昧心钱……。

谈话有时严肃，有时诙谐，尽管室外寒风凛凛，室内却春意融融。

当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我们，席间毛泽东妙语连珠，谈笑风生。

回到“茶坊”以后，我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讲话（初稿），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意见。记忆中有印象的只有一条：原料短缺，生产上打打停停不是办法。建议有可能时，自己动手炼铁。

1943年，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越来越紧。毛泽东号召“生产自救”，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此时，军工局提出边区自己炼铁，吁请有关方面支援，并在设计、机械设备及冶炼方面指定由沈鸿、徐驰两人负责。

我在延安同毛泽东正式见面虽只有这一次，但经常听到军工局李强局长介绍毛泽东的许多史侍般的事绩。他的博大精深，平民领袖的作风，时有所闻。这次亲身接触中，对他那不耻下问，虚怀若谷的精神，印象十分深刻。在这以前，我已有实际体会，有一段时间，工厂的政治活动过多，影响了生产。我和钱志道兵工厂的化学总工程师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建议毛泽东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使生产回到正轨上来……。不几天，覆信接到，信中表扬我们反映情况及时，建议很正确。他已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我在延安工作虽然很紧张，但总是要挤出时间读书的。毛泽东几篇重要著述，对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持久战》，是我在延安读到的毛泽东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的理论逻辑力极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读后使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充满勇气和信心。

联想起自己来到延安，单纯地只是为了“救国雪耻”，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出力。抗战初起，我在上海、武汉时，也曾对国民党抱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幻想。但是国民党的行径使我失望。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想抗战，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真正在浴血抗战并在几个战役上得了胜利。事实真象就是这样。它吸引了我带着机器、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

但是抗战会取得胜利吗？为什么？何时……？这一系列问题，我是茫然的。象是在黑暗中，看到前面一点亮光，只有跟着这点光，才能走出黑暗，这就是我初到延安的心态。

《论持久战》，使我心里完全亮堂了，认识了抗日战争的必然，抗战最终胜利的必然。抗日战争采取的战略，策略，就是取得胜利的方法或道路。我终于摆脱了对抗日战争囿于感情——救国雪耻的蒙昧状态，获得了理性和清醒。

我又先后从毛远耀那里读到《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油印本）。当时，我不是党员，但我对党是诚实的，党组织信任我，让我读到了当时只有党员干部才能读到的文件。

在这以前，在我的头脑中有一种迷信：哲学是深奥的、高不可攀的一门学问，不敢问津。

读了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特别是两论以后，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哲学是帮助你怎样去认识客观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帮助你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作事业——改造世界包括改造自己的学问。每个人都有他的哲学，只是被经验束缚在感觉认识的低级阶段，没能作到理论的抽象而已。毛泽东号召哲学走出课堂，我个人是亲受其益的。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促使我世界观转变的催化剂！

在旧社会，我的正义感使我对光明与黑暗、善与恶能够分辨。追求前者

而厌弃后者。但我从没有想到怎样去根本上改变这丑恶的现实。我只知道依靠个人奋斗、掌握实在的技能、本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作一个清白的、有用的、争气的人。一句话，我的世界观，像给我影响很大的《十大成功人传》（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经过延安的实践和耳濡目染，对自己原来走的道路，已在逐步变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的认识升华了。

“两论”一直是我反复阅读的经典。开国以来我又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进一步增加了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

1965年，毛泽东批准我国自己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完成，《人民日报》约我写一篇感想。我在百忙中只抽出了不到半个钟头时间，写了一篇约400字的短文。说明万吨水压机制造成功，是运用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方法结出的硕果。这篇短文不是应付、应景之作，而是我们工作的高度经验概括。以后有我经手的几项大的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也都是“两论”的理论。

是伟大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使我同一些传统观念决裂，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

## 我印象中的毛泽东

王朝闻

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先后只不过是两次。在参加会议或听他讲话等公共场合，远远地见到他的次数也不很多。读他的著作和听别人对他的叙述，有些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他没有发生六十年代以来的某些错误，我也不会遵照他所说的两点论那样去认识他。六十年代初或五十年代末，我在讲话或写作上都引用过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论点。但我自己，实际上却长时间违背过这一正确论点。这就是说，我在理论上反对盲目崇拜，但我对他的敬仰也不免带有崇拜的意味。

我长时期对毛泽东的信仰，并非象教徒对待上帝那样的迷信。我对他的信仰虽有崇拜性质，但在认识上却不是盲目的。是他那历史的功绩，富于个性的言行，直接间接地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

四十年代初，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工场工作。记得当时有两件小事，也能使我感到堪称伟大的毛泽东，竟自那么平易待人，言谈幽默。一件是他穿着有补丁的衣裤，在广场上给鲁艺全体作报告。当讲到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引用“黔驴计穷”的寓言时，还模仿了驴子的一个动作，用一只脚向后一蹬，引得我和大家一样都笑了。我自觉在这样的笑里，主要不是觉得这个动作滑稽，而是它体现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切关系。我相信他在重要会议上一定很庄重，但他此刻对我们毫不见外，深感他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首长架子。另一件，是院领导陪他到西山看望工作人员。当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听说我是搞雕塑的，他立即说：“你是做泥菩萨的。”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他这话的内涵是指对神的崇拜，只敏感到他那应用群众语言的习惯，和这种语言也有幽默特征。后来，我写作时和别人一样，称他为“我敬爱的毛主席”。这话并非违心的套语。而是以我自己的特殊感受为依据的。

1942年院方把我从甘谷驿调回延安，参加在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当时偶然和他坐得很近，但彼此之间没有机会说话。当天我只注意到，他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事时，字迹很大。一向节约纸张的我，对此觉得是他不拘小节的性格表现。比这种琐事更重要的印象，是他在第三次会上的长篇的讲话。当他谈到将要整顿三风时，说延安好比一潭死水，用棍子一搅，沉渣将会泛起（这几句话在报上发表时还保留着，印成小册子和辑入选集时被略去了）。这几句话，当时给我造成了深刻印象。不只觉得这种比喻生动活泼，而且认为这话并非幽默性的戏言，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

后来的整风，特别是审干运动，证明了成对他的比喻语的内涵的预感没有落空。审干运动伤害了不少干部。当审干结束后，他在延安大学讲话时，脱下帽子向听众鞠躬致歉。这一出人意外的表现，大大增加了干部们对他的信仰。我相信，他那强调自我批评的论点，也具体贯彻在他的这一行动里。我在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却和受伤害者一样接受他的鞠躬道歉，因此深受感动。真所谓坏事变好事，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些受过伤害、忠于革命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信仰毛泽东的另一依据，是和我当时的工作相关联的。我为中央党校新建大礼堂作了毛泽东浮雕像，大家把它抬去安装到建筑物留下的园洞上。当场副校长彭真问我能不能作全身像。我说能作；能作塑像的条件是给毛主席拍摄几张同一姿态而角度各别的全身像。彭真同志欣然答应，这成为我的一种期待（等待有照片作塑像的参考）。不久，钟敬之同志（美术工场负责



人)间接向我转述这事的結果：毛主席不同意给他拍照；理由是胶片那么难得，用以给前方战士拍照，比给我拍照重要得多。我虽惋惜不能因此为他作全身铜像，但是，也像他反对用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那样，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和观点，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也可说是对他的崇拜感。

重说一句：这种崇拜感与个人迷信有质的不同。

四十年代后期在张家口，我为做好毛泽东像访问过许多同志。访问过胡耀邦同志，更多地是要熟人说出他们的感觉和印象。我发现，别人和我一样，好印象是以实际的感受为基础的。我当时访问别人所得到的印象，最感人也最深刻的，是来自延安鲁艺（在华大戏剧系）的熊焰的谈话。她说：当毛主席一走进临时当作舞厅使用的延安鲁艺大礼堂时，她猛然觉得大屋子仿佛突然变小了。这是领导者的这种偶然出现所造成的幻觉和错觉，其实并不偶然，而是敬爱之情的自然流露。她的这种特殊感觉，是和她平日对毛主席由衷的敬仰有内在的联系。我至今还认为，这种幻觉和错觉的性质和意义，正如战斗中的士兵对他们的统帅的信任一样，也是文艺工作者自然形成的一种情感态度。

有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我自己，似有必要在这里作一回顾。1949年在《文艺报》任编委时，主编丁玲同志对我说，毛主席曾问她，你看过王朝闻的文章没有？还说：“有点马列主义嘞。”作家丁玲同时还讲起，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态度，无拘束且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要我在适当时间，同她一起去见毛主席。后来没有去成，但丁玲的转述间接鼓励了我对艺术理论的探索。间接听到上述评价，那种暗暗高兴的心情是不消描述的。当年唯恐引出骄傲自满的误会，除了在家里对简平说过，在机关里却守口如瓶。现在看来，毛主席不只向丁玲说过这样的看法。不久，新华书店王子野同志要我出版论文集。这一点更加可以证明，丁玲同志的转述有据。我的《新艺术创作论》出版之后，听说，沈阳新华书店在橱窗里，以显著地位和方式陈列了这部新书。至于后来六十年代初《红旗》主编陈伯达要我去讲美学，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同志写信给我介绍一位所里的青年美学工作者（要我帮助他探讨艺术现象），当年出现的这些现象，也许和毛主席对我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的《致友人书》的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大有关系。

不妨附带提到：我在1949年11月25日的《新艺术创作论》的《初版自序》末段里，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作了暗示性的叙述：“在这些短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增加写作热情和勇气的鼓励。其中，有我们最敬爱的同志的鼓励。”我所指的“我们最敬爱的同志”，那暗示性的表达方式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当时为了避免引起写作“夹私货”的批评，不敢直说又不忍不说。基于感谢毛泽东同志对我的研究成果的肯定，所以不禁在《自序》里作了上述藏头露尾的表述。也许这种表述，曾作用于这本集子的多次印刷发行。但1967年造反派审问我时，我对这话的来历存心“耍赖”。对方问：毛主席怎样鼓励你？我谎说那也许是谣言，我从来没有接近过毛主席，“最敬爱的同志”是一种泛指。我这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避免引起“捞稻草、垂死挣扎”的再打击。后来，没有因此受到“不老实交代”的指责。也许，这也得感激在那么复杂的情势之下，毛泽东的评价对我还起着“救生圈”般的作用。

当时我还隐瞒了另一个事实：1955年，我、蔡若虹、张愕都在中南海和毛主席接触过，而且，毛主席对我的和蔼态度，与上述了玲同志的转述对

得上号。事先，我得美协秘书长张愕通知，说毛主席要看全国美展的作品。除了把作品送到中南海，还要我陪同看画；以便和蔡若虹一起回答他可能临时提出的问题。次日去时，看见靠桌子椅子摆了一地美展作品。毛主席进屋之后，要我们和他坐在一起。蔡若虹和张愕坐在他的右边，我坐在他的左边。我一反平时好说话的习惯，只默默地陪坐着看画。但脑子并不平静，随时注意这些作品的特殊点。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多是些生活现象的如实记录都显得不太有趣。毛主席默默看了一阵，突然转头向我。也像四十年代在延安说我是“做泥菩萨的”那样，带点开玩笑的口气问道：“理论家，这些作品你看怎样？”我理解“理论家”一词带着轻松意味，但我仍颇紧张，不敢随便说话。我对前半句的话一直有深刻印象，对他提问的后半句话的原话没有确切的记忆。但上述记忆对原话的基本内容，不会有错。当时我体验到他对作品有所不满，不过是要我们先说说看。附带提到：“文革”以后，若虹同志写的回忆录，和我自己当天的深刻印象小有出入。若虹说我先说出自己的意见，其实我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事实是：毛主席先向我提出问题，我才作出即兴性的回答。当时，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是信心十足，只不过是按我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认识，说出大意如下的话：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创造典型部分的论述，特别是那创造典型的六个“更”字，已经对这些作品提出了间接的但有批评性的判断。他听后，沉默一会儿，微微点点头。我作回答时，心跳得很猛，等待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却这样点点头，这对我是一种非同小可的鼓舞。

我想若虹、张愕和我一样，当时都期待着听取毛主席对这些作品的具体意见。好像他在延安批评一些漫画那样，说出对我们的文艺思想一定很有启迪作用的话来。可惜，立刻有人进屋通知他参加对将军服的评选会，未能听到他对这些美术作品的评论。他站起身来，要我们同他前往会场参加评选。在会场里，毛主席单独坐在长桌前面。我没有见过面的将军们，坐了一屋，再就是将军服的样品，会场气氛严肃。我觉得这样坐在那里不太合适，估计不会再有时间对我们评画，我向张愕提出是否告退？张愕征求了秘书的意见，我们没有向大家告别就退出会场。在回家的路上既感到轻松，又惋惜失去听毛主席意见的机会。从此，再没有直接和他接触的机会。也不知因为什么，美协没有设法间接了解他对那些美术品的观感。我长时间为此感到可惜，羡慕音乐家们能够得知他对音乐问题的指示。

还有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写出来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毛泽东个性的多侧面。大约是1952年冬或1953年春，我还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奉办公室委托，要我把毛主席送给画家齐白石的两瓶湖南的特产菌油，送到齐白石家里。人们只知道齐白石送给毛主席图章和绘画，不见得知道毛主席对这位同乡老画家齐白石，竟是这么关怀备至的。

近读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1945年7月18日《致陆定一等》，使我忆起大约是在1964年发生的一个值得回忆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里指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 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大约是1964年的上半年，全国美协按照中宣部要求，通知我和蔡若虹等同志，用书面方式写出各人对美术学校的基本练习，可不可以用裸体模特儿的意见。我们书面意见认为：品行不端者对模特儿的侮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但雕塑、绘画的基本练习完全不画裸体模特儿是有害无益的。那时，虽有康生借这个问题在兴风作浪，我觉得应当对美术事业负责，还是坚持说了真话。也许中宣部把我们的意见转告了毛主席。他的《致陆定一等》这封信表明，对有关专业性的问题，是尊重专家和群众意见的，没有受康主的错误意见的干扰。

因为自己长期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怀疑过他有错误处。当然，我对“两个批示”是否符合文艺界的情况不是没有怀疑的；至于他对鬼戏问题的判断，当时就不以为十分中肯。为什么当时产生这样的感觉和怀疑？因为，在五十年代初，从两次到大雅宝胡同来访我的田家英同志（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的谈话里，得知毛主席关心李苦禅在教学方面的职务。李系勤工俭学时期的朋友，为职务问题给毛主席写了字迹很大的一封信。我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和副教务长，所以田家英同志为了此事特来找我。此外，还谈到他常到琉璃厂去，替毛主席买线装书。而且后来得知，因为毛主席要读有鬼的故事《何典》，特为他用大号铅字印了一批这部小说。我还得到过这本小说的大字本，阅读得来的印象证实了鲁迅先生的有关论点——谈鬼就是谈人。我相信不信鬼神的毛泽东，对以鬼为形象的小说的认识和鲁迅先生的判断一致。万想不到，后来我谈到有鬼魂出现却是思想端正的传统戏曲，却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当林彪事件出现之后，我对毛主席的一贯英明的感觉有所减少。但听到造反派所传达的他那给江青的信，引起我对他那处境的为难也有所体会。我被“解放”之后，又江青的胡作非为，觉得毛主席没有及时处理而任她占据高位是一个失策。尽管如此，我一直对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的断语从未怀疑。这样的断语是以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不是任何凭空怀疑所能抹煞的。

还有：毛泽东在军事哲学方面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对我的艺术哲学和美学思想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我不大习惯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政治术语，但不妨重复地说，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名著所体现的方法论对我影响极深。同我对他在长征途中的诗词的反复阅读的兴趣相比较，我对他的哲学著作的阅读的次数多得难以统计。尽管有些同志对他的著作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或者不谅解他晚年某些影响深远的错误，我仍然深信他那“实事求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反对“好就一切皆好，绝对好”的形式主义学风的观点的正确性。

对我这个平日较多关心艺术问题者来说，这些零星的感性印象的回忆，虽不可能成为全面认识毛泽东的重要依据，但从不同侧面的实际感受着眼，这种不带成见和不加水分而有切实感受的回忆文字，却可能也有助于有关的研究。所以，我这样写出我印象中的局部和片段。

## 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

华君武

1942年年初，在延安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人合办一个《讽刺画展》，地点是在军人俱乐部新建的砖窑里。当时在延安开画展并不多，漫画又是群众爱看的，因此引来了很多观众，也可算是一种轰动。过了几天，毛主席突然带了几个同志来看这个展览，我这时正在值班，就由我陪着毛主席看，主席看得很仔细，也问了一些问题，多半是画面或主题思想表现不明确，当时我作了一些解说，因为年代久远，已记不清毛主席问了哪些话。看完后，我送毛主席出门，按当时延安的习惯请毛主席批评，毛主席说了“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又未敢再问。

大约时隔半年之后，约在夏秋之间，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编辑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我们毛主席约我们三个人（蔡若虹、张谔、华君武）去见见面。那天下午我们如约，由舒群陪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我们和毛主席见面和谈话，就在园子里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后来吃饭也在那里。因为时隔已有五十多年，很多细节已经忘掉，我们是下午去的，吃了饭天气已近黄昏，当时谁也没有手表，估计大约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我迄今记得最清楚的是毛主席关于漫画的一段谈话，大概毛主席看到我在《解放日报》上画了一幅批评植树不养树的漫画，延河边上矗立着一根无枝叶的细树干。毛主席说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那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由此毛主席就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段谈话在以后几十年我们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当时还说，可不可以同时画两幅漫画，一幅是表扬正确的，另一幅是批评错误的。我因这种表现方法比较呆板，所以很少采用。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人物，我们都很景仰他，除了我几个月以前在《讽刺画展》时见过毛主席，平时都是在大会上较远的见到毛主席，现在坐在主席身旁，自不免有些拘束，但毛主席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拘束感，使人很自然地主席讲话。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

我在吃饭时看到桌上有碟生煊青辣椒加盐，我就问外边传说毛主席连吃西瓜都就辣椒有无此事，毛主席也笑着说那是在长征已到甘肃某一个村上，休息吃饭，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送来切好的西瓜，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我也问了毛主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主席说你要想到为人民。我记得我们向主席告别时，毛主席送我们到院门口时，又对我重复了这

---

关于1942年的讽刺画展，我后来逐渐认识，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许多漫画没有后来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友我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这些漫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又是民族矛盾处于严重关头，举行这种展览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句话。

这次谈话当然还谈了许多，蔡若虹或张诤也会各有重点记住一些谈话内容，其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曾向我们了解这次谈话，可能他的记录会更全面些。

## 毛泽东的教导永志不忘

草明

当我想到自己从参加革命后能够多次见到我国的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鲁迅和毛泽东时，我庆幸自己真是生得逢时。这两位伟人曾给我许多教诲和关怀，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使我永生不忘。这里，我单单回忆毛主席历次的谈话，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的深远影响。

早在三十年代，左联小组常传达有关瑞金苏区反“围剿”的情况，我就听到有关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消息。我心中早留下了我党领导者的印象。事隔多年，世事几经苍桑，革命在前进中屡遭挫折。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党又撤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我们搞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过着地下生活）我这才结束了经常改名换姓和被特务追踪的生活，时年我28岁。

绵延的秦岭，秃秃的黄土高原，虽有辽阔苍凉之感；但延安解放区却给我一种圣洁，潜藏着无限伟力的喜悦。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夜不用锁门。我的两个女儿和刚学步的儿子在平台上玩耍嘻笑；有时候进老乡家坐坐。他们热情得不让我走。啊，在这样自由、令人奋发的天地里，我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不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致敬信，表达我对党对解成区的感谢。

过了一年多，即1942年4月9日的那天早上，忽然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邀请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负责人欧阳山和我到他那儿去。欧阳山是第二次见他了，我却是头一次。我早就想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伟大的英雄，如今突然实现，心中未免又紧张又高兴。我们和大家一样，没有新衣服好换，只扯扯衣领把扣子扣齐，便动身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去了。

我们到了昆仑收发室，便有人领我们直到毛主席的窑洞里。

毛主席看见我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在他对面的可坐二人的沙发上。他自己也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这两只沙发，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很难得的了。毛主席开始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主要提三个问题，文艺为什么人问题，立场和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并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毛主席和欧阳山便滔滔不绝地交换意见，从文艺的定义到文艺的政策，从到工、农、兵中去到改造世界观。……我插不上嘴，只一味默默地观察。只见主席的衣着和我们穿的灰布棉袄完全一样，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衣衫有点破是最平常的事，谁都不以为耻，倒是觉得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应当的，领袖也不例外。同时我还注意到毛主席与人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我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主席讲到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并要熟悉他们，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时，我又暗自思忖：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十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可我参加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心中有些不以为然。我还没有说话，只是边听边思考。后来，毛主席问我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

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

我回答：“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我略举了两个例子。我因为来时没有准备，只简单提出这个问题。但毛主席一听倒很重视，认真分析解答了这个问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听了这精辟的见解，觉得深入工农兵中生活竟有这么多好处，这不是一贴改造世界观的良药吗？我倒很高兴，只是自己还没有实践，不知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功效，还得试试看。勤务员同志把饭菜端来，在八仙桌上摆开。毛主席留我们俩吃饭，并招呼江青出来与我们相见。按规定，多一客饭添一个菜，有炒猪肚、炒猪肝等四菜一汤，大米饭。在当时来说，有如海鲜山珍。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主席来第二封信要我们收集些材料给他送去。信云：

欧阳山二同志：

草明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我们这儿是文艺研究室，毛主席知道我们室一定会有许多书籍和杂志。至于反面材料，我们很注意反面两个字，考虑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文艺观，我们和魏东明，吴介民、汪畸，董迟等同志都动手找。找了一堆，由欧阳山过目选择、逐篇理出论点，插上标签，以便主席看时方便，材料包好后派我送给毛主席去。我到了昆仑收发室，有人带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让我坐下，并询问我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

我回答说，一切都好，只是三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主席当即叫秘书叶子龙同志进来，让他代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请他安排我的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又请参加长征的傅连璋大夫进来，请他让我的小儿子欧阳加进中央托儿所。

我登时感动得几乎掉泪，同时又后悔不该向毛主席说困难，致使领袖为这些小事费神，我再不能耽误主席的宝贵时间，我拿了信便向毛主席告辞。叶子龙同志送我到收发室外。

我看时间还早，便直奔王家坪参谋总部。到了叶剑英参谋长家，恰巧吴玉章同志在座。叶剑英同志不慌不忙地让我坐下，留我吃饭。我心想一定是吃狗肉了。因广东人爱吃狗肉。说了一会儿话，我向剑英同志说明来意，并把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了信，马上起身给干部子弟学校的吴燕生校长写信去了。吴老和我攀谈起来，问我广东话鸡字怎么说，高尔基的基字怎么说。我当即活跃起来，把‘鸡’和‘基’的广东发音念给他听。

吴老点了点头说：“北方话就发不出这个音。”

我高兴地说：“广东话的合口音北方也没有。”

吴老好像没有注意这个发音，叫我念一念。

我当即念了“合”“及”“湿”“缉”。

吴老笑着不住点头。原来剑英同志嫩了一只肥母鸡招待吴老，我也沾光了。我吃罢饭，拿了介绍信，便向吴老和剑英同志告辞。

我一路上想着党对人民的生活，干部的困难竟这么重视，而国民党压迫人民，摧残革命的文艺家。他们是失人心，注定失败的。我们党一定能得天下，挽救中国，振兴中华的。我更坚定地毕生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忠诚。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来自我国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来自抗日前线的文艺工作者，还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工作者聚集一堂。这座唯一由青砖灰瓦盖的，镶着玻璃窗的小礼堂坐得满满堂堂，既温暖又活跃，谈笑风生，充满朝气。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差不多都到齐，穿插在群众中说笑。

毛主席进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即开始讲话。他讲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他指出到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家，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或还没有弄清唯心与唯物的区分；甚至有写过一些错误的文章，大家讨论一下今后怎样到火热的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全身心地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共同努力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表示今后决心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也有的同志勇敢地发言，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还有人说艺术家本来就不是政治家，就是研究艺术，马克思主义限制了创作等等。

休息时，文艺家掀起了思想波澜，三三五五地在一块儿议论，或与熟人倾谈。我在人堆中倾听。忽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面生的同志向我打招呼，问道：“你刚从西南重庆那边来，到这儿还习惯吗？”

我可能过惯了白区秘密工作的生活——总想隐蔽自己的行踪，不觉惊诧地唐突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从重庆来的？”

他微笑地回答：“我是吃这碗饭的嘛。”

旁边有个同志介绍说：“他是陈云同志。”

大家笑了，陈云同志也笑了。我也明白过来了。他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管干部的。这时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并深深感到我党的领导同志都那么深入群众，关心大家；领导与干部之间那样无拘无束，亲密融洽啊！

讨论会继续进行，大家热烈发言，革命前辈也和我们一同研究文艺工作问题。他们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同志讲到如何转变立场的时候说：他出身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仅把立场转过来，硬是投降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我听到这些肺腑之言，十分佩服。我深感我们知识分子不愿承认自己站在小资产的立场，更不承认自己头脑里有资产阶级思想，即使改变一点，也忸怩小步走。原因是还没彻底认识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朱德同志的讲话狠狠戳了我一下。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有些作家以为自己有了读者，就骄傲起来，他指出：“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会欢迎，这就错啦。”

上面朱德、陈云同志那些精辟的话，是毛主席报告最好的注释，与报告的精神互相辉映。令我终身难忘。我庆幸我们党有这么多真知的见和灵活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毛主席的理论思想和众多领导人的智慧，几十年来便成为毛泽东思想，是治党、治国、教育人民的思想。

讨论会进行两次。5月23日毛主席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会议过程中，还照了像。吴印咸同志轻轻扳了一下像机的快门，咔嚓一声，把这历史性的映象摄下来了。

会议以后，我比开始时理解得深了一些，心情也愉快得多了。但是，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调，还是以后长期地、不断地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斗争的工作中去磨炼，受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的教育与熏陶，才逐渐改变的。

《讲话》总的来说的确是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写好作品的一服良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42年的下半年，我尝试到基层去接近群众，为了方便，我趁西北文工团去清涧、绥德、米脂演出的机会和董速一起同去。人家忙演出，我们分头到老百姓家访问，有时也向文工团的同志访问。马健民、苏一平是正副团长，闻捷是团里的成员。此行只是了解一下西部人民生活的大概，记录一些民歌。秦腔《十三把镰刀》当时是受欢迎的。从老百姓宰羊杀鸡送给文工团的热烈场面，便知道他们渴望文化娱乐的迫切心情。这一访问虽然收获不大，但我看到了延安地区人民的生活，对党的拥护和感激，对文化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增强了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感。

1943年转入整风运动，后来我病了，住到中央党校疗养所时，我不错过时机地帮助一些红军同志补习文化，听他们讲长征和抗日前线的故事。他们在长征和战争中坚韧顽强和必胜信念，深深地教育了我。

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喜讯在延安各个山头 and 原野传开。立刻，通红明亮的火把照亮了山山岭岭，欢呼声淹没了大地。

“我们胜利啰！”人们振臂高呼。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共产党万岁！”有人含着眼泪欢呼。

“毛主席万岁！”人们想起了《论持久战》的英明论断了。

是呀，八年浴血抗战，我国军队——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付出重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承受了特大的灾难、付出千万人的生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也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我们疗养所的全体疗养员，医务人员，炊事员同志都点燃了火把，欢呼的喊声与对面山头的欢声相应，和地上游行队伍欢呼应和。

这一夜，人们沉醉于欢乐和兴奋中，医生不辞劳苦地巡视病房，送安眠药，给较重的病号量血压。

经过好多天大家心情都平静不下来。老红军磨拳擦掌，只等命令重返前线，地方干部收拾东西要求回到岗位上。一些较重的病号由于着急，病倒反而重了。医生一方面劝慰大家，但他们自身也着急。希望能抽身被派到新解放区去。

由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不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去收复敌占区，而他自己一心想消灭我们的部队，却又部署还未就序，所以他邀请毛主席去谈判，以拖延时间。党中央英明地决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当这个决定公布登报后，在我们疗养院引起了大家的极度不安。疗养员三三

五五的议论，医护人员和大师傅开会讨论，全所一致意见不主张毛主席此行。主要是大家深知蒋介石其人贯于背信弃义，他对待张学良将军便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领袖犯不着和这种人打交道。夜幕降临，人们还忧心忡忡，无法入睡。其中一个河北正定的干部为这件事竟半夜还睡不着。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便起来，划根火柴点亮油灯看当天的《解放日报》。报上显赫地写着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

他叹了口气，只好带着不安又躺下。过了一会儿他又怀疑这不可能是真的，便又起来划根火柴把灯燃亮看报，果然是真的。如是者三次，反复折腾了一夜。

8月28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同志乘飞机走了。

我所的红军干部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号召，纷纷奔赴前线，疗养院空了一半，留下病较重的和一些暂时未及安排的在这儿子着急。只好每天静候毛主席的消息。

谈判结果，终于在10月10日毛主席与蒋介石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公布了。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暂时停止内战。

10月11日，毛主席安然回到延安，我们大家才舒了口气，放下了心。

时间一天天推移，疗养院的疗养员走的差不多了。我心急如焚。立定决心到东三省解放区去工作。我步行二十多里回到党校找黄火青同志（他是党校秘书长）请他派我去东北。他认为我身体不好，不答应我去，我磨破了嘴皮，他才说，如果医生同意并开证明，我可以批给你一匹马和一个勤务员，你就随古大存这个队一齐走，他的队人少，对你有个照顾。

我高兴地第二天一早就去中央医院门诊部找我熟悉的李执中医生，他很赞成我走。他认为我只是体质弱，走走路，到了新区会振奋精神的。他痛快地给我开了证明，我回党校办了手续，去见了古大存同志，只等待出发。我心里非常高兴，十分平静，只是觉得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毛主席。我何不趁这功夫看看他老人家 and 去见见邓大姐。主意既定，我又从党校步行三十里路到了枣园。邓大姐热情接待了我，并指示我到了东北新区，要注意作妇女工作，不论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都有妇女，要是妇女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更注意的是劳动妇女，农村妇女。日本14年的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影响较深，妇女背上揸的精神负担更重。要宣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

说话间开饭了，邓大姐留我吃了晚饭。我告诉邓大姐我想见毛主席。邓大姐立即出去看毛主席有空没有。她找江青来引我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和我打了个招呼，还在批阅文件，桌上饭菜都已摆开了。他放下笔，问我吃没吃饭。我说在邓大姐处吃过了。

我看见毛主席面色很健康，西南的猛烈的阳光使他变黑了。这一个多月的谈判耗去毛主席多少的精力，这点无私的阳光，是给他的一点补偿罢了。我怕毛主席见我一个人坐着，要找话和我说，势必影响他吃饭，我不如主动地趁他吃饭当儿，讲讲疗养所当时的情况和那位正定的疗养员担心他去重庆的故事给他听，估计我讲完，他也就吃完了，谁知我还没讲完，他已吃完了。他听我讲完后，微笑了。这微笑透出他对党中央这种决策的信任，也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藐视。他说：

“他们之所以不敢动手；不是因为毛某有什么；而是因为共产党，有

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解放区的人民和大后方的革命人民。”

噢，我懂了，毛主席把一切功劳都归到党和人民身上。

我告诉毛主席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讲话》精神去做，我顺便谈到自己过去不懂得工农兵中去。虽然生在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

毛主席说：“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前方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我说：“可惜我懂得太晚啦，我都33岁了。”

毛主席说：“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

他可能觉得我有点稚气，所以他用坚定的口气鼓舞我。我尔后常常认真地想这句话。

毛主席跟着问我道：“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

我答道：“没有受委屈。”

毛主席听后，说：“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我明白他的这句话是针对当时整风后的整个形势讲的。我能说什么呢。失误、不满、灰溜溜等错综复杂的情绪，虽被抗日战争的胜利喜悦所冲淡，但谁能说得清这个问题哩。我正在思考中，毛主席又问我道：

“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

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了解到这么细微的问题。因此我慌乱地回答说：“是的，我现在没有感情了。”

毛主席纠正我说：“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

是呀，没有家室拖累。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融合到做工人工作中去。我想，妇女应该有这志气。

最后毛主席还关切地问我道：

“到前方带孩子去吗？”

噢，敬爱的毛主席，你日理万机，还惦记我的孩子！我强忍着泪水，回答说：“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两个大的女儿读书的读书，有一个都做工作了，小的还在托儿所。”

毛主席点头说：“那好，孩子交给党。”

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我受益太多了，够我下半生用的了。我起身告辞，毛主席送我出门时。还关心地问我：“有没有骑马来？”

我为了少麻烦领袖，只好头一次对他撒谎说：

“有。”

毛主席点头，和我握手告别。

我踏着微明的月色，黄土高原上温和的寒风送我回党校。我一路上思考毛主席的话。我认为毛主席的话是代表党的声音。他启迪了我遇事都要从党的立场党的利益出发去看待并解决。我们的行动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我谨记党的嘱托，因此在我尔后生活和实践中，不管遇到困难、挫折或冤屈时，我都能用党教我的思想去正确对待。

到了东北，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了。新解放区的工作使我忙的什么也顾不上。中共东北局组织部的林枫同志指示我到镜泊湖水电站去工作，他说：

“今后是城市领导农村，我们的作家应该熟悉工厂，熟悉工人，现在还没有作家去工厂呢。你去罢。”我听了之后，认为林枫同志这番话是有战略意义的，哈尔滨是党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党开始接收城市，不仅在经济建设上有新的布局，即便在作家的分布上，组织上也有所考虑并安排了。我本来是生长在南方手工业的镇子，并且老是以女工的苦难和反抗为题材写作，延安出来后，我在张家口宣化的龙烟炼铁厂工作过，也在哈尔滨邮局做过工人工作。现在接到去水电站的命令，我就欣然服从了。1948年我以水电厂工人为题材写了中篇小说《原动力》。这部书曾赠给第六次劳动大会的代表们，人手一册。这时中央的唐彬同志有事来东北局，我趁唐彬返回中央的机会，托他把《原动力》带呈毛主席，作为我实践《讲话》精神的初步试卷。

1949年1月，收到江青来信，说他们看了我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她还流了泪。信中又提到我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他们很感谢我等等。（1947年毛岸青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他非常聪明，只是不了解国情，中文较差。蔡畅大姐向东北局建议，为了安全，不必让岸青去学校，让我辅导他中文）此信虽然是江青写的，但口口声声提到“我们”，我想可能包括毛主席在内。因为我从来都没和江青通过信。

1949年3月，党中央在北平入城式中检阅军队时，我们适逢“三八”节前夕，妇女代表有幸参加入城式。毛主席检阅完毕，下车和各界人士、妇女代表一一握手。我高兴地说：“我没想到那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主席说：“你也来啦。”他刚说一句，大姐们便抢着和他握手了。

另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0年元旦。我们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回到北京。康克清大姐邀请李德全、曹孟昔和我等几位女同志到她家吃饭。饭后，她又邀我们一起参加中南海的舞会。康大姐竟下令让那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朱德总司令和我们跳舞。老是踩人脚的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踏步，留下了除夕的美好的记忆。散会时，我趋前见毛主席，对他说道，世界人民热烈欢迎中国的胜利和欢呼毛泽东的名字。

毛主席说：“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流血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更谦虚谨慎，为世界人民多做贡献。”

时光流逝得真快呀，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党的教导，毛泽东同志和许许多多革命前辈的循循善诱，我时刻没有忘记，不管国内刮什么风，国外起什么阴云，我都没有迷航。这都是毛泽东思想深深印在我脑子里所致。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中去的教导，我时刻谨记并实践。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东北的重工业比较集中。我着了迷似地下工厂做工人工作，深受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的教育，他们勇于奉献，富于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不计报酬，不怕失败地搞发明创造。我长期地不断地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启迪，对于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起到良好的作用，而且生活题材源源而来，写作的路子也开阔了。直到此时，我深刻理解《讲话》的深远意义。我多年来先后在辅导数百青年工人业余文学爱好者中，首先和他们一起学习《讲话》，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可见《讲话》的基本精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遵从的。

纪念毛泽东同志，最好是谨记他的教诲，并身体力行。我们中国已走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祖国的责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严肃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肩上了，我愿和同行们共勉。

## 鲜花一束——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侧记

余湛邦

从重庆谈判起至 1966 年止，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毛泽东主席有过一些接触。尤其 1958 年 8 至 9 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邀请张治中同行，当时我是张的机要秘书，荣幸地得到随从的机会。途中早中晚基本和毛主席共同活动，亲见亲闻，所知较多而切实。他的身影、音容、笑貌、风度，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我用小品文形式写成若干则闪光的片段。1993 年是他老人家百岁寿辰，这些小品文就作为向他敬祝寿辰而奉献的一束鲜花吧。

“你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人”

重庆谈判经过 43 天的针锋相对、剧烈斗争，终于达成了协议，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在桂园签订了一份名为《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的文件，外间习惯地称为《双十协定》。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张治中陪同去山洞林园与蒋介石继续商谈。十一日凌晨张治中坐车送毛去九龙坡机场。毛经过 43 天的密切接触，对张有了较深的理解与评价。在车上对张说：“我在重庆经过调查，知道你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人。”张问：“何以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好些人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在綦江搞的一个集中营给撤销了，是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毛主席的调查是确实的。《扫荡报》社的董事中很不少是著名反共人物，如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之流，他们对此当然多方阻挠，大加反对，最后张治中直接签请蒋介石批准，这些人才闭了口。康泽办的集中营指在四川綦江的“战时干部训练一团”。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实际上是收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施以“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特务训练，对进步分子大加迫害，囚禁挺杀，人死就报逃亡。张治中据密报，派人调查属实，亲往解决，把首恶分子押交军法审理，不久就把这个反动组织撤销了。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紧张活动中，张治中和毛主席通过频繁的接触，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因而建立了很好的交情。1949 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到毛的住处双清别墅会面，毛一见就紧握张手深情地说：“谢谢你对我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并且问候张的身体和家人可好。还继续说：“我到重庆时你用上等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用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今天特备薄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毛的态度热情而又坦率仿佛老朋友久别似的，使张十分感动。

到同年 6 月 27 日，张治中在报上发表了起义声明以后，毛、张的交往更加密切。毛对张优礼有加，常常请张到中南海吃饭，谈问题，遇到中共其他领导人或其他未接触过的友好，毛总爱笑着介绍说：“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此话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此话包括了对张不平常的评价，也体现了对张的关怀。

也许由于重庆谈判时张治中慨然地把官邸腾让给毛、周作为活动休息场所，所以张一经决定留居北平，毛、周就马上先给他解决寓所问题。我是跟随张夫妇去挑选房子的。先到方巾巷看一所小洋房，张考虑到质量虽佳，但房间少些，不能容纳他全家人口，表示有困难，后来分配给宋庆龄。然后到西总布 5 号，三个大院子的古雅平房，质量高，够气派，张夫人又嫌高门槛

太多，她迈步进出有困难，这房子后来分配给李济深。还看了其他几处房子，都感到不太合适。最后看到北总布胡同 14 号孙连仲的官邸，这原是德国人盖的别墅，房厅富丽堂皇，餐厅能摆四、五十桌，舞厅能跳百把人，屋前大草坪足有一两亩大，现代设备齐全。张老夫妇表示很满意就住下来了。

有一回，山东农民把收获的特大大白菜四棵送给毛主席，毛马上命转送一棵给张。我们一称足有二十七、八斤。张夫妇舍不得吃，用一个大花缸以沙土种下，摆在客厅中间，菜心抽出苗子，足有二、三尺高，亭亭玉立，人见皆惊奇。

我心里常想，谁说共产党人少人情味？这里，人情味不是很浓郁吗？

“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北平和谈破裂，张治中留居北平，从 4 月下旬至 6 月下旬，张有过内心斗争激烈、心情十分苦恼的一段时间。他是个读了十年线装书的人，颇受旧伦理观念的束缚，一时摆脱不了。他的苦恼环绕着以下问题：（1）我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投向共产党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叛变呢？（2）蒋介石是国民党党魁，我是他手下的重要干部，而且一向受到他的赏识重用，现在我这样做，人家会不会说我是背叛党魁呢？（3）我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首席代表，现在谈判失败，不回去复命是否合情合理呢？

毛主席深知张治中的矛盾心情，特来和他谈心，多方开导。董必武、林伯渠、朱德、叶剑英等来的次数更多，最后还是周恩来的话起了作用。周除了为他分析革命大义是个人与革命、与人民的关系，不是个人恩怨的关系，国民党、蒋介石、南京政府早已反革命、反人民、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成为反革命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最后严肃地说：“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良药苦口利于病，从此张治中思想上豁然开朗，幡然憬悟，随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受到中共和广大人民的欢迎。

是年 8 月，新政协已在密锣紧鼓中酝酿，有一天，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我们准备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联合政府，请你也参加。”张说：“过去这一段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这是对张治中的极大的期望与鼓舞，张欣然表示接受，从此轻装上阵，焕发青春，积极地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你委屈了吧？委屈了吧？”

大陆解放了，中央为了统筹全国军政，酝酿设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内定彭德怀充任，有一天，毛主席和张治中谈话：

“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将成立，想请你和彭德怀合作，充当彭的副手，你意如何？”毛征询张的意见。

“噢，是各大区都要成立吗？”张心下略有犹豫。“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毛幽默地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更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我愿做彭老总的顾问。”张说。“你去做彭老总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毛幽默地说。还继续补充：

“我已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那样

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程已经满口答应了。”

“我还有什么话说，我只能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张感到有点窘。

然后，他们谈到新疆问题，毛主席说：你的关于处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很好。一切请你和彭总到新疆去就地研究解决。关于民族自治问题，可以按照《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处理。对于原在新疆的官兵，不必让他们进关，可以把他们的家眷送去，并多动员妇女到新疆去，就地成亲，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张治中和毛泽东的交往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毛对张所作的评价如此之高和多，在民主人士当中是很少见的。比如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过去的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等等，这些话，都包含了深刻的用意、高度的评价、殷切的期待、热情的关怀。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确实如此，众所周知的，比如“三到延安”，护送毛泽东来往重庆延安之间，保证了人民领袖的安全，这显然是为人民革命立一大功。比如说，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特务统治下，把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中一百多中共人员释放并护送回延安不用办任何手续，堂堂正正地从监狱出来。这是为人所不能为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绝无仅有的事。比如说，新疆和平起义，固然主要是由于革命形势、民心所向和起义人员冒死奋斗，但是张治中在新疆多年所推行的亲苏和共、民主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打下了起义的基础也密切相关，尤其1948年他对起义的亲自部署关系更大。比如说，在全国人大一届大会开过之后，他马上建议建立视察制度，使下情得以上达，使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得以密切，这种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无论建国前、建国后张治中都做了许多的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

毛主席不但对张治中评价多而高，而且在政治上学习上对张也备极关心。

张治中在1949年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一个总结，写成《六十岁总结》一文送请毛审阅指正。毛看后即复张一信：

“文白先生：来信早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日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气氛方面，是在能使人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在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大的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

过了好些时候，张、毛又碰在一起。张问：“你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用意指那里？”毛说：“你在《六十岁总结》里不是说对阶级斗争观点尚感模糊不清吗？”张说：“那是指刚解放初期，以后经过学习就搞清楚了。”

在信里，毛主席不但从《六十岁总结》中张的内心表现与进步要求寄予希望，而且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指出学习和改造的重点，给予指导。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人们如何看待它，确是人们世界观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毛对张在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给予慰藉，也是在政治上的关心，对统战政策的贯彻，我们从信中得到许多启发。

“其鱼甚多咧”

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各省。某天，在长江轮船上，毛主席正面江而立，注视江水，若有所思。

张治中站立毛身旁，特为我向主席介绍：“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

毛主席回过头来，温和的眼光落在我的面上。“噢！”跟着伸手向我。

我迈前两步，双手紧紧握着他温暖的手，我的心突突地跳，行动既紧张又拘谨。当时船上机声隆隆，人声嘈杂，我顾虑他老人家没听清我的名字，就补充说：“我叫余湛邦。”

毛主席听了微微抬起头，似在沉吟。

我又想到我的名字不好念，不好写，常常易被人弄错，同时我的广东腔咬字不准，因而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毛主席跟着问：“是干钩于吗？”

我马上心里责备自己：“多疏忽，怎只提名而不道姓？”就赶快答：“是人禾余。”

大概是我的紧张而又拘谨让他老人家看出来了，他温和而又带点幽默地和我讲：“yú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禾余，有人别俞，有口人别喻，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指着江水说：“还有水里的鱼。”最后补上一句：“其鱼甚多咧！”

毛主席风趣的谈话，平易近人的态度，马上解除了我的紧张和拘谨。我想，毛主席这一特点，使得他很容易接近群众，也很容易使群众在他面前能够畅所欲言，因而他能够经常地听到群众的声音。

“吃得很舒服嘛！”

毛主席的饮食非常简单朴素。

张治中告诉我，他在五十年代常与毛主席共餐，有时两人、三人、四人不等，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素食为主，没有大鱼大肉，更没有山珍海味。有时还请了张的夫人、儿女，一起吃饭、谈话、看电影，非常随和欢乐。

有一回，在长江轮船上，毛主席夫妇加上张治中、曾希圣、王任重共进午餐，只有一碟炒青菜，一碟黄瓜肉片，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份量也不多，这是我亲眼目睹的。

有一回，毛主席视察到芜湖，住在交际处山上，而食堂在山腰。连天细雨，坡陡路滑。吃午饭时，毛主席不要人送，亲自从山上下来到食堂和我们共食，还请来两三位干部和工勤同志，边吃边谈，了解问题。

餐厅大，摆了许多方桌。桌上每人面前一碗、一筷、一小碟，食堂中间摆了一个大木饭桶。毛主席不要服务员装饭，自己亲自到饭桶去装，装了个半碗。张治中跟着装，装了个满碗，还覆上半碗，鼓得高高的。毛笑着对大家说：“他的胃口多好，你们看他装的像窝窝头。”

在视察途中，大家基本上同住、同吃、同活动。我多少次看到毛主席吃早餐，常常是油条、面包，有时是小菜、鸡旦、稀粥。张治中关怀地说：“主



席吃得这么简单？”毛笑笑说：“吃得很够了嘛，很舒服嘛！”

“我非酩酊大醉不可”

毛主席非常重视形象思维，认为古典诗词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成为诗词，在日常生活中又常常反映他这种观点。

安徽解放后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某年搞了一个大型展览请毛主席视察，毛和张治中一道边看边谈。

当毛主席看到一种手摇的收割机，一边是手摇的小轱辘，一边是小车轮带动的剪刀，说明员表演给他看，他说：“这是推头机”。看到灭蚊的火焰喷射器表演时，就说：“这是‘火攻’。”当看到捕鼠灭鼠的器具时，方法多而巧妙，说明员逐一表演给他看，他说：“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呢！”

当说明员介绍化肥部分时，毛主席笑笑说：“你知道的那么多呀！”还说：“肥料中主要成份是氮，氮性质和氧不同，氧易和人合作，氮和土壤中的矿物质不易起化合作用，要搞‘合作化’是很困难的。”

当毛主席看到许多轻工产品十分精美，有的比上海的还要好，曾希圣介绍说：“我们经常派人到上海去学习，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毛说：“好呀，你们原来拥有一支侦察队，专门向上海剽窃东西的，我告诉他们到法院告你们！”

毛主席在文物馆看到一只安徽寿县出土的春秋时代的“爵”，工艺很精美，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说明员介绍说：“这就是古人喝酒用的杯子。”毛对身旁的张治中说：“送给你带回家喝酒好不好？”张说：“看容量总有一斤多，喝了这一杯，我非酩酊大醉不可！”

“我有这副滑杆”

建国后，毛主席喜欢到各省走动，报上时有报导。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内心非常希望毛也到安徽特别是巢县去，有为家乡人争光的念头。为此他不断地向毛介绍安徽情况。

有时介绍安徽的山河壮丽，物产丰富。有时谈到安徽古今人物荟萃，如刘邦、朱洪武、朱熹、包括淝水之战等脍炙人口的人物事迹。有时介绍黄山胜迹，说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并说：“您已到了许多省份去了，为什么还没到我们安徽？”有一回，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京，张就问：“这次没到安徽去吧？”毛说：“嗯，还没有去，作为‘负债’吧，记下这一笔债吧！”由于张谈到安徽的次数太多了，毛就幽默他说：“看来，你这人乡土观念相当重！”

有一回，毛问张：“你说黄山如何如何好，可有上山的路？”张答：“可以从皖南坐车到黄山山脚，上山时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

后来，毛主席真要到安徽视察，张又重申前请，毛幽默他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但是当他和张谈到西湖风景时，盛赞南高峰、北高峰风景的美好，说已上去几次了，张有点心动，就问：“可有滑杆可雇？”毛指着自己的双脚笑笑说：“我有这一副滑杆！”

张似乎还没意识到，抬滑杆的大多是穷苦农民。人家汗流浹背地抬，自己优哉悠哉地欣赏风景，把自己的享受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是于心不安的。

“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

建国初，跳交际舞曾经盛极一时，毛主席也很爱参加。

有一回，在武汉，当地党政同志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东湖的长天楼，办了一个舞会，请毛主席参加。毛对张治中说：“我们今晚跳舞去。”

张说：“我不会跳，跳不好，”毛幽默他说：“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

到了晚上，毛、张一起到场。开始，张只是观舞，不参加跳。后来江青来请，张觉得情不可却，一起跳了。休息时，毛对张说：“你也下海了，看来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张说：“我跳舞向来是三不管的：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步子，跳不好，您过奖了。”江青说：“你不是跳得挺好吗？”

到大江大河去游泳人所共知，毛主席爱好游泳。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对张治中说：“我这些时候，活动紧张，身上感到疲乏，打算往外走动走动，你愿同行吗？”张兴奋他说：“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毛主席还说：“我此次计划游长江，游钱塘江和其他江河，你可能同游？”张说：“我不会游，只能在水上带上个汽圈泡一泡，还得有人跟着，恕我不能奉陪了。”毛笑笑说：“那好吧，你就当个‘观潮派’吧。”

毛主席对游泳还有过一个伟大的设想，他曾对一些国家级的游泳运动员说：“中国江河那么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作游泳场呢，中国六亿人口，能不能动员百分之五十的人参加游泳呢？”

他还说，“你们要走出游泳池，到大江大河去。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勇敢。”游泳运动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事业，你们要有专业心和长期准备，不当运动员还可以当教练嘛，还可以做一个体育工作者嘛！”

毛主席游泳的兴趣很高，某次，在武汉停留七天，就游了长江七次。有一回，他从江里爬上船，就对张治中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按：毛主席在这里暗示的是当时苏联对我们施加的压力）。

“台风也可以一分为二呢”

某次，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向毛主席汇报工农业生产，说去年江苏遇到特大台风，受到很大损失，今年没有台风，丰收完全有把握。

毛主席指出：台风也可以一分为二呢。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从汉中出兵，一路打到徐州，正在兴高采烈与文武百官置酒庆祝，项羽率领三万轻骑突然来袭，把刘邦打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项羽衔尾直追，刘邦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突然天上刮起一阵台风，顿时飞沙走石，伸手不见五指，项羽只好收兵。刘邦才得保存性命，率残部逃回洛阳。

“台风也可以一分为二呢”。此话甚有道理。事物都有其二重性。台风能使人们受到损失，但偏巧又救了刘邦的性命。在这个故事里，刘邦被袭击受挫是其不好的一面，但由此领教了项羽的厉害，懂得如何对付项羽：“吾与若角智，不与若角力”，为以后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积累了经验，这就是坏事变成好事了。江苏去年遭受台风的袭击，蒙受损失，是坏事；但如因此总结经验，今后惩前毖后，加强预防措施，就可以减少损失，这不是坏事变好事了？

“行伍出身的不可不学《吕蒙传》”

张治中是个军人，而且是个读了十年线装书的儒将，所以毛泽东和他聊天时就多谈文史和军事人物。

比如谈《三国演义》、《三国志》时就大谈曹操、刘备、孙权、周瑜、鲁肃、关羽，大谈赤壁之战。谈到朱萑时就接上程颐、程颢、周敦颐，谈宋、

明四大理学派系，谈到客观唯心主义。到了安徽就谈刘邦、韩信、彭越、黔布、朱洪武、包拯。谈到朱熹时就指着他案头的朱注《楚辞》向张介绍说：“你读过《楚辞》吗？这是本好书，我借来好久了，介绍你看看。”谈到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就说：“三国时陆逊是东吴大将，孙子陆机、陆云，都是晋代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最有意思的是由关羽败走麦城而谈到吕蒙，对吕作了扼要的介绍，大意是：吕蒙自少参军，骁勇善战，但没有文化，当了将领后禀报军情也只得心记口述，很感苦恼。孙权劝他念书。吕说军务倥偬，没有时间，孙以自身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会没有的。吕听从了，刻苦自学，数年之间，判若两人。有一回，鲁肃到吕驻地看望，与谈作战。吕条分缕析，悉中肯綮。鲁大为惊叹，因柑吕背说：“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了！”

驻在荆州的关羽进攻曹操的樊城，吕蒙用计诓骗关羽把全军开赴前方，然后以轻骑疾趋南郡——今之宜昌，郡守糜芳出降。关羽将士家眷都在南郡，吕蒙进城，对他们特加照顾，对老弱者慰问，对疾病者送药，对饥寒者送衣食，对关羽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从前方派来的人予以优待，使与将士家属相见，关羽将士知道家属情况，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

毛主席最后说：吕蒙如不析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

## 终生难忘毛主席给我的教益

刘 英

毛泽东这个名字，建党初期在湖南就很有名。我是1925年3月在长沙女师入党的。大革命失败后，听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我们都心向往之。1927年12月，我参与组织“灰日暴动”，因计划失密而受挫。此后离长沙，到上海，赴莫斯科，辗转多年，直到1933年6月被派回瑞金，这才有机会同毛泽东同志见面认识。

那是刚到瑞金后没几天，我到中共中央局那座小楼上去看望洛甫（张闻天当时通常用的名字），见到有个高个子中年人在那里谈话。洛甫忙介绍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我还以为你们早就认识呢！”毛主席很风趣，连说又多了一个湖南老乡，湖南妹子。听我说起周以栗（时任内务人民委员）是我的老师，他很高兴，告诉我他们在湖南一师是同班同学。

在当时党内的争论中，周以栗完全支持毛主席。他同我谈了近年来毛主席所受的种种委屈，对我说：“现在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我就不同意。照润之这一套做，打破了‘围剿’，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依我看，山沟里的就是能出马克思主义。”周老师还交代我，才到中央苏区，要注意观察思考，不要随便跟人跑。

由于有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缘，我同毛主席一认识就很熟悉，他对我也象师长一样爱护、关心，给我许多教益。第一次见面时，洛甫向他介绍我：刘英现在少共中央局做群众工作。毛主席便说：做这个工作好，但要注意通俗化。你的对象不是学生了，而是农民。农民的文化很低，语言要通俗。讲得深了，人家听不懂，讲话不能用那个学生腔。我听了很受启发。

记得1934年9月中旬，我再次到于都“扩红”。任务很紧，要求在9月27日之前扩大红军4500人。我赶到于都时，才征集了255人。几天下来，没有多大起色，我就去找毛主席想办法。当时毛主席正在于都巡视工作（后来知道是察看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的路线）。他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听汇报。我向他反映：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很困难，大家缺乏信心，不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毛主席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我说：“再开会，就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十天了。”“不，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主席坚持要开会。

我又说，扩红突击队的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毛主席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他把四个警卫员叫来，让他们把通知的内容复述了三遍，立刻出发。

这一着果然灵，9月19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这时，离长征出发只有20天了。

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一屋子。毛主席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了。我先做报告，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布置的扩红任务，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

我讲完后，下面一个劲地鼓掌，欢迎毛主席讲话。毛主席却不过，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毛主席围绕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的讲了反“围剿”形势的严峻。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的任

务。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动员，“决心”很快转化为行动，于都的扩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此，9月2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了最大成效。”

到9月底，我们动员了将近1000人参加红军。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在5月我第一次来于都扩红时，这个县已经有3300多子弟当了红军。这回要不是毛主席帮我做动员，大家下决心，还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毛主席爱看书，长征时还带着书，他的担子主要是书。他有熬夜习惯，躺着看书。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他都放在箱子里随身带。在毛尔盖，晚上看书，他把炒熟的青棵麦子装在一口袋，看一会儿，就抓一把麦子吃。他的记忆力好，看书专心。看起来，通宵不睡觉。刘伯承曾对张闻天讲：你们该和主席讲一讲，他晚上不睡觉。毛主席睡觉时，不高兴别人打扰他。谁也不敢去喊他，怕他发脾气。刘伯承就动员我们去喊他，用担架抬起来。我们不敢。一直等队伍走远了，他才骑马跟上来。

毛主席办事决心大，办法多，这点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更加使我钦佩不已的是，他处理重大问题的深谋远虑，既牢牢掌握原则，又非常灵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可是其中也有隐忧，就是张国焘有野心，毛主席同洛甫等多次商议，认为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关键就在张国焘身上。我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听到毛主席与洛甫商量具体办法。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要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洛甫就跟毛主席说：“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这个位子，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安排，照顾了他的要求，又不让他把军权全抓去。原来担任总政委的恩来，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7月18日发布了这项任命后，张国焘才同意执行党中央的方针，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尔盖地区集中。

可是，张国焘还要在党中央内扩大他的势力。不几天，他又通过一个紧急干部会，提出要求把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提拔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为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又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毛主席去找张国焘谈话，把我带去了。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我给你带来水来了！”张国焘一下懵住了：“什么水啊？”毛主席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爷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主席同张国焘都是党的“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文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说笑话，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张国焘讲话转弯抹角，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想提四方面军的那些人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当面他不直接讲，总是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要坚决提拔。毛主席也跟他讲一般原则，说，按照党章，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情况特殊，才这样做的。四方面军中有好多很好的干部，提拔是需要的，但到中央的总是少数

代表嘛。

毛主席跟张国焘聊了好久，摸他的意图。回来后又同洛甫商量。他们看透了张国焘的用心，是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当然是张国焘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四方面军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所以，认为为了团结北上的大局，吸收四方面军的干部到中央是可以的，但人数不能多。他们对张国焘请人送来的名单提了意见，同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来回磋商，从名额到人选基本取得一致，才由洛甫在沙窝会议8月6日的会上提出：三人为中央委员（其中二人进政治局），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经过讨论，毛主席同张国焘软磨硬顶，最后基本上按这个方案解决了组织问题。

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大家都为过草地做准备，主要是搞吃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使我终生难忘。

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顺利通过草地，前方部队送来一头牦牛做吃的。警卫队把牦牛宰了，牛皮和内脏煮出来大家吃一饱，牛肉每人分一点，晒牛肉干当干粮。毛主席吩咐首先要照顾休养连。警卫队长就一份一份分好送去。贺子珍当时在休养连，给她的比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的稍多了点。这事不知怎么让毛主席知道了，他很生气，把我找去，问：“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我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他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我找到警卫队长，他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部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等几位的了，这可怎么办呢？”我知道毛主席的脾气，忙对他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于是，就从他们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点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我向毛主席报告了处理经过，他才放下心。

每想到这件事，我的心里就油然而生出一种对毛主席的敬意。在最艰难的岁月，毛主席就是这样身体力行，追求公正、平等，不搞特殊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把这种品德，奉为自己行为的准则。

## 激励与内疚——思念毛主席

朱仲丽

刚踢了毯子，一条黑长的辫子从胸前被一只小手甩向颈背，我跨进房门口，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商量好事。

我好奇地问爸：“谁是润之？他是干什么的？”

爸爸朱剑凡笑嘻嘻地回答：“他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名叫毛泽东，知道吧？在闹革命啦！”

妈妈的声音显然是愉快的：“今晚搞什么好菜款待他？……哦，我记得他爱吃我们做的油泡鱼、火焙鲫鱼……”

我拍着手跳：“好！我也爱吃。”

毛泽东和爸爸坐在客厅里喝茶谈当前形势。

“我们的文化夷社顺利开办了，这要多谢你的经济捐款和政治上的支持。”毛泽东的声音使那客厅门口，穿着红衣的女孩我专心静听。

“来，八妹子！过来。”

我应了一声，跑到爸爸膝前，害羞的眼光，痴看着青年毛泽东。

“叫毛叔叔！”爸爸低头对我说，摸着我的辫子。

我乖乖地喊了一声“毛叔叔。”

毛泽东笑问：“你几岁了呀！”

“我五岁了。是周南女校一年级小学生了。”

毛泽东一怔：“哦！难怪你这样活泼、大方啰，别人家的女孩子逢男人都怕见，咦！你没有缠脚，也没有穿耳孔。”他望着我，似乎要寻找我身上的特点。

我勾着爸爸的颈脖，坐在他膝上，好奇地报以傻笑。心中产生了一种欢快和亲昵感。这穿着灰色布长衫，头发蓬松，目光锐利的二十余岁的青年身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到延安之后，群众爱戴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我早年在家见到的毛叔叔。他怀念旧友，怀念我的爸爸妈妈。“唉！你爸爸死的太早，要不，就当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了，可惜。”“你现在已当上大夫了。”毛主席在延安初次见到我，谈了那么多，他还鼓励我说：“你要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我们边区缺医缺药不要紧，有你们这些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医生，为病人利益救死扶伤，是会克服暂时的困难的。”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激励了我的事业。在悠悠四十年行医的旅途中，我全力以赴，治愈了许多垂危病人，始终是一个医疗作风良好的医生。

怎能忘记儿时我家庭院里，曾遇到一位心怀大志的英俊青年，他见我走了过来，笑问：“你真了不起了，是小学生了。你爸爸好爱你。”

我害羞，又调皮回道：“毛叔叔，我爸爸才真的喜欢你哩，说你听工人和农民的话……毛叔叔，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不把饭粒掉在地上？是不是你要当泥木工去？”

毛泽东大笑起来：“是的，我要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还要当泥木工的带路人……你听懂了吗？”

我摇摇头。

毛主席握着我的小手亲昵地说：“啊！难怪你爸爸爱你，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读书，世界上有许多道理，慢慢就会明白过来的。”

我带着满脑子听不懂却又能背诵出来的话：“农民运动讲习所”，“当

泥木工的带路人”……而最激励我的是“好好读书”。

的确，毛主席给我儿时的教导，在我的实际行动中实现了，初中我跳级一班，高中跳级两班就跳到医学院校，直至毕业。那时我才二十一岁便在医院当大夫，四十多年的医务工作之后，进入六十三岁的这一年开始执笔写作。我能在生活的旅途中披荆斩棘爬上山顶，是毛主席给我有力的鼓励。

我不会忘记1940年，那时，党中央办事机关设在杨家岭，新盖的大礼堂尚在施工，毛主席、王稼祥、杨尚昆、王首道、吴玉章，以及许多同志都暂时分住在土窑洞里，我和王稼祥住的窑洞与毛主席住的窑洞是近邻。

一天，毛主席的右肩疼痛，勉强握笔，他紧锁着眉尖对我说：“我这右边肩膀好痛呀！已经有好几天了，你这个医生有什么好法子？”

经过我的检查之后，确诊为右肩胛筋腱炎：“毛主席！你这是受了凉，又受了湿。”

“受了凉湿，那怎么受的？”

我仔细察看这窑洞又去摸摸那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再细瞧床上好薄的褥子和盖被。“啊！”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又快步走向窑洞壁的又深又黑的防空洞口，一阵阴风扑向我。

“主席！你盖的被子太薄，桌上写东西的玻璃板太凉，这防空洞口的阴凉风直吹进窑洞里，是个威胁。”

“什么？你是说对我的生活是个威胁？”

“唔！你的肩痛就是这阴凉风吹的，盖的东西要加厚，玻璃板也不能用了，设法子挡住这股防空洞口的风。”

毛主席睁着眼望着我，半信半疑。

我请毛主席坐在椅子上，开始给他按摩，他感到舒服：“这几下子就把酸痛减轻了……嗯！你说的看来有道理，害死人的阴风、歪风、不正之风。……”

我边按摩边听。

毛主席继续说：“现在在党内有一股不正之风，就象这防空洞的风，害人不少，我们全党必须要发动群众整顿三风。……”

按摩完后，毛主席急忙又伏案写起来。不久，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当我听了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读了整风文件之后，我深深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毛主席患肩肿关节痛，坚强地与疾病作斗争，仍忘我的工作，令人尊敬。当我劝告毛主席，请他每天做功能恢复把手举的高高的动作，以及其他活动时，他的回答是“没有功夫”。

我说：“毛主席，请你多多活动臂膀，要不右手抬不高，连举手敬礼也会有困难。”

他幽默地回答：“举那么高干什么？只要能握手写字，能抓筷子吃菜就行了。”

久而久之，毛主席的右手抬不起来，我十分内疚的是没有尽到医生应有的责任，没有亲自督促他作恢复功能的动作，以致成了关节强直，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向群众招手时，他的右臂总是不能举成一百八十度。这个治疗上的缺点，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生活上，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使他的活动多一些。一天，江青在他们窑洞前喊我，我正无事，忙走了过去，她对我说，叫我此刻教毛主席跳



交际舞，她说毛主席正忙着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喊手臂不舒服，非叫他出来活动活动不可。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小任务。

警卫员把一个陈旧了的留声机搬出窑洞，放出来的音乐声音是嘶哑的，我表情失望地走过去，警卫员告我，这是从前方缴了战俘的，全陕甘宁只有这一架。是的，是的，虽如此老化，在战争环境中也是个宝贝。

毛主席从窑洞里走出来，先坐在一把藤椅上抽着烟，脑子在想着《讲话》的内容，没有发现我站在跟前。江青忙着找旧留声机片，放出来的仍旧是沙沙音的舞曲，我请毛主席跳舞，教他跳最基本的步法和姿态，我主动地带着他跳，我感到他的右手抱着我背腰部时显得无力，不时移下来：“主席！你应该按时运动，跳舞也可以活动肩肿部的……”

“那好嘛，以后天天请你来教我跳舞。”留声机已换了四张舞曲了，毛主席松下手说：“今天，你叫我向前，我就向前，你教我向后，我必向后，向左向右都听你的指挥……好了，不听了。”他笑着一甩手就进窑洞写《讲话》去了。

当《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时，我心中产生了无限的情感，是我亲身体会了他在写“讲话”时的生活情景。

“朱医生！有请！”这是那天晚上叶子龙秘书在我窑洞外叫我的声音。我应声后，他又说：“可以吗？三缺一呀！请你驾到！”

我问三缺一是什么意思？

叶子龙笑答：“打麻将牌，只有三个人，点名请你凑合。”我说太晚了，他正经地回道：“现在毛主席愿意玩麻将了，趁此锻练他的关节活动，也是医生的任务。”

我即刻跟上，到了毛主席的窑洞里，桌子上麻将牌已摊满，毛主席指着一张空椅叫我坐下。毛主席很高兴，打了头四圈又打第二个四圈，他身前一大堆赢了的筹码，笑指着我说：“朱医生，朱阿姨！你欠了我多少？快算出来。”

我在心中算着，但算不出来。

毛主席说：“我这牌押了你二万元，又买了你四万元，加低子一千元，还翻了三翻，一共多少？”

毛主席见我窘迫笑道：“我就是要逼你快点在心里算出来，哈！快算，有几千几万？”

我算呀算，还是毛主席很快地先算出数字来。又打了几圈之后，他站起来说：“好了，今晚完成了治疗任务，摸一张牌，打出一张牌，又在桌子上洗牌，活动不少了还赢了一大堆金银财宝。”

毛主席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上没有娱乐活动，不跳舞，不打麻将，非常枯燥，这一年竟能抽时间玩玩，也是因为活动肩胛关节的目的，大家想了这个简易办法，劝了他很久才答应的，在延安那样简单、朴素、艰苦的环境中，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奢侈了，但又是唯一的松弛脑神经紧张的生活调节。

由于我体会最早最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言传身教，激励了我在自己生活的旅途中常锻练自己脑细胞功能的敏捷性，更时刻铭记延安生活的困难，毛主席本人生活的俭朴，才在我自己的行动中实现起来。

1954年，当我还在北京友谊医院当院长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嘱托我一个他盼望能实现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因我的疏忽始终没有力毛主席解决，辜负了毛主席对戴大夫的一片心。我至今犹感内疚。记得那天在中南海，毛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我叫叶子龙介绍一位戴医生上你们医院工作，你见到

她了吗？”我忙说见到了，并告诉已分配在妇产科。

毛主席继续告我，戴医生的丈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戴医生早年就拥护共产党。他说他对她的为人、品德、历史都了解，可以在友谊医院入党……。她本人早就请求入党。

我欣然答应，我立即告诉了妇产科支部书记，希望他们支部能发展戴医生为共产党员，但我没有指出这是毛主席推荐的。半年，一年，两年，一直至1960年，我快调离友谊医院的时候，戴医生的入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我也把这件事搞忘了。一天，毛主席第三次问我：“戴医生，已经入了党吗？”我摇摇头回答：“妇产科支部没有通过她的请求。”

毛主席问：“为什么？”

我仍回答说：“没有通过。”

毛主席默默无言。

我回到医院，又问妇产科支书，为什么戴医生没有被批准入党？

支书给我的回答是群众没有同意。

我焦急他说最好能尽快地培养她入党，她是一个忠实于党的事业的人。至此，我心中干着急，却没有亲自和戴医生谈谈心，没有深入到支部去寻找原因，这是我终身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往事。想到毛主席身为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客观，如此民主，不走私人路线，不强迫下级党组织，而是按党的原则办事，事后没有批评我的不是，至今使我激动，使我内疚。

反右开始时，在中南海内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问我：“你们医院里划了几个右派？”

我回答已有十二三个。毛主席沉默良久之后又问：“你们医院总共多少职工？”我回答共有一千一百多人。毛主席提高声音，作右手往前推的手势严肃他说：“你们医院不能划这么多的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即算带了帽子，将来也得给他们出路。”

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政策，已先在一个中央会议上谈到了，这次又亲自向我了解医院情况并向我作了口头指示。可见，我虽然是医院“反右办公室”的主任委员，却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我把毛主席的口头指示作为我个人意见，几次向党委提出这个少划右派的建议，而且提出了几个同志不应划为右派的名字，费尽了功夫争论也是枉然。我后悔当时没有找北京市上级领导，把内情转告，我想如果当时亲自去找市长彭真，可能得到一臂之力的。

通过这个问题，我深知党中央毛主席的反右运动，以教育为主，宽大力怀。但政策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执行程度下一样，有的贯彻不够理想，致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

说来，我要感谢毛主席的一件事，是我和王稼祥同志结为伉俪，是毛主席在无意之间牵的红线。那是1938年六中全会刚胜利闭幕，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区代表举行了聚餐，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忘的活动。我先吃完了，一人走出门外，晚霞抹亮了这饭厅，我昂头欣赏这彩色的时候，听到一阵阵笑声临近，魁梧的毛主席身后，跟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他们一起走出门外，毛主席一眼见到我笑道。“啊！这是我们的朱医生啊！……哈……来！我问你。”

我红脸快步向前：“毛主席！你好。”

毛主席笑嘻嘻地看着我：“朱医生呀！我来问你，你愿不愿去开一个牛皮公司，你来当经理？”

我怔住了，牛皮公司经理？

毛主席伸出右手，掰着大拇指、食指、无名指、小指不断他说道：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有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能夸夸其谈，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经理必需拉拢一批人为他出力办事；第四，当牛皮公司经理还要会宣传，印小册子，画广告，……第五，还要……”

王稼祥同志连忙近前一步笑说：“还不能红脸害羞。”

毛主席也笑：“是，是，不能脸红。”

我这时满脸通红傻笑。

这时候，警卫员都陆续把马牵来了，各首长都一个个上了马，英姿勃勃地逐渐远去。

隔不久，王稼祥同志打听了我是萧劲光同志的姨妹子，写了一个便条给萧劲光同志：你可不可带你的姨妹子到我家来坐一坐？

我和王稼祥同志认识半年之后，结为夫妇。

毛主席作了红娘。

几十年之后，毛主席笑着向我说：“你把王稼祥同志的身体照顾得如此结实，这是你的功劳，你们可算延安的模范夫妻，假如，没有那次我和你说牛皮公司的话，主稼祥同志就没有机会见到你，至少会推迟时间……。”

啊！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们夫妇俩的媒人。

## 毛主席对王观澜的教导和关怀

徐明清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这是毛主席亲自到延安中央医院看望观澜同志后，1941年12月16日，给身患重病的王观澜书写的一段文字。毛主席的这个题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激励着观澜以坚强的意志战胜顽固的病魔，重新投入革命斗争。数十年来，这段富有哲理的名言广为流传，成为激励人们同各种病魔作斗争的座右铭。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给观澜写这段文字？关于他写这个题词的前前后后，许多人是了解，或者不甚了解的。今天，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同观澜共渡几十年不平凡生涯的战友和妻子，在观澜已经去世十二年，他自己已不可能在此陈言表达心底的激情的情况下，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我和观澜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亲身经历的，直接或间接地与毛主席的这个题词有关的一些事情回忆并记录下来，写成这篇短文，以此来祭奠我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英灵。

毛主席给王观澜写这个题词，不是件偶然孤立的事情，是两个革命者（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普通革命干部）在长期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革命方向和政治路线完全一致的基础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革命情谊。

王观澜出身于贫民家庭，参加革命前是浙江省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的一个青年学生。在大革命形势影响下，他接受进步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中国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观澜参加革命50多年生涯中，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军事斗争和农民运动。1927年秋，由上海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军事、政治三年多。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农村工作部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始终是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他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逐步锻炼成长为我党的一位优秀领导干部，受到毛主席赞赏、信任和器重。

毛主席曾称观澜是一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观澜总说自己是毛主席身边备用的一颗手榴弹，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而观澜总是不负使命，忠实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身心地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曾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办的任务。毛主席对观澜的深厚革命情谊，也就是在这些斗争实践中逐渐加深的。这里，我仅就观澜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中的几件事情，尽我所知谈一些情况。

1930年底，观澜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闽西根据地后，根据闽粤赣特委的要求，经中央批准，被任命为闽西特委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观澜一上任，就带着问题到特委所在地虎岗乡作深入调查研

究，还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土地、分财物，帮助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并在《红旗》报上对农村斗争情况作了实际与生动的报导，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1931年9月，红十二军解放长汀，闽西苏区和江西苏区连成一片后，特委任命观澜兼任长汀市委书记。不久，中央苏区中央局调观澜去瑞金中央局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后，指派观澜筹备和主编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这是毛主席对观澜的极大信任和器重。《红色中华》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是现今中国新华通讯社的前身。观澜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他和编辑部仅有的三、四名干部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战斗环境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出版《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很快，在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就创刊了。它从中央苏区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党同志的斗争，成为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在这期间，观澜住在毛主席的隔壁，他们经常促膝交谈，毛主席还常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使观澜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后来，王明“左”倾路线在江西中央苏区推行开来，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受到打击迫害。那时，有人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飞机滥炸根据地的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诬指他为敌人吹喇叭，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观澜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政府支部一位负责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把他关进了保卫局审查。当时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党员组织关系同地方的党员在一起，同属瑞金县云集区委管理，云集区九个乡党支部和党员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给中央，强烈要求解放观澜。以后，观澜恢复了自由，被调到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红色中华》总编等的职务被悄悄地撤消了。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坚持要开除王观澜党籍，并写报告要云集区委批准，区委先后召集了十多次会议，拖了三个月，也没有通过。1933年1月，在中央局作出关于中央政府机关党委不再隶属地方区党委领导的决定后，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可是王观澜始终没有接受王明“左”倾路线强加给他的错误处分，始终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后来又一直顶住了让他“重新入党”的种种安排。毛主席获悉王观澜受到错误处分后，曾亲自找组织局领导说：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王观澜的党籍问题。在观澜被开除党籍期间，毛主席仍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去各地检查工作。

观澜深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叶坪乡的贫苦农民中去，认真调查研究，摸清了实际情况。叶坪乡在1930年、1931年曾两次进行土地分配，但这个有600户的乡仍仅划地主口户，封建势力没有真正被打垮，过去收租、放债的人钻进农会，又成了贫苦农民，而真正贫苦农民分的田又少又坏，还给逃亡地主留着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低落。观澜把他在叶坪乡调查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他要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观澜开始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把贫农团组织起来，成立“查田委员会”，发动群众查阶级、评阶级，定地、富成份报上级审批，最后按政策规定分配

土地，财产。经过查田运动，叶坪乡的面貌大大改变。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的查田经验，随即在瑞金县的两个区推开。

在查田运动中，观澜参与了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观澜和谢觉哉参与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经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并颁布执行。这个文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但在当时正确指导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而且直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仍然是我们党制定土地政策的重要依据。

1934年“二苏大”后，经毛主席、叶剑英、李富春等同志向组织部门据理力争，又经毛主席多次催促，王观澜的党籍问题才得到恢复。

1934年10月，观澜接到张闻天通知随军转移，开始了长征的战斗历程。他被编入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在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四道封锁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行进在前进部队里，每到宿营地，他就带领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红。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由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后改为中央地方工作团）。红军进入云南，他到三军团帮助和检查地方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到达越西后，决定留领导干部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刘少奇同王观澜谈及此事，观澜立即表示服从工作需要，就这样，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前进，观澜带一部分同志在这万山丛岭中留下来，越西是彝族集居地，观澜带领同志们发动群众，组织起越西县游击大队，在村寨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主任。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追剿”部队逼近越西，观澜带领队伍主动撤出县城。这时，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领队伍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观澜深深体会毛主席的意图，马上交代了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芦定桥边，得到何长工所率后卫部队的接应，通过铁索桥。到天全赶上了中央部队，当他见到毛主席时，久久握住毛主席的手，两眼湿润了，好久也说不出话来。毛主席说：好了，好了，彝民士兵总算把信送到了。6月，观澜随先遣队翻越三座雪山，向毛儿盖地区前进。为了保证红军过草地北上抗日，观澜奉命负责筹粮工作。为此，他做了极大的努力。一次，在带队伍筹粮途中，不料却染上痢疾，带病翻山越岭，极度疲劳。正在困难时刻，恰巧碰上了毛主席和林伯渠、徐特立他们。毛主席送他一双从江西带来的新布鞋。林老（伯渠）、徐老（特立）送他一块油布，一条裤子。在长征路上，这样的支援多么珍贵，革命同志的情谊比太阳还温暖。后来，观澜常说：“我同主席的脚一般大，长征时我穿上他送给的鞋子，像坐上飞机一样，走起路来特别轻快。”

不久，观澜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北上，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东北军让出延安后，观澜被任命为中央工作团主任，前去接收延安。工作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都正确体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接收延

安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937年1月13日，毛主席到达延安。工作团组织延安各界民众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主席和红军进入延安。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批又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情共产党抗日的人士，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被捕释放的同志，不断涌到革命根据地。为了培养大批抗日骨干，党在延安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根据中央的安排，观澜和毛齐华等同志负责审查、分配来延安的人们，担负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还组织了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当时还担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长职务）。不久，观澜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当时组织部人手精干，任务繁重，既要负责干部工作，还要兼管地方工作。观澜和刘锡五、王鹤寿、刘春等紧密团结，夜以继日地工作。

1937年底，绥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问题，毛主席把观澜找去，当面指示，要观澜带着主席给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同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谈判，解决抗日战争中的土地问题，以及党政军民委员会等问题，以便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观澜一到绥德就提出了“消灭磨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接着迫使何绍南接受提议，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使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得到保护，组织进一步发展。这项工作，观澜做了半年。

1938年5月，王观澜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还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观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坚定地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时，王明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观澜同王明等人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斗争。

六届六中全会后，观澜根据全会精神，起草了关于开展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观澜作了长篇报告，报告分析了统战工作的现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磨擦的事实和统一战线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磨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王明赶到会场听了这个报告。一天，观澜到毛主席处正巧碰上王明，毛主席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有口音，也太长了。毛主席笑着诙谐他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象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好啊！

王明对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同当时担任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又结合在一起找王观澜的茬子，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毛主席得知此事后进行干预，直接了当地对康生说：王观澜经过十年考验，这个同志是好同志。王明、康生才不得不作罢。不久，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毛主席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统战工作的干扰就很困难了。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打击顽固份子的进攻，进一步加强边区统一战线工作。这年10月，观澜参加筹备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为会议准备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在会议将结束时，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在这次会议上，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 四

王观澜到陕北后，由于任务繁重，过度劳累，身体愈益瘦弱，肠胃病多

次发作。

毛主席看到观澜身体越来越瘦弱，把他找去，关切地问他：“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他如实汇报，每天工作无论怎样多，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主席亲切他说：做事要分轻重缓急，懒人要学勤快，勤快人要学巧干。毛主席这一席话，使观澜十分感动，却没有领会这一忠告，而把主席的关怀，当作积极工作的动力，更加拼命地工作起来。结果，肠胃病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终于使这个硬汉子病倒了。

观澜躺在延安中央医院里，心里还是焦急地想着工作。这种情况，毛主席很快就知道了。一天早晨，毛主席在傅连璋同志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赤脚涉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半山腰的窑洞里看望观澜。当时，观澜严重失眠，已经几天几夜没有睡着觉了。毛主席走到他的床前，在一条窄条硬板凳上坐下，与观澜交谈。观澜说：“几天不能睡觉了。”主席亲切地安慰说：不要着急，我在长征以前也常失眠，长征天天走路把我的病治好了。你病好后，要多走路，多作体力活动，身体就会好起来的。主席还诙谐他说：“血液是会打游击的，整天想它，冲到脑子里，更睡不着。”随后，毛主席把自己的热水袋送给观澜用，并告诉他说：“放在脚上，血液下去可能会好些的。”就在那次看望之后，同年12月16日，毛主席给观澜写来了“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那个题词。

毛主席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观澜同疾病作斗争的勇气。毛主席深知观澜受王明的打击心情不舒畅，所以在一次中央会议之后，提出请到会的同志们先后去医院看看观澜，并说不要同时去，不要把他搞累了。这番话，是王明到医院看望观澜时向他说的。当时，我也在场。

1945年初，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关心及医生的精心治疗加上观澜自己顽强的毅力，乐观的情绪，他的病情渐渐地好转。就在“七大”开幕前夕，他的旧病又发作了。对此，我深感痛苦，带着失望的情绪写信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快亲笔给我写了回信，信中说：

“明清同志：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奈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问候观澜同志。”

4月14日（1946年）

毛主席的话，使我鼓起了勇气，而对观澜更产生了特殊效果。当时对观澜的病，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中医等，观澜服汤药后，果然有好转。在这期间，毛主席还派人送来他自己用过的上法烤面包的铁犁（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到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夕，他能随着机关转移了。渡过黄河到晋绥分局境内张家湾村继续疗养。

1948年3月下旬，毛主席领导陕北军民，击败了胡宗南的进攻，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东渡黄河来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我们得悉，非常高兴。观澜让去看望毛主席，顺便将康生土改工作团的情况向主席汇报。我躺过七条小河，到了蔡家崖，主席亲切地接待我。谈话到中午，主席邀我吃饭。午饭时，与周副主席同桌，毛主席介绍说，徐明清同志是王观澜同志的爱人。还谈到那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写作情况，说到观澜同志曾和我合作过。主席讲那样谦虚的话，使我十分感动。回到张家湾村，我将毛主席



接待我的情况告诉观澜，他听后十分兴奋。随即提笔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去苏联根治疾病。毛主席于3月31日即予回信：“观澜同志：来示悉。大有起色，极为欣慰。去苏联治病是可以的，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线已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交涉前往，你即可去，此复。顺祝健康！”

1948年秋，观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经河北阜平县朱毫村中央医院所在地时住了下来，得知毛主席在西柏坡，我陪同他去看望毛主席。观澜不能走路，只好坐担架去。主席在他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接见我们，紧紧地握手，十分亲切。毛主席谈起当前上改情况时，对观澜说：“将富农剥削率从15%提到25%，你同意吗？”观澜回答说，太好了，这样能够扩大团结面。（毛主席曾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改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主席这样谦虚，观澜非常感动。

1949年3月底，我们辗转到了沈阳，做去苏联的准备。此时，观澜想到一个重要问题，他说：“王明现仍在莫斯科，我若去，他有可能再找麻烦。”因此，观澜于1949年4月2日经东北局向中央发一电报，要求党中央、毛主席对他历史作个结论。4月6日即得中央回电：东北局：日前接到王观澜同志来的报告，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中有人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又曾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作了党政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中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观澜看到电报后，非常激动。观澜手托电报文稿，那自信和兴奋的音容笑貌我记忆犹新，他怀着欣慰的心情，去苏联治病了。

以上所述，是王观澜的革命生涯中，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中的支持，生活上的关怀的生动片断。时至今日，这些往事，仍然经常在我的脑际闪现，令我激动不已。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真诚相见，革命情谊，为共产主义宏伟事业共同奋斗的高尚风格，堪为我革命者效法的楷模，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借此表达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 怀念伯伯毛泽东

毛远志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要我写篇回忆伯伯毛泽东的文章，我欣然接受了。

光阴荏苒，一晃伯伯离开我们已 14 个春秋。每当我回忆起伯伯，往事历历在目，就仿佛是在昨天。文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禁凄然泪下，我怀念、我发自内心地热爱他老人家。因为他不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回忆伯伯往事，思绪万千，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1938 年 3 月，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伯伯的身边。我终于有了温暖的家。

我是 1922 年 5 月 5 日生于长沙。这年冬季，爸爸毛泽民从长沙去了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后离开了长沙，只有妈妈王淑兰带我回到家乡——韶山。1925 年 2 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爸爸是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们兄弟俩都说是回来养病。这时我们家热闹起来了，经常有许多客人。那时我还小，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记得有一天，家里摆了二、三桌饭菜招待亲友，因我太小，母亲就让我用大人坐的板凳头当桌子再给我一个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饭，我不时好奇地抬头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们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蓝大褂。他们有说有笑，从天亮到天黑，总是说不完的话。家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先是爸爸走了，后来伯伯、伯母（杨开慧）也带着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妈妈和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回韶山说是养病，实际上是在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实现工农联盟的大革命，进行了实际探索，爸爸离开后就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 年，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阀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捉拿毛泽东，搜捕他的家人，没收他家的房屋和田产。从此，我便无家可归。

我母亲是 1925 年跟随伯伯和爸爸投入农民运动的，1926 年入党，曾担任湘潭清溪乡女界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当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乡活动了，到长沙转入地下工作。1929 年，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捕了，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 年初，妈妈为了在监狱中对内对外秘密联络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妈妈同牢房的罗星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 7 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出狱后，妈妈收养了烈士遗孤华初哥，从此母子（女）三个开始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窝，一次次逃过敌人的追捕。后来情况更险恶，生活也愈加困难，妈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让华初哥去给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个富农家做了小工。每天喂猪、种菜和烧饭。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到沉江县的传家做了童养媳。在那乌云压顶的岁月里，我自小

就一直过着恐怖、流浪、饥饿和遭受种种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多么能盼望自己也能有个温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骂。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37年，为了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同年11月，母亲和表姐章淼洪来沉江接我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饱经了惊涛骇浪的冲击，终于驶进了幸福的港湾。

到达延安的当晚，伯伯要我们去了凤凰山他居住的窑洞。我见到伯伯兴奋极了。伯伯高兴地吃着妈妈让我给他带来的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家乡的东西了。他问家乡的情况，又问到我们一路来的情况。我急急地回答后，便向伯伯打听父亲的去处。伯伯说：“你父亲已经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个月，不能见到一别十多年的父亲，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挚爱所代替。伯伯乐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说：“你原来还有个哥哥，7岁那年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诊治，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诉我，我还真不晓得自己还有个哥哥。伯伯又问：“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妈妈送我到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后来伯伯又说：“四嫂（伯伯按家乡习惯这样称呼我妈妈）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说罢伯伯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说：“临行前，妈妈一再嘱咐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不要打搅您。小孩子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伯伯听了点点头。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伯伯说：“你年龄还小了点。”并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我念。我被考住了，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伯伯笑着说：“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伯伯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我去延安鲁迅小学（后为保育小学）读书。我这个流浪儿从此投入伯父的怀抱，尽情享受慈父般的温暖。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便到鲁迅小学上学了。15岁，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是大的，但文化基础知识却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无论是平常还是节假日，我都住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补习功课，希望能尽快赶上其他同学。只有经过冰霜的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饱尝了生活的磨难，更能体会到学习的来之不易。

一段紧张学习以后，我很想念伯伯。阳春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便和章淼洪一同去看伯伯。在谈话中，伯伯问我是哪年生人？

“民国12年，农历3月20日。”（后来才弄清楚是民国11年，即1922年生）

伯伯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伯伯让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子，还煮了挂面，和我们一起吃了饭：那顿饭我吃的好香！回来的路上，表姐才提醒我说，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我心头一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说实在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

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记得那次伯伯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说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加入共产党。那时我单纯幼稚的可笑。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随后，伯伯又给我讲了共产党和其外围组织的关系。听了伯伯的话，我回学校不久便加入了“民先队”组织。这年10月，又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9月，我刚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就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一道去的还有华初等几个同学。那时我年轻，好强争胜，又因为自己读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夜晚不睡觉，不懂得劳逸结合，时间久了，落下了头痛的病根。1942年冬，我从安塞去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正好他同几位客人刚刚吃完饭，警卫员在收拾碗筷。

“不要拿走，我还没有吃饭呢！”当时我那身装束不象女孩子，言行也没有一般女孩的文雅。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伯伯一边疼爱他说，一边又让警卫员再给拿个好菜来。不一会，警卫员端来三个烤辣椒。这的确是伯伯常爱吃的好菜。再看看他们吃的饭菜，也只有二米饭（即大米和小米做成的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我端起碗来，把伯伯他们吃剩的饭菜一扫而光，还象没有吃饱似的。伯伯对我说：“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在座的叔叔问我多大了？是否申请入党了。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伯伯半信半疑。

“我1938年10月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我年龄不满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那时预备期一般为三个月）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伯伯高兴地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我。我很激动。因为那时边区受经济封锁，纸张铅笔都比较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那是相当珍贵了。同时我也明白，这是伯伯对我学习、工作的鞭策。

当伯伯了解到我是来延安医院看病时，他慈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指李讷）和她妈妈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吃。说着伯伯领着我看了他办公和居住的窑洞，然后又指给我看什么地方是厕所，最后带我走进妹妹住的地方，指指说：“你就住在这里。”当天夜里，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警卫员把我推醒了。我不知为什么。原来伯伯工作习惯于通宵达旦，白天的饭也移到晚上来吃。夜深了，他要吃饭，让警卫员也给我送一个小猪蹄来吃。我迷迷糊糊地吃完，倒头又睡，真是疲乏极了。

过了两天，伯伯问我：“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看住的地方紧张，又怕影响伯伯的工作，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别：“伯伯，我想回去了。”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我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伯伯住在一起。时间虽短，但使我深深感受到伯伯无微不至地关心。老人家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1943年，我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我向伯伯说，我想去前方工作。伯伯笑笑拍着我说：“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果不其然，没多久，我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厉害，组织上送我到西北局的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伯伯住的地方很近。伯伯工作忙的厉害，却还惦记我。我在农场住了一间干打垒平房，自己做饭吃，屋里黑洞洞的，伯伯就关照警卫员拿了一些旧报纸来，把墙糊上。不知谁送了他两只风干鸡，他没舍得吃，让警卫员给我送来了。江青也来看过我。说真的，她那时也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伯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当时被人称颂为“弥天大勇”。但是我不相信蒋介石会放下屠刀，我日夜为伯伯的安危担心啊！“双十协议”签定后，伯伯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13日我就急忙跑去看望，一见到伯伯，我又高兴又疑惑地问：“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耽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伯伯笑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噢，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作准备。”

这天我们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爱人曹全夫同志。见到我有了爱人，伯伯挺高兴，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伯伯询问了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他知道全夫是一个穷学生出身，来延安参加革命，上了抗大，现在是从敌后又回延安来学习时，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夹一片扣肉放进他的碗里。那时中央正组织大批干部去东北，创建新的解放区。这次我又向伯伯要求去前方。伯伯问：“要去哪里？”我说我想和全夫一同去东北。伯伯痛快地应允了，说：“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去锻炼锻炼了。”

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如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盼望爸爸归来啊！我胸中埋藏着多少话要向他诉说，我要用最好的学习、工作成绩向他汇报。远方的爸爸也想念女儿啊！他只能从照片上看见已到延安的女儿，给女儿来信，捎来做衣服的花布。……我不敢再想下去，并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

样也克制不住了，泪水簌簌直流，我急忙捂着脸离开饭桌，躲到里间屋去。泪眼朦胧中，眼前虚幻着父亲留给我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记忆。江青走过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我看伯伯也没有吃好饭，沉重地坐在一边。我擦干眼泪走到伯伯跟前，斩钉截铁地说：“伯伯请你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伯伯慈爱地扶着我的双肩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回到驻地后，我们又给伯伯写了信，表示我们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导去做，任何情况下，都不做软骨头。很快，伯伯就回了信，同意我们结婚，并说：“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再见了宝塔山，再见了延河水。10月中旬，我们告别了延安——她是养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肩负着伯伯的嘱咐和期望，走向了新的革命里程。

因为战争，交通暂时阻断，我们没有到东北，中途留在了张家口。这期间，我曾收到伯伯托人捎来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家庭合影，伯伯站在中间，岸英抱着李讷站在一侧。伯伯虽没写信，但看了照片就可以明白，这是告诉我岸英弟弟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同时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快慰、我为他能享有这样的快慰而高兴。

解放战争经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军民的苦战，短短两年，战争全局就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伯伯坚持转战陕北，达到预期目的后，于1948年4月，率领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那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在这里。）一天下午，伯伯叫我们去了。他穿了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在院子里坐个小木凳，两脚伸在前面，脚上穿一双破布鞋，两脚的拇指都露在外边。全夫看到这一情况着急地说：“该换一双鞋子了，边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伯伯却说：“破了没有关系，旧鞋子穿着舒服。”

伯伯看到我穿的衣服东一块、西一条的补丁就笑了：“看来你还会打补丁噢！你的衣服呢？”

“好一点的给孩子改做衣服了，旧的缝缝补补自己穿。”过了一会儿，伯伯问：“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怎样？”

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住的老乡家隔壁是个地主，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另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后来怎么样了？”

“地主婆娘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呆，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当时中央正在解决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倾向，伯伯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伯伯同我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不如说是在了解我的思想状态。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春，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京。建国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搅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时，我匆匆看望过一次。这年冬天，我又去过一次。我因身体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见我有点畏缩的样子就问：“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伯伯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毡帽（当时的军帽）给了我。

“你丈夫哪里去了？”伯伯问。

“已经南下了，现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能忘记他们啊！”

多少年来，为了避免影响伯伯工作，我宁愿少去打搅，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记得只去过两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诞辰。当时我住在和平医院养病。贺老总见到我说：“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这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里，伯伯正和朱总司令坐在一起。他指着我问趣地对总司令说：“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这天华初、觉民带着海英、森洪都不约而同地去了。吃饭时，伯伯和领导同志们在一起，我们几个和李讷妹妹在另一间窑洞里，伯伯走过来看看我们，很高兴地说：“祝你们身体健康。”

1963年伯伯70寿辰，我们和李敏相约去了，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过生日。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是的，说起来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除李敏结婚那次外，我再没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写。我怎么不想念，我是经常思念着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干扰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回避这种关系。我上前紧紧拉着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除了伯伯身边的人外，在坐的还有程潜、章士钊和王季范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这桌。饭后，伯伯送走客人，看见我正准备走，便招手叫住了我：“远志，来！”我赶忙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可以听得出，他的鼻子有点不通气。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着我的手说：“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稍停，他又接着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我感到纳闷了。刚才吃饭时伯伯就讲：“人啊，坐飞机可能坠落摔死，乘火车可能翻车撞死，骑马也可能掉下来摔死……”怎么现在讲起死的问题？噢！我想这是伯伯对做寿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连串地问：“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哪里？”“远新去看过你吗？”就这样陪伯伯坐在那，轻松愉快地谈了好一阵。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一条薄呢子裤，怕他坐久了受凉，就说：“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软。那天他老人家兴致很高，又站在那里同身边人员——合影。我们担心他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小时吗？”

#### 四

在延安的时候，伯伯对军委二局（现在总参三部）的工作很关心，经常听汇报和过问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只讲两件事。

1939年秋，我们二局的同志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赶忙

跑过去一看，是毛主席，原来，伯伯是在外参加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同志们接他到二局休息，并请他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记得他说，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一百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他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寓言故事来教育我们。他说：“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拢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作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伯伯非常善于作诱导说服工作，他说话深入浅出，而且诙谐幽默，把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使人听了受鼓舞，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杨家岭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问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就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给他念叨，谁是我的科长，谁是股长，工作是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哟，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又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两个指毛顺义和毛华初，我是那半个）。”后来伯伯就向二局的领导交待，从他的办公费中节约出三分之一给二局作为本钱，办个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合作社赚的钱就补在伙食里，我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例，但是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于天下大事，但他仍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 五

领袖伟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爱，也有热烈的感情，但又很讲原则，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不能有特殊。有这样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多年来，伯伯对我的关心和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又不允许有特殊。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钱希钧妈妈去看他，当谈到我时曾说：“泽民不在了，你要照顾一下远志。”伯伯回答说：“不能照顾，一照顾就要特殊了。”

我从湖南初到延安时，吃小米饭一下子不习惯。为了节省吃饭时间，我常爱用水泡小米饭锅巴，稀里糊噜地吞下去。结果，时间一长把胃搞坏了，经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里，秘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了我一元钱，让我胃疼不能吃饭时就买一碗油茶喝。后来伯伯问我：“有些人吃小米不习惯，你吃得惯吗？你要吃不惯就得饿肚皮噢！”过后我悄悄问秘书是怎么回事。



他说，伯伯已经知道我给你钱买油茶吃，让我以后不要再给你钱了。我明白了，伯伯是严格要求我，要和同学们一样，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钱退给了秘书。

伯伯不允许亲属有特殊，但对于合理的要求就及时解决。1939年，帅妈妈（孟奇）从湖南到了延安，带来妈妈的口信，要我们好好学习。同时她还告诉我们，你妈妈现在很苦，仍是以讨米为生干革命。我和华初当然了解妈妈以往的困苦，想到现在的条件应该和过去有所不同了，便给伯伯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组织给以生活接济。伯伯很快批复：“钱可寄去，好好安心学习。”后来我知道，伯伯是通过党组织给母亲寄去20元钱。

暑假期间，鲁迅小学组织一些干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领导同志，让我当队长。我们采了许多野花，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有的同学提议，让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们到苏联去学习。我说我不提。但有的同学还是当面提出来了。记得当时伯伯耐心地向同学们解释说：“苏联现在正在搞建设，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另外你们年龄还小，现在边区学习也很好嘛。等你们长大了，学习有了好成绩再说吧。”同时，伯伯又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要为我们的父母亲争光。临走时，伯伯送给我一桶饼干，让我抱回去分给同学们吃。

1946年10月，我们撤出张家口，我便把孩子寄养到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老乡家里。1948年秋，老乡捎信来说，孩子病重，让我赶快去看看。从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顾骑着马赶路，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遇到熟人也顾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会儿，就有个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拦住了。“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我们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了。这次相遇我们都很高兴，但顾不得细说。当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时，直催我快走，并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我匆匆赶到老家时，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了。村里无医无药，我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很快他就骑着马赶来了，我们一起抱着孩子来到西柏坡，经医生急救，孩子转危为安。这时，我和岸英才松了一口气，吃过饭，我们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谈得来。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谈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书橱中发现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却说：别的书都可以给，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面是马恩列斯毛的头象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岸英严格按伯伯的要求做，这对我是个很好的启迪。

1950年，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也通过信，岸英弟弟虚心好学，对人诚恳热情，很有志气，很有希望，我为失去这样的好弟弟而悲伤。

伯伯不仅对岸英弟弟严格要求，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他都是比较严格要求的。使我铭刻在心的是，我将要离开延安时伯伯对我的一再叮嘱。当同意我们去东北时，他说：“你们应该到实际中去锻炼，闯一闯好。但要记住，不

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和人民群众讲团结；不论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当我们已向他告别走到院子里时，伯伯紧拉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说：“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恳切地教导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铁快成钢啊！

伯伯，我最敬爱的伯伯，从 60 年代中期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看过您，但我内心深处却时常惦念着您。只因那时国内外世事纷乱，您日夜操劳，我怎么能再去打扰。特别是后来得知您病重，我多么心焦！可是欲去不能，欲罢不止。突然噩耗传来，使我心碎……

当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会堂的花丛翠柏中时，我曾三次守在您身边，哭着依依不愿离去，有多少个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慢步在纪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仿佛看到您面带微笑，健步走来，接着您那慈祥和蔼而又幽默的言语索回在耳边……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来。

亲爱的伯伯，您对子女、对家人，对乡亲们很有感情，但您把这情都融于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我是党和人民养育的，是在您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多年来自己身体不好，不争气。人民给我的多，我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有负人民和您对我的教养而感到不安。亲爱的伯伯，我们全家从心底爱戴您，思念您。在您诞辰 10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回忆往事，说出我埋藏多年，从来不愿对人讲的一些话，权作我在伯伯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陈薇 曹宏整理）

## 回忆毛主席调查研究拾零

沈 同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所见感人的事很多，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一贯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毛主席每天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一事当前，他总是掌握情况是第一，随时随地都忘不了作调查研究。毛主席不但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实践，作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调查材料，而且善于调查研究写了不少关于调查研究的专题报告。在他的每篇著作中，都随处可见他调查研究的来龙去脉。可以说调查研究在他一生中是贯彻始终的。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久了，深受他的言传身教，就更加体会到，他一生中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他在伟大事业中的许多决策，都是他调查研究的结果，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调查，得到了第一手材料，日积月累，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事实证明，毛主席作的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为什么要作调查研究呢？毛主席说：“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他以言传身教来号召我们：“都要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要求大家必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毛主席把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到了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人类求解放的高度来看待。

毛主席很善于作调查研究。实际上，调查研究已经成了他每天工作日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调查的内容广泛丰富。他好学不倦，每事问，有闻必录，一旦发现问题，就抓住不放，追根究底。他既能洞察全盘，又能抓住重点，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正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四面八方，先抓什么，怎样抓才能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尽看苏联的蓝本。他在占有各地基层大量第一手调查材料的基础上，便及时和政治局的同志们又展开了调查研究，一面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一面又利用工余饭后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亲自察看了中央许多部门生产上的革新成果，并且还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指导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毛主席作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主席曾说，常找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比坐在屋子里等着听汇报和看报告要实际得多，可以一目了然，实事求是，有了调查才有发言权。作出正确的结论，对改进工作就有说服力了。毛主席一生走遍了大江南北，每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工作之前，他要去什么地方，调查什么问题，从来不事先告人，要求偃旗息鼓，不能扰人。虽然毛主席每年外出视察工作的时间都在半年以上，但记者无从知晓，主席也不让报道。他每去一地，都是到时静悄悄，离时不辞而别，既不让当地领导人迎送，也从不接受宴请。主席每到一地，当地领导同志一旦发觉，都要来关照，对毛主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热切地盼望主席接见。这种战友的情怀和对毛主席的爱戴，使我们深受感动。有一次我怀着天真的感情，在主席散步时向他报告了同志们的愿望，主席说：大家各有各的工作，应该各司其职，互不相扰嘛，他们要是把群众等着办的事放下，偏偏要来迎接我，我于心何忍嘛！我如有事要同他们商量，是会请他们来的，我经常到各地去看一看，又行止不定，要是集合了一大群人像个代表团，事先选好了地点，要在某月某日前去参观，让老百姓老早就作好准备，等“代表团”一到，使人家应接不暇，

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怎么能够作调查研究！毛主席在视察工作时，有时在行进途中就让停车，他就地视察，看来随遇而安，实则胸有成竹，在按计划行事。有些当地领导人，感觉毛主席的行动，出其不意，使人捉摸不定，迎接不及。可是毛主席却调查到了第一手的真实情况。

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工作时，一面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面还就地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有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问题，便及时找来当地的地、县委书记到他乘坐的火车上来座谈，听他们的汇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大家研究，毛主席曾说：登门拜访这个办法，要比把大家请到北京去开会好，毛主席还恐怕人们不管他的意见正确与否都盲目执行，有时对自己的意见还要进行核查。

毛主席不仅善于作调查研究，而且还善于积累资料，以备查用。他好学不倦，博学多能，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更有超人的记忆力，一朝需用便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毛主席还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能够帮助他作调查研究。他说：“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同志们在主席亲切具体的教导下，认识到这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任务，都积极热情、尽心尽力地做好，并且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学识和思想都得到了充实和提高，皆大欢喜。毛主席也感到欣慰。

毛主席经过调查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毛主席在进行调查研究过程中所作的艰苦工作，同样激励后人，仅点滴所见，已感人至深。今思其事，念其人，毛主席亲切感人、甘为人民孺子牛的伟大形象又出现在眼前，不禁百感交集，谨追记几件亲眼所见毛主席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小故事，权作怀念。上面的几段叙述，也是由这些小故事引发出来的。但由于当时还有任务，无暇他顾，故不能窥其全貌；又因时过境迁，多已不复记忆，只能将一时一事的凤毛麟角或只言片语，概述一斑。

#### 一、毛主席请警卫战士帮助作社会调查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甚至把它看作是一个革命者为建设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多多益善。他不但自己经常亲自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并教导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他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作更广泛具体的社会调查，尤其在全国解放之后，他进入北京工作了，对这个问题感到更迫切需要，这样做不但使他能够更多的“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及时为群众解决困难，同时也锻炼了身边的工作人员，使大家受到了教育和提高。在毛主席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在毛主席的耐心教导下，就经常帮助他调查了解农村的社会情况，战士们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毛主席经常利用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帮助他了解农村的社会情况。当时这些战士都来自农村，思想单纯，作风朴实，虽说一般都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但他们对自己土生土长的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凡是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有清楚记忆，而且反映情况一是一，二是二，从不添枝加叶，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不会编造。毛主席从他们调查的情况中，了解到全国很多地区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和悲喜交集的民间故事，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毛主席很重视战士们的调查材料。

毛主席非常喜爱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战士，很关心他们的学习，对他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主席曾亲切地对战士们说：“你们都是些好同志，就是

文化水平低一些，你们要好好把文化提高一下，以后就能够掌握科学知识，多为人民做些工作，多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的倡议下，中南海警卫部队给战士们组织了业余文化学校。毛主席亲自担任名誉校长，战士们在毛主席的关怀和鼓舞下，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学校的文化课程逐年加深、提高，一直讲授到大学的课程。

毛主席为了使战士们更好的帮助他作社会调查，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他的住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前的院子里，接见了在他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给大家讲了关于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怎样才能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问题。他耐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

毛主席首先向战士们说明为什么要作调查研究工作。他说：“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多为人民服务。”“我们各人的工作不同，有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帮助他作社会调查，他说：“你们都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他风趣地说：“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和吃菜一样，不光吃青菜，还吃点辣椒。”战士们齐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

毛主席看着战士们信心百倍，跃跃欲试的样子，高兴他说：“就讲讲工作，讲讲工作方法吧。大家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一个是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以看家为名作调查工作。”

怎样做调查工作呢？毛主席教导大家，不要摆架子，对人要谦虚。他说：“我们拟了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家里边的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乡村干部，别摆架子。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高兴。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毛主席又嘱咐大家要注意保密，他说：“可不要说：‘我是给毛主席警卫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一个，回家以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毛主席说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因为在我们的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了一个在家搞生产的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搞什么工作？战士告诉他，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又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这时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对毛主席的行动要保密，便说：“我没见过毛主席，不知道。”老人看着这个小战士，待了一会儿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呢！”这个战士立即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这个小战士急着要为毛主席的健康辟谣，就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看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这件事后来被毛主席知道了，他总是一提起来就发笑。

毛主席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的方法，接着就给战士们布置任务：要调查什么呢？主席说，回去“调查生产的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总之，毛主席指出，农业生产的项目多得很，数也数不清，还有对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些都是调查的内容。

毛主席看了战士们探亲回来写的农村情况调查报告，便把报告里的一些生动事例和遇到的问题，结合当前的政策，讲解给大家听，帮助战士们了解

党的政策，解答在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战士们对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大家回到家乡，不但作调查，还要作宣传。

当时我国许多地区水旱成灾，农作物歉收，农民都叫粮食不够吃的。战士们的调查报告也反映了许多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对此毛主席指出，既要有渡过困难的信心和办法，又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主席指出一个战士的调查报告说：“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他在家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他为什么哭穷呢？”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说：“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自己不叫也不好。老百姓瞒点粮食好不好呢？好！心里知道他瞒了就好，你知道就行了，瞒就是有啊！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说毛主席讲的瞒粮好。”主席又指出，大家的调查报告里还反映：“有的地方确实不够，卖过头粮，牲口不够吃，也有把母猪杀了的，逃荒的也有，把牛杀了的也有。”怎么样才能度过困难呢？主席提到了曾文的调查报告——曾文同志是广东五华县人，家乡受灾，灾区人民依靠合作社的力量，团结互助，在抗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毛主席称赞说：“你们那里的老百姓真勇敢，农业合作社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嘛！”主席还在曾文同志的报告上写了“合作社好”四个字，让大家去传阅。

1955年，国家正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战士们的调查报告里反映，有很多农民不理解，我们的战士也不够理解，因此就没有办法去向群众作宣传。毛主席结合这个情况，又给战士们讲解了统购统销政策，他说：“统购统销有五大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是缺粮，保证他们有粮食不饿死，而且不涨价。第二，对灾民有利。去年水灾有五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有四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人，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百年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我们拥有八千万城市人口，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还有资本家，过去吃现在也吃，现在是统一吃，比粮食私有的好，可以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买回机器。拿些豆子出国，送给苏联就可以买回机器，没有统一就少一些，统一了呢就多出口一点。”

战士们调查材料还反映：大家都叫缺粮，可是人多粮少，不知道粮食是怎么分配的，有些贫苦农民担心分不到粮食。毛主席说，粮食的供应是有保障的。于是又给大家讲了粮食的分配办法：“解放军吃32亿斤，出口38亿斤，现在总共为870亿斤，800亿斤的分配是：城市450亿斤，农村350亿斤。农村的分配：第一是缺粮户，第二是四千万灾民，第三是经济作物区，第四是四民，就是盐、渔、林、牧民，因为他们不搞粮嘛。”

战士们聚精会神的听着毛主席的讲话，越听越高兴，感到一时间就懂得了这么多事，自己忽然间聪明了许多，兴奋的样子溢于言表。

毛主席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战士，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全国各地走到一起来了，也是非常高兴，他鼓励大家说：“在座的是六万万人的代表，尤其是你们青年，乡村城市、东南西北都有，六亿人口的代表非常重要，不要轻视自己。”毛主席勉励大家，要团结起来，互助合作，才能搞好工作，他对战士们说：“为什么要团结呢？为了工业化，为了社会主义，分工合作为了总目标。团结起来，学习，调查，为把工作做好，要互相团结。”主席亲切地嘱咐大家：“态度要好，要互相关照！”

最后，毛主席号召同志们：“都要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

为人民服务！”

会后，毛主席又把这次讲话的内容归纳为五条“出差守则”，并亲笔写好交给大家执行。原文如下：

出差守则

- (一) 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
- (二) 态度——不要摆架子。
- (三) 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
- (四) 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 (五) 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从此，同志们回家探亲作调查，便有了共同遵守的“出差守则”。战士们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调查工作进展得又快又好，调查材料的质量也一次比一次提高。

1956年，全国各项工作欣欣向荣，工农业发展日新月异，形势大好。毛主席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后，又准备到各地去视察工作，他对当时在农业方面出现的增产增收和群众日益高涨的生产热情，非常高兴，又打算到农村去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在出发之前，主席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26名警卫战士，让他们回家一面探亲，一面帮助他调查各自家乡农村的情况，在4月23日出发，限期归队汇报。

毛主席5月3日到了广州，并请来彭真、杨尚昆、罗瑞卿、谭震林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召开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和江西五省的省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这五个省的工作问题。

回农村探亲并作社会调查的战士们，5月13日纷纷回到北京，又即刻赶到广州，向毛主席作汇报。这期间，毛主席白天的工作安排得很紧，除开会外，还视察了广州岭南文化宫、广东造纸厂和通用机械厂等一些单位，有时还抽空下珠江游泳锻炼身体。利用晚上的时间，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主席看得很认真，连战士们报告里的错别字都给改正了过来，有时还要把战士找来细谈。战士们反映的情况，都是一件一件的具体事例，他们的语言又带有地方特点，说起来有声有色，情况真实，生动感人。毛主席有时还提出问题 and 战士们讨论，经常谈到深夜。

在毛主席身边担负警卫任务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战士，他们虽然籍贯不同，语言各异，但都一心要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好。在毛主席的热心教导下，发挥出了这些青年战士的潜在能力，他们长知识，广见闻，理解了党的政策，不但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还学会了作社会调查来为人民服务，也有了向群众宣传的本钱。战士们普遍反映，听毛主席讲话，思想开窍，深受启发教育，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尤其是当想到自己竟能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来为人民服务了，心情更是无限的激动和愉快：

毛主席看着这些年轻的警卫战士，他们兢兢业业、日夜警惕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同时文化知识提高了，认识问题的能力增强了，还学会了作社会调查，他常常看着、听着、想着，脸上绽出了喜悦、欣慰的笑容。

二、毛主席说人生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关于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虽然众

说纷坛，但多是看苏联的蓝本。毛主席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遍了大江南北，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调查研究，以求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蓝图。

1954年春，毛主席在掌握全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想了解一下中央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看看是否能够适应全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有力的为各项基本建设服务，以求成龙配套，形成全国一盘棋，大家互相支援，消除矛盾，通力合作，更加有力地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首先要看看这些部门在为国家的生产建设和改革创新方面，究竟有了哪些实际成果。

可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分昼夜，从哪里再去找这么多时间呢？然而毛主席只要想办的事，就一定要达到目的，而且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他从来没有说过时间不够用的话。事实证明，毛主席过去在许多次对敌的战役中，都能够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的条件，运筹帷幄，掌握时机，抢出时间，事先作好周密的部署，满怀信心地去争取胜利。毛主席曾经坚定地告诫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就必须抢时间，挤时间，走到时间的前头，要能够掌握时间，决不能够作时间的奴隶，人生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

时隔不久，纺织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革新的纺织品，产品优美，花色新颖，做工精细，深受群众欢迎，市场供不应求，拟大批生产，向国内外销售。周总理指示，送请毛主席看一看。因为花色品种很多，又不知毛主席什么时间能看，便在中南海的流台布置了一个展览室，以便主席随时察看。

一个星期天，毛主席散步走到瀛台，便去察看这些纺织品。展览室布置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毛主席看得很仔细，边看边听解说，当主席得知讲解人员就是生产这些纺织品的专业人员和纺织工人时，便向他们详细了解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销售以及群众的反映等情况，他们部一一给主席作了汇报，还特别指着那些府绸类的花布向主席报告，说这些产品质量好，式样大方，料子又薄又软穿在身上很舒服，比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花布要好得多，价钱也便宜，深受群众欢迎，准备大量生产，向国内外销售。毛主席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搓了又搓，满意的说：“很好”。主席对专业人员的解说也很满意，一直看了一个多小时。主席看后，还让请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来看一看。

毛主席看了纺织工业部的这些展品后表示，看了这些纺织品，又向工人了解到生产情况，好象进到生产车间一样，这样看一看，既不兴师动众，又不影响工人的生产，也不挨挤，还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办法很好，因为正常的统一办公时间，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这种调查工作，只是利用工余饭后和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进行，并不影响正常的工作时间，毛主席就把它叫作“业余活动”，他还建议那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进行这种“业余活动”中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同志知道后，在百忙中也利用饭后的休息时间，到流台去看了这些展品，纺织工业部钱之光部长还赶来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中央在北京的领导同志也都来观看了纺织工业部的展品。大家一边看着展品，一边听着汇报，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和专业人员交谈，都很关心这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也都称赞那些花布好，说怪不得市场上苏联的花布卖不出去，我们自己能生产这么漂亮的花布，又是物美价廉，谁不愿意买自己国家生产的東西！并提出，我们有这么好的产品，应该大量生产，出口换机器。

纺织工业部这种汇报革新产品的做法，不但得到领导同志的赞许，同时



也受到了中央其他部门领导人的注意，大家都希望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他们的产品，指导他们的工作，纷纷把本部门的革新产品拿来向毛主席和中央作汇报。于是，毛主席原打算对中央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就这样开始了。至于时间的矛盾，也就按照毛主席的抢时间、挤时间的办法，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终于积极又巧妙地争取了时间，他的调查研究又增加了一种方法。

这种把本部门的革新产品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展出的作法，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几经改进，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来了就看，没有时间限制；第二，汇报产品的部门无需专门派解说人员，都给产品写上简要的说明，领导看时便可一目了然；第三，如果时间允许，中央领导同志、专业人员和生产工人，都可以来现场直接交谈，或开座谈会，凡是领导要了解的情况和指示精神，或是展出部门要向中央领导请示的问题等，都可以在现场提出来商讨研究，有些问题主管领导当场就可以解决，而且决定了就办，如国产花布就代替了进口花布。

1954年国庆节前后，瀛台开始布置通讯部门的汇报展品。11月2日下午，陈云同志和林伯渠同志先后到了瀛台，先看了通讯系统和保密通讯的革新设备，又看了工作人员的表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陆续来看了展品。大家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我们的保密通讯工作做得是很成功的，这是因为除了在通讯方面的有效工作外，还在于我们的同志们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严密的保密措施，今后在通讯工作的科学建设方面，我们还必须迎头赶上。

1955年春，瀛台又布置起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革新成果展品。3月27日刚刚布置好，朱总司令便来察看了，邓洁同志赶来向总司令作了汇报。许多展品造型美观，工艺精巧，独具匠心。有很多手工业产品，都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经过了革新改造，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还有许多手工艺品和多种多样的编织品，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远销国外。另有些精工细琢的雕刻艺术品，已成了国宝。展品中还有些革新的农具，当时在手工业方面的农具革新，还只是在小农具方面的一些初步改革，如把锄头中间打个洞，去掉一块铁板，这样在制作时可以节省原料，使用起来也方便、轻巧。在展室里摆着的双轮双铧犁，可算得上是当时最突出的革新农具了。总司令边看边听汇报，还提出了有关手工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问题，一直微笑着频频点头。

4月6日，毛主席饭后散步到了瀛台，去看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的展品，察看中注意力集中到双轮双铧犁，主席看过说明，让我按照说明操作一下，幸亏我在事先进行安全检查时曾作过试验，学会了操作，主席说我操作得倒像个“里手”。主席也亲自操作了一下，他说，要能够比旧犁头节省人力提高效率就好了。这时程子华主任和几个同志赶来了，大家便畅谈起来，他们向主席汇报了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又把双轮双铧犁的制作过程和造价，比农民使用的旧犁头提高了多少效率等，一一向主席作了详细的汇报。毛主席在察看过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有时指示工作。他指出：手工业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要大力发展，党委要鼓励干部做好手工业的工作；手工业要提高技术，发挥改革创新的精神，手工业有许多好东西，象王麻子的刀子和张小泉的剪子，便利了群众生活，一定要帮助他们发展；手工业要帮助农民修理农具和改革农具，手工业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手工业也要向半

机械化和机械化发展，目标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

1955年6月，瀛台布置了重工业部的展品汇报。周总理非常关心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对情况了如指掌，展品一开始布置就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注，待布置就绪，周总理和彭德怀同志于6月20日先后都来察看了展品，几乎逐项进行了查询。察看之后，又同专业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总理看后，大家反映，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听了总理的谈话，解决了大家的问题。又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收获良多。

6月26日，陈云同志来看了展品，他详细查询情况，看得十分认真。

毛主席来看时，对几种新式机器的操作和生产的样品很感兴趣。另有几件进口的产品和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同类产品并列在一起，作了比较。毛主席看了说，买产品不如买机器，买机器要买“母鸡”，因为“母鸡”会下蛋，要作一本万利的生意。大家听了频频地点头，都被主席这形象的比喻引得笑了起来。

接下来是国防工业部门的产品汇报。有一部分产品，特意把新制的武器同过去的一些旧武器作了对比，这使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都抚今追昔感慨不已。他们说，这些已经报废了的“驳壳枪”和“三八大盖”还有土地雷等，拿到人民手里，就都成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子弟兵以弱制强、以少胜多、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曾使那些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闻风丧胆。主席逐项查看了各种新式武器，详细询问了各种武器的性能，一边听着专业人员的汇报，一边拿起几件武器，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了三点一线的试验，主席还问我们使用什么武器，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还看了一种新研制的快速导火索的试验，都很感兴趣。

毛主席在看铁道部的汇报展品时，反复查看了全国铁路运行示意图和建设规划。因为那时还没有直通云南的火车，主席笑着说，我们现在要去昆明还是要坐飞机呢！专业人员汇报时，毛主席问到了当时火车的运载能力和运行速度等问题。当听到当时客车每小时约行60公里，每列客车一般挂十二、三节车箱，以及货运列车的运行情况时，主席问，还能不能再多拉一点，再跑快一点呢？他们回答说，目前的机车能力和机器的安全运转还有问题，但没有人说做不到。

中央各部门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这种汇报产品的作法，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展出部门接踵而至，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产品越来越多，新产品和新建树则层出不穷。随着产品不断更新，展出的规模和形式也逐渐扩大。起初展出的多是些小型轻便产品和一些模型、沙盘之类，逐渐的由模型变成实物和增加了大型机床产品。1958年春，竟在瀛台组装起一架我国自行试制的喷气式飞机来。刘少奇同志知道了，在4月4日便兴致勃勃地到瀛台去察看，详细了解情况，并对专业人员倍加鼓励。

毛主席对中央各部门每次展出的新产品，都要亲自逐项察看，而且看得仔细认真，专业人员赶来时，还要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对许多产品都要摸一摸，试一试，问清是什么人发明创造的，弄清产品的用途和所产生的效益。

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和一些有关的领导同志也都来看过许多部门的汇报展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察看展品的过程中，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给予关心和指导，不断地称赞。有的说，看那，在这许多新产品和新事物里，件件都有我们的先进人物和祖国英雄儿女的身影，他们给祖国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有一次，我报告主席，瀛台又变换了新产品。主席问，又变了？我说，首长们最近看得快，变换的也就快了，还有好多部门的新产品在等着来汇报哪。主席说，好，有变化就会有进步，一切都在变嘛！事实正如毛主席说的，一切都在变，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多少旧机器换成了新机器，大量的新产品代替了旧产品，更多的新事物代替了旧事物，而且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祖国的各项建设都在推陈出新、突飞猛进，新人新事倍出，各项事业的新气象使人目不暇接，各方面的生产都在成倍的增长，硕果累累，丰富多彩，耀人眼目，我们的祖国被她的英雄儿女们装点得如此美好壮观，真正地“换了人间”！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继续进行着这种“业余活动”中的调查研究。转瞬两年过去，毛主席对中央各部门在生产建设和改革创新方面的实际情况，已有了广泛又具体的了解，同时也更加鼓舞了各部门的生产积极性。

毛主席胸中有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又有了中央各部门各显其能的具体情况，对如何使全国人民，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各部门更好地团结协作，紧密配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毛主席已胸有成竹。

1956年初，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连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这些汇报中，毛主席看到了有关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十个重大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从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就围绕着这个基本方针，又借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写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指导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名著《论十大关系》，并在1956年4月25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报告。这个报告至今仍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文献。

### 三、毛主席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

每年春华秋实季节，毛主席经常要到各地去视察，了解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情况，帮助农民研究农业丰歉的原因，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一）毛主席视察棉田

1955年秋天，毛主席听说河北省有些地区善于种植棉花，今年的长势又很好，便到邯郸地区视察了一处棉田。主席走进棉田，只见广阔的棉田，枝叶茂盛，果实累累，长势喜人。细看大片棉田又划分成了许多地块。原来这是给棉花姑娘们划分的责任田。她们要在棉花的种植、管理直到收获等各方面，开展生产竞赛。棉花姑娘们整天奋战在棉田里，把棉花培育得茁壮喜人，棵棵展示着她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正在棉田里劳动着的姑娘们，看见毛主席来了，惊喜异常，大家一声呼喊，蜂拥跑来，高兴地跳着脚和毛主席握手，给毛主席戴上了她们的遮阳草帽，争着请毛主席看她们的责任田。毛主席一边察看棉花，一边听她们滔滔不绝地解说，好象谁的话都说不完。毛主席首先看到一片棉田，棉株都高过人，枝叶茂盛，随风摇摆，让人喜爱，大家都称赞不已。主席接着又看了另一块棉田，这一块棉株比前一块的明显矮了许多，但枝杆长得挺拔粗壮，怒

指四方，风吹来叶动枝杆却不摇，其茂盛姿态，大有当年张翼德傲立当阳桥的威武雄姿。她们对这两种高矮不同的品种都十分喜爱。毛主席看着听着，好象发现了什么，便亲自到两种棉花前分别进行仔细观察，又各自数了几棵棉花上结的棉桃，进行了比较，然后问大家，高的好还是矮的好？管理高株责任田的棉花姑娘立刻回答：“高的好！”她让大家看，哪一片棉花都没有她种的棉花长得高！也有的说矮的粗壮矮的好，还有的说两种都好，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出请毛主席评一评。于是大家都围成一团听毛主席讲话。毛主席首先称赞大家管理的棉田很好，又指着那块矮的棉田说，那一片棉花长的矮，可是又粗又壮，特别是棉桃结得多；当然高株的棉花生长也很茂盛，可是结的棉桃比矮的少，你们数数看，哪一棵矮的都比高的结的棉桃多，应该挑选良种，争取高产，对不对？大家都被毛主席说服了，齐声说，毛主席说的对，我们就按照毛主席说的办。

大家簇拥着主席，到了田间临时休息的凉棚下，请主席喝她们防暑的绿豆汤。有的人还跑回家去拿来了自己生产的大花生和红枣，请毛主席和大家吃，并争着给毛主席报告她们种植棉花的情况。这时村支部书记跑来了。他高兴地握着毛主席的手说，真想不到毛主席会到这里来看他们种的棉花！他随后便向毛主席报告了全村的生产和群众的干劲，又向毛主席保证，明年一定要增产！毛主席听了汇报很高兴，并指出：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要关心水利和施肥，还有改造盐碱地等问题；又称赞大家种的棉花很好，个个都是种棉能手，还要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农业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他鼓励棉花姑娘们，要很好的研究和提高植棉技术，努力增加生产。

1957年金秋季节，又是毛主席视察秋收情况的时候了。毛主席于9月3日出发，进入了华北地区，在火车上眺望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冀、鲁、豫大平原，只见遍地秋实累累，十分喜人。为了核实增产增收的情况，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毛主席有时下车实地察看，有时分别请来沿途省、地、县的负责同志，到火车上座谈。一路视察，且行且看到了邯郸。当经过大棉区时，毛主席让停下车来，原来他对两年前曾到这里视察过棉田的情况记忆犹新。他要再看看两年来这里的农民对棉花的种植管理，有了哪些进展，还要核查一下自己当年提的意见是否合理准确，恐怕群众盲目执行他的意见。

邯郸农民已经争取到了两个丰收年，的确面貌大变。遍地棉花生长茂盛，棉桃累累，且长得象水蜜桃一样，已开始吐絮。绿叶、白棉，十分鲜艳。遍地不见野草。每棵棉花都好象盆栽的鲜花，较两年前的管理情况又更胜一筹了。正在棉田里劳动着的老农和棉花姑娘们，看见毛主席来了，都惊喜若狂，跑过来鼓掌欢迎主席，高兴地陪着主席察看棉田。几个老农民高兴地仰面看着毛主席鼓掌，只是张着嘴笑，不知说什么好。主席拉着一个老农民的手，低头问他的植棉经历，又让他说说这几年种植棉花有什么变化。老农告诉主席，现在种的棉花都是矮株多桃的优良品种，产量很高，如今也不怕干旱了，连年都是丰收，现在连棉花杆子都有人收购了，棉花全身都是宝。毛主席微笑着点头说好。时值天旱无雨，可是棉花的墒情很好。主席又查问了水利和施肥的情况。他们指着被棉丛遮住的机井，告诉主席，现在已经用机井抽水浇地了，主席微笑着点头。

有个小姑娘对毛主席说，种棉花可真好，年年都丰收，她爸爸妈妈都特别高兴，还给她做了新衣服。她问毛主席高兴吗？毛主席笑着说，你们种棉花的技术提高了，还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年年都能够争取到丰收，可见人能

胜天，与天斗争其乐无穷嘛，谁能不高兴呢！说得人们喜笑颜开，主席接着说，你们还要总结经验，提高种棉技术，争取再提高产量，我看你们的爸爸妈妈还会给你们买新鞋子呢！大家一齐畅快地大笑起来。

### （二）毛主席关心生产，群众深受鼓舞

1957年3月下旬，毛主席到农村去视察小麦的生长情况。一路察看，到了徐州地区，在火车上就望见远方的麦田，象一片绿色的绒毯，纯色无暇，一望无际，远处与蓝天相接，近看碧绿中油光发亮，十分喜人。

毛主席让停车，走进麦田，仔细观察，见麦苗茂盛，土地整理得井井有条，看了麦田的墒情和土壤的耕作，又检查了小麦的分蘖情况，边走边看，越看越高兴，不觉已走得很远了，当转过了一处田埂，忽见远处的麦田里晃动着人群，正迎面走来。原来是地区在这里召开三级干部现场会，约有四、五百人，正在检查小麦的生长和管理情况。人们越走越近，有的人眼快已看见了毛主席，喊了一声就径向毛主席跑来，大家立刻像炸了巢的蜂群，沿着麦垅展开了散兵线，都向毛主席跑过来。为了维护秩序，我们有个同志便先到前面去迎着大家说：“同志们，毛主席来察看你们的小麦，大家不要拥挤，免得踏坏了麦苗，人多就不要握手了，站在田埂两边欢迎，好不好啊？”大家立刻停下了脚步，齐声说好，很快就分列在田埂两边。这时毛主席已走过来，大家鼓掌热烈欢迎，向毛主席问好。主席笑着走到群众中，一边和大家招呼，一边询问他们一些有关大面积麦田的种植管理情况。地委书记要给毛主席作汇报，主席说：不必了，我已经看到麦田了，实际情况已很清楚，你们的任务是：第一，要争取丰产丰收；第二，要总结搞好大面积丰产田的种植管理经验，提高种植管理技术，增加产量。大家看到毛主席来视察他们的小麦，又提出了希望，对毛主席的关心异常兴奋，不约而同地争着说：“一定要丰产丰收给毛主席报喜！”毛主席高兴地笑了，大家更高兴。

### （三）毛主席帮助农民总结生产经验，学习科学种田

为了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学习科学种田，毛主席总结了多年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经验，汇集研究了我国农民历年来的耕作方法和实际效果，围绕农业增产的方针，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并对每条都作了详细说明，以求提高农业耕作技术，保持农业不断地增产。

- 土——指改良土壤；
- 肥——指合理施肥；
- 水——指发展水利，合理灌溉；
- 种——指改良种子；
- 密——指合理密植；
- 保——指作物保护；
- 管——指田间管理；
- 工——指工具改革。

这八字是来自群众经验的总结，深受农民的欢迎。毛主席一面让农民在现有耕作基础上试行和提高，一面自己还在继续进行核查研究。

1958年以来，毛主席经常听到各地许多关于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有的甚至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对“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了新的问题，毛主席要亲自去作调查研究。

大约是在“农业八字宪法”发表后的一个春天，毛主席要去看看小麦的

生长情况，同时也想验证“农业八字宪法”的内容，便乘车到了生产情况热火朝天的河南省郑州地区，主席走进大海一样辽阔的麦田，见麦苗一片青绿，生长得非常茂盛，每块麦田的地头都立着一块说明牌子，记载着种植管理人员的姓名和麦田的亩数、深翻、施肥、密植、估产数量以及管理措施等事项。主席一连看了几块麦田和牌子上的说明后，他笑了，指着一块长得很茂盛的麦田地头上的说明牌子说，看哪，亩产万斤粮了！那人们以后就可以一天吃五顿饭了嘛！

主席看了一块干部种的试验田，地头牌子上的说明写得密密麻麻，如深翻一米，每亩施底肥千斤，密植粮种××斤，等等；再看麦田，土质深黄，由于深翻过的土地，土质疏松，浇灌之后有的地方已经下陷了，地面高低不平，麦苗的密度比水稻秧田还要密，生长细弱，也不见分蘖。主席说，不对了，深翻不应把阴土盖在阳土上；一米深施底肥，并非越深越好；密植恐怕也太密了，不见阳光不透风嘛！要告诉这些同志，要请老农作顾问，很好地向老农学习。

毛主席视察后说，常找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比坐在屋子里等着听汇报和看报告要实际得多，可以一目了然，实事求是，有了调查才有发言权。作出正确的结论，对改进工作就有说服力了。

#### 四、毛主席一个调查研究的故事——从了解情况到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他把“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看作是一回事，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才算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当问题解决了，群众满意了，人们在欢庆时，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的高兴，有时甚至兴奋得彻夜不眠，常写诗以抒情言志，不过这些事人们是很难见到的。这里介绍一个毛主席作调查研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故事的全过程。

1955年仲夏正当农忙时节，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一路从北向南。有时细察，有时访问，到了杭州，请来了几位同志开会。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便让部分同志帮助他去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的生活情况。

主席召集的会议开始后，我们几个同志出发，到杭州郊区的余杭地区去访问。走进一个村庄，因为是农忙时节，青壮劳力都下了大田，只遇到一个农民在家做木工，准备盖房子。我们又走到田头，群众正忙着整理稻田。在池塘边的树荫下，有一个粗壮的农民，依着树干仰天躺在那里，只见他两手抱头，眼里满含泪水，呆望着天空。我们走近他身边，问他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下田去劳动？他看看我们，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泪水滴在胸前。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的腹部鼓胀，颈部粗肿，可知行动困难，分明是病倒了。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只是摇头流泪，我们说明是特意来这里访问的，又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没有说话先叹气，呆了半天才说：“都是我的命不好，有福不能享，谁也怪不得，没得好说的。”说完又是叹气，现出一言难尽的样子。为了弄清情况，大家都坐在他身边，等待他解说，他见我们诚恳的样子，想了想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抹掉泪水，勉强挺一挺身子说：家里几代人都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自己靠打工养活父母，还要逃避国民党抓壮丁。好不容易盼到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实行了土改，分到了田地，再也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不愁吃不愁穿了，过上了好生活，真是说不尽的快活，全家

千恩万谢共产党、毛主席！说着说着，忽然，他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又低沉下来，有气无力地哀叹：可惜好日子不长，自己害了大肚子病（这是当地群众的叫法，即血吸虫地方病），使得他力不从心，有了田也不能种，成了废人：本打算一死了之，可仔细一想，全国解放了，自己不但分了田，说话也挺起了腰杆，好日子才开头，要是白白地死了，实在对不起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自己也想看看这个世界，究竟还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可是再一想，自己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不能报恩，还要白吃家里的饭，等着也治不好病，倒不如早些死了的好！……他一边诉说，一边流泪，竟至泣不成声。

大家听着这个老实憨厚的农民，痛诉自己悲惨的身世，都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劝他不要难过，要先把病治好，好日子还在后边。他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你们外地人不知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地方病，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是有钱也没办法治好，本地人祖祖辈辈都受这个害！”他声泪俱下，难过极了。我们向他解释：千百年来，我国灾难深重的劳苦人民，在旧社会受着封建帝王和官僚地主阶级的压榨，只有吃苦受罪，那里会有人来管我们劳苦人民的天灾人祸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如今全国解放了，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来建设咱们的国家，你们的病也会有办法治好的。他迷惘不解地问：“这是多少年来流行的地方病，从来就没有办法治好！再说我们这一带遭受了地方病，毛主席怎么会知道呢？！”大家又给他解释，三座大山哪一座不是千百年来就压在人民的头上，还不都是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推倒了吗！共产党毛主席就是要给人民解除苦难的，你们这里有危害人民的地方病，毛主席一定会领导大家来消灭地方病，为人民除害，会把你们的病治好的！

他一直耐心地听着，这时他忽然抬起头来，怔怔的看着我们，很久，竟充满激情地说：“你们说的都是实情，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跑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助我们穷人翻了身，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剥削压迫了，这是我头一次佩服毛主席！后来毛主席又领导大家斗倒了地主恶霸，给我们分了土地，从此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不但救活了我们一家，也救活了全国的穷苦老百姓。这是我又一次佩服毛主席！要是毛主席又知道我们这里的人们还受着地方病的害，再想办法帮我们治好这种从来没有办法治的害人病，他老人家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人民的大救星！我这一辈子都佩服毛主席了！我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记住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说完他兴奋得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我们带着这个农民破涕为笑的心情，回来就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长期以来，都有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况很严重，血吸虫病对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帮助人民解除苦难，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斗争了！

毛主席对此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据初步的调查了解，正如后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遍及南方十二个省市，患病人数约 1000 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一亿人以上，对于人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影响发育，病区人口减少，生产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家破人亡。如江西省丰城县的梗头村，百年前有 1000 多户，到 1945 年只剩下 2 人，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有 90%；安徽省贵池县的碾子下村，百

余年前有 120 户，现在只有曹金雨一户 4 口人，其中 3 人仍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已成为我国现在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危及到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毛主席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进一步了解到血吸虫病对人民危害的严重性，即于 1955 年 11 月在杭州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他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 多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马上开展工作。

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即于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7 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 100 余人，会上传达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关于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决定，经过研究，提出了 7 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以及防治研究等具体问题。

于是，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有血吸虫病的地区开展起来，又在这些地区纷纷组织了领导干部和医疗专家相结合的防治血吸虫病的医疗小组，边治疗，边预防，边研究，既治标，又治本，全面展开了工作。

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于 12 月也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有关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专家们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在受害地区，党和政府进行了全民动员，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深受血吸虫病之害的广大群众，都有过惨痛的亲身经历，一听说共产党毛主席派人来治血吸虫病，要为民除害，人人拍手称快，兴奋异常，都积极响应，个个争先，在防治血吸虫病医疗小组的科学指导下，各项防治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同时全国各地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无私支援，更加鼓舞了灾区人民的信心和决心。

毛主席一直在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又去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

1956 年 2 月 17 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1956 年 3 月 3 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 2 月 28 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卫生部徐运北同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 3 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 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 年 7 月 7 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 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



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 1957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 1957 年 4 月 23 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全国上下总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一年、两年过去，血吸虫病的发病率降低了；又过了一年，有些地方的血吸虫病患者逐渐恢复了健康；捷报频传，人民一片欢腾。

1958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拍手称庆。人们在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到处充满了人民对党的歌颂和信赖。这是人民给予领袖的力量。

毛主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消息，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年来，血吸虫象瘟神一样，夺去了无数同胞的宝贵生命！统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竟害得祖国大地“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人民坐以待毙，好不凄惨！今天一声春雷，祖国解放了，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在党的号召下，动员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无穷的力量，多少人间的害人虫都被消灭了，现在又同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而且全民振臂，一举成功，终于消灭了多少年来一直在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使得那些遭受血吸虫病魔危害的千村万户的同胞起死回生了！顿时一幅新的图画又展现在眼前：绝处逢生的广大人民群众，将重整衣冠，斗志昂扬地走上建设祖国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他们个个如生龙活虎，都有无穷的力量，银锄落处将使青山绿水间，遍地稻寂成浪：铁臂摇起可以开山劈地，击起钢花飞溅。瘟神呢，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毛主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在踱步浮想。微风送爽，不觉已是旭日临窗，他凭窗遥望南天，要歌颂这人间奇迹。于是以诗言志，欣然命笔，一挥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的不朽诗篇。他歌颂人民力量的伟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气势如虹，把被瘟神践踏了的八万里大好河山，培育成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神州大地。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 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

林 克

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百业待兴，国际风云诡谲。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负着重建国家和处理纷繁复杂国际事务的艰巨使命。1954年，毛主席提出，需要一个懂英语和国际问题的秘书，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物色入选，组织上选派了我。同年10月金秋季节，我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南边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从这里走过一条长廊便是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在见毛泽东之前，毛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兼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曾经给我谈了他多年工作的体会，他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可能帮不上主席的忙。”这使我感到作毛泽东的秘书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从未做过秘书工作，更不知道毛泽东对秘书工作有何要求，不免担心是否能作好工作。但我决心全力作好党交给我的工作。

随后，我见到了毛泽东，他要我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此外，还教他学英语。1957年后，他又要我兼顾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直到1966年。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在他身边12年的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磅礴的气概，广阔的胸怀，深邃的历史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深思熟虑的气质，高度集中的意志，当机立断的魄力，忘我的工作激情，刚毅、顽强的性格和他那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错误和缺点。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挫折和失败；他对国家、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他提出和推行的“三面红旗”和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内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虽然如此，他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他的巨大贡献和某些严重失误都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和鉴戒。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我主要想从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的某些片断，来回忆他对青年人的教诲、鼓励和期待。

### 广收博览——毛泽东鼓励青年学理论

我初到毛泽东身边时，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资料；综合及汇报情况，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他对我的工作很放手，他只明确任务，但从不做硬性规定一、二、三、四，要我怎样做，也不划任何框框，而是让我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我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我的工作有个有利条件，就是除了工作，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谈话多。他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他经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他不但要求我汇报情况，而且要求我作出分析、判断、并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从交谈中，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作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年4月7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写信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的工作最初是分管国际问题，以后又扩展到国内问题以及理论问题。我过去的习惯是研究形势和动向较多，而从理论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很不够。现在由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要求我一方面要“广收博览”，另一方面要“偏重一点理论”，这样才能符合他的要求，“于你我都有益”。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让我阅读国内报刊的学术理论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看。

在毛泽东的指导和鼓励下，我认真学习了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我跟毛泽东一起阅读和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参加由他亲自主持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活动，这使我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中国的实际的重要性，认识了理论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因对象不同，对学习的要求也不同，对于年轻的警卫、卫士，服务人员，则首先要求他们学习文化，学习基础知识。为此，在他倡导下，中央警卫局为他们办了文化补习学校。

他有时也有选择地让他们读一点通俗的理论小册子。

1960年，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

“林克同志：冯契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

冯契，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

因为毛泽东身边的青年卫士、服务人员，多半是工、农子弟，他们较单纯，但文化水平低，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缺乏，阅读哲学著作有困难，而冯契同志的书写得通俗易懂，又不是大部头，比较适合他们阅读。

#### 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要身边人员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加重视实际知识；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更为重视实践，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所以，他不仅提倡读有字的书，而且更提倡读无字的书，所谓读无字的书就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并在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科学论断。他一生中作过许多著名的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直接指导和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对纠正左倾的政策，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出了乱子时强调：根本原因是未调查研究，心中无数。

毛泽东除了亲自视察或调查外，他还经常让身边工作人员到城乡的厂矿、街道、农村、学校，深入社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时间有长有短。

我在他身边工作时，曾多次到农村参加整社、蹲点，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四清。在整风运动期间，我曾被派往十几所大专院校了解整风运动进行情况并向他汇报。此外，我还经常进行短期的社会调查。

50年代中期，一个严冬季节，田家英同志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老解放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老区人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我随田家英同志一同前往。当时我还没有农村社会调查的经验；而田家英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政治上成熟，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我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参加的。我们这次访问了原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平等地。这次调查，我们除了向县委说明来意，并听取县委一般情况介绍外，没有任何迎送招待，我们没有要任何人员陪同，只因为路远，县委给我们派了一名司机开一辆小吉普车。我们全部时间都是吃住在农民家中，直接同农民和基层干部谈家常来了解情况。有时是一、两人，有时是三、五人，有时开小会座谈。经过长期战争，那时群众生活仍很艰苦，正值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季节。夜晚，我们睡冷炕，穿着棉衣，盖着棉被，还觉着四处透风，手脚冰凉，冻得难以入睡。有时遇到飞雪天气，中午道路泥泞，早晚道路结冰，崎岖不平，吉普车非常颠簸，由于路滑，车于行在路上常常横了过来。当时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并不觉得苦，就这样，我们一户又一户，一村又一村，有时乘车，有时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完成了这次调查。路上，田家英曾对我说，这一带老解放区生产发展比较慢，原因在于当地党员干部比较老化，摆老资格，不能吸收新鲜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闯劲。像这样的地区如果不发展新党员，要比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是困难的。回到中南海以后，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对他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他的意见颇为重视和赞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负责同志谈话时，仍然记得这次调查，他说：“老解放区有的才不

象样子，有人摆老资格，把持党组织，不发展新党员。如河北平山，全县封锁情况，下去的干部，他们要考你中央委员有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等等。”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会调查，是1961年毛泽东让我们到河南参加整社。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要隐瞒。”

他拿出了写好的一封信给我们看，信中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一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临行前，毛泽东跟我谈了一次话。他指示我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他要求我们下去的同志组成临时党支部，要我担任支部书记。我考虑到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同志，我提出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他觉察到我可能有顾虑，便说道：我看你可以，你是否敢于承担责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13人，我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同志担任支书，我担任副支书，他同意了。行前，他同我们下去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1961年元月16日，我们自北京出发，参加河南省、地、县工作队，由于河南信阳专区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阶段，所以，我们改去许昌专区郡陵县马栏公社参加整风整社，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罗道让同志和我参加了省、地、县工作队领导小组。

整个工作队120人左右，进村后同农民实行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劳动。工作队员还要逐户访问农民群众，了解生活、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生活关。不到一个月，全部工作队员都得了浮肿病。我们每人粮食定量是27斤，实际上连一半也吃不上，这一半还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汤。所谓粮食，最好只是红薯作的淀粉，根本见不到玉米，更不要说大米、面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肿，其他同志也好不了多少。但我们13位同志，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考验。

在调查中，农民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因为它是违背群众自愿的原则，

一夜之间由干部强制成立起来的。由于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多吃多拿、浪费和管理不善，农民吃不饱饭。当时公共食堂被视为共产主义因素，要解放公共食堂是要冒犯右倾错误的危险的。但我们工作队领导小组经过研究，从实际出发，主张停办公共食堂，给省委写了停办公共食堂的请示报告。然而，我们下去的同志中有的同志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怕犯错误），写了一个公共食堂优越性的报告。最后，省委还是批准了停办公共食堂的报告。后来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推广了我们停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这在全国可能是最早这样做的。大约在春节前，我们停办了公共食堂，群众非常欢迎这个措施。春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在修整我们入村时已破败坍塌的院墙。群众生活初步安定下来。接着工作队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组长冯明高同志（当时为河南省农林厅长）的建议，发动群众家家在宅基地种三棵树（一棵核桃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枣树），以备灾荒之年可以抗灾。同时发动全公社农民在全公社广泛植树。十几年后，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报道，说鄱陵县是全国平原植树模范县，从照片上看到原来树木被砍伐光的村庄，被郁郁葱葱的树林覆盖起来，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此外，工作队还分给社员宅基地、自留地，提倡发展家庭副业。

在到农村以前，无论在北京学习的文件和省委的情况介绍，都强调敌情严重，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社队为三类社，三类社队绝大部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首要任务是要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夺回领导权，完成民主补课。但我们在群众中作调查时发现，主要问题是政策上的失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特殊化风）严重，在所有制体制上，社队规模过大，没有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没有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政策，剥夺了农民的劳动成果，还有高指标、高征购等问题，就是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整了社队规模，认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政策；对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的问题，分步骤实行了彻底退赔；实行了粮食“三定”，纠正了高指标、高征购。

在干部问题上，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瞎指挥、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我们纯洁了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制止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转变了干部作风，并进行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在生产上，建立了生产秩序，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了夏收夏种等工作。基本上按照毛泽东的三点指示精神，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了整风整社的任务。

1961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回北京作总结。由于极少数同志对整社过程中搞特殊化的缺点和错误缺乏认识，缺乏自我批评，又不肯接受多数同志的批评，难以作出总结。当时，毛泽东正在江西，我写了一封信将整社的基本情况和问题以及总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如实向他作了报告。8月7日，毛泽东作了指示，大意说，我去的信，他和杨尚奎同志已看过了，他同意我的态度，希望下放的同志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极少数同志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 不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对青年进行防腐蚀教育

毛泽东历来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反对奢侈浪费、以权谋私、谋求制度和规定以外的特殊待遇。因为干部政治和生

活上的特殊化，不仅是为政不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腐化现象。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亲戚、身边工作人员。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腐蚀的方针。同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他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1951年，党中央作出了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决定。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

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生简朴，严格遵守国家的制度和规定，不为自己的亲属谋求特殊利益，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儿女，但他自己谆谆教导他们不要有优越感，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不要特殊化。他最钟爱长子毛岸英，并寄希望于他。当毛岸英1946年，阔别祖国19年后，秘密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就要他参加农业劳动。1947年，毛岸英又东渡黄河到山西，河北等地参加土改。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又送毛岸英到朝鲜经受战火的洗礼。当毛岸英不幸牺牲时，他痛失爱子，但又语重心长地说：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作出牺牲。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李敏、李讷正在学校读书，她们在学生食堂用餐。他不准用小汽车接送，要她们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常见她们穿着褪色的兰色卡其布制服，背着绿色帆布书包回家。有时卫士组瞒着毛泽东派汽车去学校接李讷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批评卫士：为什么三令五申，还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对他的亲戚，也是如此。1949年10月9日，他给他的夫人杨开慧之兄的信说：杨开智先生：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这表现了他反对利用职权为亲戚谋职务的高尚品德。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经常教诲他们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1964年冬，我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我体会这三点都是体现了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的精神，我遵照他的要求做了，结果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这更有利于深入群众，了解到真实情况，使我获益匪浅。

有位卫士，工资比较低，他与周围卫士攀比，总觉得自己吃亏。于是在评级时闹着要连升两级，领导上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卫士平衡比较，只给他提了一级，他又哭又闹。在1957年整风时，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标题是《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某某某哭哭啼啼要两级》，凑巧毛泽东看到了这张大字报，说了一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提级时啊！”毛泽东这是借《林冲夜奔》这出京剧中的两句戏文改了几个字，来教诲这位年轻人不要争级别、闹待遇。但事后，他对这位青年的生活困难很关心，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些钱给这位卫士解决困难。这位卫士没好意思接受。

就连他身边的卫士结交女友，毛泽东也常劝导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考虑，绝不能打着他的旗号，说什么我是毛泽东的卫士，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等等。他告诫这些青年：打他的旗号最后自己是要吃苦头的。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在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

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毛泽东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 不因人热——毛泽东教育青年艰苦创业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锅和灶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是梁鸿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和灶。他熄灭了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

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敢于想别人之未敢想，言别人之未敢言，走别人未敢走的路。

毛泽东曾多次赞赏历史上有政治远见、不迷信权威、富于改革精神、有创见、有作为的年轻人。他谈到战国时的甘罗12岁时就当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见、有作为。他多次赞赏西汉的贾谊，说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兵策》是西汉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风气，值得一看。他说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时因梁王坠马，而过于自责，以致抑郁而死，深感惋惜。为此，他大约于60年代初还吟诵《贾谊》诗一首：“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他还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也不过30岁，等等。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出于贫寒农家。皈依佛门后，一直是舂米的下等僧。后来，禅宗五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作法偈，以观各人的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了一首，深得众僧推崇，但弘忍并不满意。慧能反神秀之意，另作一首，却得到弘忍赏识，受法衣，为禅宗六祖。

毛泽东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静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



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种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

毛泽东对子女、亲戚和身边工作的青年也同样鼓励他们要有雄心壮志，严于律己、自立自强，不要依靠他人。

毛泽东 1941 年 1 月 31 日，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志气是很好的。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做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

1963 年 1 月 15 日给李讷的信中说：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

1962 年 6 月 3 日给邵华的信中说道，……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

1950 年 5 月 12 日，毛泽东给文南松表兄的信中说：运昌（即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对于身边年轻工作人员，则希望他们首先提高文化，提高工作能力，为人民服务。对学习好、有上进心的青年，则予以鼓励、表扬。卫士张宝金被送入大学学习，学习成绩优秀。张宝金休息时看望毛泽东，他每次必见并同他交谈，这是过去的卫士中很少人能享受到的殊荣。毛泽东还经常向身边青年表扬这位同志有进取心，学习后知识增长了，眼界开阔了，思考能力提高了，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于不爱学习或上进心不强的青年则谆谆诱导、鞭策、有时还要批评，最后还是坚持送他们去学习。

坚持真理不怕鬼——毛泽东对青年进行党性教育

1957 年整风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我谈到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说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科学真理，甚至不惜为此而献身。他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了科学的“日心说”，否定了在西方统治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统治。意大利的哲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他们也都因为坚持真理而遭到罗马教廷判刑惩罚。1959 年 10 月，毛泽东对我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还对我说过：“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失去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还同我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有两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

深，终生难忘。一个是“狂生夜坐”的故事，一是《席方平》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聊斋志异》。

约在1958年5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聊斋》上有一个故事，毛泽东边说边生动地比划说，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着眼睛，这样对视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这个故事出自《聊斋志异》中的《青凤》，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泽东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他说完故事后说道：“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更加感人，发人深省。毛泽东问我是否看过这个故事，我说，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他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又向城隍、郡司告状，因他们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受尽了拷打，又被押回阳间。席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几十大板。席大喊：“谁叫我无钱，应当挨打！”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还敢告吗？席说，大怨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体锯成两半。席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小鬼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还告吗？席恐再遭到毒刑，谎说不告了。席又被押回阳间。席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三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脏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阳寿三纪（古代十二年为一纪）。

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一些基层单位少数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对整风中提出积极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做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

不怕了。

毛泽东以后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个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他修改的序文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处增加了这样一段：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毛泽东对序文的另一处修改是增加了这样一句话：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让何其芳在序文中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话。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何其芳的修改稿，当天看完退回并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在退稿中把他上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这一修改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微和周密。就是说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外，还需“通过斗争”这个条件。这是他根据当时国内整风和国际斗争总结出的重要经验。

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蔽，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伾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欣赏。

1959年3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

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发表了他不同的看法。他对我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毛泽东对刘禹锡的许多诗也是欣赏的。如《石头城》、《乌衣巷》、《再游玄都观》、《西塞山怀古》等经常吟诵。他还用毛笔为我手书了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七律诗一首：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二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份手迹，笔力苍劲飘洒，我一直珍藏着。

## 忆主席

章含之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于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顾无限！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而对一位作家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但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暄，他们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做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

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也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语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二十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本版的全套《智囊》， he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

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讯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辞汇时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辞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言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意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is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字，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七十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辛酸地想起六十年代初期的主席。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却始终未能消融。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于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

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融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主席同我第一次关于父亲的谈话是在一次讨论完英语之后。毛主席点上一根香烟，靠在沙发里，缓缓地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我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毛主席听了我的话，从沙发里坐直身躯，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然后说：“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我说：“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着故作惊奇：“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毛主席接着问我：“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啊？”于是，我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我说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老师批判章士钊，同学们偷偷拿眼光扫我。毛主席说：“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说：“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我只得承认我不知道。于是，毛主席严肃地说：“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挟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说：“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我一下子懵了，我沉默，我惭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着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后来吃饭时，主席又告诉我，1946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蒋态度暧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主席广泛听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和父亲谈了，父亲当时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主席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我劝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主席说当时父亲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他最后作出返回延安的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对我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



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主席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还有一次，我向主席讲我的身世，我告诉他我和父亲感情淡漠可能因为尽管父母亲都守口如瓶不告诉我真相，但是我其实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父亲在我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主席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材，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作自己的父母才对！”

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

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人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他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当时还深情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另一段毛主席与我的有趣谈话也许是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讨论。我那时年轻，说话没有顾虑，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毛主席问我教学生用什么教材？我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说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主席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我说：“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好文章，外文也一样啊！”毛主席说：“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我说：“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好吗？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主席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我回学校后如实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当时我去主席那里只有总支的领导知道。）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让红卫兵知道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外面的墙壁，也有不少在校园的大字报栏里，说我“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后来，当我1970年又见到主席时，我告诉他为了这个“文学派”我挨了多少斗争。主席开玩笑说：“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我当时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岁月中，有多少人只为一句随意的评论就遭灭顶之灾。如果主席对我说的话当时就能作为一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也许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离子散的家庭！

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本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说过了初五就启程，一路坐火车，记得他说是去江苏、浙江。

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要教我读《史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但毛主席要教我历史，那是伟大的领袖当我的教师啊！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那时候我去中南海见主席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

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雪，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毛主席派汽车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很失望，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64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我请示主席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我要去陪他学英语。毛主席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酝酿。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在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之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拟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 1970 年的 6 月，相距他 1964 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 1968 年的恶浪中未遭灭顶之灾。1970 年 5 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 8341 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要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 8341 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 5 月 1 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我连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1970 年 6 月 14 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 34 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还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那是 1966 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人们一片惶恐，一片纷乱！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权威们纷纷被斗争、被游街……。我是惊恐不解之余，才给他写了那封信，之后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几句赠言。真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

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主席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在此之前，我应当组织教师把新教材编出来。

在关于教改的工作谈完之后，我万万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议。主席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又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向杨德中同志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总理汇报。他们两位立即着手落实毛主席关于外语学院教学改革的指示，配备了班子，一个月后我们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干校贯彻毛主席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进行得不很顺。教师们终于听到重返教室的号召，十分兴奋，在编写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学性强、语言规律性强的教材，而8341军宣队却一味强调“突出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所编的教材是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复辟的产物，并隐隐约约地认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于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毛主席请示。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七次会议，听取军宣队和教师们的两方意见，最后，终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当我于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总理辞行时，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你去一段时间，把指导思想弄清楚后就在工作移交给别人，早日到外交部报

到。”4个月后，我在沙洋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我立即结束教改工作，于3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我记得军宣队张政委、孙政委在沙洋干校小会议室向我传达北京的指示时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可我却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从十八岁进入外语学院以后就再没出过外院校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谊。如今要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3月29日，我乘学校的吉普车离开了沙洋干校，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十八年、奋斗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报到，从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剧性旅程的顶峰，爱与恨，生与死，辉煌与屈辱……那样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伴随着我，难分难解，直至生命的尽头！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它们的因果。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六十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洞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在此文中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万没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怀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所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应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定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脱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转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

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坐，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我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老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多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三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辛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悠久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及所作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弄懂，不想去解开那些心中的疑问。我愿留给历史学家去分析，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涛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

## 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韩桂馨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17 年了。这 17 年中，我对他的怀念一直没有断过。今年是他的诞辰 100 周年，我不禁想起了任弼时同志曾经很感慨地说的那句话：“中华民族有幸，出了个毛泽东！”的确，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与山河同在，日月同辉。

我深深地怀念毛泽东，不仅仅因为他的伟大历史功绩，还在于他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记忆。我曾有幸在毛泽东家中工作了三年多，介入他日常生活中的不少小事。深知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有着不同凡人的高尚情操、精神境界。

我对他的这一面认识 and 了解，是从转战陕北时期开始的。

### 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1947 年 10 月，中央后委住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树。我当时在中央军委卫生部所属的中央洛杉矶托儿所工作。有一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同志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毛主席身边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了，已经是该上学的年龄了。现在转战陕北天天行军打仗，需要一个阿姨去教她识字，照顾她生活。组织上考虑你是党员，又有高小文化，做事稳当，决定调你去。”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呼呼跳动，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真的能见到毛主席了。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安平县，我高小没有毕业就报名参军到了延安，离开家时，全家人都嘱咐我“共产党毛主席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如果见到毛主席一定向他老人家问好。”我想这只能是个梦，想不到梦想变成现实了。心情别提多高兴了。当时我也有些担心，担心的是我一个农村女孩子，参加革命时间不长，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吗？我们托儿所所长沈元辉为此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就这样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那年我正好 18 岁，刚成为新党员。

带着组织上的介绍信，我渡过黄河辗转来到了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他们行军驻地的一个农村。毛主席身边人员领我到了老乡院子门前。这时，我听到院子里有一个稚嫩、甜润的声音在唱戏，唱的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肖桂英唱的一段，有板有眼，很有韵味。

走到院子里一看，女娃娃留着齐整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一边做着舞台上的架式，见有人来，女娃娃不唱了，害羞地扎到年轻妇女的怀里。那个妇女就是江青。

经介绍我认识了江青和她的女儿李讷。我忙上前去打招呼问好。江青说我知道了，你的档案材料已看过。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宝女儿，体弱，扁桃腺经常发炎，容易发烧，你要带好她。我连连点头。

这时我看见小李讷冲我甜甜地一笑，我心里轻松了许多。

### 第一次和毛主席说话

在双塔村住了一天，我便跟着江青带着李的过黄河到河西区。

过了黄河，到了陕西佳县一个叫李家平的村子。我们三拐两拐进了大院子，这时，正好碰上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边跟着一位挺精神的小伙子。还没有等我们几个大人说话，小李讷就象一只小燕子似地扑到毛主席那里，嘴里叫着“好爸爸、乖爸爸、小爸爸！”

毛主席非常高兴，一手抱起女儿，一手拍着李讷的后背，用浓重的湖南



口音喃喃着“我的好娃娃、乖娃娃……”一边说一边在女儿脸上亲了又亲。

我们站在主席身边的人都会意地笑了，江青尤其高兴。

好一会儿主席才放下孩子，扭头看我，小李讷嘴很甜，很快地说：“爸爸，这是新调来的阿姨，”我忙上前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连声说：“欢迎，欢迎。”接着又问我愿意不愿意在这里工作，我一边点头一边回答：“愿意，主席忙国家大事，我能帮助主席做一点小事，很光荣。”

主席连声夸我会说话，又问我读过书没有我回答说上过高小。又问我是那里人，我说老家是河北省安平县人。主席笑了，很亲切地说：“好啊，女秀才嘛。以后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了。”

这时，毛主席拉过他身后的那个小伙子说：“银桥，你的小老乡，你们都是安平县人，为革命走到一起来了，拉拉手吧，这也是缘份嘛！”

我的脸腾的红了，没有去拉手。

主席哈哈大笑起来：“银桥啊，你是党小组长，小韩也归你领导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说话，我觉得这和我见到的主席台上的毛主席不一样，他和平常人一样，和蔼可亲，我也不再拘束。

那位银桥就是后来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我的丈夫，我们结为夫妻，是毛主席做了促进工作，他是领袖，又象父亲一样关心儿女，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实在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锅台办公桌

沙家店战役以后，结束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形势开始好转起来，但是毛主席仍然很繁忙，平时很少说话，总在屋子里看地图，写电文阅电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到一地，首先给主席找休息的地方，好让他解除一天的劳累，我们这样做，主席不高兴了，对我们说，“行军到一个地方，住下来以后，不要先搞床铺嘛，要先搭个办公的地方。”

按主席的吩咐，我们每到一地就先去找桌子、椅子。可是战争年代陕北老乡家里极难找到桌椅，最好的就是一张小板凳，都是些小圆堆子，或是草编的坐位（的）等，我们又怕暴露目标，不敢随便到更多的老乡家里去找，大家非常着急，主席见状没说什么。他围着老乡家锅台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就把这锅台当办公桌吧。”

陕北很多地方的老乡，用青石板作锅台，我们扫扫锅台上的灰尘，于是这个锅台就成了毛主席的办公桌，我们又找来一个木墩子让主席当椅子，他坐在锅台边幽默他说：“这样很好吗，革命成功了，这个锅台还有一份功劳呢！”

毛主席常常在小小的锅台上，指挥着辽阔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妄图半年时间消灭共产党在陕北的梦想。

不能搞特殊

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吃的是二米饭，就是用大米和小米合起来做成的米饭。

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大食堂吃饭。李讷和我们一块到大食堂吃饭。主食是黑豆稀饭，就连这个也吃不饱，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粥不好消化，吃了肚胀。有一次小李讷偷偷地对我说，小韩阿姨，我吃了黑豆粥肚子疼。

我心想，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小孩子呢，老这样下去怎么行！于是，我

去找李银桥商量希望和主席说说，让李讷和主席一起用饭，有时能吃上一点细粮。

银桥同意我的想法，找了个机会，就壮着胆子和主席去说了，主席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望着远处出神。

不知什么时候，李讷跑进来，很可怜的样子说“爸爸我吃了黑豆稀饭肚子疼。”

当时，江青在场，她给我们使眼色，鼓励银桥继续说下去。

主席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用手摸了摸小李讷的头，又推开她，对我们说：“陕北老乡的孩子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现在要比岸英、岸青小的时候强多了。”说着挥挥手，不让我们说下去了。

银桥不说话了，我继续请求地说：“李讷还小，就让她……”

主席脸色沉下来，决然表示就这样吧，不要搞特殊。

从此我知道，主席在家中决定了的事谁也不好改变，他对子女要求尤其严。我们这一次请求毫无结果，李讷照例和工作人员一样在大食堂吃饭。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李讷发育长身体时期，她在学校吃不饱，值班的卫士给她送过饼干，此事被主席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主席不让自己的孩子特殊，他的孩子们也从来不搞特殊。

院子里的笑声

陕北山峦起伏，气候干燥，一到冬天，气温格外低，北风一吹，整个山沟都吼吼叫。

我们在离佳县城不远的神泉堡住了些日子，又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

有一天，主席办公累了，从屋内走出来，在院中活动一下换换新空气，这时，我领着：李讷、叶子龙参谋长的女儿燕燕、叶丽亚和胡乔木的女儿胜利在院里玩耍，李讷一眼看见爸爸过来了就说，我和小爸爸玩。主席也就和小朋友们玩起来，开始做起运动来，活动一下腰甩开两胳膊伸伸手大步向前走，像扭大秧歌一样，小朋友们跟在后边模仿，一边扭、一边笑。……

小朋友们总盼着和主席一起活动玩玩，主席一来到院里，他们给主席演小节目，主席看着很高兴，笑的很开心，伟人也有童趣。虽然他每次在院子里只能呆几分钟，但是他只要被小朋友们发现，小朋友们就不放他走，玩了几分钟，主席说，我还要工作不能多玩，等全国解放了再多玩几分钟。

一切为了前线

毛主席一生简朴。不讲排场，他反对大手大脚花钱，吃饭只要求合口味，粗茶淡饭足矣；穿衣舒适就行，旧的破的不在乎，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更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

他平时很少吃肉，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有一次，我为他补内衣，那衣服破的不象样子，手挖几针破洞更大，实在不能再补了。拿着这件破衣服，我想不通，形势好转了，我们这些战士还能穿上整整齐齐的新军装，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怎么就不给他发一套新军装，我有气就去找领导李银桥。李说“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主席不穿新衣服，我们给他领了他也不要，谁也没有办法。”

我不信，就大着胆子去找主席讲，并把那件破衣服抖给他看。

主席不以为然。他笑了笑说：“就劳驾小韩阿姨再补补吧。”

当时，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主席却和蔼地说：“衣服穿好穿歹不算什么，比起前方流血牺牲的战士们，我们就想通了。他们更需要衣服穿，更需

要给养。一切为了前线。”他深思了一下，又挥起手说：“等我们胜利了，再穿好一点，你说对吗？”

几句话，说得我哭笑不得，只好拿回衣服再小心翼翼地补起来。

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3月，毛主席渡过黄河，离开陕北，这是我在主席那里工作刚开始的半年。这半年，战争异常残酷，环境极为艰苦，由于工作关系，我不能亲眼见到战场上的毛泽东，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亲身感受到他于小事中显现出来的高风亮节长垂风范。历史上的毛泽东是个巨人，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追忆历史风云，寻觅伟人足迹，心潮起伏难平，对于我来说，毛泽东是领袖、长辈、老师几种身份兼备。他对我们的教导和影响，奠定了我一生的做人准则。毛泽东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

徐 涛

谈起“养生之道”很容易使人联想甚至误解为古代的或个别现代的那些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人，潜心学习了老庄、佛、道之术，一心想通过养心养性、养气养神、练功打坐、清静无为、少思寡欲或者寄托于“神药”补品等以企求健身长寿者。其实中国古代的“养生术”中除去那些唯心的、迷信的、消极的糟粕以外，也有不少是符合医学科学道理、符合中国民情、积极健康的健心强身之法。但我现在要谈的既不是古代的更不是消极落后的养生，而是积极的、健康的、经过毛泽东同志自己亲身实践过的保健养生之道，道者规律也。那么毛泽东同志在保健养生与有关长寿方面真的有什么规律与秘密吗？

毛泽东同志重视人民的健康，他也重视自我保健，但这并不是目的，他认为保持健康才是学习求知与从事革命工作的基础；他本身的战斗一生的经历，已充分的说明了问题。他对健康、体育锻炼，保健、人的寿命、人的生死等都有他自己的独特观点。

毛泽东同志去世已 17 年，今年是他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日子，他在革命人生的旅程中度过了 83 个春秋。他是举世公认的革命巨人。正像恩格斯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就是在中国人民豪迈的革命时代造就出来的革命巨人。

他的博学多才、胆识谋略、卓越成就与民族英雄的形象都使人十分崇敬。他的革命经历、工作生活方式、性格情趣、读书学习方法、辩证思维、富含哲理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等多有独到之处。不但在生前，即使在他去世后仍将对亿万人民产生了使人感动、敬佩、甚至惊异之感，也会使不够了解的人更会产生好奇的心理。这些将会对人们有着十分引人的魅力。人民爱戴他、怀念他，对他生前的健康状况、保健养生、与有关长寿等问题，也许是希望更多了解的内容。曾经作为他的医生，我想就我所知，记忆所及作些回忆。

毛主席生前曾对吴旭君同志(当时是毛泽东同志的护士长，兼解放军 305 医院副院长)说他“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这篇内容是我初步概括的，包括讨论他是否算长寿老人、以及他的生死观、健康观、自我保健养生法、养生 16 字诀，以及他保健养生的遗憾不足之处，这些都是他自青少年至老年亲身经历与实践又行之有效的内容方法。在他逝世后，这些内容如能使一些需要的人供作参考或是采纳实践，这也将是有益于人民的，我想这样做是会更能符合他生前心愿的。我愿以此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算是长寿老人吗？

毛泽东同志从 1893 年 12 月 26 日诞生到 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逝世，共度过了 83 个春秋。我要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算不算是长寿老人？我想这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1.按群众的愿望算，多年来习惯于欢呼“毛主席万岁”，这反映了群众希望他健康长寿，主席逝世时举国悲痛，叹惜他去世太早了，尽管他已是 83 岁高龄，但尚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这说明对毛主席寿命的期望值太高，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作为判断是否长寿的标准。

2.从社会人口的寿命统计数字及民间习惯分析，人口平均寿命期望值，近年来北京、上海的统计均已达到或超过了 70 岁，但在 17 年前 70 年代中期，并未达到 70 岁，其他城市更低些。与 83 岁比较，比平均寿命早已超过许多，

可属于高龄老人了。毛主席在晚年常风趣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73、84岁无非是孔老夫子与孟老夫子当年的寿数，这民间俗语也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最多只说明活到73、84岁难得，不等于只有超过84岁才算长寿标准。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也属于民间俗语，所以83岁按说应属于长寿范围了。

3. 按老年医学标准算，我国规定60岁以上称为“老年”人，80岁以上称“高龄老人”，90岁以上称“长寿老人”，100岁以上称“寿星”。毛主席的实足年龄是83岁，但他每日超负荷工作，有时每日仅有4小时左右睡眠，每日工作至少20多个小时，他一日工作量等于常人两天的工作量，他能在这83个年头里作了超量工作，作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广博学识，是一般同龄人在同样时间内部难于达到的。也正是他进行了加倍的工作日，如果从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算起，即从1920年起直到1976年止，即使按保守的计算法只算50年间他是一直加倍量的工作学习，那么他度过的可能相当于常人的100个年头。这样计算不算夸大。早已超过了90岁，难道还不能算长寿老人吗？

4. 从毛主席的革命传奇式的经历算：

少年学生时期：初生至25岁（1893~1918年）他出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当初是贫农，后来成为富农，他自己说过“粮食虽然够吃，但家里有七张嘴吃饭。”他父亲从来不给他钱，从不给他肉、蛋吃。从医学营养学角度看，生活条件是较差的，他从6岁起帮家里干农活。他曾对我说：“小时我常放牛。天还没亮，我正睡得好香哟，我父亲就叫醒我，去给他放牛，天冷不想起也没办法，还是要去。打赤脚，脚冻得痛，只好把脚放在刚厨出的牛粪中取暖。”他13岁离开小学，白天干农活，晚上给他父亲记帐，深夜才能自学读书。18岁时参加了黎元洪的革命军，月薪只有7元钱，伙食费花2元，其余的都订了报纸，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当时住在北京的三眼井一间小屋里，一个炕上睡8个人，翻身都要打招呼，所以他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体力劳动多，饮食营养跟不上，体质较差，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个阶段，他的精神营养远比物质营养丰富得多。

青年时期：26至33岁（1919至1926年）他帮助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往返于湖南、上海、北京之间，经常身无分文，在上海时还曾靠洗衣维持生活。有一次乘火车睡觉时，鞋子被人偷了，只能光脚走路。从1920年，他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到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及“八一”南昌起义等，他常奔波往返于农村城市之间，组织了秋收起义，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中年时期：34到42岁（1927到1935年10月）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多年游击战争，又经历了368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老一辈革命家共同走了无路可走的路，饥寒状态下爬过高耸的雪山，越过鸟兽绝迹的沼泽草地，对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此革命创举在世界革命史上堪称举世无双，他吃尽人间疾苦，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生活条件无比艰难。

从43到56岁（1936到1949年），约相当于老年医学上的“老年前期”（按为45到59岁）转战西北，抗日、抗击国民党的进攻，指挥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高度精神体力耗损，睡眠、饮食、行动等一切更加无常。

老年与高龄老年时期：56到83岁（1949到1976年）27年间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建设时期，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开展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斗争、

对接班人的选择、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与经济封锁等。此外，在 1923 到 1935 年间他受过多次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三次离开党中央。建国初年爱子毛岸英的牺牲，家庭生活中的不幸、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晚年与衰老疾病作斗争等这些都加重了精神与体力的损害。

从医学角度讲，利于健康长寿的基本条件应该包括多方面，除遗传因素外，还有生活环境、饮食营养、精神心理，体力活动、工作生活方式、健康情况与医疗卫生条件等。从以上条件看许多在主席身上并不具备。他一生中在全国解放前生活了 56 年占生命的 2/3，解放后 27 年占 1/3，而战争年代占了他生活的 1/4。解放后虽然在饮食营养、生活工作条件上有一定改善，但生活简朴、睡眠极少、工作极多、仍是不利条件。在这样条件下经历 83 个春秋，我认为是十分难得的。

我认为像毛主席这样类似经历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和一些生活比较优裕、精神体力劳动不重、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相比；也不能和从事比较简单的农业劳动、生活在田野山村的人们相比。对经历战争与复杂环境的革命前辈们应从社会、经济、体质、政治等多方综合分析，我认为他们达到 70 岁以上就应视为“高龄老人”，80 岁以上应视为“革命的长寿老人”，90 岁以上即相当于一般人的 100 岁，应称为“革命寿星”了。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以上哪个方面分析，毛主席都应称为“革命的长寿老人”。

####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

我们首先明确了毛主席是一位革命的长寿老人，那么他又是怎样在许多不利于健康的条件下做到健康而且长寿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我认为他在精神心理、体育运动、饮食营养等方面有相当独特的自我保健经验。他从年轻时就崇尚这一原则：“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这是孟老夫子说过的。

#### 体育锻炼终身坚持

1. 自由体操：毛泽东有一套自编的“自由体操”，有时在散步中可以边走边作。他深呼吸，缓缓散步时可以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关节；有时屈伸时腕关节，时常旋转双肩，以肩带动时臂作圆周旋转运动，左肩向前上，右肩向后下，交替转动，也可同时作腰部旋转扭动。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生人时练习。作起这套动作与平时的严肃庄重完全判若两人，比扭秧歌的动作还要有趣。有时我跟他一起散步，他边做边回过头来看我，当我在笑他这一套“自由体操”时，他就向我做个鬼脸，然后他就更起劲地做，好像在故意逗我似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年轻时就自编过体操，叫“六段运动”，有手、足、头、躯干运动，还包括拳击、跳跃等。后来年纪大了就把剧烈动作改掉了。我想他年轻时很可能看过中国古代养生法的书籍，参考了“八段锦”、“五禽戏”等而编了“毛式体操”。因为有一次他跟我说：“三国时有个名医叫华佗，给曹操治过病，他学老虎、学熊、学猴子、学鹿、学飞鸟的动作编了‘五禽戏’，这你应该知道罢？我看不错，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这都是仿生运动。人们有好多运动都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其实也是动物学动物。中国有螳螂拳、猴拳，你游泳的那蛙式不就是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吗？”

2. 散步：主席平时的主要运动就是散步。一般喜欢快步走，冬天在冰天雪地里照常散步，还特别喜欢踏雪。他特别喜爱雪，有时院子里满是洁白的雪，他又不让扫掉，他喜观赏雪景和洁白如地毯般的白茫茫大地，可有时他

又喜欢踏雪，在厚度深过脚腕的雪地里踏行。寒冷天出来散步从不戴口罩、手套、围巾，他很耐寒。但他散步时间也不很长，每次5至10分钟，就想回去办公。散步范围就在那有六棵柏树和一棵槐树的小院子里，就在菊香书屋门前，有时夜里办公累了，偶尔从后门出来在中海北岸马路上走一段。静谷就在西侧是个小花园，但很少去。外出巡视时喜到野外田间、茶园散步，他喜看庄稼，喜在田野里和农民交谈。

有时正在散步中间尚未到预定时间、或是打麻将中间突然不讲话站起来思索着问题，走回办公室独自办公去了。起初我们都很奇怪，后来习惯了，也就见怪不怪了。直到晚年他体弱有病，卧床过久，双下肢很吃力，他仍要设法下床坚持站一会或者努力走一走与衰老疾病作顽强斗争。

3. 跳舞：在五十年代，常常在星期六晚上去春藕斋参加舞会。每次可跳一至两个小时。他喜欢听民间音乐、广东音乐等，跳舞中间还可欣赏一下相声、舞蹈之类的小节目。他喜欢跳音乐节奏鲜明的中口步，舞姿悠闲，他认为跳舞既是锻炼身体，也是多接触群众的好机会。

4. 爬山：是他很喜爱的一项运动。1954年我第一次跟他外出巡视，到杭州。那次他是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而去的，住在刘庄。一天上午他刚睡醒就提出要爬山。我想他已是老人了，爬山恐怕太累，就劝他不要爬了，他说要爬。我去向叶子龙同志（机要秘书室主任）、汪东兴同志（中央警卫局局长），王芳同志（浙江省公安厅长），请示，最后商定让爬一个小山，就是丁家山。这小山就在刘庄大门口对面，像一个大屏风，大约几十个石级可到小山顶。主席像散步一样，随便就走完了，爬完山跟没事一样。第二天睡醒后又说要爬山，又共同商量安排了一个略高一点的桃花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醒后就要爬山，而且不爬重复的要爬新的山，要爬高山。毕竟已是61岁的人了，我给他做了两个规定条件，第一爬山中间要中途休息。第二需要时我得给他查脉搏、呼吸，了解脉搏快慢，以及由快到慢的恢复时间，以了解他的心脏功能。开始他不同意，说我“小题大作”，后来总算同意了。他爬山时步子不紧不慢，能持续爬很久，相当有耐力。我和周泽昭同志（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共同对主席进行观查。经脉搏、呼吸的测量等，都认为他的心肺功能很好。主席说：“我这辈子爬了不少山，累不坏。”回家以后，晚上他对我说：“井冈山那么大，还不是靠两只脚走过来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在年轻时活动量很大，有一次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夜，独自从岳麓山爬上爬下，全身湿透，到了蔡和森家，蔡的母亲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我要体验诗经里“纳于大麓烈风暴雨勿迷”的情趣。连想起这些后来才理解毛主席为何喜欢爬大山，原来和他多年爬山涉水的征战生活经历有关。那一年在杭州，他又爬了南高峰、北高峰、后来还爬了莫干山等。总之几乎爬遍了杭州周围的大小山峰。

5. 外出巡视、远途旅行：主席当年经常外出视察工作，一年内要外出多次。较经常去的地方有杭州、广州、上海、武汉、长沙、北戴河等。所经之处更喜涉大川、登高山、观沧海，这与他的博大胸怀是很相适应的。有一次吴旭君问主席“主席，你怎么

有时和其他的首长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到了夏天，越热你越往南方跑，到了冬天越冷你越向北方跑。”

“这你就知道了，”主席笑着回答：“这样既可作调查研究，又可锻

炼身体。”

其实毛主席年轻时就喜爱远足野外宿营。后来外出视察时，到了一个城市往往不下火车去城里住舒适的房子，他就住在火车上，他怕给当地领导增添麻烦，所以白日外出视察，晚上睡在火车上，出入方便。列车停在郊外，晚上极安静，四周是农田，飞鸟鸣虫，田园气氛，他可能又在回味年轻时野外宿营般的情趣了。他常说，“下去调查研究、走一走，脑子就充实了。”年轻时他曾远足、徒步旅行，有一次33天经5个县，行程900余里，到基层了解民情，增长知识，锻炼身体。

6. 游泳：是他终生喜爱并十分擅长的运动。他游泳特点是：游大不游小、游长不游短、游远不游近、游缓不游急、游险不游易。他擅长侧泳、仰泳，泳姿熟练，只要有条件就要游大水库、大河、大江、大海。每次下水只游一次，但时间可长达1小时甚到2小时。在海中游不喜在岸边浅水处，下水即向远处游。他还喜欢和年轻人比赛。有一次要和我们比“漂水”，他说面朝天，手脚伸开不许动，看谁漂得久。结果我们短时就下沉了，他却能漂得久，他得意的笑了。又一次要和我比，我说“好，看谁游得快！”他说“不比快。”我说“所有游泳都是比快的。”主席说“有比快就有比慢的。我们比持久和耐力，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就要有耐力，要时间长游得远才得胜。”我们年轻动作快，消耗能量大，但游不很远。我们游了一段都上了船，休息一下再下海游。他可持续游很久。主席还喜欢“潜水”。连头带人一下子直沉入水中，再过十几秒才出水，我很着急。我劝他老人不宜潜水，水深压力大，增加心肺负担，他索兴当我面又故意“潜水”一次，像小孩与人逗气一样，出水后还向你笑，表示胜利，表示无所谓。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很少潜水了，看来他已默默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另外他还专门喜爱在大风大浪里游，冬泳不怕天寒水冷，63岁时首次横渡长江，73岁时又渡长江，在长江里前后游过17次之多。后来还想穿游三峡。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游别的姿势？他说“我看你的自由式也不自由。”

“你看我头不进水，不用换气，游起来我口能讲、耳能听、眼能望。”主席说得轻松愉快。

“你这才真叫自由式呢！”我连忙说，因为主席擅长于游侧泳仰泳。我想这种姿势确实更适合于老年人，我当初建议主席游泳时就没想得这么细。

“游泳的好处你只说过四点，可你没说全，它最大的好处是脑子不能想事。我散步、跳舞、看戏，吃饭、连吃了安眠药也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游泳时可从不想事，一想事就向下沉，要喝冷水。”

7. 梳头：长时间脑力思考问题，他可感到头部不适、疲劳。每逢这时他便要卫士帮他梳头，从前额部向后枕部缓缓反复梳，时间长短不定，他背靠椅子，上身后仰、双足前伸，双目闭合，身体舒展放松，他感到舒适，毛主席认为补脑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吃红烧肉，另一个是梳头。他说：“脑子要补，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言下之意没有更好的条件就得梳头了。他说：“梳头可以补脑，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头发生长，把有限的营养首先供应大脑，帮助大脑恢复疲劳。”我想梳头这一内容，恐怕是他早已读过中国古代养生学的书籍才引用的。因为明代学者冷谦就在“修龄要旨”之中提出“养生16宜”，其中提到的“面宜多擦、发宜多梳、目宜常运、口宜常闭、津宜常咽、背宜常暖、腹宜常摩、皮肤宜常干浴。”他较常作到了8宜。直到目前在日本民间流传的“16宜健身法”就是从中国传出



去的。

8. 按摩：他脑力劳动繁重，感到疲劳思睡时又常常难于自控而甚难入睡，在服安眠药以后就叫值班卫士小伙子帮他按摩，促进睡眠。对下肢促进血液循环，使近年来很少活动的下肢尤以小腿肌肉能有些被动运动。这种按摩至少要一刻钟以上，或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手法也挺有讲究。

9. 擦澡：他年轻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已习惯于在天刚亮就到水井旁，脱去衣服，用吊桶打冷水淋身。淋后擦身，擦后再淋、再擦，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冬季照常。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意志、锻炼勇猛与无畏。后来年纪大了，这个习惯就改为温热毛巾擦澡。卫士一边给他擦澡，他还可以一边看书、看文件，擦时四肢、胸腹背都擦。我曾问他为何不喜欢洗澡或淋浴？他说：我习惯了，擦澡好处多，除去清洁之外还可按摩、促进循环，有健身作用，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可预防感冒。”

主席还曾向陈云同志建议使用此法健身。在一个文件上写明“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下面署名毛泽东，那是1953年3月19日的事。在签名后又补写一句“用酒似不甚好。”这一句是针对某些苏联内科专家曾对其他病人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的方法，提出了他不同的意见。毛主席这些建议与方法，有一定的医学道理。

对毛主席的体育运动利于健身养生，作点医学分析。

“缺乏运动是20世纪人类的通病。”半个多世纪来，科学技术生产呈突飞猛进之势。电气化、自动化生产、交通通讯进展、人造卫星及宇航的发展等均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另一些副作用。如生活中电器、煤气、交通、通讯、电梯、洗衣机、电脑等。给人们生活提供了大大的便利，使人们体力劳动明显减轻，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紧张、脑力劳动增加、缺乏体力肌肉锻炼，使人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逐渐减低，身体脂肪容易增长，心脑血管病日趋增多。恰恰就在这个人类更需要适当增加体力活动才能利于健康长寿的课题上，毛主席较早的又较完整的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体育锻炼的理论、目的与方法。他自幼至老身体力行，他有着卓越的预见性。

按摩、擦澡是由于他体力活动少而采取被动运动防止肌力减弱，再加游泳、日光浴、空气浴等加强皮肤血管舒缩功能以适应外界温度变化，增加耐寒力，对防止感冒确有实效。感冒对老年人绝不是小病，它常是诱发大病、重病的导火线，主席怕感冒，医生更怕他感冒，正由于多年坚持这些活动，他较少发生感冒，对防止一系列呼吸道感染，保护心肺功能等起了较好的作用。散步、自由体操每日坚持、方便易行，不像爬山、骑马只能偶一时期进行。室外散步接触新鲜空气，活动全身关节，再加跳舞活动对减少脑力疲劳、减轻体重等大有好处。游泳是全身平衡发展的良好运动，对减肥、镇静、锻炼皮肤适应温度变化而防止感冒，真正帮助脑力休息（这一点对毛主席产生了奇效）都有作用。仰泳尤以侧泳姿势更适合于老年人，游泳给主席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与健身效果。按照近年来运动医学的研究认为运动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适当降低高血糖、还可增加血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这后者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是有利的。因此适当运动锻炼对促进健康与长寿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运动就其作用说可以代替药物，但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毛主席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深刻。

## 饮食起居

生活方式：可能再也没有谁的生活方式像毛主席那样“古怪”了。他和一般人的习惯完全不同，他饮食餐次不定，不但一日不是三餐，常是两餐或两天三餐，每餐间隔甚长。吃饭时间日夜不定，也可以说“廿四小时里那个时辰都睡过觉”，那个时辰都吃过饭。饮食内容也不一定，正常时一餐中有四菜一汤，量也不多，但也常是煮一缸麦片、或烤几块红薯也算一餐。他吃饭时边吃边看书报，吃起来狼吞虎咽，仍像打仗行军时似的。他常说他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白天睡觉晚上夜里办公。我想他长期这样很少体力活动又很少见阳光对身体很不利，就常劝他改为正常规律。有一次谈到日夜规律的事。

“你说老虎厉害不厉害？”主席向我提问。

“厉害呀，有时候还能吃人。”但是我也奇怪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它就是白天睡觉夜里出来，它也不见什么太阳，不是也很健康吗？”主席说完我才明白。

“那……那人和老虎不一样。”我一时词穷没说出更好的理由。“人还能捉住老虎呢，还是人厉害。”我又补充了一句，道理还是没说清。

反正我一直在想，他整日连续高强度脑力劳动，加以生活起居、饮食工作全无规律，按医学上一般规律这种情形因为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中枢的功能失调与紊乱很容易致成高血压、溃疡病、心律失常、或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等一类疾病，这在医院中已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他却什么事也没有，仅仅是睡眠非常不好，这真有点使人不可思议。当时我未能解释。

工作一段时间，我又有些新的发现，那就是——这无规律的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律。二，在无规律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三，这种无规律对他来讲已是顺乎自然，久成习惯，自我适应了，不以为怪，不成负担主动自由。

饮食特点：比如起床后几小时和入睡前几小时进餐，也大致有其规律，正餐两次，或一正餐、一次便餐都以不过饥不过饱为准。饮食内容是荤素搭配、素菜青菜较多、口味清淡、喜食粗米杂粮、食不过偏、杂食多样。二米饭有大米、小米，还可加点百合、红薯、芋头之类。菜以绿叶菜为多，多粗纤维。毛主席常跟我说：“我的生活里有四位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另一次他说：“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有十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我说。

“你应该给他诊断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我想是这样的，就回答了。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寒，用姜去暖寒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去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他不紧不慢笑着说。

“看来你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也笑了。

有一次谈起饮食问题我跟主席说：“现在欧美人都喜欢吃中国菜饭，又好吃又能减少心脑血管病。”

“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全国有多少省和地方，菜饭有多少种？”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又接着说：“中国地大物博，宝藏很多可开采及生产的有限，土地多但可耕地不多，大家只好暂时少吃一点；中国是东方国家，习惯上吃得素一些，本来在中国古代佛教僧侣终年吃素食，据说南朝梁武帝终生都吃素，影响较大，后来素食由寺庙传到宫廷又传到民间。不过我们并不是全素，吃得素一些对健康有好处。西方人食物里脂肪多，越往西越多，他们得的心脏病也比中国人多。”

我曾经向主席说中国古代很早就讲究营养了，提出“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合理的平衡食谱了。

“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治病，你们医生可不要过分迷信药物，不要轻视饮食治疗。”主席还说过“豆付、豆芽、皮旦、北京烤鸭都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有些地方的小吃也都有特色，应该国际化，可以出口。”

“豆制品的蛋白和肉类蛋白一样都是优质蛋白，油皮、腐竹含蛋白质40~50%，湖南豆鼓含蛋白是30%，都比肉中蛋白含量高，我给你安排的食谱里，豆制品也不少。”我刚说完，主席接着说“豆制品我很爱吃。”

喝茶：是主席的一大嗜好。每日睡醒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喝茶、看报纸。他喝绿茶，尤喜龙井，要浓、要热。喝完茶用手指把茶叶掏出放到嘴里全吃了，他认为茶叶像青菜一样也有营养全吃下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主席也说过“茶可以益思、明目、少卧、轻身”，他说“这些可是你们的药学祖师爷李时珍说的。”他说最早种茶、饮茶都在中国，可能在九世纪就先传入日本，后来才传到欧洲、印度。他也知道唐朝陆羽作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的专门著作，说“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作的贡献。”

的确，茶现在已是世界上三大饮料之一，茶可提神、健脑、使思维迅速联想完善，还可利尿、止泻、消除疲劳，有人试验饮热茶9分钟后可使皮肤温度下降1~2℃，可以降温消暑，茶还可防射线的幅射作用，绿茶除含大量维生素C外，还可降低血中胆固醇，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在主席原有的饮食习惯内容上，再加以医生给予的调整改进，就更有利于健康了。

#### 主席的饮食原则

荤素搭配、以素带荤、粗细搭配、海陆搭配、杂食不偏、口味清淡、餐次适当、内容简朴、热量适中。

属于：高蛋白、多维生素、多纤维素、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盐、低糖、热量适中、平衡营养、东方膳食。

世界上近年来不少营养学家提出为防止心脑血管病，某些肿瘤，“东方膳食”是比较理想的先进膳食。更有的学者提出总热量不宜高、低胆低脂，甚至适当饥饿，都对防病促长寿可能更有利。

对“红烧肉”问题，也曾有过不同见解。红烧肉、肘子类主席确喜欢吃，但也非餐餐皆有，也非限制不给。当时有些炊事员，一般工作人员皆出于好心实意认为“有求必应，不求也上”是对主席“增加营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殊不知当时主席体重已较重，为健康及防止心脑血管病及某些肿瘤，从饮食作一定的医疗管理监督是很必要的。因此对工作人员甚至对主席我都作了反复的宣传解释。我当时的原则是：“红烧肉”一类食物，以解馋为主，不求饱食；以瘦为主，略肥不腻；量不在多，次不求频，控制体重，医疗说理。最后主席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饮食配合很好，保证他体不过重，病不增加，为健康长寿巩固基础。

#### 精神心理情趣爱好

对古今中外长寿老人的长寿因素调查中，其经验都可分别概括有几十条，但在诸多因素中大家所共有又都排于第一位的几乎不约而同的就是精神上的乐观开朗，毛主席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

革命的乐观主义、心胸开朗、无私忘我、事业心强、信心十足、七情俱在但很能情绪自控。他喜怒不易形于色，常看不出大喜、大怒、大忧，他很注意“制怒”，修养很高，不迁怒、从无面红耳赤态度粗暴表现，生活中偶尔有些怒气，平静出口，态度严肃，事后还常向年轻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真正生气只是为国为民，比如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不承认中国，为了1949年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他们对新中国不重视，他曾愤愤的表示过：“我就咽不下这两口气”，这是何等的英雄骨气！

辩证思维、精于谋略，对危难急重军国大事胸有成竹、多谋善断、独到见解、善解矛盾、从容不迫。在六十年代前后，多个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及军事包围，有将要对我大举进攻之势，主席镇定自若曾表示过：“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撤到黄河、长江两岸，诱敌深入，关门打狗。”在林彪反革命叛变前夕，他们正准备谋害毛主席将下毒手之际，当时毛主席乘车外出视察，在此危险紧要关头，毛主席身处交锋的最前沿阵地，他以勇敢机智、深谋预见的神态曾说过：“我在进行火力侦察。”

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博学多才、自成一家、志气高远、情趣广泛、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热爱读书及书法艺术。

坚韧顽强、不畏困难、体不服病、病不服重、人不服老、老不服衰、迎接挑战、胜不服输。生活不怕艰苦、谈话喜欢交锋辩论。直到晚年仍与衰老疾病作顽强斗争，直到逝世前都未停止学习，未停止思考国事，多么崇高的思想与顽强的生命力！

对个人生活无所求：对衣、食、住、行从无特别要求，不要高标准、不求享受、不食珍贵、不食补品、衣着朴素、喜住平房。日甘淡泊的生活，减少了对他事业工作上的干扰，不产生个人烦恼。他只睡垫上棉絮的大木床，那一半还留给他的“图书朋友”，生活上很像孔老夫子的“居无求安”。另外有的地方像苏东坡养生处方上的内容：“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至于苏东坡的“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他却永远不愿也不能去效仿了。

在精神生活中只有睡眠是最不理想的了。这是革命历史复杂环境中造成的。每当我问及睡眠的情形，他常风趣的告诉我：“我十分能吃，七分能睡。”因此不得已才靠安眠药助眠。但由于多年来前后几任医务人员都非常重视，正确掌握、慎重使用、及时调配、因此虽使用多年从未产生任何毒副作用，但是有力的保证了他的睡眠与繁重工作，安眠药立了大功。

由于主席的辩证思想不但有利于他大脑皮质高级神经活动的调节，思维条理清晰、善抓主要矛盾、判断准确、主动从容，正常的神经活动不中断、不干扰正常的身体内脏等生理活动，有利于他的健康与长寿。此外他对人的寿命、生死问题、保健医疗问题的观点提法，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指导与启发。

生死、寿命及医疗保健问题

毛主席说“人那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

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也是合乎情理的吧！”我说。

“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那孔老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你们搞医的认为人的寿命有多长？”

“人的寿命相当于人本身生长发育期的5倍，如果算25岁为发育期，人的寿命大约是120岁。也有人提出能活150岁，不过多数学者意见倾向是120岁。”我解释说。

“我看人能活到100岁也不那么容易。只长寿不健康又有什么好处？要又长寿又健康才好，要老有所为嘛！”

主席还曾说过：“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1700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65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啰。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曹操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

主席告诉我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说过养生之法是：晚饭少吃口，饭后百步走，娶个老婆丑，活到九十九。主席又说“我也有个原则：‘遇事不怒，基本吃素，多多散步，劳逸适度。’”

我认为毛主席的养生健身“16字诀”更完整合理。把精神心理放在首句，而发怒是七情之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作为代表提出“不怒”。第二句“基本吃素”，重在“素”与“基本”。素指饮食清淡、低脂肪、低胆固醇，但又非全素，表明蛋白、脂肪仍有，是以素带荤。散步简便易行，要求有一定的量，劳逸适度包括生活工作起居，不是只逸不劳，要有劳有逸。

主席还说过“我看你们容易迷信药物，不要有点小病就用药。人还有抵抗力吗，先让自身的抵抗力与细菌作战，能战胜就不要用药。如果抵抗力差，你再用药帮他一把。这也是自力更生为主吗！”

“西医能治病能开刀、割阑尾、吃阿斯匹林这都很好。你们也要好好学习中医。把国外的医学学好，也把传统的医学学好。”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多年罢，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十代人行不行？”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三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说话间他

自己也笑了。“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的结合。”

“医学越来越前进发展，人的健康与寿命也在促进，人们要求生活更美好，可是你们医生把饮食又搞了那么多限制，什么胆固醇又高了、油又多了、鸡蛋又限制了。这不是矛盾吗？你们要不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发掘些胆固醇低的食物、多培育些胆固醇低的品种、胆固醇高了找点有效的控制办法，让人又能放开口味吃，又能控制不生病。胆固醇是人体内存在的，必定也有用处，把他降得太低了就不会有别的问题吗？我看在医学上也是没有‘绝对’的问题吧？”

#### 毛泽东保健养生中的遗憾

毛主席的保健、养生与长寿问题，从广义上讲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健康上的医疗保健、政治上的安全保卫、生活上的后勤服务，以及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工种及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配合才使得工作顺利及取得良好成果。我更希望通过毛主席的“自我保健及养生之道”，并以他的主导思想、理论、方法等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对革命对多种事业都充满了十足的信心。这种坚强的自信使他的愿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与发挥。但也有时他对自己的疾病与衰老，表现了超出生理范围所允许的过分自信，则对他的健康、养生、甚至长寿，可以产生不利的影响。

主席多年长时期大量吸烟，虽然多人、多次、多种方法帮助他戒烟，他自己也愿意配合，但多年来未能全戒。晚年最后一段时间虽然不吸烟了，但吸烟的慢性隐蔽性的危害对身体早已发生影响，使他的心肺功能都受到严重损害，对健康、长寿肯定产生了甚为不利的影响。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你们当医生的人大概是另一种人生观吧？你们有点病就想得很多，自己吓唬自己，也吓唬别人。”这些话，毛主席讲过不只一次。他的这些话，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也很辩证。确实，医生讲的话有不正确的、或不够正确的，这里面也包括医生临床经验的差别、医生间包括专家之间意见的不一致，还有时医生的观点可能带有片面性、绝对性。总之这些也受医生自己思想、观点的影响，也受当时医学水平发展的限制，而毛主席思想则不受什么中西、学派、习俗、常规等的限制。但除此以外，医生的许多观点也还是经验的总结及医学正确理论的指导，因此对医生许多正确的意见与建议，如果他能更多的听取与采纳，对他的健康、诊疗、以及长寿等将肯定会有更多的帮助。

#### 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

练习书法是毛主席“养神健脑的健身方法”之一。书法家常说练书法犹如练气功，能起到气功所起的作用。因为在书写过程中要集中思想，去掉杂念，呼吸均匀，姿势正确，身体放松，神态安详，目不旁视，耳不杂听，就能有安神镇静的作用。

我不知道主席当时知道不知道这种高论，他也没有跟我说过，不过从他的表现上看，他是深感其中之妙的。他曾经说：“练习书法也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后来他写给于立群的信中也说过：“……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

好事。”（1965年7月26日）。所以他写毛笔字有时是抒发情感或作诗填词，有时又是在钻研书法，是他反复阅读碑帖之后的笔下发挥。反正我看他每次书写之时，其表情神态都是十分舒适、安然。每当我看他书写时，我都保持不跟他交谈，特别是在他入睡之前，常是夜深人静，有时只有我在他身旁，有时值班卫士在，也有时吴旭君同志在旁驻足观看，其他的人就较难有此机会了。在灯光下笔过之处留下串串神奇字迹跃然纸上。

在这里我想多用一点笔墨谈谈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我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他的保健医生，由于工作原因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他接触，也有幸能亲眼观看他写字或练习书法，能聆听他关于书法的高论，他也曾送给我他的书法手迹。所以我对书法的兴趣也就逐渐增加了。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对于毛主席的书法，我只能“看”、“学”、“欣赏”，而不能“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主席也是我的书法“老师”，因为他曾教我如何练习书法。遗憾的是我尚未学够，更没学好。

毛泽东同志一生都非常热爱书法艺术，他的书法造诣很深，他行草兼备，极富个性，笔走龙蛇，豪放不羁，继古创新，自成一家。

毛主席的书法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和欣赏，也在人民中广为传播。有的作者统计他的书法自1915年至1966年面世者达400件以上，或接近450件之多。包括各种题词约200件（有的统计为163件），毛泽东书信手迹84件，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117件，手书他自己的诗词面世者不足50件，还有其他内容等。但是我没有作过统计，我所了解的是毛主席对诗词常有重复书写的习惯，赠送友人的也为数不少，也较难精确统计，因此我估计实际的书法手迹很可能比上面统计的数字更多。若仅按上面统计的数字计算，书信及题词类约占三分之二，因此其书法手迹中属实用性质的书法占大多数。其他则可归入艺术欣赏价值。当然其中许多都可属于文献纪念价值、书法教学价值等。因此艺术观赏与实用价值有时二者兼备亦难以区分。据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书法中包括楷书、行书、行草及草书。至于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大篆、小篆、隶书等我没见他写过，也未听说他写过。

#### （一）毛主席挤时间写书法

他处理军国大事十分繁忙，那里来的时间练习书法呢？我也很好奇，总想得到解答。他忙起来常昼夜不分连续工作。他写书法也是无定时的，但多在工作繁忙间隙时间，虽非每日必写，但确是经常书写。我发现他最爱在深夜时书写。那时他每天入睡前都要服安眠药，吃过药后在入睡前一段时间他精神能够放松一些，他为了使心身更能松弛与平静，便坐下来写字。说是“写字”，我觉得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写字，一是练字。写字主要是写出文字而已，而练字则指对已写出文字，自己并不满意，对字的结构、字形、笔划、笔锋、神韵等要求更进一步完美，甚至多次重复书写。有时他晚上开会回来，再次办公前后也写写字，使自己换换脑筋。

#### （二）我看毛主席写书法

毛主席办公常喜欢用铅笔，他更喜欢在床上靠坐着看文件、看书学习。他的床头桌上长期有十几只已削好的粗黑软铅的木杆铅笔备用。用铅笔书写也能写出像毛笔一样的笔锋与笔力，所以他喜欢用。批阅文件可用铅笔或毛笔，写信则常用毛笔。写书法则常在卧室的办公桌上书写。每逢作书法他常是身着睡衣，上身挺直，右手悬腕，腕指运动灵活，笔端挥洒自如。他常运笔中锋，笔势流畅又富于节奏感。笔在纸面活动，犹如冰上舞蹈般流利舒畅、

飘逸优美。字体变化大小随意姿态万千，看他书写使人有登山观海心胸开阔之感，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他书写时凝神连书一气呵成。他爱写古诗词，都在背诵中写出，内容多是他平时反复阅读与喜爱的诗篇。有时也常写他自己的诗词。

平时他看碑帖时从不动笔，但常用手指点划摹写。写字当时又从不看帖，也不把帖翻开放在手边。他喜用现成的墨汁，也不挑选什么名贵的端砚等等，笔则狼毫羊毫都用。喜用大信纸或8开的白色厚宣纸。一张纸上最密的能竖写七、八行，但一般多只写三至五行，每行三至五个字，因此一页不过十来个字。如果纸上有竖格，他常不按格写，也可顶天立地写满全纸，随兴所至，不求刻板不受约束，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字写得满意就继续写，有时重复书写，还不满意就顺手扔入桌下的字纸篓里。写到尽兴，人也感到舒服了就接着办公或者准备睡觉。

### （三）毛主席教我“书法”

有一次主席在办公间休息时和我闲谈。他问我在学校上课及学习情形。我告诉他我有时抄笔记不够快，就想学点草字，可是学了一些草字后还是不够快。在一次偶然机会又学了“速记”。等我的速记达到每分钟能写下260到280字时，把学的草字又都忘了。他对速记很有兴趣，说：“还没有人跟我谈过速记，你说说看！”我向他谈了中国的和外国的速记，速记的原理、应用、及速度等。他要我写给他看。我写了一段给他，他拿在手中仔细看了会然后说：“这是天书。”

“主席，你看这像不像另一种草字？”我问他。

后来我们又谈到中国的文字，真草隶篆等。我说我还是喜欢草字。

“主席，那一次草字我没学成，现在跟你学学写草字罢。”

“你想学草字还是草书？”他问我。

“草字、草书不是一样吗？”我很奇怪。那时我对书法几乎一无所知，只以为草字笔划简单，写得快，又好看。

“草字是草字，草书是书法，一字之差大不一样。”

“它们有什么差别？”我又问。 书法就不单是字喽，里面有规律有章法。”

“我要想学书法该怎么入门呢？”

“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他背靠床架，慢慢的回答。

“那我看帖时要注意什么？”

“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快背下来时就更熟了。”他拿起一技烟，我帮他点上，他慢慢吸烟。我看他吸起烟来，估计他还有可能往下谈。就借机会再追问。

“看帖时要记些什么？”

“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

“哟，还这么复杂呀？”我表现有点畏难的样子。

“你要熟悉一个人，不是要记住他的高矮胖瘦吗？你还要记住他的五官特点呀！”他喷出一口烟在微笑。

“这么说记字跟记人一样啊！”

“是啊，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

我还想多问问可是又怕影响他休息，我说“好，那我就练习练习吧！”



这次谈话就暂时结束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到卧室去看主席。他坐在大床上正在看碑帖。

“主席，你在看什么帖呢？”我问。

“兰亭序。”

“上次你跟我讲人有胖瘦、五官，学书法也讲字有五官，还得有精神，你能再跟我讲讲吗？”

“呕，看来你还真想学呀！你看，”他指着手中的字帖说：“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他讲得很认真。

“主席，你怎么又讲起哲学来了？”

“你先不要打岔，”他挥了挥手说：“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有‘十七帖’。记住了王羲之的行笔你再看郑板桥的帖，”他的视线离开了手中的帖，面向着我继续说“就又感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象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份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主席，你把字都给说活了！”我向他笑，他也笑了，显得那么轻松。

“临帖是要照原样写吗？”我又问。

“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

“主席，字的精神应该怎么理解？我只看到字形不同，看不懂精神。”

“字就像人，有精神有个性，有的雄伟豪放，有的潇洒秀丽，你要学的字可不要让人看了感到松散、柔弱呀！当然写字也不要刻板。”

“我要学草书从那儿下手呢？”

“不要好高骛远，欲速不达，可先学楷书，小楷是基本功，以后再学行书、草书。”

“那我看什么帖好呀？”

“先看千字文，多看多记，还能学到一些常识，比如千字文里讲了天文、地理、农业、气象、矿产、特产、历史、修养。你能背出来，看的也就差不多了。”

“那得看多久呀？”

“不念个十遍八遍，你背不出来，一步步来不要急。也可学‘标准草书’。”

“还有什么‘标准草书’？”

“就是于右任编的那一本。”“将来要写出自己的风格！”他又补充了一句。

“什么？自己的风格？”我又觉得奇怪。

“就是你的个性呀！你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

我没有讲话，他看我没听懂又说：“如果每个人写的都和字帖或是某人的字一模一样，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世界上的东西如果全都一样，那叫什么世界呀？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

“主席，我好像开始懂了一点。”

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期、中期讲的，我一直深深记在心中，随着自己的年岁在增长，我也越来越喜爱书法了，更觉得主席的话对我教益匪浅。只是多年来我总是钢笔在手，直到近年才挤出时间偶尔写写，练书法不够坚持，我总感到有些辜负毛主席的教导。

#### （四）毛主席是从 1958 年后才学习草书的吗？

已有不少学者在专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书法，也有许多真知的见。我也看到有的材料提出毛泽东同志是从 1958 年才学习草书的。他们的依据主要是根据 1958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的那封信。信中提出把“已存各种草字帖清出给我”及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等。

我想就我所接触与记忆提出我的印象，供书法研究专家们参考，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 1958 年以前早已学习草书了。只是在书写实际中草书字数出现的多少与熟练程度风格发展变化等，后些年有突出的飞跃表现。

据陈秉忱同志介绍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常阅览法帖，那时书法已显示大气磅礴，1949 年出国时带了“三希堂法帖”，1955 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20 年中间收藏拓本影本碑帖 600 多种，已看过的也近 400 种。“二王”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披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要领”和“草诀百韵歌”等帖。（见“书法”1988 年 2 期）。

我和陈秉忱老先生有交往，较熟悉，他是清末山东金石大家陈介祺的曾孙，陈老本身也是金石篆刻书画家，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他提供的资料真实确切。毛主席还要求为他收集各种字体千字文 30 余种。他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草书。有人研究认为主席学过苏东坡、黄庭坚书法还兼有郑板桥的影子，这些都各有独到见解。

我以为 50 年代初主席书法以行书为主，兼杂草书。其实在三、四十年代的书法中已见个别较少的草书，54 年后又有些变化。如 54 年 3 月致黄炎培、彭石麟的信等。到 1956 年 12 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1956 年 12 月 29 日给周谷城的信等，已呈龙蛇竞舞了。在 1958 年以后，行草及草书出现较多。六十年代后更为突出。如 1961 年 9 月 9 日“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 年 1 月 8 日及 1963 年 2 月 5 日，“满江红·和郭沫若”，63 年 2 月 28 日“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等。他的书法中呈现了如王羲之的流畅秀丽，和怀素的狂草风格。60 年代的书法呈示出新的飞跃，有字字珠玑之美。已进入毛主席书法历程的高峰时期，也进入了中国书法的高超境界。

#### （五）中国当代的书法大师

中国的书法确是在中国文字衍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特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数千年来已积累下无数佳作精品。

从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看，从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直到草书，已到书法颠峰。草书结构简、变化多、字形美、运笔难，有很高的观赏艺术价值。有人提出“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比喻恰当。追溯历史谁在草书上有极高的成就谁就将被尊为一代书法大师。如汉代张芝被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唐代张旭亦为“草圣”，怀素与之齐名。这样提法并非意在排斥其他的书法与书法家，而只想说明毛主席的书法行草兼备，狂草犹精，继古创今，自成一家，堪称我国当代书法大师。

## （六）书法四种

我以为中国自古至今，书法不过分为四种：即一般书法、名人书法、书法家书法、及伟人书法。

名人书法：是指其人社会知名度高，但不一定专于书法，人们需要其书法及签名等，是慕其名，留纪念或存史料，从其书法中可了解其个性、风格等。当然也有的名人兼有书法之长，较为难得。

书法家书法系有深厚书法功底，精于书法，所书字体结构、笔力、神韵等独具风格，作品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可成为教学或艺术珍品。

伟人书法则与以上又有异同之处，伟人必是社会名人，若又有真正书法家之功底，又有伟人气质、风度，其字里行间可使人感受到一个伟人的博大胸怀，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而豪放不羁的独特性格渗透于笔墨之间，书法自成一家。可供人欣赏研究，也具有很高的观赏、纪念、史料及实用价值。毛泽东的书法我认为属于伟人书法。

## （七）毛主席与“兰亭序”

毛主席和我谈书法时常提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话题，印象很深，久而久之心里积下了宿愿，总想一旦有机会一定去看看兰亭。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年我因工作经绍兴于是专门访问了兰亭。它在绍兴市西南约 13 公里的兰诸山下，据说越王勾践曾在此处种过兰花，汉代又曾设过驿亭故得“兰亭”美名。远在公元 353 年时王羲之于三月初三在此雅聚修禊，41 人行曲水流觞之饮成诗 37 首，王羲之即为此诗集写了一篇 28 行 324 字的序文，即书文双绝的“兰亭序”。这兰亭秀园之内，茂林修竹、溪水蜿蜒，还有鹅池、碑亭诸景都是毛主席一直向往而未能相见的，我终于看到了。他曾和我谈过爱国诗人陆游与绍兴的沈园，所以我又去看了沈园，但因闭园而未能进入，十分遗憾。当我在沈园门前徘徊时我立即回忆起毛主席和我说过：“陆游与唐琬离异后，又相遇于沈园，那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陆游的那首“钗头凤”就题在沈园的墙壁之上。”我眼前又浮现出毛主席伏案而书的情景，他潇洒的写下了：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当又写完下半阙后，他问我：“你知道唐琬回赠的那首词吗？”

“我没读过。”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瞞！瞞！瞞！”他熟练的脱口背诵出来。他接着说：

“这首词回赠没有多久，唐琬就因积愁而死去，当初是陆游的母亲与唐琬不和。陆游这一对夫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剧。”那天晚上他很有谈兴。

“我看你和小吴（按：指吴旭君）你们这个家庭是很幸福的。”他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这世界上真正幸福的家庭能有多少啊？”他在自言自语，又像有些感慨。是不是他又在连想了自己的家庭呢？

我又从回忆中回到了现实，当我在归途中又自然的联想起了往事。在北京时主席有一次曾跟我说过：“王羲之当初跟卫夫人学书法，也学张芝的草书，能博采众长，也有他自己的风格。”“笔势流畅，秀丽多变。”我似乎在耳边又响起了主席朗读兰亭序内容的湖南乡音：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他还告诉我“兰亭序是王氏的传家宝，唐太宗十分喜爱，除令人临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带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喽！”

毛主席在五十年代初，曾到过绍兴，我当时也去了，但像鲁迅故居、沈园、尤其是兰亭，这些他最熟悉的人与事的古迹名胜，他为什么都没去看呢？我真替他遗憾。我那次去看兰亭是在1986年，在主席逝世后的十年，虽然我不能把看到的内容再去向他讲述了，但从我内心说也算是一次有意义的替他浏览补偿吧。

#### （八）主席赠我们书法手迹

从兰亭回到北京，又引起我对主席的怀念。我又展开了他送给我们的书法手迹，浮想不断涌现。那是1963年初，毛主席外出在杭州，有一天他对吴旭君说：“你的徐涛不是也在扫除一切害人虫吗？”当时吴旭君以为主席是指我仍在作医生，是与病菌作斗争的工作。因为主席讲话常是幽默风趣的。主席接着说：

“我原来答应过要送给徐涛几个字，一直欠了债；这几个字先留给他作纪念吧！以后再给他写。”

吴旭君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首词，“满江红·和沫若”。其中最后一句正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她才恍然大悟，主席原来说了双关语。词后毛泽东签了字，时间是1963年1月8日。这一首词是草书，笔锋流畅有力，既秀丽满洒又气势磅礴，字体舒展大方，有的是狂草行笔如龙翔凤舞。这是主席书法高峰时期的作品，我们都十分喜爱。

主席还送给吴旭君两件书法手迹。1966年9月24日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主席说“你1949年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1951年又志愿申请参军当了女兵，祝贺你。”

1966年9月29日，主席又写了一首七绝，与上次的内容一样，后面也写了“为吴旭君同志书”，都签了名。这两件书法写得都苍劲有力，有威武之势。吴旭君问主席：“为什么两件都写同一个内容？”

“再送你一付字，希望你第二次机会当解放军的女兵。”主席笑答。事情就是那么巧合，1969年解放军305医院建立时，她被调作兼职领导，真又第二次当了女兵，应了主席的预言。主席送给我们的这几件书法，我们都珍惜保存着。

#### （九）欣赏主席书法有感

“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骊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

“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却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这是怀素狂草“自叙帖”中的两首形容草书的诗，有趣的是一说醉中所书醒后难再写出，一说书写之妙自己不知。确属灵感所至微机玄妙了。毛主席作书法从未说过自己不知其妙，更不是醉后书写。但却常在服安眠药后大笔挥毫，兴之所至情之所趋，笔走龙蛇，心身舒畅，意境非凡。与怀素醉后疾书各有千秋。我只能借非文非诗的短句来表达我对毛主席书法的羡慕，言之不全比之不恰在所难免。

### 欣赏毛主席书法有感

布局美妙，疏密有间，参差错落，乐舞翩翩。  
凤翔龙腾，意境万千，锋刚若剑，柔韧丝牵。  
断续枯润，功透笔端，笔随情意，收展飞天。  
豪放流畅，滞洒游仙，转折连书，节奏悠闲。  
行草从心，未失规范，秀比羲献，意超狂颠。  
浑然一体，珠玑满篇，海天胸阔，生气盎然。  
笔蕴辩证，诗传人间，继古创新，神韵超凡。

毛泽东的保健养生之道，如能对人们有所帮助与借鉴，实现了他“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心愿，他将含笑九泉。

---

羲献：羲指王羲之，长于行草，称“书圣”，献指王献之系王羲之之子，均为晋代书法家。

狂颠，狂指狂僧怀素，长于狂草。颠指书法家张旭，被称为张颠，称“草圣”，亦长于狂草，均为唐代书法家。

## 毛主席的心事

吴旭君

### 一、毛泽东思考着中美关系的五步高棋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应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应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我认为，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坐的右侧位，我和张玉风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

国的感觉神经。”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死地。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武装台湾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以及发动越南战争。在外交上美国也同样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针锋相对，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在任何外交场合对美国人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这一切是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是苏、美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然而，历史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后，发生了变化。特别是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这一切都触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治家的敏感神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心走向一个“新世界”。他认为国际风云的变幻将存在着美、中、苏三国均衡的新局面产生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世界是否正是毛主席的设想呢？这样一个局势的存在是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呢？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任人欺凌和宰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还了！新中国将会以巨人的实力出现于世界之林！于是，毛泽东自豪地着手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建设，与此同时，他并努力开展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可是，事与愿违。他幽默地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更没有把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作为中国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显然，毛泽东懂得，这样横着站久了是吃不消的，何况，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够采取主动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使我们自己从中获得主动，岂不更好？主席虽然从没有这样明确地对我说过，但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的事实正是如此，使中国在不利于自己的世界环境中争取主动，发展自己。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和他谈“参政”。这是从 1957 年开始的，主席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广，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从这时候起，我便有意识地多注意参考消息中的一些事，和主席见面时有时也谈谈。后来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自从主席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同志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主席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给我专门订了一份中文版的《参考资料》和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需去向他汇报；在他接见外宾时，主席

有时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主席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交给周总理等等。我深知他老人家的苦心，是想让我这个新手的功底打得厚实些，因此，我也很努力地在攻克这个新堡垒。

我们看的《参考》分两种。一种是现在一般人都可以看到的小开张的我们叫一张纸《参考消息》；另外一种《参考资料》其内容比前者多是供首长们看的，有上午版，下午版各一本，还有一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天定时送来新出版的当天资料，这三本加起来可能不止十几万字。从此，我便开始每天把《参考资料》当成教科书一样认真阅读，然后，每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去向主席汇报，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问题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陇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

主席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那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交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在主席的言传身教之下，我已经多少学会了一点从《参考资料》中看出点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微妙问题、苗头问题，并且知道在哪一个时期、主席关注哪些问题。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他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



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里，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作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干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弄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

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下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拼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

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啾啾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

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他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

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役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时，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

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

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 15 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 65 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 ,便已乘风归去 !

他没能亲眼见到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 二、毛主席的黄河恋

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镶嵌着两条绚丽夺目的项链——长江和黄河，它们都从边远的西部青海省发源，浩浩荡荡流经中州，进入东部平原。最后，黄河跨过山东泻入渤海，而长江则在繁花似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逝者如斯夫”！

它们的支流从河道的主干向四方奔腾，哺育着整个中华大地，滋润着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多个民族。五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和长江多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宽阔的胸间和心里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老人家利用搞社会调查和开会的机会，途经两河流域，去视察江南、江北，有时总想忙里偷闲顺便到武汉，跃入长江去畅游一番。

在武汉盆地大火炉里，主席几乎每年都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面对这条逐渐由清变黄的滔滔江水，开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说呀。他汗流夹背，迫不急待地换上游泳裤，抓着小轮船边的悬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挥臂游动起来，乘着江水强大的冲力，他像坐滑梯般地一泻而下，顺着江流前进。这种愉快，他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得到，也只有长江才能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喜悦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欢这滔滔江水，这辽阔苍天，他也喜欢它水深流激，他更赞美这种只争朝夕的速度……。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恋着长江。

而主席对黄河的情感，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对长江那般在众目所视之下发出响亮的赞美。往往只有在主席忙完公务之余，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没有忘怀的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的忧患和经历的灾难，当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动人故事，他急着翻看地图、查阅资料、审批计划……，总想再次到黄河身旁，亲自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黄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我觉得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蒋介石。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归

结为一句话：我们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

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就跟我常讲黄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经体弱多病，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我给他唱有关黄河的歌。我给他唱《黄水谣》。

我看见主席仍闭着眼说，“唱！”于是，我又接着唱了一首《保卫黄河》。

唱完了，我说：

“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睛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他的话让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谈起黄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卫士封耀松值班。

“主席睡了吗？”我问。

“还没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给主席祝寿，那年是他六十六岁生日，按民间的说法，是六六大顺。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的形势从58年大跃进开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干劲冲天，又赶上“十年大庆”，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什么反应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已经有饿死人的绝密报告送到主席案头。

我来到主席卧室，见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烟，便没讲话。平常，他会笑着问：“又有什么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续了半杯热开水，只听他说：“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脚侧的地方。每当主席睡不着的时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护理原则的要求来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时应该少谈兴奋的事，不要主动去谈一些新问题，尤其不能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心事”之类的话，这会使他烦躁焦急，心绪不定。我总是一声不响地顺手从他床上拿起本书看，或是说：“主席，我给你念点东西吧。”我想，一种平淡、单调的声音可以对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现在不忙念书喽，你先看看这个。”主席往桌子那边指。

他床头的桌子上放满了书，还有茶杯、铅笔和刚写过的手稿。

“是这个吗？”我拿起手稿问。

他“嗯”了一声，语调平淡地说：“你看吧。”并不停地抽烟。

我一看这是主席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要他们下去搞调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处。主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我毫无顾虑地说：“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争取和他们一起下去搞点调查研究。”主席说：“你不用下去，你还另有任务。”我说：“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份药。我想，其中包括内服药，就是治常见病和地区多发病的几种常用的药。另外，还准备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药品，再开一个药单，写清每种药的用法。当然，还应该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在会上除了我讲以外，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

主席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说：“你不忙现在去办喽。”

我又坐下，想着怎样让他别抽烟，慢慢入睡。我说：“主席，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用用耳朵，我给你读‘兰亭序’。”

主席能熟练地背诵“兰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读的时候他不用费脑子，感觉会轻松些。他轻轻点着头，我尽量的用轻柔的声音，平静的语调往下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再继续往下读。“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又看了他一下，只见他仍闭着眼睛，我便继续读完。

第一遍全文读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静的闭目，一动不动，但又不像完全睡着了，于是我又开始读第二遍。等第二遍读了一部分，我听到他开始打鼾了，我没停，继续往下念，直到他的鼾声越来越响。我坐着没动，怕吵醒他。过了二十分钟，他突然睁开眼。他觉得很奇怪地问：“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睡着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

“不对，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个盹，不过，你真的睡着了。”

我见他精神好些了，便问：“主席，你这几天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心里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发愁了吧？”

“光发愁也没用，得想办法。我给你看的東西你看了嗎？”

“看了，你打盹前让我看的。”

主席语调平静地说：“国家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跟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时的困难不一样。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区，现在是全国性的。”

“你老记着延安那点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转战陕北时我打了那么多仗。”

“转战陕北时苦吗？”

“苦。可是我们不怕。那是战争年代，有仗打高兴哩！人家说我只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我比公鸡的能耐大多了。那时，我们那么穷，可是我的名字还挺响亮的哩，尤其是对蒋委员长来说，他特别关心我。他的情报机构很灵，我到哪儿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点点头。他接着说：“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万人马，只要我不离开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张王牌呀。这张牌可以由我来调遣。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我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蒋委员长对延安狂轰乱炸，无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颗炸弹果真在我住的窑洞前开了花。胡宗南以为我准死了。可我没死。”

“后来呢？”

“后来呀，都能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喊声，我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我就是想让他们进来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走。这就是兵书上讲的‘诱

敌深入’。但是我当时就说过，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看来黄河帮了你的忙。”

“你见过黄河吗？”

“没有，只见过照片。”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右手在脚面上一扫。“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看黄河应该高兴，怎么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为什么还去看？”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这时一些饿死人的报告已经频频送到他的桌前。为了让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临睡前我总是设法主动跟他聊天，想让他讲讲他过去的事情。这时，他便常提起黄河，黄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对他的儿女也没有像这样常挂在嘴边。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主席的心情也轻快些。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我在一边给他调墨。我说：

“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呀？”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嗨，事情一忙就顾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主席的情绪特别好。有时他办公躺着的时间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厕所，这种时候我就想让他多走些路，所以每当他起床后，给他穿好睡袍时，我便轻松的笑着，嘴里给他打着锣鼓点：锵、锵、锵……，他一听便迈着台步在屋子中央转圈，小跑起来。有时我又故意变调，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锣鼓点：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会学着小姐的步态扭着走，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他很喜欢唱京剧，高兴时还不时地做出甩袖子亮个相的动作。每当我在旁边大声笑他时，他便一本正经地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严肃点。”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唱京剧讲究的是板眼要准。”这时，他会自己打着拍子摇头晃

脑地唱起来。主席的音乐节奏感的确非常好。

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主席对我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准备。”

我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我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他高兴地笑了，红光满面，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我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主席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我把汪东兴同志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同志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准备去视察黄河时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主席根本用不着练，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骑马有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上马时需要警卫帮他一把，一旦上了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骏马便阔步前行。那神气，那动作好让我们这些不会骑马的人赞美、羡慕。从此，主席又多了一项活动——骑马。

我从来没骑过马，所以对骑马没什么兴趣。有一回，我在住地与浴场之间必经的一条公路上练骑马，突然过来一辆汽车，马惊了，它顺着公路向通往海边的大路奔跑去，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地抱着马脖子，胡乱地拉马缰绳，平时训练时学的那几手不知忘到那儿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紧要关头，马居然停下来。从此，我对懂事的军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认为它救了我一命。练骑马不是件轻松的事，几天下来我浑身酸疼。特别是大腿内侧几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杀得钻心的疼。有一天我本应陪主席去游泳，我谎称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罢？”

“你怎么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尝尝拼命是什么味道，就应该下去。”

我不甘示弱，咬着牙下了水。海水杀着我的大腿像火烧一样疼。

从海边回到住地，下了汽车主席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主席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我期待他教我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到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笑了。

可是我当时赌气地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还要骑马去。”说完这句话我一想，这

不就是主席的“激将法”吗。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这么说你还是想练的，那好，就继续练吧。你不会骑马就去不成黄河，长了这么大，连黄河都没有亲眼看过，你会后悔的。你要知道黄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现在搞建设，不让它做贡献，它会不高兴哩。我了解黄河，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工作人员接着练骑马。我还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这次我才真正地体会并理解了主席对去不成黄河的遗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

后来主席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汇报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况。主席听后又是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他还是要去。他对我说：“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看来，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脏也不好。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让主席身体恢复健康，而准备在72年2月如期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们医疗组进行了大力的抢救治疗工作。最后病情终于好转，顺利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主席在患病期间，为恢复中美关系及开展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决策，从而使两国敌对状态得以缓解。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我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真难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无所畏惧，不顾自己的身体，执着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我顿时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他说：“你这个人呀，马克思和列宁都叫我回来了，我不是挺好吗？”

“是呀，你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也感动了我。去，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黄河，怎么样？”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输地说。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来精神高度紧张和连续的超量工作，疲劳成疾，我病得实在难以再支撑了。主席亲切地叮嘱我，“先回去好好看病，养养身体。”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主席，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医院里，虽然人是在接受检查治疗，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样仍然想着去黄河的事，好像觉得这件事没能做到，没能满足老人家的的心愿，在我心中总是块心病。

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随305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住进了医院大楼旁边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工作人员住的地震棚只有顶棚和铺板，四面通风，就搭在唯一的一条通道旁。医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必须从这里通过。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剂量的心脏病药物外，就是坐在棚子里，面朝着这条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東西。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有一辆中型吉普车满载着沉甸甸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层草绿色的军用雨布，从这条路上开过。看到这辆车从我眼前开过，我的心才稍觉平静下来。车上尽管伪装得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对它们太熟悉啦。雨布下面放的

是一个个蓝色的氧气钢瓶，每天都必须以空瓶来医院换走充满氧气的新瓶。我每天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东西，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吉普车只是来去急速地驶过，我也能从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变化。曾使我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取走的氧气瓶逐渐地增多，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我默默地看着战士们搬动氧气瓶，每次我都想去打听主席的情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们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规定。没有主席的消息，我心里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说的许多的话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主席苦恋了大半辈子的黄河，难道他真的再也不能亲身实地的去看看了吗。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于是，我写下了这样四句，虽算不得七绝的诗句，但确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达积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 《黄河之恋》

“ 远离非易近易难，  
十年频梦九交谈。  
狂涛飞虹神游遍，  
纵到黄河心不甘。 ”

#### 三、毛泽东的生死观

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我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自己的死，为什么？这个问题应由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说的是1963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我好奇地问。

主席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我宽慰地说。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我。

“好。”我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

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我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我的话，主席笑了。他掐灭烟头说：

“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主席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主席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看起来，以应付“考试”。主席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我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我：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我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我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主席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我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为了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我直率地说：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主席看着我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不能，万万不能。”我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主席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

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我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我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全文是这样的。“倡议实行火葬（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对这件事到底应该怎样看呢？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21日和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得非常好。

邓小平同志说：粉粹“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粹“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小平同志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

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 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辞别时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的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毛泽东同志，你在广大人们心中一直深深留着美好的印象。

## 玉泉山情思——忆毛主席在玉泉山与我的谈话

张木奇

玉泉山是首都北京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对于我来说，更是永志不忘的，它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胜地，而且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光辉的转折点。因为就是在这里，当年我这个稚气尚存的小兵，亲自领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在阔别三十多年后，我和马尚志故地重游。在玉泉山，我们首先见到了五十年代的老战友关玉书，他陪同我们先瞻仰了当年毛主席居住过的地方。我向老马和老关说，我还保存着一张毛主席 1954 年在这儿拍摄的照片。那时院子里地上只有一些移植不久的草皮。不久又来到当年毛主席与我第一次谈话的地方。我内心十分激动，指着小径的白石块说：“马局长，主席就是在这儿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我谈的话。”环顾周围，我惊喜地发现了路边上侧挺拔而立的一株苍翠的柏树，当时还很细很小，而如今却长得既粗壮又高大，它是当年主席与我亲切交谈的一个“见证”。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和党中央于3月23日，由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迁来北平，住在“双清别墅”。6月初，我与许多战友一道，由驻石家庄的华北部队调到北平中央警备团。6月中旬，组织上分配我们36名同志到保卫毛主席的警卫连工作。从此，我开始了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长达十余年的难忘经历。

1950年6月，毛主席来到玉泉山，住在一座松柏参天，浓绿尽染、古香古色的名叫“楠木殿”的院落中，这里即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又是卧室。毛主席在此期间，撰写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等重要著作，并为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做了各种准备工作。当时，我在警卫连连任通信员，连部住在“玉峰塔”下南山坡山腰的东西相向的两幢瓦房里。这里居高临下，可以俯览玉泉山墙内外那迷人的风光。有时，主席在房子周围走动，或在林间小道散步，有时还在傍晚走到墙外那青翠的稻田里和农民拉家常等情形，我们都可看到。更使我永远难忘。

当时，我经常去主席院子的东门口的警卫科办公室给李树槐科长送工作部署、报告、总结和每天的口令等密件；也从李科长那里取敌情动态、情况简报、上级指示、首长报告等方面的文件。此外，每天我还要去班排送报纸、学习文件以及首长指示等。做为通信员，每天至少还要去伙房打三次开水和三次泉水，以供连首长饮用、洗漱等用。

一天中午一时多，我刚理过发，未戴军帽，穿一件战士白衬衣和一条三号绿军裤，还穿一双绿胶底鞋；手提一把大铁壶，蹦蹦跳跳朝山下去打水。嘴里还轻声哼着连队歌曲“……保卫咱们人民民主政权，保卫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好比那，火红的太阳一样光明……。”你说多巧！正在唱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来了。当我看到正在上山、迎面而来的毛主席，简直喜出望外，哼着的歌声也随即悄然而止了。

只见毛主席身材魁梧，身体健壮，在阳光的沐浴下，他的宽阔的前额上泛着微微光亮。红光满面的毛主席穿着一件白布长袖衬衣，一条银灰色的裤子，按他的生活习惯衬衣照例被放在裤腰里，腰间扎一条褐色的牛皮带。他脚穿一双圆口黑布鞋，迈着健步向上走来。陪同主席上山的有江青，还有李树槐和孙勇同志。主席上台阶时，孙勇同志机智上前去扶助他老人家。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四个人又说又笑，越走离我越近。为了不影响主席，我主动站在路边等候，水壶也不知什么时候放在身后地上。

主席走在前面，眼看着他老人家就迎着我来了。此刻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心跳很厉害，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我这种激动而紧张的神情，可能早被毛主席发现了。他老人家微笑着向我走来，边走边伸出那巨大的右手。我虽然紧张得不知所措，还是本能地赶紧向前迈了两步，万分感激地用双手握住了主席的巨手，只觉得主席的手是那么温暖和柔软……。他老人家关切地问我：“小鬼，你好吗？”我激动地仰着望着主席那慈祥的面容，赶忙回答他老人家说：“毛主席，您老人家好。”主席又亲切地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对这句问话，我因还听不惯他的湖南口音，也有点没听明白，真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些发懵，呈现了一些窘迫的表情。李树槐望了我一眼，看到我太紧张了，便指着我向主席说：“这是警卫连的小通信员张木奇。”主席望着我说：“噢，张木奇。哪几个字？你写一下。”同时把他的左手掌心向上伸在了我面前。我用右手的食指在主席的掌心上了“张木奇”三个字。主席满有兴致地边看边说：“弓长张，树木的木，奇怪的奇，对么？！”我仰望着他老人家，点头示意。主席无不风趣地说：“会说话的木头才称奇吗，嗯。”毛主席这句风趣幽默的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我拘谨的心情消失了。主席还说：“张木奇，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么！他接着问我：“你多大岁数？”我答：“十七岁。”主席这时用目光从头至脚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他才说：“噢，十七岁，还是个娃娃么。”又问道：“讨没讨老婆？”对主席的这句问话，我实感不解。李树槐同志赶紧来开导我说：“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我这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感到脸有些热，略带羞怯地回答道：“俺还没娶媳妇。”他们看到我这种可笑的样子，又听到我这句地道的曲阳话，主席和在场的人全都笑了，主席笑的最开心，我也无拘无束的笑了起来。此时，我看到主席习惯地吮了一下嘴唇，我还无好奇地看到了他下颌部左侧的那颗痣点。我心想在一些歌曲里唱到主席是“北斗星”、是“大救星”，果真不错，他的脸上还真有颗“星”呢！还记得在老家上小学时，晋察冀边区编写的课本上有毛主席像，晋察冀日报上也经常登载木刻的主席肖像，我还在砖墙上用画石画过，但却记不清是否画上了这个特有的痣。……江青也插问：“看这小鬼又聪明又老实，你老家是什么地方？”我随口答道：“河北省曲阳县。”主席听我说是曲阳人，似乎联想到什么事，他略有所思地说：“噢！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大家也向主席高兴地点头默认。主席又把目光转向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呐？”我答：“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我一边说，主席一边用右手手指扳动左手手指计算着，然后他就特别诙谐地说：“再加上一位解放军不就是一个四口人家了。”老人家还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我会心地回答：“是，对。”主席关切地问：“他们都好么？”我说：“都很好。”主席又关切地问：“他们知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我说：“知道——（其实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南海当兵，并不知道搞什么工作，我们部队特别强调保密纪律，是不允许向别人讲保卫毛主席这件事的）。”主席听了又“噢”了一声，然后进一步又问：“他们满意不满意你在这里工作？”我爽快地回答说：“很满意，很满意。”主席也显露出满意的表情。他极为关心地问：“木奇同志要去干什么？”我说：“到‘天下第一泉’去给连首长打洗脸水，等会他们就该起床了。”主席这时呈现出高兴的神情，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小鬼呀，还是个娃娃么，好，再见。”我也充满感激和振奋地向主席再见！然后他们就转身向高处走去，他们边走边谈论着什么，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目送着他们向山上走去。这时，我才想起

大铁壶，从身后的草丛中把它提起来，向山下跑去。脑海里翻腾着刚才主席亲切关怀我的音容笑貌，这近二十分钟的谈话，句句说到我的心坎里，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这已成为永远激励我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动力。

此后不久，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江青很喜欢我，想把我调她那里去当勤务员。我听后是既高兴又担忧。主要想到我这个农村小伙子，还不通事理，像平时这种毛手毛脚的样子，去伺候一个领袖的夫人，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担心干不好。再说客观上也有许多不便之处啊。我向领导同志谈了这些想法，恳求指导员：“别调我去那工作了。”“指导员，毛主席无比亲切关怀我们全家人，我就一心想去为他老人家站岗放哨，保卫他的绝对安全！”……指导员听了我一番话，觉得有些诧异。他说：“你小木奇人不大，心眼可真不少呢！说出话来还满带理，实在不想去就算了呗。至于你想到班上去担任警卫任务的愿望，我记住，到时候我们再考虑这事。”指导员的话真解决问题，没多久就把我调到班上工作，在毛主席住的房子西边的小水塔处为毛主席站岗。在此期间，主席常在傍晚时分出来散步，经常在我的岗位路过。由于上次与我握手谈话相识后，就视我这个小兵为“熟人”了。一次主席散步时又遇上了我。他老人家看着我挺着胸膛、满有精神地身背美国卡宾枪（这是陈毅老总从华东战场的蒋军手中缴获后，送给我们警卫部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以特别威武雄壮的军人姿态，向他立正行注目礼时，老人家又来亲切地与我握手。在主席的感染下，我也自然松开枪背带，毫无拘束地同他老人家热情握手问好。之后，还是在此地，毛主席又和我握过两次手。这种难得的机遇与无比幸福的时刻，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

1951年元月6日，为了加强警卫，调整管理机制，原主席的警卫班已撤销。警卫班的警卫员常连锁等同志与警卫连一班我们几个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内卫班”，并接过了原主席警卫班的任务。从此我开始担负保卫毛主席的内卫警卫工作任务。这样与主席见面的机会多了，实际接触也多，听主席讲话的机会多，逐渐习惯并能听懂不少湖南话了。记得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时，有常常随口一句：“警卫，快去叫叶子龙来。”我们就飞快地跑到叶主任跟前报告：“老头请你去。”或“主席请你快去。”叶主任随即就快步到主席那里去，精心办理主席交办的有关事宜。还有一天深夜，主席按电铃唤机要秘书来。在中办机要室值班的主席机要秘书罗光禄，闻铃而动，手里拿着一大叠文件、电报等材料，急促地走入主席的办公室。过了约十多分钟后，主席与罗秘书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院子里。罗秘书又拿出一些看来是已经主席阅办过的文电。主席望着罗秘书，以浓重的湖南话深情地称赞道：“罗秘书，你是辛辛苦苦地为人民服务。”罗秘书以严肃和略带微笑的神情聆听到主席的赞誉后，稍显激动，然而，他却未曾表态。而站在一旁的我却陷入了深思，我想：“主席您为人民日夜操劳，日理万机，有些大事和急事，常常使您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地连轴转。把一切都奉献给人民，领导人民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您才是比谁都更辛苦的人啊！”

记得在1954年2月，毛主席去杭州的莫干山，刚乘吉普车到达山上，主席就问我：“为什么乔木、伯达他们还未到？”我赶忙回答：“他们在步行上山。”主席指示我快去用车接他们上来。我立即乘一辆小吉普车下山接他们。在盘山途中碰上了乔木他们，立刻停车，说明了来意。只见乔木上衣扣子解开，双手插在腰的两侧，脸上出了汗，但他向我说：“你回去转告我们的谢意。今天是我们锻练身体的好机会，我们决心步行上山。请主席放

心。”……无奈，我只好返回向主席报告。

还有一次在中南海住地，是一个深夜，主席走出办公室，刚出房门，我就立刻为他老人家开了灯，马上看了寒暑表并向主席报告了气温。关心气温是主席的生活习惯之一，我们的工作也与之相适应。在报告温度时，主席听到是我的声音，就走过来与我聊天，从我的工作、生活到我们部队的教育、训练及伙食等情况，还有我家里人，家乡情况，问了许多。这时只我们二人，一问一答拉了四十多分钟的话。我对湖南话懂的显然多了，通过这些交流活动，我对主席的感情更深了，他老人家的心同亿万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里，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老人家那无比宽阔的胸怀，深刻体会作为人民领袖时刻关心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一切为了人民的优良作风。他老人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撞击着我的心扉。1958年我署名“红奇”在《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点滴》的短文，向读者介绍了毛主席的一些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后来我才得知，卫士长李银桥向我介绍当时毛主席看此文时的情景：“一天下午，主席刚醒来，在寝室的床上，我将这篇文章送给主席看：这是张木奇同志写的关于您的文章，请您看看。主席接过来，认真看了全文，然后笑了笑，就对我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听完银桥这段回忆，我内心特别激动，主席老人家向来不愿人们为他树碑立传。然而，人们早把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矗立于心间，任星转斗移，任历史巨变，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伟大的儿子——空前的民族英雄，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共存！

## 在毛主席关怀下成长

吴凤君

在我的像册中，保存着几张珍贵的照片，那是 50 年代我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时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合影。每当看到这些照片，看到照片中张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眼前就浮现出那难忘的时刻。

1957 年底，我所在的文工队将要撤销。我们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了好几年，在离开前都盼望能与首长合影留作纪念。我们将此愿望告诉了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当晚他就带着我们到了主席的书房。主席正靠在卧榻上看书，见到我们他立即放下了书坐了起来，招呼我们坐下。卫士长代我们讲明来意，主席欣然同意，微笑着说：“好么，就听银桥的安排吧！”我们高兴地簇拥着主席来到小会议室，顿时会议室内充满了欢笑声。摄影师侯波正患感冒，发着烧抱病赶来为我们拍摄，就在她调整焦距时，说笑声悄然而止。室内突然变得异常安静；主席坐在椅子上环视左右后风趣的说：“怎么这么严肃啊？变得谁都不认得谁了。”是啊，平时与首长很熟悉，可坐下来照像还是第一次，不免有些紧张。经主席这么一说，大家互相一看，不禁哄然大笑，侯波不失时机地按动了快门。

卅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我们都已双鬓染霜步入老年，毛主席也已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老人家那伟人风度和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作风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还有在红墙碧瓦的中南海内与警卫战士共同渡过的日日夜夜，也令我终生难忘，那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无尽的思念。

###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3 年，做为中央警卫团文工队的首批队员，我从南京华东军区文工团调来北京。记得当时领导说：“我们的任务主要有二项：一是为警卫部队服务，二是为中直机关，中央首长服务。究竟为那些首长服务？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我们多问，我只是焦急的盼望着，盼望着能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

53 年 8 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终于接到执行任务的命令，晚饭后我们列队来到勤政殿外的院子里。只见顶上吊着几个大灯泡，青砖铺地，周围摆了一圈椅子。面对这样的场地，我以为是与中直机关的同志们搞联欢。将近 10 点钟，我看到了位高大身躯的人，迈着大而稳健的步子来到我们中间。啊！是毛主席！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再仔细一看，真是毛主席来了！这时乐队奏起了湖南民歌《浏阳河》，此情此景，我的心快速的跳动，眼睛发潮，旁边一位同志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请主席跳舞。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我竟然未动地方。看到队友请毛主席跳舞，真佩服她的勇敢精神，我鼓励自己，下支曲我一定请主席跳。当我站在主席面前时，他老人家微笑着站了起来，我向主席问好，可说话的声音又小又结巴。他看出我很紧张，立即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非常亲切和蔼地与我谈起话来。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我听不太懂。于是他放慢了讲话速度，微笑着问我：“你是新来的吧，从那儿调来的？老家是那儿的？”望着他那慈祥的笑容，我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讲话也流畅了。我回答是刚从华东军区调来的。主席“哦”了一声；“你原来是陈毅，陈老总的兵哟。”我接着说我出生在青岛。主席又说：“你是江青的老乡。”江青是谁？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敢问。只听主席又问我什么时候当的兵，我回答 1948 年，济南解放后参军的。主席止住舞步笑着上下打量我之后风趣地说：“看不出你还是个小老革命哟。”我也被他那风趣的神情



逗笑了。我们就在这亲切幽默的气氛中谈着，笑着。这时，我几乎忘记他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了，他老人家就像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我也变成一个小孩子在聆听长辈的亲切教诲，听的那么专注，那么入迷。此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时间过的慢些，再慢些，让我多听听这和蔼可亲的声音。遗憾的是这段时间过的特别的快，经过短暂的休息，主席又要办公了。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忽然想起许多该向他老人家说的话，都未来的及说，真是后悔极了。

#### 一次难忘的失言

主席对待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那么亲切，平易近人。有时还很风趣幽默，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就笑着摇摇头说：“呜乎哀哉了。”记得我初次听他说这句话时，我怔住了，看到我这茫然的表情，主席哈哈大笑。随即解释说：“有点累了。”是啊，他老人家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极少休息怎能不累呢？可在我印象里，他总是那么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就在很有限的休息时间，他也忘不了搞点调查研究。每逢见到我时，总要用他那浓重的湖南话问：“有什么新闻么？”开始我不理解，我想新闻都在当天的报纸、广播中报道了，我有什么新闻可谈呢？后来我明白了，他要了解的正是报纸、广播中不曾报道的那些凡人小事。此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将听到的、看到的新鲜事讲给他听。主席听的很仔细，很认真，有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有时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

记得1956年的春夏之际，队里派我和张庆强去合肥学习民间舞。正遇上淮河部分流域发水。一些灾民流落在合肥、蚌埠等地的街头。我们一出蚌埠火车站，就被几个灾民围住了，他们中有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妇女。有位老大爷向我们下跪乞讨。我们几乎把身上所带的钱都散给他们了。回北京后，主席问我怎么好几天未见了，我说去安徽学习去了，并且不等主席问有什么新闻么，我就将在安徽所见灾民之事作为新闻讲给他听了。我说完后主席只问了一句话，“钱都给了灾民那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运气好，遇上我原来所在的文工团在合肥演出，我们就找他们与老战友同吃同住了。若在往常，主席听了此话一定会发笑，可这次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就不说话了。我意识到我的话讲多了，纪律规定我们不能向首长谈这些事的，我赶紧改变话题，但已无济于事了。只见他点燃一支烟，深深的吸了一口，便沉思不语了。这时我真后悔我的失言。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悄悄地溜了。过了一会有人喊我说，主席叫我。我过去一看，周总理坐在主席身边正和他谈着话，主席看到我连连招手，让我过去，把在安徽街头的见闻讲给总理听。我又叙述了一遍，未等说完，总理点点头说：“我知道此事。”总理向主席做了汇报，并将救灾措施一一说明，最后总理说：“绝大部分灾民已返回家园排涝抗灾了，只有少数人不听劝告，滞留在城里，政府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不久就会回去的。”这时，我听到主席轻轻的“噢”了一声，还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脸上又露出了往日的微笑。我明白了，刚才主席是为那些受灾的群众忧虑不安。我暗暗地庆幸周总理来的真及时，讲明了情况，解除了主席的忧虑。否则他老人家又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 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大约54年夏，我们在北戴河执行任务，有几天因受台风影响，气温骤降，海上风大浪急。从山上往下看，浪卷黄沙，把靠近岸边的海水都变成浑的了。往日喧闹的海滨，突然变得异常冷清。这种气候莫说下海游泳，躲在屋里还觉得很凉。晚上见到主席，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天游泳了么？”我惊讶的

说这么冷的天谁还游泳。主席笑着说，“哎呀呀，你们这群小鬼还不如我这老头子呀？”我连忙说：水太浑了，全是沙子。主席说：“游过这一段就好了。”我又说，风那么大，浪那么急我可不敢游。主席笑了笑耐心的对我说：“这点风浪有什么可怕的，它还是怕人的哟，你一游它就给你让开路了，我和往日一样的游了，这不很好么。”听了主席这番话，我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我想主席不仅仅在谈游泳，而且在倡导一种精神；那时他老人家已过花甲之年，在那么恶劣的气候下，仍然坚持下海游泳，正如他诗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当时，我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那种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和勇气。主席看到了我们的弱点，但他从不用大道理对我们进行说教，而是抓住一些小事，循循善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 毛主席关怀我们成长

主席对青年人的成长极为关心。无论是工作、学习或生活，只要有机会总要过问。就连我们找朋友的事他也要操心，甚至亲自出面帮忙。对我们的学习就更为关心，记得1955年，主席对警卫战士讲话时提出：你们应有三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警卫团积极落实了主席指示，办起了速成中学。他老人家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并用自己的稿酬为大家买了书包、课本、字典等学习用品。此后形成了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团里也为机关干部办了文化夜校，我也参加了初中班的学习，遗憾的是我们晚上经常有演出任务，保证不了上课时间，未能坚持到底。

主席与我们谈话时常常问到学习问题，我记得他不止一次的告诉我：要养成每天看报的习惯，要关心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了。他经常问我都看什么书，喜欢读什么书。有一次我告诉他我订了一份《新观察》杂志，我很喜欢看。他听了笑着说：“要学会观察事物不是很容易的。你好好学习一下如何观察人，如何观察事物吧。”主席问我看《红楼梦》么。我说看过，只是其中许多诗词看不懂，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他说：“多看几遍就懂了，那些字不认得记下来问我。”后来我又看了《红楼梦》，其中的疑难字通过查字典，向周围同志请教也认得不少，我未去打扰他老人家。但他对我们的教诲是极有耐心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说到某地落一块“陨石”，我说那个字我不认得，他问怎么写，我伸出手在手心上边划边说：一个反耳刀，一个员外的员，主席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告诉我念什么，我记得非常的牢，只是读此字时也代有湖南音。主席鼓励我们学习，也支持我们学习。58年文工队撤销，我申请去北大荒。59年又调回北京工作。主席知道后很高兴，让李银桥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饭，饭后谈话中我谈到我文化水平太低很想学习。这时主席靠在沙发上，听到我说要学习，他立即坐了起来，认真的问我：“你想学什么，有什么具体打算么？”我一时未回答，他又接着说“我能给你帮点忙么？”当时我确有学习愿望，却无具体打算，学什么，去那儿学？我回答不出。至今想起此事都非常遗憾，如果当时我回答的清楚、具体，我相信他会帮助我实现学习愿望的。

#### 我收到毛主席的信

58年我们单位撤销了。当时有几种选择，我们一群年轻人，放弃了留在城市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几经周折，最终获准随几万名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去开拓祖国的北疆。

我将此事告诉了主席，对于我的选择他极为支持，当时他很动感情的对我说：“你们要离开这里，我是很舍不得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程，你们都很年轻，应该远走高飞。”说到这里，他口气一变，又像往日那样风趣的说：“不过你走后可不要把我这老头子忘了，要经常写信，谈些你们那儿的新闻。”

58年3月，我们告别了首都，北上的列车把我们带到祖国北疆的小城完林。不久，收到好友小刘的来信，她说自我们离京后，毛主席很关心我们，多次向她询问我们的情况，她向主席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并将我写给她的信请主席看了。看完信主席说：“他们真的把我忘了，也不给我写信。”小刘建议我快给主席写封信，由她转交。说心里话，离开北京后，我非常想念主席和其他几位首长，我很快给主席写了信，报告了我和我们这批同志的情况。

59年春节前后，收到小刘的信，与往常不同，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除小刘的信外，还有几张宣纸，一行行熟悉、遒劲又洒脱的字迹跃然纸上，“是毛主席写的信？”我高兴的跳了起来，可忘记我是站在土炕上，事后发现我将炕跳塌了一块，主席的信除了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对我所选择的道路再一次给予肯定。他信中写道：“...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会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高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占用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高飞转业，于人民事业有利.....”我在远离北京的祖国边睡，在没有炉火的小屋里，气候是那么的严寒，此时身上顿觉注入一股暖流。北大荒的生活真是很苦，但我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 一封未寄出的信

59年夏我调回北京。小刘告诉我：前不久主席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她知道我要调回北京，此信就未寄出。我激动的从她手中接过信后，急不可耐的打开一看，他老人家还是那么亲切的关怀着我，后边他又写着“寄诗一首，闲时一读如何？”哎呀！还有一首诗！我极力让我激动的心平静下来，仔细的读下去，这是一首七律，题名《送瘟神》，信后边的署名是主席在陕北转战时曾用过的化名——李得胜。

主席写给我的是《送瘟神》第二首，当时读了不十分明白，事后了解到他写此诗的背景，我才理解老人家送诗的意义。我也更深的感受到，作为人民的领袖，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江西余江县，首先根治血吸虫病的消息。主席看了之后竟然夜不能寐，欣然挥毫写了此诗。他老人家这么激动是有原因的。早在56年主席就知道南方许多地区流行大肚子病，于是他在杭州开会时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调查情况。当这些同志向他汇报了血吸虫病给群众造成的痛苦和危害时，主席坐不住了，当即决定请有关领导和专家们尽快开会研究如何消灭血吸虫病的措施。主席说：“我们打倒了人为的敌人后，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打倒自然界的敌人。”还说：“我就不相信消灭不了血吸虫。”此后，在主席亲自关怀下，成立了消灭血吸虫病小组，领导、专家与群众相结合，进行了一场与血吸虫病的斗争。仅用两年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他老人家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了解了这一背景，再读这首诗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为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福与自豪。

毛主席热爱人民，时刻把人民的疾苦系在心上，他将毕生的精力都贡献

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创立的辉煌功绩，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及警卫战士的亲切关怀以及他那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也将永远铭记我心中。值此，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

## 在最后的日子里

周福明

毛主席离开我们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来，我丝毫没有减弱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9年12月26日，毛主席66岁生日那一天，我在杭州有幸第一次给主席理发，主席对我还比较满意，就把我带往北京。先是做主席的理发员，很快又当卫士，负责主席生活管理的工作。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个春秋。与主席朝夕相处十七年，要讲的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尽。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借此之际，我想主要谈谈主席晚年最后日子里一些情况，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不尽思念。

进入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主席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三〇一、三〇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心情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在主席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我为他送饭、开饭。可这时的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精心地为他老人家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主席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隔断时间把食物往管子时注入一次。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阵，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许多工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插不上手，但卫士值班仍照常进行，我们没日没夜地为配合医疗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毛主席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地，忘我地工作着。我时常看到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个不停。我心里很难受，真想劝主席您喊一声吧，您叫一声吧。可我们的主席从来也不喊，从来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他以顽强、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

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四十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主席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主席不停地看，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替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彻底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壮语。

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字帖。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我到主席身边后，看主席读这套书，有的起码读过十遍也不止。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看起来眼睛也感到不那么费劲。当时送主席阅看的文件，事前都要由秘书局和部队的同志把铅印件抄成大字。

主席的生活习惯历来怕热，他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髌骨早已长出了褥疮。特别是进入6月，天气逐渐地转入夏季，更觉得炎热难耐。一天，躺在床上的主席实在感觉闷热难忍，我们想有什么办法把铺的凉席换一换。张玉凤想了个主意，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主席抬起，自己赶紧去换床单下铺着的凉席。主席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有来得及去换，主席就昏了过去。肺心病最忌讳动，这次搞得很紧张，惊动了华国锋。怎样替主席换凉席成为一件大事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经过反复考虑、研究，最后采用“换床”的方法。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

新做成的床长220公分，宽140公分，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木质的床头，所不同的是它还带有医院病床的功能，称它为“治疗床”。床底四周用四棱钢固定，床板可以升摇，床的四腿还是轱辘的，原地能够360°打转。我和警卫战士先反复训练。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找来了与主席体重相近的厨师进行试验。我按照主席的生活习惯，先把要换上去的床用褥子、凉席一层层地铺好，再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再把它与主席躺着的床相并。而后我和警卫战士们从并床的这边，拽着主席躺着的床单，均匀地使劲，慢慢地把主席从原来躺着的床上拉到要换的床上。实践证明，换床的办法是可行的。当时华国锋也下了令：“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我们到现场。没有你小周在，没有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床谁也不能换。”以后，只要主席提出，政治局常委、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三方到位，床才能换。

1976年7月28日深夜，我没有睡觉，和往常一样在值班室里值班。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听到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哗啦啦，……”响得非常厉害，也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在场的人都忽地一下围到主席身边，屋里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有位同志喊：“小周，快！主席的头。”

我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弓下身挡住。

很快送来消息。在我国的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刚才的一切是震中的波及。现在唐山、丰南地区仍处在余震之中。

游泳池的房屋有些是木质结构，再加上长久失修，房子比较陈旧。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做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较新，相对游泳池来说要安全得多。

地震后的几个小时，警卫中队的战士用担架把主席抬到“二二”。当时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下了，抬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晓。

毛主席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来了。”他搞清怎么回事后要求回游泳池。

是华国锋亲自来到主席跟前向他解释、做工作：“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主席还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讲：“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唐山、丰南地区的地震逐渐地趋于平静。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这场地震，伤亡人数达24万多人，其它的损失难以估量。主席不禁为此而落泪。8月4日，毛主席派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递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可毛主席他自己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伴随着唐山、丰南地区的余震，永远离开了他居住的游泳池。

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9月8日，主席去逝的前一天。

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很快，我发现从主席的鼻子部位渐渐地变白，这是体内血液下沉的结果。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处理主席后事的工作开始了。为了要把自己与主席十七年的经历画个圆满的结局。我再三地向领导、组织恳求，希望自己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修最后一次面。

要求一提出，我就默默地去做准备。为主席理发十七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里如此地沉重。我打开理发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围布、推子、梳子、篦子、刮胡刀、……。它们并不脏，每次我用过之后都要擦净，用酒精消毒。可此时的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拭，不知多少遍。我还特意选出几把篦子，同以往一样用棉花一把一把地梳好。

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的工具，是如此地亲切，就好象是一条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

我默默地期待着！

凌晨三点来钟，也就是主席逝世后的三个小时，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当汪东兴告诉我这一消息时，难过之极的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

主席已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了，头发凌乱不堪且参差不齐。这还是主席病重期间，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剪的。他的胡子我倒刮过几次，很快又长了出来。

我揣着理发工具箱走到主席床过，有些迟疑了。主席安祥地躺在那里，他太劳累了，太疲倦了，我怎能忍心打扰他。

“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我们互不干扰。”主席的话又仿佛在我的耳旁响起。我暗暗地说：“主席您安心地睡吧，我决不会打扰您。”

我弯下身子，手中的推子在主席的头上轻轻地、慢慢地来回移动。

这是我凭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此时的主席身体都开始僵硬，更不能动了。象主席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弯着腰是理不到的。为了不打扰主席，使他老人家感觉得舒服。剃右鬓角的头发时，我干脆跪在地上，扒在床边为主席剃；剃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顺着他躺着的姿势，这边扒一下，那边躺一会，稍微偏动主席的头部。

我浑身是汗，为主席服务十七年，除了第一次为主席理发，再没有象今天这样。是激动还是紧张，是悲伤还是难过，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地模糊不清。

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主席适应什么热度，用手一试就知道。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似乎变得黑了，再用篦子反复地篦，立刻显得乌黑发亮。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似乎主席又精神起来。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很快又回到游泳池住地拿来衣服为主席穿好。内外衣都是新的，是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准备替换被主席穿破的衣服。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用上了。中山装的颜色也是主席最喜爱的灰色。

1976年9月11日早晨，我哭送主席。我同负责主席警卫的战士一起抬着老人家的遗体，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一步地离开“二二”、离开了中南海……。

（元莉整理）



## 后 记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 1990 年 3 月开始，陆续约请了部分长期追随毛泽东进行革命和建设工作的老战友、老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撰写回忆文章，编成《缅怀毛泽东》一书，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已于 1992 年 8 月编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入下卷的 43 篇文章（约 55 万字），同上卷一样都是作者不顾年迈、体弱和工作繁忙，专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撰写的。有的文章的基本内容虽已见诸报端，但作者这次又重新作了改写和增补。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赵福亭、蒋建农、蔡钊珍、刘益涛。汪裕尧审阅了部分文稿，冯蕙、黄允升、张素华等也对本书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帮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